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A Study on Modern Japa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
历史渊源

〔日〕 額纈厚 / 著 顾令仪 申荷丽 等 / 译 马彪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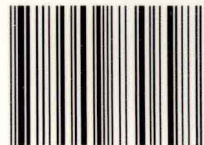


作者充分吸取亨廷顿、珀尔马特、芬诺、马科松等西方学者的政军关系理论，并在三宅正树有关政军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时代为顺序，选取了从1912年日本军部要求增编两个师团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大正、昭和时期的政军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军事介入政治的详细经过及其背景，剖析了军事介入政治的真实原因。

作者对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研究，是基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推动了新时期日本学界对于近代军国主义形成体制的关注，为日本政治、军事体制的变革和政军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上架建议： 中外关系

ISBN 978-7-5097-3089-8



9 787509 730898 >

ISBN 978-7-5097-3089-8

定价：59.00元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A Study on Modern Japa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近代日本政军 关系研究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
〔日〕 纘纘厚著；顾令仪，申荷丽等译；马彪校．—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ISBN 978-7-5097-3089-8

I. ①近… II. ①纘… ②顾… ③申… ④马… III. ①政
治制度史—研究—日本—近代 IV. ①D7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2777 号

·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

著 者 / 〔日〕 纘纘 厚
译 者 / 顾令仪 申荷丽 等
校 者 / 马 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吴 超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王洪强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0.6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360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089-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1-808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近代日本政軍関係の研究』

作者 額瀨厚

岩波書店

© 額瀨厚, 200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根据日本岩波书店 2007 年版译出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序言

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60多年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进行的努

力。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青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于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代友好下去。而对于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

论，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于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

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2008年5月

政乎军乎：纘纘厚《近代日本 政军关系研究》中文本序

徐 勇

—

本书著者纘纘厚先生，是中国读者越来越熟悉的日本学者，现任日本国立山口大学教授、副校长，早年就读于日本一桥大学，曾师从著名军事史、政治史学者藤原彰，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本书译者包括申荷丽、顾令仪等多名学有所成的年轻学者，和在日多年的留学生，他们的学养和语言功底保障了中译本的学术质量。

纘纘厚教授作为日本政治与军事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身兼行政职务，在学术研究诸领域工作十分繁忙；又是日本知名社会活动家，依学者的良知，尊重历史事实，长期致力于反对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等违宪活动，为维护正义、坚持日本的和平民主发展方向做出了贡献。他曾多次访问中国海峡两岸、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历史，并努力开展和各方学者的合作与交流。

在治学数十年间，纘纘厚教授发表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其成名著作为涉及日本战时历史及其政治军事体制的《总体战体制研究》（1981），其后陆续出版有涉及战后日本政治和

中国等国家关系的《检证·新方针安保体制》(1998)、《周边事态法——新地区总动员法·有事法制时代》(2000)、《宪法九条和日本的临战体制》(2006)等。涉及日本政治责任及历史反省的著作有《侵略战争——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1999)、《文民统制·自卫队将走向何方》(2005)、《“圣断”虚构和昭和天皇》(2006)、《田中义一：总力战国家的先导者》(2009)等。本次出版的《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据2005年岩波书店版本译出，是著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积累多年成果所改写的力作。

本书按时代顺序，选取1912年军部要求扩军增编两个师团的事件为开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日本大正与昭和前期政治与军事历史，作为本书研究范围。该时段的基本史实，是政党与军部激烈角逐，其后军部战胜议会政党，走向军事独裁，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全书将上述历史划为三部六章，加上序章（介绍全书主题思想、相关理论学术流派、研究方法等）与终章（全书内容与论点总结），脉络结构十分清楚。该中文版将为中文读者研究这一段重要历史，探讨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政治与军事结构特征，提供有效的帮助。

二

研读本书的内容、考察其学术意义，需要对近代日本政治军事体制的发展脉络，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回顾。

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了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在思想理论方面，担任过内大臣、政府访问欧美使节团团长的岩仓具视，曾依据对欧美国家的考察，主张现役军人不干预政治。在岩仓等人的指导下，参与起草《军人敕谕》的福地源一郎为《东京日日新闻》写社论：“由是观之，不干预政治乃陆海军人之本分；不怀念政治思

想为军人之大义。”^① 他结合历史传统进一步指出：“吾国之军人政治，沿习所及，上下实有七百年之久，其余势难以消除，乃至于维新之后，数度蒙受其祸患。”^② 《内外兵事新闻》杂志发表社论《论军人与人民之关系》，也认为：“考察我国现状，文化逐日进步，往日文武混杂、军人为政之弊风，几近绝迹；军人唯磨砺忠君爱国之志操，期望于国家有事之时建立功名，于政治大权则毫无干涉，悉数委诸文官之手。”^③ 明治时期出现的这些反对军人干预政治的主张，虽然一直持续到昭和时期，且一直被政党民主派用为同军部的斗争，但其作用有限，始终未能阻止军国主义的持续膨胀。

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天皇体制，在皇军的名义之下建立国家军队。1882年颁发《军人敕諭》，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保持对军人实施绝对的精神思想控制。在体制方面，1878年设参谋本部直属天皇，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大权，规定军令长官有关军令事项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确立了“统帅权独立”原则。1889年“钦赐”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1900年规定了陆海大臣由现役武官专任，1907年4月4日天皇正式批准了《帝国国防方针》及其附件，确立进攻型对外战略，完全巩固了军国主义的统治。

随着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陆海大臣势力的膨胀，军方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日趋活跃，和政党民主派实力之间的对立加剧。至1912年前后，军方自称为“军部”，社会政党势力方面则批判为“军阀”。军部成长为与政府内阁及主张民主主义的政党相对抗的势力集团，形成了一段时期的二元政治现象。这也是亨廷顿所指出

① 转见〔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东京，有斐阁，1956，第531～532页。

② 转见〔日〕藤田嗣雄《明治军制》，东京，信山出版株式会社，1992，第285页。

③ 转见〔日〕藤田嗣雄《明治军制》，第284页。

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为政治化的军队’。”^① 最后的结果是，军部在1930年代取代政党内阁，直接控制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军部法西斯专制。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多重性质特征的研究，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的重视，在中日两国俱有大批论著。1930年代是军部与政党对立最为剧烈的时期，有日本的中野登美雄《军人と参政权》（1934）、《军人的政治的中立の原则の发生と其综合的政治的意义》（1935）及《统帅权の独立》（1934）等著述，还有藤田嗣雄《欧美军制研究》（1934）等代表性著作。战后出现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下），三宅正树《昭和史の军部と政治》（全五卷），藤原璋《天皇制と军队》，井上清《大正期の政治と社会》（1976）、《日本の军国主义》（1975），安部博纯《日本ファシズム研究序说》（1995），以及户部良一《逆说の军队》（1998），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有深入开拓，多被评为日本学界前沿著作或经典作品，且均涉及或较多关系到政军关系问题。但上述政治、军制等多方向的杰出研究，并未结束有关日本政军关系的研究，相反进一步凸现了该研究视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按早稻田大学三浦裕史的论述，“在基本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之下发生的大战时期，及其之后各国有关国家与政治理论的代表性文献中，没有对兵权与军制的问题进行研究”。^② 明治大学的三宅正树也指出，即使在美英等国学界，对于国家政军关系的研究也不太受到重视。

政军关系研究（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中心内容，是考察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几

① S.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26.

② 转见〔日〕藤田嗣雄《欧美军制研究·题解·注（5）》，东京，有斐阁，1991，第637页。

乎是所有国家不可回避的社会政治问题。早期资本主义理论家亚当·斯密（1723～1790）曾指出，人类文明发展伊始，军事力量即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更离不开国家常备军的保障。他强调说：“一国家要永久保存其文明，甚或要相当长久保存其文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编制常备军。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野蛮国才能抵御外侮；同样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突然地而且相当地文明化。”^①

亚当·斯密较早地关注到军权干政问题，他认为军权同专制主义并无绝对关联，如果建立了稳定的政军关系，无论军权还是民政的权力形态，都就能保障民主与自由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发展军事力量需要改善社会大环境，而社会发展需要分工，军队是社会分工后的一种职业，亦是高尚伟大的技术职业。

这一职业化理论，为后来的亨廷顿所发挥。基于美国建国后国家武装力量的曲折发展历史，亨廷顿指出军事力量的扩张，会危及国家政治基础。如果有效限制军事力量的参政权利，发展其军事职能之专任，即可使之处于有用无害的地位。亨廷顿倡导“文官控制”与“军事专业主义”，中心点在于搞好军人和文人集团之间的位置关系，通过军人专业化路径，使军队成为国家有效控制下的职能机关（或曰工具）。由于美国在世界的特殊地位，亨廷顿等人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述多方面的理论与史实说明，政军关系研究，属于新兴研究范式，不仅可以有效分析世界各国的近现代历史，也能够适用于东亚的中国、日本等国的政治与军事问题考察。

战前日本由于军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军人政治不断膨胀，形成国内军事独裁，对外频繁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此过程之中，军方人士自称“军部”，频繁发布系列文书，直接要

^① [英]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69页。

求政治参与权。海军大佐水野光德于大正10年（1922）在《东京日日新闻》发表《军人心理》一文，要求解除明治时期现役军人不干预政治的禁令：“军人切望之二是参政权……现今普通选举的呼声高涨，连妇女也都要求参政权之时，对于捐纳金税之外捐纳血税的军人要求参政权，不能认为是忤逆大势。这是军队的最好的安全阀。特别是要打破日本人最为厌恶的军阀的话，给予军人以参政权是最好的捷径。”^①有的试图对政治概念提出不同解释，以便在名义上的不干预原则之下，达到实际上的干预政治的目标。如纘纘厚早年揭示，陆相宇垣一成强调：“余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但军人又担负着国防，国防不全则国危。那么，就不能把议论国防问题说成是直接干预。”^②

在日本对外全面战争时期，一些干预过国内政治、发动过对外战争的军人，也有人转换视角以追求战争出路。其典型人物如石原莞尔，因其策划侵占中国东北“有功”，被称为“满洲国之父”。面对七七事变后的困局，他又主张军人退出政治而专注于武力发展，1938年8月提出《关于军队退出政治的意见》，强调：“军人干预政治，必然地要造成军内的政见对立，会破坏其统一。直面这一值得担忧的事态，拯救国家与国军之道路，只能在于军事当局通观大势，断然、自觉地从政治中退却，舍此并无他法。”他翌年2月又提出《关于军队政治参与的意见》，主张军队“不失时机地从政治的直接参与中退却出来”，实施“政治关系大整理”，包括“1. 将文官位置上的将校军官迅速撤离；2. 举凡政治交涉事项，均唯以文职之大臣、次官、参与官担任”等措施。^③问题是，上述诸多限制军人干预政治的声音，在对外侵略战争的枪炮声中日渐式微。

① 转见〔日〕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第349页注释参考。

② 〔日〕纘纘厚：《总体战体制研究》，东京，三一书房，1981，第127页。

③ 〔日〕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东京，原书房，1978年增补版，第255~256、284~286页。

政党民主派反对军人干政的政治主张，在学术界得到了不断的阐释。如中野登美雄借助于分析欧美国家军制，提出：“军人对于国家有军事上的服务关系，因而由服从军事统帅而被置于军的特殊规律之下的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加以一定规制。对此，我国法律与欧美一部分国家的国法相同，不止是免除军人自身的所谓参政权利，另于‘政治’事项之请愿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国务要求权以及自由权也被限制。”总之，“一言以蔽之，根据军队的特殊使命，要求军人实行政治中立的原则，是为差别主义最根本的内容”。^①

限制军人干政原则在法制上的名义存在与实践中的被打破，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政军关系的特征之一。但这一矛盾终不能依靠其自身力量加以调整，其后是在战败投降之后，由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实施管制，推行民主改革方获得解决。

战后日本政治军事体制的变革，为政军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战争反省的思想意识，推动了战后学界对于军国主义体制问题的关注，进而促进政军关系研究，产生了一批崭新的学术成果。

三

根据上述历史进程考察及学界先行研究结论，可知无论近代日本历史研究，还是欧美各国的政治军事问题探讨，均包含政军关系领域的重要内容。纘纘厚的《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不仅在该领域做出了新的开拓，也丰富了政军关系领域的理论学说与方法论的发展，成为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作为贯穿本书的上述视角与方法论，著者在前言与序章中作了

①〔日〕中野登美雄：《军人の政治的中立の原則の発生と其総合的政治的意義》，《早稻田政治経済学杂志》第39号，1935年1月。

全面介绍，尤着重介绍了西方学界的“文官控制论”，特别是亨廷顿分析日本所作的“二重政府论”，S. 芬诺的“政治文化比较论”等论述。广泛吸收了西方学者的前沿学说，但本书并未拘泥于西方思维，而是结合日本政治与军事体制的内在结构，作了切合实际的考察分析。

纒纒厚重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总体战体制的政治作用，指出：“在大正民主运动的环境中，一方面是民主主义（民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民众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总体战化’的新军事秩序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样，民主主义和以民众动员为绝对条件的军事主义之间的调整，就不断地进行着。日本型民主主义（民本主义）和日本型军事主义（军事优先的政治体系）的共存关系，证实了在‘总体战体制’不断构筑的过程中，政军关系本身也成为被规定的要素。”（日文版，第10~11页）他又指出，日本国家体制的建立，并未经受西方那样的“市民革命”，而是同天皇制联结为一体，为追求战争目标而被纳入总体战体制。于是在多元化权力结构的演变中，“最后形成为军部优先的政军关系”（日文版，第12页），即“日本型政军关系”。

纒纒厚沿此关系线索展开全书论证，表达了同西方理论不同的学术思考，所采用的按时代变化划分为三部六章的方法，客观而清晰地揭示了演变的进程。本书第五章分析的由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政军间的角逐，第六章分析二二六事件之后以陆军为中心的政军关系，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军部的“合法的间接统治”结果等论述，均富有独到见解。其中，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驻朝鲜日军不待军令擅自越境侵入中国东北、获得军政当局认同的事件，著者强调是为标志性事件，表现了日本“军方炮制既成事实，政府做出事后承认，此种连带关系，被定格为延续其后的政军关系基本结构”。（日文版，第314页）这些论述无疑值得关注。

值得对比参考的是，上述九一八事变之后，作为中国方面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面对“政乎军乎”均已全面运转的日本战争机器，发表《敌乎友乎》的政策性文书，试图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说理方式，化敌为友。但结果是，两年之后，不仅中国大陆，而且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均烧遍了战火。所以，了解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结构，不仅对于日本历史，而且对于近现代中日双方，以及亚太地域关系史研究也十分重要。相信通过本书的研读，各位读者能够有所收获。

四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探讨中、日军事史与军政关系的一些问题，笔者读过纘纘厚《政军关系论的一点考察》、《总体战体制研究》等论著。没想到的是，经过了20余年的神交，2008年笔者探访明治维新的萨摩、长州等发源地，在山口大学与纘纘厚教授相识了。当时，漫步于获市美妙的山水之间，细听教授所作诸多历史与风土社会介绍，其收获之大与感触之深，至今不能忘怀。

作为明治维新发源地，当地“文化财”即文化遗址的周密保护，无不令到访者印象深刻；但那些刻意的彰显式纪念物，则以其蕴涵于中的负面因素令人怀忧。如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鼻祖山县有朋建造的高大纪念碑，保留完整的扩张主义政治家伊藤博文豪宅，还有军国主义政治家田中义一的纪念铜像与豪华宅第，等等。普通的游客，不知是否联想那些“辉煌”纪念之下屈死的邻国冤魂；而洞悉个中历史的研究者，又该如何履行肩负的责任呢。

后来收到纘纘厚教授寄来的另一本有关田中义一的专著。书的后记写道：自1991年就职山口大学的20余年中，不知多少次陪同到访客人寻访历史遗迹，也时常会在松本河畔的田中义一豪

宅的廊侧坐下，“浮想其时代的历史风景”。近些年，纘纘厚教授批判右翼参拜靖国神社，支持广岛高等法院的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当是数十年持续研究政军关系历史，以及这一“浮想”的必然结果吧。

于北京大学燕北寓所

2011年4月9日

中文版序

此次,承蒙中国著名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拙著《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提供珍贵的出版机会,感到格外的高兴和荣幸。在此,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朋友尊敬的徐勇先生为介绍和联系该书的出版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徐勇先生是中国政军关系研究的著名学者,2008年和2010年承蒙徐先生提供机会,我曾两次应邀赴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专题讲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步平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介绍文”,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步平先生是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在日本享有盛名。此次能够承蒙先生为本书撰写“介绍文”,深感荣幸。

将本书的日文版翻译成中文是项极其困难的工作,我的研究助手和指导的博士硕士生为此付出了诸多的努力。担任本书翻译工作的是雷秀雅(北京林业大学)、顾令仪(西安交通大学)、毕克寒(中国东北大学)、毛莉(北方民族大学)、申荷丽(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兼职讲师)、郭鑫(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博士生),他们分工协作,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翻译书稿完成后,又请山口大学的同僚马彪教授对译稿进行了全面的审阅修订。马先

生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优秀历史研究者，去年他回北京期间集中完成了书稿的审校，对马先生的大力协助深表感谢。

本书主要通过探讨分析日本国家的权力构造和保持天皇军队的特权制度，进而阐明在近代日本国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步入“战争国家”之路。在日本，本来应该由政治统治军事，但是，反而陷入了军事介入政治的现实状况。通过分析这一状况的原因，剖析日本实施“战争国家”的本质，同时，必须构想和实现不再重蹈“战争国家”覆辙的制度。因此，本书不限于从思想运动方面论述日本军国主义，并且通过权力构造和政治过程来加以分析和认识。

希望本书在中国能为研究者和知识人，以及诸多的研究生和学生等广泛阅读。

日本国立山口大学教授、政治学博士

纈纈厚

2010年10月

目 录

政乎军乎：纒纒厚《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

中文本序

徐 勇 / 1

中文版序

1

绪论

1

- ◆一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及其问题所在 1
- ◆二 政军关系论的导入与本书的分析视点 5
- ◆三 本书的结构与目的 12

序章 从政军关系论看近代日本的政治与军事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史研究的理论适用问题

15

- ◆一 前言 15
- ◆二 政军关系论的成立经过及其期待的作用 18
- ◆三 政军关系论者有关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史的研究
——亨廷顿、珀尔马特、塞缪尔·芬诺、马科松的
政军关系论 30

◆ 四 政军关系论的新展开

——以三宅正树《政军关系研究》(2001)为参考 48

第 I 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大正末期的政军关系

第一章 围绕两个师团增设问题的政治与军事对立	65
◆ 一 前言	65
◆ 二 陆军的扩军要求与西园寺内阁	67
◆ 三 扩军问题的政治意图	80
◆ 四 大正政变期间田中义一的政党观	92
◆ 五 陆军的危机意识及其解决办法	101
◆ 六 结束语：对反政党观的助长	113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政军关系的变化	119
◆ 一 前言	119
◆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与应对	122
◆ 三 对构筑国家总体战体制的展望	140
◆ 四 结束语：对总体战体制构筑的展望	159

第 II 部 大正时期围绕内政外交展开的政军关系

第三章 西伯利亚干涉战争时的军事领导与外交领导	165
◆ 一 前言	165
◆ 二 出兵的经过及其构想	167
◆ 三 田中的变化与对原敬的接近	182
◆ 四 结束语：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原型	202

第四章 围绕陆军军制改革问题政军之间的抗争与妥协	206
◆一 前言	206
◆二 对军部的批判和政党的军制改革案	209
◆三 山梨—宇垣裁军的断然实行及其内容	219
◆四 削减四个师团的真相与陆军军制改革	230
◆五 结束语：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出台	241

第Ⅲ部 昭和初期政军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政军关系对立与统帅权问题	247
◆一 前言	247
◆二 关于统帅权与统帅权独立制的解释	250
◆三 统帅权侵犯论争的背景与展开	256
◆四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外交及战争领导	270
◆五 结束语：认识乖离的政军关系	281

第六章 至日英美开战前夕政军关系的改观与日本型 政军关系的成立	283
◆一 前言	283
◆二 九一八事变后至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政军关系	286
◆三 中日全面战争前后期政军关系的改观	303
◆四 结束语：“合法的间接统治”的归结	319

终章 日本型政军关系的构造与特征	
——走“军民融合型统治”的道路	322
◆一 前言	322
◆二 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与统帅权独立制	325

- ◆三 二战之前日本政军关系的构造特征 339
- ◆四 结束语：政军关系论的当前课题 352

参考文献 357

译后记 388

绪 论

一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及其问题所在

日本近代历史是以漫长封建社会的解体为开端的。军队和政党这两大国家机器在封建社会解体、近代化道路开辟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军队与政党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在日本，充当对内、对外暴力机器的军队的出现要早于政党。这是因为为了维护创建近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国内秩序，与整备警察制度同样，军队的创立得到极力强调。军队创立之后，作为近代日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国民之间的利害关系进行调整的重要政治机器，政党才应运而生。

由此，在近代日本社会形成过程中，军队和政党这两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机器诞生并启动，使日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近代国家。但是，由于军队和政党这两大国家机器的启动时期不同，因此两者之间的深刻对立和激烈抗争也就陆续凸显出来，即一方是依然残留有浓厚封建体质的明治国家军队，一方是受英法等西方自由主义、立宪主义思想影响的政党，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作为明治国家的两大国家机器——军队和政党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相互协调的关系。

翻阅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哪个国家，在从封建社会发展近代社会的过程中，军队和政党这两大国家机器的诞生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在欧美，近代社会的国家军队是经过革命，以“市民军”或者“国民军”的形式转化而来的。因此，在军队和政党之间，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协调、互补的关系。然而，日本近代军队没有经过市民革命，是在与天皇制度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创建的。因此日本近代军队在完成消灭封建制度这一历史使命时，就无法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明治军队和以欧美模式为典范的日本政党之间存在不和乃至矛盾的主要原因。^①

正因为这样，自由民权运动以及被称为民党的日本各政党的追求——彻底消灭以军队为社会基础的封建秩序，建立欧美型近代化的崭新政治秩序，就受到了本该以消灭封建社会为己任的日本军队的抵抗。日本军队从一开始就带有封建性质，下述竹桥事件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1878年，驻扎在东京竹桥的近卫炮兵大队和东京镇台炮兵大队大约250名士兵，发动了日本陆军创建以来最大的叛乱。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明治政府领导者，为了使军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企图利用这一历史时机使参谋本部独立，并确立所谓“统帅权独立制度”。于是，在这一制度的成立过程及成立理由中，便集中体现了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构造特征。

“统帅权独立制度”是排除政治介入军事，排除政治统治军事的制度；或者说是拒绝政治对军事的统治，阻碍欧美型近代化进程，维护封建秩序的制度。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总体战”战争形态，即在战争形态趋于近代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军队开始克服自身的封建意识，通过自我革新，产生了强化与政党合作的意向，并开始摸索如何处理政治和军事之间的互补关系。

^① 有关日本军事机构的基本特征，参照額瀨厚《天皇制国家の軍事機構》，菅孝行編《叢論日本天皇制Ⅱ 天皇制の理論と歴史》，拓殖書房，1987。

上述明治国家的统治结构可以总结如下：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国家的统治大权全部集中于天皇，统治权力被分割成几个机关。通过对权力的分散和分权，削弱了凌驾于天皇统治之上的权力机构出现的可能性。结果是只有军事机构（军队）被作为天皇的直属权力机构，使军队成为天皇制国家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治日本这个近代国家，就是这么一个近代性和前近代性同时孕育的政治抉择的结果。在这里，军队扮演了贯彻天皇制国家绝对意志的重要角色。

和其他官僚机构相比，具有上述特征并负有上述作用的军事机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天皇制国家在残存半封建社会特征以及绝对性的同时，坚定地推行资本主义化，坚持不懈地建设近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军队作为一个威慑并抑制民众对政治民主化和各种政治权利要求的暴力机器，不断被强化和扩大。但是，军事当局并不是始终采取强硬的对立态度。在大正民主主义的背景下，当天皇制国家体制直面危机时，正如山梨军缩和宇垣军缩所象征的那样，军队也表现出一定的缓和姿态，在“国民的军队化”或者“军队的国民化”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形成的“总体战”的战争特点，军队也迅速制定出相应的积极政策。

日本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克服狭隘的国内市场的制约，在海外，首先选择了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为其资本注入地。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势必要以军事力量为背景，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战争政策为其外交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日本资本主义选择了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军事机构的膨胀这个构造性问题亦随之被固定化。

由此，本来是以维持封建秩序和确保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统帅权独立制”，结果却成了一个获得一定政治地位的制度。军事机构因有帷幄上奏权和“军令”等特权，所以和其他官僚机构相比，拥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军事机构（军队）在大正时期

的政党政治成立过程中，随着以民意为背景被选势力的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抬头，无论在组织原则上还是在行动原理上，不可避免的是，两者当初就不可能形成合作关系，而只能是对抗关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对立和对抗关系，特别是在指导外交和战争等方面多次凸显出来。

毋庸赘言，日本政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政友会和宪政会（民政党）两大政党实质上发挥着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政治部”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要优先追求经济利益的政党，与高举发展大陆国家日本旗帜、为此企图增强军事能力使扩大军备合法化的军部之间，出现了日渐明显的乖离。特别是在对华政策和如何保持与美英等国的距离上，两者都持有不同主张。这就是造成日本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各种局面对立化的主要原因。

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各种权力和各种势力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因此，在构筑“总体战体制”上，确立可行的国家目标成为日本社会各界的共识。为此，在抑制国内各种矛盾的过程中，政治和军事的一体化动向就逐渐表现出来。从那时开始，日本的政军关系，虽然在表面上依然是对立和对抗的关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已经开始摸索相互妥协和协调的方法了。的确，日本的政军关系并没有成功地实现欧美式的政治对军事的统治，而是在明治宪法规定下，在建构以军部为主导的“总体战体制”的总体认识下，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确立了军部优先的政军关系。

虽然最终实现了军事对政治的“合法性、间接性统治”，但是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最终保留“合法性、间接性统治”的历史事实及其原由。其理由是，对于军事对政治的“合法性、间接性统治”这个特征，不能仅仅停留在称呼其为“日本型政军关系”上，正因为军部统治具有其合法性、间接性的事实，使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型政军关系”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①我们今天面

① 着重号为原著者所加。

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课题。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对近代日本的政治课题与特征进行概观的基础上，把最能代表明治近代国家所孕育特征的政军之间的独特性居于问题的中心，在探求和整理历史事实中重温上述问题。笔者作为日本的政治学研究者，一直关心的就是“统帅权独立制”问题。因为这才是本来应该为政治统帅军事的合理的政军关系发生逆转，两者之间的关系被迫变成军事统帅政治的依据。^①因此，立体和综合剖析企图以依据统帅权独立制统治社会为目的的军部（军事）和与此相对抗，企图实现通过民意统治社会的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贯穿本书各章的共同课题。

二 政军关系论的导入与本书的分析视点

日本政军关系研究的倡导者三宅正树（现为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在其最新专著《政军关系研究》（2001）中，在认为政军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包括具现化所有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并包含与民主主义的成熟度相对应的固有课题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军关系这一命题体现着国家体制的最根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对近现代历史和政治来说，这确是其最基本的课题。”^②

① 与此相关联雨宫昭一指出“所谓近代日本的军事、政治的关系，具体是指统帅权独立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存在的军部和政党势力之间的关联。但有意思的是，体现专门性的军部以及体现利害理论的政党之间并不仅存在着对立关系，后者更成为了战争指导主体的事实”。参见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第5页。

② 参见三宅正樹《政軍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3页。三宅正树于书中还指出，可以归属于在日本的政军关系史的研究范畴之内的研究成果，虽然与欧美相比较确实依然处于劣势，但在此需要特别列举一些最近的研究成果。广瀬克哉所著的《官僚と軍人—文民統制の限界》（岩波書店，1989），作为专门从事行政学研究的笔者，持有与原本的民主主义相反的原理，论述了军队作为委托于公共权力的暴力装置，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统制的研究课题的著作。广瀬克哉在承认创出文统制的意义是为了有可能与相对原理并存的基础上，论述了关于战后日本的行政机构并不存在有效处理文民统制的制度。即，要想使文民统制

三宅正树还指出，与欧美对此命题的研究相比，日本对此命题的研

制度化就必须通过国会与内阁尝试使用民主统制来实施防卫政策的运营过程，因此并没有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文民统制制度。广瀬克哉还尖锐地指出，文民统制之所以没有被制度化是由于防卫政策的形成与运用过程本身成为了政治争论的焦点。战后日本的政治行动样式是以强行设置回避以上争论焦点的机构，作为政治焦点的回避政策最终防卫政策的运营完结于官僚组织的层次。广瀬克哉的论点，重复强调战后日本的防卫问题并没有成为公开的政策讨论的对象，广义上的政军关系论不仅针对现实的政治过程，而且在历史学、政治学、行政学和法学等相关各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并没有充分地进行深刻探讨。基于此点，笔者提出探究政军关系本来面目可能性的问题。

广瀬克哉的研究还指出，无论是在现实的政治过程还是在研究领域当中，当提出军事的领域时就会大大地提高政治焦点化的可能性。另外他还指出，战后日本也常常收敛于某种思想性极强的讨论中的特征。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无论是文民统制为获得其实效性，还是同时在宪法层次上应该以欧美的文民统制制度的基本为范本而进行规定，首先政军关系论的适用是不可欠缺的。此外，以安全保障政策为主要研究课题的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研究员西岡明在《現代の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知識社，1988）中指出“战后的民主主义体制下我国的政治、行政文化当中往往忽视了政军关系的视角”，以及在“前言”（第2页）中指出在积极地深入研究政军关系的过程中，提出政治与军事的并存与协调的理论作为其著述的目的。笔者认为，西岡明的著作也与广瀬克哉的著作同样是以战后日本以及欧美的政军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虽然没有直接言及战前期日本的政军关系，但通过文民统制实效性的制度化确立欧美型政军关系，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民主主义社会下政治与军事的协调性并存之路。

直接以战前期日本政军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成果是，李炯喆的《軍部の昭和史》（上、下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7）和永井和的《近代日本の軍部と政治》（思文閣出版，1993），以及雨宮昭一的《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关于雨宮昭一的研究成果由于在正文中提及，此处对李炯喆以及永井和的两篇著作简单作介绍。首先，作为日本现代史研究者的永井和的研究，是通过某种独特的手法精致到极限的政治史研究。另外正如其自身在“序章 视角与定义”中所阐述的，是“通过‘政军关系论性质的研究’的内阁史研究”（第11页）。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主要列举了“军人首相内阁”，尝试通过制度上的原理以及法制构造等分析在其与政治的对立与妥协的过程中成立的原因。其中永井和设置“第四章 关于政军关系理论的一考察”（第239~279页）一章，一方面批判性捕捉芬诺（Samuel E. Finer）的政军关系理论，另一方面对日本政军关系分析是否适用持谨慎的态势。有关此点的评价将会在正文的终章中进行阐述，在此就不再加以论述。此外，现在的韩国中央大学讲授日本政治史的李炯喆的著作，是追究贯穿亚洲太平洋战争期的政军关系的真正的政军关系史研究。李炯喆与永井和同样，一方面借用芬诺的政军关系理论，另一方面触及作为芬诺理论中心的“军部支配形态”

究并没有积极展开。

也就是说，在战后日本的政治史研究领域里关于政军关系史研究的地位依然没有确立，也没有突出的研究成果。三宅正树作为欧美外交史研究专家，很早就提倡在日本的政治研究中导入政军关系理论，并在近现代日本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但是即使如此，却仍然不能改变日本政军关系史研究不充分这一事实。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历史学界，日本战后的政治史研究一个显著倾向是，在研究对象上否定及排除军事，并在这一倾向上表现出过剩的意识集聚。相反，在将军事和政治相提并论这一点上却比较消极。在这种倾向下，军事理所当然被视为政治的从属，军事也只能是政治的一个领域。研究者一直心怀警戒和自制：如果不这样看待军事，是否会引发对军事的认可？

第二，战后日本的历史学研究重点一直停留在对战前军国主义的批判及分析上，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但是在政军关系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为何实质上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并走向独自发展的道路这点上，却缺乏分析和批

论，批判了芬诺所指出的日本政军关系的特征为“限制性地间接支配”的论述，提出是否是接近于“合法性的间接支配”的判断。此论点包含极其重大的内容，包括笔者的见解在内会在本文终章中具体进行论述。

其他在广义上属于政军关系史范畴的研究还有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岩波書店，1973），井上清《日本の軍国主義》（全4巻，現代評論社，1975～1977），大江志乃夫《日露戦争の軍事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76），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工藤美知尋《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下巻，南窓社，1982），三宅正樹主编《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全5巻，第一法規出版，1983），野村実《太平洋戦争と日本軍部》（山川出版社，1983），藤原彰《日本軍事史》（日本評論社，1987），角田順《政治と軍事》（光風出版，1987），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86），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研究史論》（校倉書房，2000），三谷太一郎《日本の戦争と政治》（岩波書店，1996），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成文堂，1996），佐藤元英《近代日本の外交と軍事》（吉川弘文館，2000），黒沢文貴《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山田朗《昭和天皇の軍事思想と戦略》（校倉書房，2002）等。

判。也就是说，笔者认为不充分的是，在积蓄对军事领域步入独立自主发展路线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把军事领域与政治领域的相互关系作为政治领域整体的问题重新思考这一视点。

第三，与上述两点某些部分稍有重复。日本战后历史学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对战前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运动、体制等进行阐明上，对军事领域的研究被纳入上述研究范畴。正如雨宫昭一在论述日本战争体制研究的特征时所指出的，占有主流地位的主张是“强调日本战时的体制是法西斯主义体制，是统治阶层全体对人民进行压迫、统治和排斥异端的体制，其背景是因为有前近代的残余存在”^①，在通过把战时体制以及军国主义定位为法西斯主义所取得的批判战时体制的分析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在对军事其实作为一个固有领域一直位于政治的对立面，并不断与政治之间派生出紧张关系这一点上的涉及以及分析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当然对于军事领域的研究在军事史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积蓄，事实上也总结出许多极为重要的教训。但是，其中对于以政军关系为分析视角的导入仍然暧昧。因此，对于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的相互制约性没有从正面进行分析研究，而是采取了从其中某一方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的态度。就是说，结果是政治史研究和军事史研究一直处于隔离状态，把两者同时并在同一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视角比较薄弱。

为了克服上述研究上的问题，笔者期待政军关系论的普及，也

① 参见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第2页。雨宫昭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各研究中，指出“一方面在战争的政治性侧面，虽然特别重视‘与阶级斗争的关联’，却存在轻视军事性侧面的倾向……另一方面重视军事性侧面的研究，其研究学者多数直接或间接地与其对象相关联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军事专业。再加之，成为其研究对象的每每来源于同一观点，无论是由于无视政治性侧面亦或是偶然性巧合，亦都强烈地存在作为相对于军事性侧面的外在条件来处理的倾向。可以说两者间的共同之处为均以其他侧面作为外在条件来处理”（第10页）。雨宫昭一接着指出政军关系论的重要性，在政治与军事的互相规定的同时，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联中才有可能开始把握两种契机的相对的独立性”，在把握政军关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

认为已到对政军关系史研究给予一定评价的时期了。特别是在今天的日本，战后开始的被称之为“文民统制”战后型政军关系从根本上开始动摇，如何进一步构筑合理的政军关系被重新摆在人们的面前。再者，面对目前美英等欧美先进国家军事组织和军事官僚进入政治领域的突出现象，重新重视对日本政军关系的关心，并最终实现与民主主义基本原理保持协调的军事领域的存在，迫在眉睫。

与如上研究史层面上的问题同样，在围绕军事在现代社会中存在方式这一层面上，导入政军关系论并使该理论精致化显得尤为重要。从上述观点出发，这里有必要对本为欧美外交史研究专家的三宅正树总结的有关日本政军关系的主张做一简单介绍。

三宅正树认为，从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史上颇为典型的事例——九一八事变以后军部对政治的参与变得常态化这点出发，日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试图把找出军部介入政治所具有的一定的规律性作为自己的使命，明确地总结出坚决不能在历史上再次出现军部介入政治，让军国主义取代民主主义的悲剧重现的教训，作为政军关系论研究的主要视角。^① 在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里，因为“统帅权独立制”的存在，使得军事脱离政治并独立行动成为可能。通过吸取“统帅权独立制”严重影响和规定了日本近代政军关系这一教训，日本战后采用了“文民统治”这一统治军事的政策。三宅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为了进一步使“文民统治”理论化，并使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系统发挥功能，就必须确立有关政军关系应有的基本理论。

遗憾的是，日本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对于这里所说的政军关系基本理论的考察是不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充分掌握“政军关系论”先驱理论家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珀尔马特（Amos Perlmutter）、芬诺（Samuel E. Finer）、马科松（Maxon）等的

① 参见三宅正樹《政軍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15页“第一章 政军关系的基础理论”。

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亦致力于掌握三宅所强调的有关政军关系的基础理论，其成果将在本书序章中进行陈述。

在接受和认可三宅正树观点的基础上，本书的基本视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个视角是，在继承亨廷顿、珀尔马特、芬诺、马科松以及福尔克尔·贝格哈恩（Volker R. Berghalm）等的政军关系理论以及三宅正树有关政军关系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近代日本政治和军事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把握，探求军事介入政治的经纬及其历史背景，从政治的对应过程检证军事介入政治的原因。

第二个视角是，试图强调在政军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强化统帅权独立制的功能，意味着军事的政治地位低下这一点。也就是说，笔者迄今一直重视作为军事摆脱政治干涉，甚至进一步统治政治的制度上、思想上的根据——“统帅权独立制”，但是并没有把它看做政军关系上固定的、非和解的制度。笔者认为，本来“统帅权独立制”的出发点就在于为了防止军事被政治所愚弄，从而达到脱离政治实现独立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毋宁说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防卫措施。

也就是说，一般多认为“统帅权独立制”是1878年（明治11年）12月依据参谋本部条例设置参谋部而成立的。但是，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开始到昭和初期的“统帅权独立制”，基本上不但没有成为政治和军事对立的争论点，相反，正如大正时期设立外交调查会和制定军需工业动员法所显示的那样，说政治和军事对立，还不如说两者之间保持了协调优先的关系。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统帅权独立制”被作为军事介入政治的根据，是在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以后。

第三个视角是，尝试确证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在日本的国家构造及国家目标的内涵限定下，两者之间在相互补充的意义上最终不得不确立协调体制这一点。具体地说，从大正时期到昭和初期，政治和军事对立的争点，是当时最有力的两大政治机器，即政党和

军部这两个组织之间围绕着国家发展方法及方向所展开的战略意义上的争论。借用三谷太一郎的话来说，就是关于“选出势力”的政党和“非选出势力”的军部两者中，到底谁来组成国家指导部的对立。

更具体地说，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也可以说是谁优先谁的问题：是优先在战前型民主主义体系过程中摸索国家发展的前途，企图在对外与英美协作基础上将日本编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党和资本家等的总体意见；还是优先在构筑以军部为主导的指导体制过程中，企图中断与英美的协作，建立在大陆（中国）的霸权，把日本建设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革新官僚等的目标。这作为前面所述的政军之间的乖离现象表现出来。在这种决定国家战略的方向性问题上，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对立虽然不时尖锐化，但是受日本资本主义技术和资本水平较低的限制，有时无无论政军哪方却不得不选择向英美妥协的立场；有时则相反，在强烈民族主义的觉醒过程中试图摆脱英美的尝试又表现突出。总而言之，在这两个立场的抉择中，政治和军事一直摇摆不定。

上述情况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在昭和初期以后具体体现在军事与政治的对等化，或者出现军部内阁等历史事实中。事实上军事不但介入政治，而且统治政治的事实成为常态。虽然这个结果是由在满洲发动的军事行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国内以三一〇事件（1932年）所代表的一系列武装政变计划，以及犬养毅首相遭暗杀（1932年五一五事件）等一系列暴力和恐怖主义所导致的；但实际上政治一方接受了军事的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抛开军事介入政治的手段非合法性不说，如何把握将军事的“合法性、间接性支配”付诸实施，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因此，深入考察自大正时期到日美开战前夜日本政军关系的实态，由此出发检验该问题，并从上述视角分析总结近代日本政军关系构造的性质特征，就是贯穿本书的主线。

三 本书的结构与目的

本书按时代排列内容，分作三部共六章，另有绪论、序章、终章。各章的“前言”部分将对各章的目的和内容做简单陈述，这里重复概括如下。

首先，在序章中，作为对“政军关系”的理论性考察，我们首先厘清以亨廷顿等为代表的政军关系论的系谱，简单介绍以三宅为代表的日本有关政军关系以及政军关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分析贯穿本章的、从政军关系论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史的基础上，探求政军关系论在此研究中适用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序章将再次明确指出本章的分析视角，同时也是阐明本书课题的起点。

其次，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所谓的政军关系史实证篇。考察的对象范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日美开战为止的近代日本的政治过程。

“第 I 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大正末期的政军关系”的第一章，主要通过围绕增设“两个师团”问题政军之间的对立和妥协的政治过程进行考察，尝试论证从政军双方一致的视角中可以总结出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基本构造的原形。也就是说，通过日俄战争后，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崭露头角的军部，其中特别是陆军，将依据何种理论上演与政府的争斗进行考察，试图总结出军事统治政治的手段原形。

第二章的内容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在构建“总体战体制”这一国家目标上，政军双方不得不达成共识。在实现这个国家目标的过程中，围绕主导权和目标内容决定权，政军双方虽然持续激烈对抗，但在大正民主政治氛围下，民主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一般民众。同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战争形态趋于“总体战化”，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建立新军事秩序。为此需

要对民主主义与以民众动员为绝对条件的军事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本章将试图论证日本型民主主义（民本主义）和日本型军事主义（军部优先的政治体系）的共存关系。在构筑“总体战体制”的过程中，政军关系本身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①

“第Ⅱ部 大正时期围绕内政外交展开的政军关系”中的第三章，主要对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史的发展在外交和战争指导领域中到底被赋予了何种特性进行探讨。毋庸赘言，不但要对决定政军关系特性的众多因素作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分析在政军间对立和妥协的政治过程中，对中国以及对俄罗斯（苏联）政策的变迁。这一章将要阐明一个事实，即本来应该专心于指挥军队这个有限和专门领域的军事 = 统帅部，不仅指挥军队，还频繁地指挥了本来应该作为指导外交和战争的主体的政治 = 国务这个事实。这里留意的一个观点是，不把握军部从指导军队到指导战争的飞跃和脱轨的背景，就不可能理解日本独特的政军关系的构造。

第四章，通过深入分析含有破坏国内政军关系平衡状态危险性的削减军备这个对军部而言能强化组织和机构，或者稍有不慎甚至会带来弱化组织和机构的极为微妙的问题，阐明军部对企图通过削减军备削弱军事机构的政党加大反对力度，并逐渐倾斜于排斥政党的政治过程。进而在确认作为近代日本国内民主主义政治代表的政

① 日美开战后也陆续有总数的总体战论出版。例如，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土屋番雄在《国家総力戦論》（ダイヤモンド社，1943）中对总体战的特征描述为，“在总体战中虽说武力战依然占据中心位置，但在举全国之力的战争中，其规模庞大，全国的经济力量与政治性、思想性团结力量一同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一些数次的会战，而决定于比较长期的资源战以及连续的激烈战斗”（第10页）。另外，木下半治在《戦争と政治》（昭和書房，1942）的“第二章 总体战的现阶段意义”（第49~80页）中，对于战争形态的各个阶段划分并解释为古代战争 = 朴素的总体战时代、中世纪战争 = 潜在性总体战型时代、国民战争的近代战争 = 无意识性总体战型时代以及帝国主义战争 = 半意识性总体战型时代，在此之上把现代战争划分解释为意识性国家总体战型时代，并且对总体战的特征概括为“第一是对战争指导的意识性，第二是战争目的至高性，第三是战争手段的无限性”。

党的地位及作用的同时，探索缺乏与如此政党势力建立共存关系理论的军部的动向。

“第Ⅲ部 昭和初期政军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对自九一八事变到日美开战前夜十年间政军关系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当时政军关系虽然已经被意识到应该构造“总体战体制”，但是它们不但没有尽快使之成为共同的国家目标，没有形成国家战略的一元化，相反却使政军关系陷入更为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为了早日建成符合日本资本主义现实水平的“总体战体制”，即使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政军双方仍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相互妥协，开始摸索近乎强制性的同一化合作。在替代政党内阁形成中间内阁以及举国一致内阁、对英美协调路线派和亚洲不干涉派分裂对立、权力结构多重化多层化等激变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军部优先的政军关系。分析这一过程的第五、第六章，试图论证最终实现的军部对政治的“合法的、间接的支配”，实际上是通过确立日本型政军关系这一形式实现的。

终章从考察“统帅权独立制”的政治功能出发，笔者在提出“军民融和型统治”新概念的同时，对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构造进行概括和总结。

序章 从政军关系论看近代 日本的政治与军事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史研究的理论适用问题

一 前言

在探讨近代日本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 政军关系时，通过采用或者导入欧美学者率先提出的政军关系论视角，似可以得出一定的法则性和客观性，而且迄今为止也确有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章首先介绍主要的政军关系论（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同时就这些政军关系论试图如何理解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等加以整理。与此相关，亦介绍以日本政军关系研究先驱三宅正树的研究成果为中心的政军关系论，以及政军关系史研究的现状。^① 并涉及从政军关

① 日本政军关系论研究第一人三宅正树的主要业绩如下：《メッセルにおける十九世紀ドイツと明治前期日本との接触》（《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報》第六号，1972年6月）；《ドイツ第二帝政の政軍關係——クラウゼヴィツとルーデンドルフの間》（佐藤栄一編《政治と軍事——その比較史的研究》，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78）；《文民統制の確立は可能か——政軍關係の基礎理論》（《中央公論》，1980年9月号）；《政軍關係の視角から見た1930年代の日本》（三轮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1930年代論として》創世記，1981）；《日本の政軍關係の特質と病理》（三宅正樹主編《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第一卷，第一法規出版，1983）；《ドイツ軍国主義の研究視角——ベルクハーンの著作を中心として》（《村瀬興雄先生古希祝賀記念西洋史学研究論叢 政治と思想》，立正大学西洋史研究室，1983）；《政軍關係から見た二、二六事件とカップ—探》（《軍事史学》第二〇卷第一号，1984年9月）；《危機と政軍關係——世界恐慌とデモクラシー》（富田信男、堀江滋編

系论的角度，如何才能论及日本的政治与军事关系等基本问题。

政军关系论本为 1950 年代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研究课题，最初被翻译为军民关系而非政军关系。政军关系论研究的旗手亨廷顿，把军民关系定义为“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的一个侧面”，是“军事性安全保障政策基本的制度上的要素”。^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军部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显著的美国社会里，民（=政府）统制（civilian control）军（=军部）的困难性，作为阻碍健全的民主主义

《危機とデモクラシー》，学陽書房，1985）；《ドイツ国民史の研究——フェルスターの軍国主義をめぐって》（《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第二五卷第一号，1987年2月）；《政軍関係研究》（芦書房，2001）等。

-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 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下卷），原書房，1978，第4页。塞繆尔·亨廷顿主要著作有：*The Common Defense: 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olitical Order of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内山秀夫译《变革期社会の政治秩序》上、下卷，Simultaneous 出版会，1972。主要著作有：Michel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Robert J. Art, Vincent Davis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Reorganizing America's Defense: Leadership in War and Peace* (Washington: Pergamon-Brassey's, 1985) 等多数。另外在最新的论文有“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6, November / December, 1996; “Control: The Crisis 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35, Spring, 1994; Colin Powell, John Lehman, William Odom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An Exchange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36, Summer, 1994, 等。最近的著作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huster, 1996), 鈴木主税译《文明的衝突》（集英社，1998）受到广泛瞩目。至今为止已被翻译成 25 国语言以上并在日本成为畅销书。关于亨廷顿的著作，另外收录于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的“Reform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在仅仅 7 页的论文当中再次尝试解读政军关系包括后冷战时代在内与自由主义改观的联系，是一篇值得瞩目的论证。应日本出版社要求执笔的最新著作，山本暎子译《引き裂かれる世界》（ダイヤモンド社，2002年10月刊，原标题为 *The Big Picture: Collected Thoughts on the Events of 9/11 and Changing World Order*），即《文明的衝突》之后日本与美国为中心对现代政治状况进行分析。

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让人们广泛担心。特别是到了196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时代帷幕正式拉开，对军部发挥作用的期待增大，使得人们痛感“文民统制”的必要，构筑民与军之间的协调关系成为愈加重要的政治课题。

因此，促使开展军民关系论研究的背景，有着美国国内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诸因素存在。但是，若想把以实现“文民统制”为目的的军民关系论直接运用于战前日本的民与军的关系上，还需要若干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伊藤皓文所述，在战前日本的国家里不存在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文民统制”，“在这里，军民关系并不直接意味着政军关系。莫如说军民关系主要意味着军队与一般社会的关系。在这样的国家里，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不能作为军民关系理解，而恰恰有必要作为政军关系本身来理解。”^①因此，如果要把军民关系论运用于历史性考察日本近代政军关系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一定的保留事项。

换句话说，军民关系研究，原本是在创造民对军合理的统制和指导的方法及理论上的问题，追求一定的目的和意义而展开的，与此同时也追求民主主义的成熟与发展。相对的，如果使用政军关系研究这一表现，那么首先应该把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置于基本对等的关系之上，然后创出两者如何建构协调关系，从而合二为一发挥机能的方法与论理，才是必然的最大焦点。

因此，在此对政军关系的组织、机构、制度、体制之类的所谓组织要因，亦即硬件方面的分析尤为重要。不过，对于政军关系的展开过程仅追求此类组织要因并不正确，当然对运营组织的政治家和官僚等，亦即软件方面的要素也必须进行评价。在此意义上，在第一章往后作为考察对象的政军关系复杂的展开过程中，如何整体

① 伊藤皓文：《明治国家における政軍関係——軍隊と国家の關係の一事例研究》（1），《防衛論集》第7卷第1号，防衛庁防衛研究所，1968年11月，第2页。

定位决定政军关系能动变容的政治家和官僚的动向，就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问题。

以下，作为研究政治、军事的一种方法，本章将首先再次对欧美各国研究总结的有关政军关系论的内容，在与“文民统制”论的关系上加以概括整理，然后在有关日本政军关系史研究中介绍主要的政军关系论。进而论述这种始于美国的政军关系论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近代日本的政治、军事史研究领域到底具有何种积极意义。

二 政军关系论的成立经过及其期待的作用

1. 政军关系论成立的背景

一般认为把军队和战争作为政治学和历史学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始于1950年代德国出现的军队社会学（military sociology）。^①当初，其目标被规定为军队的社会学性研究，所以被翻译成军队社会学，之后扩大了其内涵，在更为广义的意义上，被翻译成战争社会学（war sociology）。

指代军队社会学实质内容的 military sociology，其源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出现在德国的军队心理学（military psychology），如字面所示，其重点是以士兵为研究对象对军队内部进行分析。该研究的关键词为士气（morale）与规律（discipline）。这是因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出现了被称为总体战的战争形态，对于此种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全体民众参与是不可回避的，所以必然被要求重新构筑社会与军队的关系。在此，“军队的国民化”或是

① 参见高橋三郎《戦争研究と軍隊研究——ミリタリー、ソシオロジーの課題と展望》，《思想》第605号，1974年11月，第2页。高桥认为，近代战争研究的历史，早在16世纪开始已经成为讨论的对象，但只是在技术论的层面（用兵术）和法律观点（国际法）上来探讨的，关于战争的原因与机能，以及战争防止策略的讨论而属于从19世纪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为止的统称为“战争的哲学”的领域。在此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盛行“战争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研究”与“军队社会学”占据战争研究的主流地位。

“国民的军队化”必然地成为构筑总体战体制的必需条件。^①

为了克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为应对军队的大量动员与大量消耗而创建相应的军需工业这一难题，从而巨大化了的军队以及形成了使国民战争总动员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取得了有关军队作用的国民合意等，总之出现了研究军队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使之理论化的社会需求。高桥三郎介绍说，军队社会学者齐格勒（R. Ziegler）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军队社会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理，在研究军人（the profession of arms）、军队（military organizations）、军制（the military system）、战争（war and warfare）的同时，也研究了政军关系论（civil-military relations）。^②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政军关系论从过去作为军队社会学领域中一种内部研究，扩展到包含诸多研究领域的一种外部研究。在此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把政军关系论定位于一种协调并统一掌握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而出现的总体战时代的战争、军队，以及重新建构“国民”的相互关系的一种方法论。

那么，在此所说的政军关系论，到底拥有怎样的内容呢？美国的政军关系论学者莫里斯·简诺威兹（Morris Janowitz）和亨廷顿等政治社会学者们，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正式研究政军关系论。他们研究政军关系论的共通之处，在于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容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预计将要肥大化的军队组织的基础上，寻求如何使其与其他政治社会组织相协调、且高效运用该组织的答案。^③

因此，他们最为关心的应该是统制军队的方法和手段，而为了

① 参见額綱厚《総力戦体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国家総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课题是构筑能够大量动员国民的总体战型战争形态，攻克这个课题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目标。此方面的研究还有黒沢文貴《大戦期間の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

② 参见高橋三郎《戦争研究と軍隊研究——ミリタリー、ソシオロジーの課題と展望》，第19页。

③ 参见笹部益弘《シビル、ミリタリ、リレイションズ序説——主要文献とそのアプローチ》，《防衛論集》第3卷第1号，1964年4月。

阐明军队组织的内在问题，并解消其与政治民主化的相互矛盾，将其改编为对人类社会有用的组织，从而构筑以政治学和社会学视点研究的理论的努力还不够充分。而且，日本真正开始开展政军关系研究时间还很短，所以直至今天，还很难说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领域，其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

有关此问题的论点很多。简单概括起来，第一个问题是，分析近代日本的政治过程，特别是政军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政军关系论可以适用？也就是说运用政军关系论研究的积极意义到底在何方？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与军事原本作为两个互相对抗的领域，是否可以并列？换言之，是否可以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特别是在日本，正如作为政军间所产生的对立、妥协、调整关系的政军关系史研究所明示的，在由此所决定的政策和方针的决定过程这一点上来说，理论上的二分化是不可能的，同时其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①

① 注释以外有关政军关系论的代表著作如下所示。与此相关联的欧文文献亦在卷末汇总列示。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First published by Pall Mall Press 1962, Revised and published in Peregrine Book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9.) Morris Janowitz,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张明雄译《新興国と軍部》，世界思想社，1968。James W. Morley, *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 191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Yale C.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Military Rivalry 1930 - 1945*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3). Richard J. Smethurst,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Harold H. Sunoo, *Japanese Militarism: Past and present* (Chicago: Nelson Hall, 1975). 辻野功译《日本の軍国主義》，三一書房，1980。William F. Morton, *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 (Folkestone: Dawson, 1980). Volker P. Berghahn, *Militarism: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1861 - 197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Volker P. Berghahn, *Militarismus: Die Geschichte einer internationalen Debatte* (Hamburg: Berg, 1986). 三宅正樹译《軍国主義と政軍関係——國際的論争の歴史》，南窓社，1991。

就是说，虽然从制度上区分政治与军事是可能的，但在政策决定过程中表露出来的是政治与军事混在化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决定同时也是政治决定。只是因为出于通过分别理解政治与军事各自独特的动向，才能深入探讨此处所谓的政策决定过程及其内容的必要性，才采用二分化方法研究至今。

所谓政军关系，并不是要把“政治”（政府、文民）与“军事”（军队、军人）之间的关系看做对立且不能妥协的关系。其理由不仅是因为政军关系论本身是以构筑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或互补性为最终目的的，还因为现实的“政治”实际上是由多种制度、理论混合而成的，而且即使与“政治”相比，以压倒性团结力量为特征的“军事”，也是由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政治条件，再加上经济条件以及国民对“军事”的期待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一种多样体。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负责“军事”部门的军事官僚（军人）中既有非常执著于政治性行为规范的人，也有基本上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政治方面自我抑制的人。其中关心政治的军人为了提高自身在军内的地位或提高军队的政治地位而组成政治团体，要么借助此政治力量转而统制政治，要么企图追求军事与政治的一体化。某些时候此举亦会获得国民的支持。

因此，不能单纯地认为政军关系仅仅是单线的对立关系，而应该认识到政军关系是由这两者各自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内部结构重叠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关系。在此意义上，政军关系总是呈现着非常活泼的变化，我们绝不能认为它们是一成不变的并存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概括军事或军队在近现代国家内部，到底被赋予怎样的职能和期待，其正统性又是通过什么被赋予的。

当然军事、军队是一个被赋予“国家防卫”（国防）的任务，遵循军事论理，通过严格纪律进行内部统制的职能集团。在民主主义国家，军事、军队在法律的制约下即使只承担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作用，也是可以获得正统性的。在此种情况下，军队一般履行以下三种职责：（1）为完成国防任务而要求分配必要的资源；

(2) 在政治指导者决定对外政策时，解析其政策的军事关联性 (implication)，提出必要的劝告，以帮助政治指导者作出政策决定；(3) 实施政治指导者决定的军事行动。^①

以上三种任务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履行，政军关系一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两者能够保持相互补充的合作关系。但是，如果军队像工会或各界联盟等利益集团、压力集团那样，通过政治行动扩大自身的利益与地位，或是摆脱法律制约企图强化自身的地位，那么赋予军队的职能构造就会崩溃。

如果形势发展到此，那么军方要么是诉诸物理性手段对政治施加压力，要么是进一步掌握政治权力从而统治整个国家。为及早阻止军队介入政治，进而夺取政权这一事态的发展，围绕政军关系合理意义的争论，也有必要进行真正民主议论，而这个真正民主议论的实行过程，也成为政军关系论的一个重要的论题。对于与“文民统制” (civilian control) 体系相反，对勉强从军事强制统制政治的教训中导出“文民统制”体系的战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② 下边，我们将从“文民统制”的视点对政军

① 参见长尾雄一郎《政军関係と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道下徳成等編《現代戦略論——戦争は政治の手段か》，勁草書房，2000，第76页。

② 对战前日本政军关系的研究可参见前原透《“统帥権独立”理論の軍内での発展経過》(《季刊 軍事史学》第23卷第3号、通卷第91号，1988年1月号)；田上穰治《“満州”創建期における政軍関係——関東軍の政治的役割》(《法学》第18卷第2号)等。关于战后政军关系的研究可以参见神谷不二《政軍関係論 (civilian control) に関する一考察》(《法学雑誌》第2号，1963年12月20日号)；中島晋吾《戦後日本型政軍関係の形成》(《季刊 軍事史学》第34卷第1号、通卷第133号，1998年6月号)；佐藤明広《戦後日本安全保障研究の諸問題——政軍関係の視点から》(《法学会雑誌》，1995)；神田文人《“満州事変”と日本の政軍関係——統帥権と天皇制》(《敬愛大学 国際紀要》第3号，1999年3月)；寺村安道《明治国家の政軍関係——政治的理念と政軍関係》(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纪要《政策科学》第10卷第2号，2003年1月)等。总结了战前战后日本政军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日本政治学会編《近代過程における政軍関係》(岩波書店，1990年3月)；額顯厚《近代日本の政軍関係——軍人政治家田中義一の軌跡》(大学教育社，1987)；渡邊行男《宙垣一成——政軍関係の執着》(中央公論社，1993)；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

关系论进行定位后可以研究的问题内涵做进一步论述。

2. “文民统制”与政军关系论

回顾和研究从战时到战后的政军关系论的时候，代表着战后政军关系的“文民统制”应该如何定位呢？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是亨廷顿的定义：“文民统制的本质是明确区分政治上的责任与军事上的责任，并且后者在制度上从属于前者。”^①即其前提条件是政治对军事的统制。这才是政军关系的本质。

的确，在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中，在“文民”统制军队这个意义上，所谓“文民统制”（civilian control）抑或是“文民”优位（civilian supremacy）的关系，在政军关系上是没有成立的。但是，大正民主政治时期的裁军时机和降低军队作用的现象，以及在构筑总体战体制时国家总动员法的成立过程中，为使军队、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适应总力战阶段而进行的改编以及合理的战争指导体制的组建等，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通过扩大行政权和强化官僚制，至少把政治对军队统制的尝试付诸实施，这也是一个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这里所说的政军关系的主体为政府，客体为军队，可以直接理解为围绕如何建立政府与军队相互关系的政治过程或政治思想。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在近代国家，特别是国民国家成立以后，作为物理性保证国家主权的必须机构的军队，其存在意义虽然不断提高，但是“国民”开始真正登上政治舞台，那么这个“国民”在政军关系中到底应该如何定位？

事实上，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已经论及了作为界定政军关系主要原因的“国民”的问题。^②与此相关

（上、下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7）；額瀨厚《近代日本の内外政策》（《戦争責任研究》第43号，2004年春季号。该论文中文译文，《于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0月14日号）等。

① 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原書房，1978，第160页。

② K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hinterlassenes Werk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Berlin: F. Dummler, 1832-1834, 田秀男译《戰爭論》上卷，岩波書店，1968，第61-62页。

联，长尾雄一郎也引用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思考战争——克劳塞维茨与现代战略》（*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指出：“在考察国民国家时代的政军关系时，有必要在由政府、军队、国民三重构造体组成的国民国家的范畴中，在考虑‘国民’存在的基础上研究政府与军队的关系。也就是说，仅仅研究政府与军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充分的，还应考虑‘国民’这一第三因素。”^①的确，在民主主义时代，政府不可能无视国民的存在；在总体战时代，军队取得大量动员对象的国民的支持与同意，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虽然我们理解长尾的论点，但在“国民”作为构成“政府”的直接主体已经被制度化的今天，笔者还是想指出，政治=政府这个概念，亦包含着此处所谓的“国民”。因此，今日作为实质性意义上的政军关系的制度或者理论的“文民统制”，应该解释为：作为民主主义主体的“国民”，与因得到“国民”的支持和赞同才被正当化的“政府”共同把军事=军队置于统制之下。

的确，军队是一个在国家机器中独占行使唯一绝对且强大暴力手段的特殊存在。但是我们还有疑问：即使通过“文民统制”的民主方法试图对军队进行统制一事本身并无错误，但是通过对军队进行法律以及制度上的约束而成立的政军关系，其合理并且有效的程度到底如何？

也就是说，在近代国家成立以前，相互独立的各种势力各自拥有暴力工具，由于其成为内战和内乱进一步复杂化并且扩大的原因，所以在近代国家以及国民国家成立以后，国家通过独占暴力具备了预防与制止内乱的能力。实现了安定与秩序，确实，国家独占暴力，同时也赋予暴力的施行者以强大的权力，由此产生对军进行监视与统制的制度与思想的需求。通过回顾历史过程，

^① 参见长尾雄一郎《政军関係と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道下徳成等編《現代戦略論——戦争は政治の手段か》，勁草書房，2000，第74页。

可以看出近代国家成立以后的政军关系，是以管理国家安定与秩序而形成不可欠缺暴力的方法这一问题为中心的，而“文民统制”，亦即通过暴力工具原则上由“文民”实行管理的这一形式，也只不过是迄今为止被普遍认可的管理暴力的一个手段而已。

这里还有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文民”（civilian）的词源到底是什么，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文民”与资产阶级（bourgeois）并为市民（citoyen）的词源。根据福田欢一的说法，其中 bourgeois 与 citoyen 以法国革命实现人民主权国家为契机被明确区分，“直至 17 世纪，civil 与源自希腊都市国家的 politique 大体被作为同义语使用。法国革命的派生物法国民法典 *Code Civil* 正式确立了这一新的用法，使之成为 politique 的反义词。由此决定性地分开了 citoyen（市民）与 civil（文民）”。^① 总而言之，“文民”（civilian）这一词语包含着从近代市民主义派生而来的民主主义的理念与目标。

而 civilian 一词的词源，如果根据“在古罗马时代，以市民阶级为舞台掌握独裁权力的恺撒，推行了按现代理念来看并非民主的政治，到从恺撒主义（皇帝专制）堕落为所谓亲卫队独裁（praetorianism）的军事支配的历史事实”^② 来看，把 civilian 仅仅规定为非军人或非军事的概念显然是不充分的。即便是 civilian，也必须满足具有民主主义理念的人物这一基本条件。

在此意义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使是一个 civilian（非军人），也比一个积极服从政治需要的军人更信奉军国主义，所以更强势推行非妥协的、露骨的军事政策的政治家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正如路易斯·史密斯（Louis Smith）所指出的“文民统

① 参见福田欢一《市民について》，《福田欢一著作集第二卷 近代政治原理成立史序説》，岩波書店，1998，第402页。

② 参见长尾雄一郎《政軍関係と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道下徳成等編《現代戦略論——戦争は政治の手段か》，勁草書房，2000，第27页。

制”，“如果确切表达的话，应该称之为‘民主的文民统制’”。^①因此，将“civilian control”直接翻译为由文民（=非军人）进行的统制（=文民统制），从中很难把握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沿革与本来的意义。虽然它相当于史密斯所谓的“民主性的统制”，或者与其基本上同义，但笔者认为含有更彻底的民主主义对军事的统制意义的“民主统制”（democratic control）一词，作为“civilian control”一词的译文更为贴切。

3. 军国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政军关系论

研究政军关系论时，作为应该考察的对象，涉及有关军国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与理论是一个必然的条件。Militarism（军国主义、军事主义），是在与军事相关的各种问题和价值上，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主张在政治行政层面军事第一主义思想应该优先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古代的罗马帝国、弗朗哥独裁时的西班牙、帝政期的德国、从九一八事变到战败时期的日本等各时期的各国占据社会主流，其结果构筑了以 militarism（军国主义）为基调的体制。

但一方面必须注意的是，所谓军国主义并不单纯指的是强大军事力量和军事机构的存在本身，而指的是以这些存在为背景的军事上的价值观及其占据政策决定和国民意识的比重。所以即使没有强大的军事机构，但如果不断产生军事主义的构想以及对政策选择的冲动和评价，这种状况也应该认为是军国主义。从这一系列意义上来看，军国主义具有可以作为政治制度、政治意识，以及政治思想等各领域研究对象的性质。此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军国主义具有与民主主义完全相反的基本原理。就是说，相对于民主主义的基础

① Louis Smith, *American democracy and military power, a study of civil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佐上武弘译《军事力と民主主義》，法政大学出版社，1954，第28～29页。

为自由、自治、自立的原理，军国主义则是不断企图形成以统制、管理、动员为目的的各种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把军国主义看做与民主主义对立的观念。但是在此重要的问题是，正如沃克·伯格翰（Volker R. Berghahn）所指出的，不能以军国主义本身的现象与行动作为分析对象，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产生军国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构造分析上。^①

“militarism”（军国主义）一词的概念起源于近世的英国。1653年就任共和英国国家元首（护民官）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自身的军事力量为背景，掌握了凌驾于议会之上的权力。后作为军事权力压抑议会权力体制（=军事支配体制）的用语开始使用“militarism”一词。其后，以名誉革命（1688年）为界，议会主义得到确立，“文民”权利获得压倒性政治力量，在此过程中成立了近代英国国家。由此可见，在近代英国发展史上，对军国主义的克服一直作为重大政治课题存在。

但是，这里所使用的“militarism”概念并没有确定。如果一般地概括说，“militarism”的意思是，在应该以“文民”或市民为主体的近代国家，军人却占据国家权力的中枢，选择战争的政策优先于别的政策，以军队作为操控政治的物理基础。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如果克服军国主义跋扈的政治状况，构筑以市民（=文民）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体制，从而实现民主主义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民主主义是化解军国主义的决定性手段。

因此，阿尔弗雷德·发格茨（Alfred Vagts）在其著作中把军国主义的对立概念不是定义为和平主义（pacifism），而是定义为文民主义（civilianism）的意义极为重大。事实上，阿尔弗雷德·发格茨在其著作中指出“文军民国主义”的存在。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军事价值、军事习气、军事原理、军事态度的无条

^① 参见三宅正樹译《軍国主義と政軍關係——國際的論争の歴史》，《译者解说》部分。

件信奉者”，^①“文民军国主义”在憎恶甚或否定文民政府、议会主义、政党制度等的立场上，与军人军国主义如出一辙。

如果在此涉及政军关系论与军国主义的关系，那么就有必要考虑军国主义虽然是阻碍民主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又不完全否定民主主义，进而寻求构筑两者协调关系的理论——政军关系论的出现过程。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中，就有关“文民”统制军事的方法，主张从军人的职业性出发，应该以重视其作为社会性和政治性存在的自律性作为基本前提。

就是说，按亨廷顿的说法，军人及其所构成的军队、军事机构，作为固有的政治与社会的存在，担负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通过形成与社会和政治合理并且有机的关系，进行共存关系的构筑是合理的。在此亨廷顿认为，这样的“文民”与军人的状态应该称之为“客观的文民统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与从前不承认军事领域的自律性，以军人应无条件服从由文民所构成的政府的统制为前提的“主观的文民统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相区别。^②在此我们愿意明确的一点是，依据军国主义的历史经纬，并不是提出直接对此进行全部否定的论理，而是通过一定的让步，逐渐化解军国主义的内在危险性，从而提出了探索与其共存理论的政军关系论。

另一方面，我们还希望从近代国家成立的发展过程中登场的 liberalism（民主主义）与 militarism（军事主义）之间的对立问题上来把握政军关系论的位置。在 18 世纪后半期取得产业革命成功的英国，通过 1830 年代的宪章运动实现了市民参与政治，同时议

① 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Civilian and Military*, (Rev.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60). 望田幸男译《軍国主義的历史——文民与军人》，福村出版社，1994，第 489 页。相关研究还有 纈纈厚《軍国主義 Militarism》，《現代政治学事典》（ブレーン出版，1991）；纈纈厚《現代ミリタリズム論序説》（《紀要》山口大学教養部，第 26 卷，1992）等。

② 参见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原書房，1978，第 80～137 页。

会制与政党制较之以前其政治比重明显增加。立宪主义支持的这些议会制与政党制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并作为与国王掌握的大权（*prerogatives*）相对抗的原理而形成自由主义。从这一过程来看，自由主义理所当然地强烈意识到应对作为国王权力源泉的常备军进行统制。由此所产生的方法是由议会（*parliament*）和内阁（*cabinet*）对军队进行统制。

虽说如此，自由主义在英国虽然是作为通过确保王权的自由，来企图确保自身特权与利益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而产生的，但是通过以法国革命为起点发展而成的民主主义，在不仅包括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包括众多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被制度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以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统制军队为前提的“文民统制”理论。

也就是说，在此由市民（*civilian*）选出的政治家所构成的政府和议会，以市民合意为背景合法对军队进行统制的形式，被采用并被制度化。这也正是“文民统制”的基本原理，与没有得到市民合意，政治家及一部分特权阶级对军队进行统制的政治统制（*political control*）完全有别。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民统制”的本质。但是，虽然以这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为基调，但现代“文民统制”在欧美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却也是不争的。在英国以名誉革命（1688年）为界，确立了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upremacy*）制度，此后持有压倒性权限的议会与被认为是该议会内组织的内阁，拥有对军的绝对统制权。这是因为在英国出于对王权的对抗而形成的议院内阁制当中，立法部与行政部基本上完全一体化，两者团结一体对军进行彻底的统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通过战时内阁（*war cabinet*）能强有力地指导战争的条件，就是英国有着如此固有的历史背景。

相反，在美国与法国等共和政体采用总统制，实行行政、立

法、司法三权分立制的国家中，为了防备权限过于集中在作为最高司令官的总统一人手中，议会便彻底抑制并监视总统的权限，由此，围绕对军的统制问题，出现总统（政府、内阁）与议会产生尖锐对立的局面。也就是说，与英国行政部与立法部事实上处于融和状态相对，美国则处于对立或抗衡的状态。

在这一点上，美国与法国的总统制在彻底实施“文民统制”上反而成为某种制约条件。相对于军部，行政部与立法部确保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这就使得军部获得了作为国家机构一部分的主要地位。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时的法国军部，以及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美国军部，它的行动原理的根底是对“文民统制”的执著，这便是使战斗不必要扩大化与长期化的原因之一。从其背景可以看出，两国实行彻底的“文民统制”的困难性也随之凸显出来。^①

在以上简单概括的基础上，下一节往后，我们将列举亨廷顿等政军关系论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就关于军部介入政治的背景及原因这一有关战前日本政军关系研究的最重要课题的分析视角进行论述。

三 政军关系论者有关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史的研究

——亨廷顿、珀尔马特、塞缪尔·芬诺、马科松的政军关系论

1. 亨廷顿的二重政府论与职业主义

以亨廷顿为首的政军关系论研究家，特别把战前日本政军关系的历史性展开与法制构造作为分析对象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虽然

① 参见长尾雄一郎《政军関係と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道下徳成等編《現代戦略論——戦争は政治の手段か》，勁草書房，2000。就最近出现的所谓“文民统制的文艺复兴”热烈现象，长尾雄一郎指出：从来的诸研究主要倾向于研究文民统制如何导入纷争频繁发生诸国以及走向民主化的中东欧各国的课题，以及在如何防止军队介入政治和政变上发挥一定作用等问题。相对的，抑制政治对军事的介入，研究在党派政府中如何维护军部的方法也应该成为研究课题，也有必要议论政治指导部与军事指导部两者对共同责任的认识。

给我们留下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近代日本政治与军事关系极其重要的观点。其中亨廷顿最早关注日本政军关系的特殊构造，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较大篇幅进行论述。^① 这里就亨廷顿在论述日本政军关系时重视的两个关键词，“二重政府论”（dual government）和“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作一简单论述。

亨廷顿认为：“日本政军关系的法律构造，本质上是军部独立的构造。政府被分割为军人部门和文官部门两个部分。其理论可说是‘二重政府’。”^② 就是说，战前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日本政府的实际状况是由政治与军事这两个领域构成的“二重政府”。这一“二重政府论”，之后在说明日本政军关系时被众多的研究者频繁引用。加之到了1930年代，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军部势力实际上增强了政治发言力，并在政局中发挥主要作用。基于这一历史事实，这一观点被用来从构造上说明军部势力政治化的原因时，是最具说服力的一种方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的确，明治宪法体制以分权为特征，只有独揽大权的天皇才具有统一这些被分立的权力以及机构的权限。如果以“二重政府论”为基轴来对日本政军关系进行简单概述的话，那么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在军事从属于政治的前提下，政治机构因其高度化和复杂化，从而政军两机构被分化就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日本的政军关系中，再加上统帅权独立制度的存在，使得政治与军事处于并列和对等的关系，所以政军两机构产生对立和抗争的事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必然的。这明确指出明治国家体制所具有的政治和军事的分权性、二元性，在这种构造特征问题上，应该没有异论。

但是“二重政府论”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这一理论基本上是把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作为对等、并列的关系进行固定且

① 参见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原書房，1978，第124～137页。

② 参见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第130页。

静态地把握，其结果导致轻视或无视政军之间相互依存、妥协、抗争等剧烈政治变动的倾向。在分析日本政军关系中，指出分权性的确是重要的，也没有违背历史事实，但是我们还要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定位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在广义上军事领域也是被政治领域所包容的对象域。在此意义上，意味着两个政府的“二重政府”这一用语，最初就伴随着以某种对等性和平等性为前提来分析政军关系的危险性。问题是，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分析政军关系达到某种对等性和平等性的政治过程才是最为重要的。特别是日本的政军关系，在明治近代国家的成立过程以及明治宪法体制所具有的特异性当中，两者的对等性和平等性是在国家机构的组建过程中被决定的。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如果试图运用亨廷顿所提出的“二重政府”理论聚焦历史过程的话，将无法明确断言“二重政府”的时期究竟是何时，以及伴随着怎样的实际情况而表现出来的：是认为自明治宪法体制成立以来一贯为“二重政府”，还是认为昭和时期的所谓“军国主义时代”才是“二重政府”。这一点未必明确。的确，亨廷顿认为“二重政府的法律根据源于宪法与习惯”，^①他列举军部保有的帷幄上奏权（1889年）和现役大臣武官制（1900年）等军部的特权，还举出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所发生的因为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导致西园寺内阁倒台的事例，由此强调了军部的独立性。

确实，陆军在1878年（明治11年）12月以参谋本部条例为发端成立军令机关以后，在机构上以军令机关为中心的军事机构明显地逐渐从政治机构中独立。事实上这种机构上的分离必然成为政治（=国务）与军事（=统帅）间对立和抗争的原因。但是这种机构性分离在政治的机能以及政治的作用方面，并没有马上准备好对等且并行的权力关系。两者始终受限于当时的国内以及国际的政治状况，而且力量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更应该在这一点上

^① 参见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第130页。

追求政军关系的魅力及其本质。

与以上两个问题相关联，亨廷顿在“军部的政治影响力”^①条目中，就日本军部政治影响力增大的原因，列举了直至大正末期为止藩阀势力（萨摩、长州出身者）独占军事首脑职位、军人出任非军事官僚职位、军国主义社会对军人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威吓等事实。这些指摘虽然全部符合事实，但是若从把握政军关系的政治过程变化上来看，他只不过是指出了其中的一个侧面，并没有说明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为何因如上原因导致军部优势或军部主导政治运营的结果。我们有必要首先确认如下事实：上述事态出现的背景，存在着在官僚势力，陆、海军势力和宫中集团（元老、重臣）等“非选出势力”内部，以及与“选出势力”（政党）之间的对立和妥协不断重演中，作为对外发动的国家意志，以军部为先导，针对亚洲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确立军事、政治及经济支配权的意图。

也就是说，如果像亨廷顿那样对机构的分离过于执著的话，就会有陷入把军部的权力看做超越政治全体的存在，比如说是自律性展开的对象这一危险的可能。在日本，被称之为“东条独裁”的军部独裁，实际上如果没有天皇大权的存在是不可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作为军部独裁典型事例的东条内阁，最后由于失去天皇的信任而被迫下台的过程所示，日本政军关系的构造，莫如说也是一个绝不允许军部独裁的政治体系。我们对此也有必要加以留意。

与“二重政府论”相关联，下面我们介绍另一个关键词“职业主义”。亨廷顿把军人介入政治的原因归结于其职业意识低的理论，正如以下所述，成为塞缪尔·芬诺等人批判的对象。但是日本军人被彻底地灌输了天皇军队的意识（=皇军意识），已经形成血肉，认为他们作为职业军人的意识在精神和思想上都达到相当高的领域是极为自然的。日本军部政治介入的常态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赋予军部由统帅权独立制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为象征的特

① 参见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第134～137页。

权制度为背景的。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在其动机的形成过程中，皇军意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军队内教育彻底注入皇军意识的将校集团，未必与亨廷顿所使用的意思同质，他们实际上具有某种“职业主义”。

然而问题是，正如三宅所指出的那样，越是高度评价日本将校集团的“职业主义”，就越发觉彻底的专门职业意识可以回避介入政治这一亨廷顿所总结的政军关系论基本命题，并不一定具有说服力。^① 如果我们把本书第一章提及的两个师团增设问题（1912年）导致西园寺内阁垮台事件、第五章提及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侵犯统率权问题（1930年）和驻外军队关东军主导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等代表日本军部对政治的介入，以及以五一五事件（1932年）和二二六事件（1936年）为首的将校和将校集团发动的恐怖行动和叛乱事件等反复出现的对政治的介入和对政党的攻击等作为事例进行研究分析的话，便可以得出结论：亨廷顿政军关系论的基本命题，未必适合于日本的政军关系。

与此相关，亨廷顿却得出“日本的将校集团成为世界上最缺乏专门职业精神的主要军人集团”^②的结论。总而言之，正因为亨廷顿所意指的“职业主义”允许有极为多样的解释，所以恣意且主观的观点就有了用武之地。在此，虽然应该将专门技术性和对政治的中立性作为“职业主义”的中心概念，但是亨廷顿却将自己提及的，以作为日本军人的普遍现象而表现出的神道与武士道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具有与此牢固结合的军人精神的日本将校

① 与此相关联，三宅正树在《政军關係の視角から見た1930年代の日本》中指出亨廷顿的日本军部理论属于牵强附会，“正如日本军部介入政治的重复出现，假使在另一方面充分掌握了职业主义，而这种职业主义极限化作为健全的政军关系的理想形态，就成为实现客观性文民统制的必要条件，继而亨廷顿的基本见解暴露出崩溃的危险”（三宅正樹：《政军關係の視角から見た1930年代の日本》，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創世記，1981，第135～136页）。

② 参见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第126页。

集团的特异性，尝试强行塞进“职业主义”的范畴当中。这里暴露出了亨廷顿定义用语的混乱。

直截了当地说，真正的“职业主义”将校集团应该是一个非政治组织，因此其存在也可以获得政治的信赖。按这个主旨来说，要在从不断介入政治，最终走上树立军部政权、构筑军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不归路，并极为露骨地使自己的政治行动常态化的日本将校集团身上，要找出亨廷顿所定义的“职业主义”，至少是非常困难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根据“职业主义”的程度，将政治介入度和介入的可能性作为研究对象一事本身，其实是极为勉强的。

日本的将校集团实际上把一般社会称为“地方人”，他们通过与此画线来区别军队社会与一般社会。他们对于由此来保持自己的独自立场一直持有强烈的关心。其闭锁性与特权性，使他们不是与政治进行调整，而是倾向于展开军独自的政策，这种倾向因政治情况的变化而表面化，结果导致不断地对政治进行干涉，这也成为他们对以一般社会选出的人员组成的帝国议会和政党组织的强烈厌恶感以及其批判立场基本没有崩溃的理由。围绕这个“职业主义”的问题，下边对珀尔马特的论点进行简单介绍时还要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2. 珀尔马特的“praetorianism论”（军国主义论）

下边就继亨廷顿之后，最著名的政军关系论学者珀尔马特（Amos Perlmutter）主要著作《现代军与政治》（*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中对日本分析的主要部分进行检证。^①相对于亨廷顿以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的政军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珀尔马特则以诸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他通过对

^①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多数国家具体表现出来的政军关系的实态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军关系论。

珀尔马特在该书第三章（The Professional Soldiers in Prussia-Germany, France, Japan, and USSR）中有关于日本的一节（JAPAN: Soldiers Without State）^①中指出，日本的将校们自建军以来，作为军队这一集团组织的构成人员的责任观念，即“作为团体的责任观念，并没有违反所谓介入政治这一军人职业伦理”，^②因此，在日本，不对政治进行介入的原因，并没有作为团体的责任观念，得到落实。然后他得出结论认为，相反，如果出现介入政治的一定条件和必然性时，从军队的建军过程以及在此培育的日本军队独自的性格来看，介入政治是经常发生的。“他们认为，对政治的介入，实际上是爱国的军部集团的，作为团体的义务。”^③

也就是说，日本的军队是以“护卫”天皇的近卫兵为自己的出发点的，“护卫”天皇是日本军队所承担的主要责任。由此“护卫”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国家体制也成为他们的责任，日本军队被定位成只有他们才是维护国体的物理性基础。日本的军队及其将校集团“认为自身是支撑帝国秩序的正当而忠实的官吏”，^④因此，对侵犯此帝国秩序的一切政治状况反应敏感。所以客观地看，结果就是导致了军对政治的介入。

珀尔马特理解的特征是，他指出，被明治宪法体制所限定的，以政治的和法制的构造为条件的日本独特的军队地位，与以天皇制为基础的日本固有的文化及传统风俗为背景的军部独自的政治姿

①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pp. 69 - 75.

②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p. 73.

③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p. 73.

④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p. 73.

态，是促使军部介入政治的主要原因。三宅也将珀尔马特的理论解释为“在日本，军部的作为一个集团的利己主义，受到日本特有的正当性信仰的助长极端地膨胀，使军部对日本的内政和外交进行最大限度的干涉成为可能”。^① 概括地说就是，他指出日本军部不惜偏离《军人敕谕》文面所示的军人不干预政治的规定，使自己介入政治常态化的原因在于，日本军队在建军过程中所内含的固有的历史与政治的性格。所以说，要彻底究明军部介入或者干涉政治的原因，首先应该尝试分析日本固有的历史与文化。性急的普遍化搞不好将会忽略重要的论点。

珀尔马特在表示军部的政治介入或者政治干涉时，使用了“praetorianism”一词。这一词的词源为古代罗马帝国意为“近卫兵”的“praetorianus”。三宅认为“praetorianism”翻译为“军阀化现象”比较合适，并将带有军阀化倾向的人称之为“praetorian”。因此，“praetorianism”可以解释为说明日本军部的军阀化或者军事化这一政治现象的关键词。^②

但是珀尔马特的这个分析也还是有很多可疑点。第一，并未摆脱现象性说明的领域。如果说政军关系论的研究目的是探求军事介入政治原因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关注更为本质的侧面。也就是说，对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曾几度出现的膨胀主义关心稀少，另外还缺乏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国内政治原因的综合把握。日本军事机构，作为膨胀主义的物理手段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任务，因此，军部的政治化现象变得十分显著。问题是弄清楚这些膨胀主义及其最终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内在机制才是最重要的。

① 参见三宅正樹《政軍關係の視角から見た1930年代の日本》，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第142页。

② 参见三宅正樹译《軍国主義と政軍關係——國際的論争の歴史》，第179~181页。关于“praetorianism”的定义，三宅正樹相继介绍了珀尔马特以及其导师亨廷顿所提出的定义，同时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此将“praetorianism”明确定义为“指军队明目张胆地介入政治的用语”。

第二，把问题仅限于“praetorianism”这一用语上，仍有若干疑问。珀尔马特认为，作为军队的集团肥大化，将促使 professional（职业性）军队转化为“praetorianism”，但是要把军队的肥大化直接导致军队的政治介入和政治干涉这种说明一般化、普遍化，似有不少困难。军队即使肥大化，但如果对军队的统制没有漏洞，控制强调军事理论的军队组织也是可能的。相反，军队机构即使没有肥大化，但如果重视军队在国家的政治地位，那么军队对政治的介入理所当然也会成为常态。

例如苏联各级司令官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并配置负责政治指导的政治士官（замполит）作为副司令官监视、统制军队。^①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大的特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在那里派生军队介入政治的可能性极小。另外美国军队也是在以总统为顶点的强有力的全国民的统制下，所以也几乎没有军队介入政治的余地。如今配备有在西方社会也属顶级的军事力量，防卫机构（军事机构）和防卫力量都有飞跃性增强的日本自卫队，也可以认为“文民统制”在发挥着有效功能。

即使如此，珀尔马特通过独自的方法确实对许多国家及其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彻底的职业主义最终会带来回避军队介入政治的结果这点上，他虽然继承的是亨廷顿的观点，但是他最想强调的一点却是，军队因集团性（corporatism）的肥大化将转化为 praetorianism（军国主义）。这一点与亨廷顿的观点明显不同。亨廷顿以专门技术、责任、集团性为职业主义的三大要件，认为这些将同时实现军部的政治介入，或者说构筑政治与军事的协调关系。关于这点，亨廷顿在写给珀尔马特著作的序文里指出，不赞同

① 参见中村治《ソ連における軍、産、政関係》，佐藤栄一編《現代国家における軍産関係现代国家的军产关系》，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74。此外关于苏联政军关系的最近研究有笹岡信矢《ソ連の政軍関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体制移行期を中心に》，明治大学《政治学研究論集》第19号，2004年2月。

集团性是职业主义的必要条件这一见解，认为集团性将招致对政治的介入是对职业主义的“误用”^①等。

两者见解出现不同的背景，既说明有概念使用上的方法论问题，同时也说明要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中找出有关军队介入政治的原因，并追求其一定的法则性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困难的。在指出上述与亨廷顿相违的基础上，珀尔马特在终章里，就日本的政军关系的特质总结道：“把日本军队推向 praetorianism（军国主义）地位的，是日本军队的专业化与近代化。”^②他认为日本军队政治发言力增大以及政治介入常态化的原因是“专业化与近代化”，这点不仅与亨廷顿不同，而且也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我们必须指出一个珀尔马特基本上没有言及的事实。使日本军队或者说将校集团介入政治常态化的最大原因，就在于自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在政党政治为主轴的日本型民主主义体制中，作为“非选出势力”的将校集团对于自己不能确保民意直接支持的焦躁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珀尔马特的分析可以解释为，他把分析的重点置于在强化“专业化”及“近代化”的过程中，怎样把握积蓄在军队内的内发能量促使日本军队转向对政治的介入这一点上。

正如本书第一章以后将要论述的，我们还必须关注如下事实：日本军队以及将校集团对政治的介入，与其说是内部能量的作用，不如说是被欧美式政党政治或因英美从属型日本资本主义的展开唤起对国家体制改革的危机意识，亦即外部压力能量的触发。

3. 塞缪尔·芬诺的“政治文化比较论”

塞缪尔·芬诺最关心的是军部达到介入政治的过程，以及限定

①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p. xi. (“Foreword” by Samuel P. Huntington)

②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p. 285.

其过程的政治社会风土，即政治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层次。塞缪尔·芬诺在《马背上的人——军在政治上的作用》（*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中，首先将政治介入定义为“通过武力将一般承认的文民当局的政策或人才更换为军的政策和人才”。^①但是，塞缪尔·芬诺在说明此定义并非自己特有，而是一个一般的定义之后指出，关于政治介入的方法与内容，并不仅限于暴力装置的物理性使用，而且还有具体行动以外的各种方法，譬如影响力、压力、非合作等以军事力的存在为背景的各种各样的方法。由此可见，塞缪尔·芬诺主要关心的是论述上述到达直接诉诸军事力量的过程。

塞缪尔·芬诺将军部的政治介入分为四个阶段。即各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水平，决定了各国政治介入的阶段。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军部支配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下边简单整理如下。

首先，在政治文化已经成熟的国家，因“文民统制”的原则已定形，军部对政治仅限定在给予一定“影响力”（influence），并且其影响力也是在合法范围内实行的阶段。其次，在政治文化有一定充实程度的国家，军部预示随时会发动“压力”（pressure）和“敲诈”（blackmail）等制裁行动，由此向政府提出自己要求的阶段。至此为止的阶段中，军部的政治作用相对较低，说明军部在名义上与实际上都处在政治的统制、支配之下。因此，军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

但是，在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军部会冲进“替换”“文民”政府、“文民”政权的阶段（displacement of civil cabinets）。他们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显示要直接行使军事力这种暴力装置或者对“文民”政府表示不合作态度，以达到自己的意图。于是最终在政治文化水平最低的国家，“文民”的政治体制被清除，从而进

①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2), p. 20.

入军部独裁的阶段 (suppliment of the civil regime)。

塞缪尔·芬诺将这四个阶段的军部的支配形态分为以下五个范畴。即“限制性、间接性支配” (indirected, limited military rule)、 “完全的间接支配” (indirect, complete military rule)、 “二重支配” (dual rule)、 “直接的军部独裁” (direct, military rule)、 “直接的军部独裁下的疑似文民政府” (direct, quasi-civilianized rule)。① 塞缪尔·芬诺的政军关系论认为, 军部的政治介入程度与其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的成熟度成反比, 政治文化的程度决定军部的支配形态及其内容的阶段。这一观点本身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析方法。毫无疑问, 塞缪尔·芬诺从世界史角度, 比较研究发生在各国的军部介入政治的实际情况, 探求军部介入政治的原因, 将这一分析进行一般化、普遍化的作业。在此方面, 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塞缪尔·芬诺把这种政军关系论也应用于对战前日本军部的政治介入进行比较研究。在此, 他把战前的日本定位于具有“发达的政治文化”的国家社会位置, 军部对政府使用“压力”及“敲诈”的方法进行政治介入, 最终使日本成为一个被军部“限制性、间接性支配”的国家。②

根据塞缪尔·芬诺的分析, 如果把时间限定在战前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昭和6年)到战败的1945年(昭和20年)之间的话, 军部的支配形态应该被分类到“限制性、间接性支配”范畴。同时也由于二二六事件(1936年)以后,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复活, 军部政治介入的阶段也从行使“影响力”阶段进入通过“敲诈”对内阁进行牵制的阶段。事件后, 陆军在广田弘毅内阁组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例如阻止民主主义人士

①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pp. 149 - 167.

②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pp. 151 - 156.

入阁等),就是一种“敲诈”的典型事例。^①

如上所述,军部的政治介入本来还处于极为有限的程度,但是以二二六事件为转机公开介入政治,到日美开战时其介入程度达到顶峰。但是日本的政治介入此后并没有到达“替换”阶段。其原因,正在于日本的政治文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按:塞缪尔·芬诺的区分属于第二阶段)。对于战前日本的政军关系,塞缪尔·芬诺认为虽然军部对政府的“敲诈”常态化,但是并未达到“替换”程度,因此军部独裁并没有成立。

作为结论,塞缪尔·芬诺通过比较研究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军队的政治介入事例,主张为阻止军队的政治介入,必须确立“文民优势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civil supremacy)。在此并未对亨廷顿所主张的军队的“职业主义”寄予过大的期待。就是说,塞缪尔·芬诺认为,在发展政治文化,蓄积完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只要确立“文民优势的原则”,就可以减少军部介入政治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日本在政军关系上,因为确立了统帅权独立制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等全面否定“文民统制”原则的制度,结果为军部介入政治开辟了道路。因此,即使具有成熟的政治文化和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只要存在这些军部特权,就不能否定军部介入政治的可能性。这一点很重要。

以上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塞缪尔·芬诺的理论。但其中也存在有不少疑点。

第一,从理论形成的大框架来看,区分政治文化成熟度的基准或指标到底是什么,并不明确。的确,塞缪尔·芬诺在论及现代的军部的政治介入时,作为政治文化水平低的国家,列举了阿根廷、巴西、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拉克、委内瑞拉、巴基斯坦、苏丹等国家,使用了人均能源消费量和工会组织率、

^①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pp. 132 - 133.

人口的城市化率、国民的识字率等数字来作为表示政治文化水平的基准。^①但是像这样的基准、指标仅限于此处，而且仅限于现代国家中“政治文化低位”的国家。仅仅据此，到底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文化发达的国家应该如何进行分类，而且是否能够进行充分的比较分类，还不明确。既然使用分类、区分这种方法，也就有必要明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合理的基准与指标。

第二，从用语问题上来说，在用塞缪尔·芬诺所说的“影响力”、“敲诈”、“替换”对实际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时，仅仅限定在1930年代。陆军在二二六事件后对广田内阁的干涉、介入的实际情况确实有用塞缪尔·芬诺所说的“敲诈”一词来表现的价值，但是，对于塞缪尔·芬诺认为日本军部在该事件以后，由于日本政治文化发展水平所限放弃了超过“敲诈”的介入，转而主要使用来自外部的恐怖行动这种卑劣手段，发挥实质性政治能力，从而领导了政治这种判断与认识。这点我们不能同意。

三宅对此已经提出疑问。^②二二六事件以后军部的政治介入，借用塞缪尔·芬诺的用语已经是超越“敲诈”，在积极推行“替换”。实际上，军部竟然连陆军出身的林銑十郎内阁（陆军大将）也拉下台来，推出遵循陆军意向的近卫文麿执掌政权，强行推行了内阁的“替换”。

当然，无论是这个林内阁，还是后来的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内阁、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内阁、东条英机（陆军大将）内阁、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内阁、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内阁等陆海军内阁，虽然说单是由军部的政治力量成立的是不正确的，但至少是以强有力的军部发言力为背景，接二连三地实行“替换”却

①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p. 102.

② 参见三宅正樹《政軍関係の視角から見た1930年代の日本》（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創世記，1981），第75～76页。相关其他研究还有：慶応義塾大学地域研究グループ編《変動期における軍部と軍隊》，慶応通信，1968；西岡朗：《現代の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知識社，1988等。

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塞缪尔·芬诺的“敲诈”与“替换”用语本身的有效性和妥当性就存有疑问。

在其他方面，按塞缪尔·芬诺的区分，把日本视为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文化发达的国家是否妥当；以及与此相关，在塞缪尔·芬诺的研究中，政治文化发达程度基本相同的德国与日本，其军部政治作用的相违如何说明，等等，这些问题尚有讨论的余地。我们不得不认为，总体来说，因为急于使政军关系在世界史层面上一般化，所以不免造成对各国历史的精细的比较研究稍嫌欠缺的结果。^①

4. 马科松的“下克上”理论

下面介绍一下马科松在1957年发表的《日本外交政策的统制——关于政军对抗的研究（1930～1945）》（*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 Military Rivalry 1930 - 1945*）。此书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出版会系列发行的政治学丛书第五卷，以日本国家意志的决定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点与上述三人不同，马科松可以看做一个日本历史研究者。马科松有着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为东条英机辩护的经验，他使用那时所提交的资料，以探讨昭和初期日本军部介入政治的实态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此，他试图通过对政军关系史的独自分析，辨明日本政军关系的特征并使之普遍化。

虽然存在唯一的参考资料只有作为《西园寺公与政局》出版的《西园寺、原田回忆录》，以及受1957年（昭和32年）以日本

① 关于塞缪尔·芬诺政军关系论的研究有：三宅正樹：《政軍關係の視角から見た1930年代の日本》（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1930年代論として》創世記，1981）；内山秀夫：《新興各国における政治と軍部》（慶応義塾大学地域研究グループ編《変動期における軍部と軍隊》，慶応通信，1968）；五百旗頭真：《陸軍による政治支配——二、二六事件から日中戦争へ》（三宅正樹編《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第二卷第一法規出版，1983）；筒井清忠：《昭和期日本の構造——その歴史社会学的考察》（有斐閣，1984）；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下卷，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7；永井和：《近代日本の軍部と政治》，思文閣，1993；等等。

法西斯主义研究为主的日本现代政治史研究刚刚起步等研究条件的制约，但是他已经成为外国人研究日本现代史的先驱。他使用一定的分析方法分析军部介入政治的原因，其意义在积蓄了庞大研究成果的今天也没有退色。

马科松政军关系论的关键词是“下克上”（rule from below）。马科松主要关心的是军部在日本的国策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强调军部在外国的军事行动，在决定日本外交指导及外交政策时，发挥了极其重大的决定性因素。那时候，正如关东军等现地部队挑起九一八事变以及华北分离工作等典型事例所示，最初是现地军队的中坚将校策划的非法军事行动，最后军中央被迫追认其合法。这些行为对内阁人员之一的陆军大臣构成压力，陆军大臣最终以军部大臣的特权为后盾，强迫内阁和政府贯彻军部的要求。由此可见，在国家政策的决定上军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关于战前军部在日本的国策决定机制中所起的作用，马科松在强调与本来应有的决定机制相异性这个意义上，使用了“下克上”一词。马科松构思出这一用语的理由，应该是出于重视在对《西园寺、原田回忆录》所记载的军部介入政治的常态化，以及元老西园寺为了抑制军部的政治野心绞尽脑汁的言行进行整理时，尝试解明日本军部介入政治的特异实态这一研究上的视点。

但马科松的理论也存在很多疑点。第一，马科松所依据的资料，虽然很多原因属于历史时期的问题，但基本上是依据对军部的政治介入持批判态度的西园寺这个亲欧美派元老的言行及其周边的宫中集团的思想与行动。他仅仅是通过这些资料尝试解明日本的政军关系。他在此，对于如与九一八事变相关的石原莞尔和同属统治派的中坚将校们扰乱军队的统制和国策统一性的行为，用“下克上”一词作为日本固有的现象说明。^①

① Yale C.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 Military Rivalry 1930 - 1945*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73), p. 114.

也就是说，由于过于依赖该资料，马科松陷入将军部（陆军）在全体内政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所发挥的指导能力大大超出实际情况的结果中。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契机的确是出于关东军的“谋略”，但也正如本书第五章将要解明的那样，问题在于在事后对此承认的军中央以及政府内部的指挥实施中，存在着期待关东军通过运用武力从而推进中国政策的意图。

这一时期马科松依据的所谓宫中集团，虽然没有全面地登上政治的运营舞台，但是在他们的行动中，并没有开始对军进行积极抑制或进行否认。即使他们对军主导的对中国政策的急速发展将带来与英美之间的摩擦抱有不安，对此，马科松在结论部分总结为，1930年代以后的军事膨胀政策，是军部的军事侵略计划和军部主导的结果。^① 马科松在把握其他历史细节上也明显存在误解，虽然这是受资料的制约不得已而已，但从大的框架上考虑，这是与马科松的关键词直接相关的，所以首先得指出来。

第二，就马科松的关键词“下克上”一词本身来说。我们一般论及日本政治、军事史上的所谓的“下克上”，指的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表面化了的军部内部领导权下降的倾向，具体指的就是幕僚层指导性的强化和军上层部的傀儡化。^② 例如，真崎甚三郎参谋次官把闲院宫载仁总参谋长完全傀儡化，从而掌握了参谋本部的实权，以及九一八事变时石原莞尔等人无视关东军司令官以及关东军首脑部的意向独断专行等事例。

此处所说的“下克上”与马科松所使用的“下克上”其意义有相当的差异。马科松的用语相当含糊，使用范围也相当广泛。也就是说，马科松试图用“下克上”一词来说明1930年代以后的日本政军关系的构造与机制，但是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因

① Yale C.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 Military Rivalry 1930 - 1945*, p. 215.

② 参见藤原彰《天皇制と軍隊》，青木書店，1978，第51页。

为马科松对“下克上”一词的定义过于暧昧，很有可能被允许无限扩大解释。另外，“下克上”一词用在说明权力内部的位置关系变化时也许有效，但如果作为全面把握政军关系全体的用语，显然缺乏精密度。

三宅对马科松理论的评价：“作为在战后较短时期内，从政军关系的视角出发，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前半期日本外交政策决定的内部机构进行分析的研究，应该给予一定的。”^①如果说政军关系论构筑的目标，是探索军事介入政治的原因，提示有关政治与军事之间应有姿态的理论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在理解三宅的这个评价基础上，还是不得不指出其“下克上”一词的局限性。

马科松在终章结论处指出：“毫无疑问，九一八事变后战线扩大到华北以及中国全土，最终扩展到南亚太平洋地区及东南亚地区，1930年代以后的如此军事膨胀，完全是军的计划与引导的结果。”^②但更重要的几点问题是：为什么“下克上”的情况在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日本国家体制中不但产生，而且达到常态化？这是否因为明治宪法体制内部当初就孕育着这么一个要因？与此相关，“下克上”常态化的结果，到底给日本的政军关系带来了怎样的特征？回答以上课题，才应该是当前政军关系研究的目的所在。

正如三宅所指出的，马科松运用极其有限的资料来分析战前日本军队政治介入的原因，作为象征事例，他举出二二六事件这样军的武装政变的理由我们虽然能够理解，但是纵观今天的二二六事件的研究，可知该事件其实是出于对军队的横暴及不必要的政治介入不满的结果，现在人们更为关注的反倒是以该事件为良机，通过镇压政变，企图巧妙地打通介入政治通道的该时期军部

① 三宅正樹：《政軍関係の視角から見た1930年代の日本》（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1930年代論として》創世記，1981），第135页。

② Yale C.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 Military Rivalry 1930-1945*, p. 215.

中枢的动向。^① 因此，马科松所分析的“下克上”作为现象性事例来说，也许有其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指出的是，现在要求从制度及组织层面对军的政治介入进行多面分析。

四 政军关系论的新展开

——以三宅正树《政军关系研究》(2001)为参考

1. 政军关系的变动要因

在此重新整理一下以战后欧美各国为主要对象所展开的政军关系论。三宅在其新著《政军关系研究》“第四章政军关系论的新展开”中，列举了成为政军关系论起点的《军人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以后的亨廷顿的政军关系论，以及最新的政军关系论和研究者的动向等。他用寓意深刻的问题设定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美苏冷战结束后各国政军关系的变容等。在此首先列举三宅指出亨廷顿的几个问题，通过笔者自身的总结，探索今后政军关系研究的课题。

其中三宅最为关心的是军介入政治的原因。他首先引用亨廷顿的观点：“促使军队介入政治的主要原因不在军队的内部，应该从政治的内部来寻找。军队方面即使确立了职业主义，但是假如政治体制一方弱化并陷入分裂状态的话，就会导致军队的政治介入。”^② 然后他重新指出：从来对于军队介入政治的原因主要在军队自身的本质与构造中寻找的倾向很强，但其实如果政治自身混乱、动摇、缺乏正统性等诸条件齐备，军队就会产生亲自登上政治舞台的冲动。

这里强调的是，为了使可称之为现代国家政军关系基本原理的

^① 参见须崎慎一《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その時代——天皇制、軍部、戦争、民衆》，大月書店，1998。

^② 三宅正樹：《政軍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142頁。

“文民统制”能够发挥作用，首先应该确立“具备正统性的高效率的政治体制”。如果用此对照战前日本的政治，就可以联想到促使陆军产生介入政治动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不顾国民利益，只追求党利党略。在此意义上来说，亨廷顿的如此观点就在于应该构筑坚固的政治体制，不给军队可乘之机。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反过来说，当政治出现可乘之机的时候，便给军队提供了介入政治的绝好借口。军队钻这个空子，通过追究存在于政治内部的各种矛盾，获得介入政治的正统性。

三宅还提及产军复合体。正如战后美国政治学者所指出的，产军复合体的存在，促使了军的政治影响力的增大。关于此点，亨廷顿并不持肯定态度，但三宅指出，产军复合体是阻碍“文民统制”成立的要因。总之，出于产军复合体经常向美国政权中枢输送人才的现实，可以指出两个侧面的问题。

在今日的美国，产军复合体的存在给政军关系带来决定性变化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变化的第一个侧面是使政军两者间的协调性必然化；第二个侧面是，以军事与产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基本的经济结构作为政治结构也发挥着作用，其结果，导致政治与军事处于混在状况。

也就是说，产军复合体的成长将军事价值判断带入国家政策的决定过程中，这个现实通过美国的军事政策在美苏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比重更加重要也能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说，以美国为首，英国、法国等同样存在产军复合体这个权力组织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大幅修正从那而来的政军关系论的基本结构。亨廷顿和三宅指出的这个问题，如何反映到新的政军关系论研究上，就是我们今后的重要的课题。^①

① 论及“军产复合体”问题与政军关系论之间关系的文献中，最值得参考的是三宅正樹译《軍国主義と政軍關係——國際的論争の歴史》（南窓社，1991）的“第五章 军产复合体”（第122~149页）。

这里的问题是，像以前那样把政治领域与军事领域严格区别已经不可能，而“文民”与军事的相互渗透也已趋于常态化。比如沃克·伯格翰在其著作中引用并介绍了美国历史学者迪布尔（Vernon K. Dibble）《兵营社会》一文观点。（迪布尔）认为：“对于美国，继续追问如今文民是否还在控制着军人这样的问题已毫无意义。根据他的见解，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的各种制度以及人们极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极为相互依存的国家。其结果，他认为，在以前的议论中总是清清楚楚分别开来的军事领域和文民领域，虽然不能说已经融合到完全不能分开的程度，但是早已交叉渗透，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了。”话虽如此，但伯格翰并没有完全接受迪布尔的观点。

例如，德国政治社会学者迪特·森格哈斯（Dieter Senghaas）在其著作《军备与军国主义》（1972年刊）中，对于把美国型高度产业社会看做军国主义提出疑问，并认为，与其说产军复合体的创出会直接带来军国主义的扩大，不如把其作为另外一种军国主义概念来把握更为适合。这里对单纯认为产业社会的高度化会直接带来军事化（militarization），结果将转换成军事国家或者军事型社会这种观点提出疑问。美国型的军国主义指的是军人在政治领域掌握主导权，不可避免地要创建军事价值优先的社会这种状态。但是产业社会的高度化，毋宁说将带来政治与军事协调关系的进展或者两者分工的明确化。^①

特别是在今日被称为军事技术革命（MTR = the Military Technical Revolution）或军事革命（RMA =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的军事技术的急速发展中，仅靠少数军事专家与军事技术人员统管全部军事领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军事买办独占军事领域已经极为

① 参见三宅正樹译《軍国主義と政軍關係——國際的論争の歴史》，南窓社，1991，第125～126页。Volker P. Berghahn, *Militarism: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1861-197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7.

困难的现状下，政治与军事应该成为同时放在同一范畴内处理的对象。由此可见，欧美日先进各国的政军关系，已经发展到必须在全新的阶段和全新的理论框架中把握的阶段。^①

相反，欧美以外的许多依然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即使没有获得政权，军部（国防军）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很大，摆脱不了军事主导的政军关系这种实际例子也很多。也就是说，即使在产军复合体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也未达到高度产业社会的各国当中，还是存在政治领域与军事领域相互介入的情况。在这种政军关系论的全新展开中，在构筑与该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发展方向相关联的体系性理论时，应该构筑最贴切、最合理的政军关系。

在此意义上，三宅《政军关系研究》“第四章 政军关系论的新展开”中的“2. 亨廷顿眼中的1970年代的政军关系”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部分。三宅在此提到了亨廷顿的《1970年代的军人与国家》一文，介绍了亨廷顿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军关系类型区分为“传统模式”（1815~1940年）、“冷战模式”（美苏冷战时代至1970年代初期）、“第三模式”（1970年代）等三个类型。

在此，“传统模式”时期政治与军事之间的紧张关系尚未表面化，但是“冷战模式”时期军事的社会作用却大为高涨，作为政治手段军事力的使用也被正面容忍。但是，进入1970年代，美国

① 关于现代日本政军关系的真实情况，近来也面临着麻烦的问题。战后日本政军关系虽然一直以美国型的文民统制作为其基本原理，但在日美军事协力体制的进展和周边事态法和恐怖主义对策特别措施法，以及一系列有事法制议论中增大了对自卫队制服组的作用的期待。宪法学界开始提出制服组的政治发言能力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承认的见解。例如，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阿川尚之（美国宪法专家，原驻美公使）在“给予制服组发言权”为题的专栏中指出，“应构筑一种制服组不必通过中央直属部门而直接作为专家提出自己见解的制度。在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政治家作出最终决断。文民统制本就应以此种形态存在”。（《朝日新闻》2002年7月10日的“我的视点”）但是，阿川尚之的这种见解，是强拉硬拽于现实状况的文民统制论，一旦容忍了“提出见解的制度”的话，在依然未被制度化的政军关系现状当中，就会致使制服组在行使其政治影响力时的危险性提高。在此意义上，根据目前的状况，日本更有必要加强在政军关系研究的进展。

公众的政治意识从军事外交领域转向关心福祉、健康、教育、环境、都市问题等国内问题，以及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从来对军队的宽大态度也开始逐渐修正。而越南战争激活了舆论中潜在的反军情绪，从而导致对原来的政军关系进行大幅修正。

就是说，大众的态度从一般的亲军转变为嫌军，再转变为反军，同时也使“反防卫知识分子”（antidefense intellectuals）出现，使反军国主义（antimilitarism）潮流涌现出来。^① 亨廷顿的理论虽然是苏联侵入阿富汗以前的理论，但是他已经预测到当侵入阿富汗那样的国际纷争发生时，与之对应的政军关系也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到此为止三宅简要介绍了亨廷顿的新的思考。但是问题是他强调了在现代，政治领域与军事领域不像以前那样能明确区分，而是相互交叉重叠，也就是说有复层关系被加强的现状。其理由，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苏冷战构造中所产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不宣而战的，无论美国还是苏联，发动战争的时候并不明确区分政治与军事（战争）。或者说从原来政治与战争两者择一，发展到不分政治与军事（战争）、两者并存思想占主流的地步。

笔者认为其理由是，第一，如果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一旦宣战的话，即使美苏不是当事人，在某些情况下，美苏也有不得已陷入直接军事对决的危险。美苏最多时合计保有五万枚核武器，具有能屠杀全球人口8倍的能量，处于一种所谓过剩杀戮（over kill）的状态。而且，由于核武器搬运手段性能增强，命中率也飞跃提高，使“确证破坏”成为可能。如果不选择在受到攻击之前先发制人地攻击对方，那么就不可能回避毁灭，他们使自己陷入核威胁之中。因此，作为核保有国，对以美苏为首的不少国家来说，宣战带来的将可能是自国的毁灭，因此这种选择是一个必须回避的选择。特别是美苏，不仅陆地，甚至空中及海上也作为核对峙的场所，相

① 三宅正樹：《政軍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149页。

互之间处于核恐吓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的使用基本上不得不要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无论美苏哪一方，冷战时代的战争都是无宣战布告的军事力量投入或使用。于是在此所设定的新的战略方针为“局部纷争”或“低强度战争”（LIW: Low Intensity Warfare）这一新的战争概念。这种新的战争概念，相对从来的战争是国家对国家的战争，以国家对恐怖组织、国家对特定民族、国家对特定集团等非对称性为决定性特征。由此，虽然军事力行使的门槛低了，但却不像从前那样战争基本上交给军事组织，而是政治指导与战争指导同时进行。可以想象，战争形态的这些变化，迫使政军关系应该发生根本的转换。

第二，对军事力行使的拘束这个问题也值得深思。今日美国的政军关系，在与政治和军事关系变化的同时，围绕政治领域内军事政策决定过程的对立与妥协极为活跃。作为其基本前提，围绕是否由议会把美军最高司令官美国总统使用超级军事力的权限相对化，成为政治争论焦点。在被称为“权限扩大的历史”的美国总统史上，1973年11月7日制定的《总统战争权限法》（正式名称为*Joint 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War Powers of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是一个划时代事件，为人们所记忆。此法律的目的是确立在没有战争宣言情况下投入美国军队时，应该由议会和总统共同判断。对于包括除此以外的其他战争在内的紧急事态的应对，1976年9月14日颁布的《国家紧急事态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也规定，总统宣布国家紧急事态和采取紧急事态对策，也须经由议会授权才能实行。^①

① 参见浜谷英博《米国戦争権限法の研究——日米安全保障への影響》，成文堂，1990，第73页。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宫脇岑生《アメリカ合衆国大統領の戦争権限》，教育社，1980；宇賀克也《アメリカ行政法》，弘文堂，1988；Eliot A. Cohen, *Supreme Command: Soldiers, Statesmen, 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中谷和男译《戦争と政治リーダーシップ》，アスペクト，2003年等。

以上两个法律的颁布，使军队最高司令官总统的对军权独占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意义上，如果说议会是实行民主权力的场所，那么政治与军事的均衡则由议会权限的扩大而得到保证。由此虽然可以认为美国的政军关系趋于正常化，但是三宅在论及以上情况后，引用并介绍了亨廷顿的论文。亨廷顿认为上述法律对美国军事力的行使带来了一定的拘束，但是与此同时，“一旦开始使用武力，为了迅速并且决定性地达成自己的目标，当投入压倒性的军事力”。三宅认为亨廷顿的预测是正确的。就是说，大总统与议会在决定投入军事力量时，为了不再重蹈越南战争时边考虑议会的动向边逐渐扩大兵力投入的覆辙，具备了选择短时间内集中作战的可能性。

从以上几点引申出来的政军关系论的新展开中，在美国方面浮现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政治与军事在多重构造的现实中，两者之间的区分越来越困难的现实。正如三宅自身所指出的，有关美国的政军关系论，亨廷顿的看法是“乐观得令人眩目”。^①由这种现实的政军关系派生出来的美国军事力的行使方式，已经被海湾战争以及以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同时多发恐怖事件为发端的对阿富汗的进攻、伊拉克战争（2003年3、4月）等证实。正像在此所具体显露出来的那样，只要议会同意，结局将很可能全面展开由军主导的政军一体化关系。在此，我们不得不想象，对军队的甚至过剩的期待通过议会的赞同得以确保，这种水平的政军关系的实态化正在进行中。

上边已经述及，亨廷顿未必深刻理解伯格翰引用并介绍过的“军事领域与文民领域的共生关系”（迪布尔）迫使以两者的区别为前提，以“文民统制”为基本的政军关系结构解体的现实。若此，我们不得不从亨廷顿的政军关系论中解读允许政军共生和“文民统制”相对化的新的政军关系在今后展开的可能性。因此，

^① 参见三宅正树《政军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154页。

这也势必将引申出对以往的政军关系论进行根本修正的议论。

2. 政军关系论的新展开——亨廷顿、诺德林格的议论

这里我们首先看一下亨廷顿于1996年发表的最新论文《政军关系的再构筑》。^①关于此论文，三宅在《政军关系研究》第四章第四节“冷战构造消灭后的政军关系”中有所介绍。由此可知，此论文是在讨论冷战结束这一新形势下，政军关系应有形式的国际会议（1995年3月13~14日于华盛顿市）上所作的基调报告。三宅在该节的“1996年的亨廷顿”项，介绍了此论文。我们尝试着整理一下三宅的介绍。

三宅首先指出，亨廷顿虽然受到塞缪尔·芬诺、珀尔马特等许多人的批评，但是他基本上没有改变自己在《军人与国家》中所提示的“文民统制”论。也就是说，据亨廷顿说，最近20年间，共有实行权威主义体制的近40个国家出现了“文民”政府，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体制的过渡。同时也确立了以亨廷顿主张的“客观的文民统制”为基本的政军关系。当然，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方式千差万别，并非一成不变，但与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军关系相比，新民主主义体制下的政军关系较为良好。同时，亨廷顿还引用斯洛文尼亚的贝布莱尔（Anton Bebler）的说法，作为“历史性调和的进展”，^②列举了11个项目，介绍了在美苏冷战构造下实行权威主义体制的东欧诸国的政军关系的显著变化。

亨廷顿引用贝布莱尔的说法，披露了东欧旧社会主义各国在当年以共产主义为原理的权威主义体制下，军人也被强制要求无条件地为党和国家服务，并由此承担了支撑权威主义体制的作用。但是，伴随民主化而来的军队和军人的政治中立化，军队和军人从党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Reform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Reform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p. 5.

与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民主主义体制中服从作为政治主体的“文民统制”，从而确立了亨廷顿所主张的“客观的文民统制”。

亨廷顿就东欧这种典型的良好政军关系的成立，以及确立“文民统制”举出三个理由。第一，军人的“职业主义”和“文民统制”广泛普及，被世界各国军队所接受；第二，“客观的文民统制”无论对军人还是文民都有益处；第三，与经济改革不同，政军关系的改变不但基本上不会给社会带来负担，相反会带来广范围的利益。^①

亨廷顿还在该论文最后一节“关于新使命的课题”中论述美苏冷战构造结束后政军关系应有的形式，并指出，军事力的削减倾向和征兵制度改革的实行，使军队和军人的政治和社会作用低下，出现了军队的作用究竟应该向何处寻找的问题。他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文民与军人抑或是民众与军队之间将会产生紧密的关系。亨廷顿引用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名言“所有市民皆为士兵，所有士兵亦为市民”，论述了争议中的民主主义体制下新的政军关系应有的形式。^②

最后，对于今后政军关系的再构筑，亨廷顿认为，相对于军人，更为重要的是站在文民立场上的人的立场。亨廷顿指出以上问题点后认为，虽然问题点很多，但是民主主义国家的政军关系与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相比，显然比较顺利。他在披露了这个乐观论后结束了自己的论文。前边我们提到，三宅曾指出亨廷顿对于美国的政军关系论“乐观得令人眩目”，这里亨廷顿同样持极为乐观的态度。

亨廷顿的这种乐观论到底是从何处派生而来？这一点本身就令人深思。恐怕是因为他本身在卡特总统时代担任白宫安全保障顾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Reform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pp. 6-7.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Reform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pp. 10-11.

问，直接与美国军人结下深厚友谊，亲身体验到了军对拥有绝对权限的总统的无限忠诚心，以及对在那里接触到的高级军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优秀“职业主义”精神充满信赖的缘故。

总之，对于亨廷顿的对美国军人“职业主义”精神近乎信仰的确信，我们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但在此应该论述的是在民主主义体制下军事作用的相对化问题。也就是说，在现代被战争形态所规定的政治与军事的多重化构造状况下，文民指导者要是不具有优秀的军事知识和情报分析能力，那么与这种多重化构造相反，随着军事技术的高度化发展，政治与军事进一步走向分化，在与从来不同的意义上，两者之间再次产生深刻隔阂的可能性也就会很高。

就是说，军人越是企图通过独占高度的军事技术与军事情报追求自身的认同性，只有民主主义体制才可能实现的亨廷顿所说的“客观的文民统制”就越是很难生效。为防止此类事态的发生，比如说文民的军人化或已不可避免，同时军人的文民化亦是不可欠缺的。在这点上，如果借用亨廷顿引用的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名言“所有市民皆为士兵，所有士兵亦为市民”的话，那么这种不得不追求的状况，就成了“所有文民皆为军人，所有军人亦为文民”。

但是，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成为现实，那么现代战争的形态和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些难题，必定会成为阻挠建立应有的政军关系的要因。如果我们直视这种现实的话，就会对亨廷顿的乐观论再次感到惊奇和意外。

下面我们整理一下三宅在第四章第三节所介绍的诺德林格（Eric A. Nordlinger）的《政治中的军人们——军事武装政变与政府》（*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 and Governments*）。^① 三宅关

①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7). 其他的诺德林格的著作如下所示：Eric A. Nordlinger, *Conflict Regul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Eric A. Nordlinger, *Isolationism Reconfigur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等。

注的是其中的第一章“Praetorianism（军国主义）的研究”。诺德林格在该文中把适用于西洋诸国以及非西欧诸国双方的文民统制的模式，区分为“传统模式”（traditional model）、“民主主义模式”（liberal model）、“渗透模式”（penetration model）等三种模式，并对其特质进行了明快的论述。^①

与亨廷顿主张的“主观的文民统制模式”相对应的“传统模式”，显示了文民精英与军人精英的未分化状态，而“民主主义模式”则是以两者的完全分离为前提的。用此对证战前日本明治近代国家的文民关系，如果我们通过比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充分显现出来的状况，文民精英的代表伊藤博文与军人精英的代表山县有朋互相协作进行战争指导的事例探索政军关系，那么以上两种模式到底可以适用到何种程度呢？

的确，到甲午、日俄战争期间为止，文民与军人两方的精英处于未分化状态，也就是说相互渗透的状态，这也许可以归入“传统模式”的范畴。但是，明治末期以后，随着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军部的影响力增大，再加上创建了各种各样的军校，军人精英辈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主的官僚培养体制的完善，文民精英同样也大量培育出来，由此两个精英阶层的分业体制逐渐得以确立。

因此，用诺德林格的主张来说，在日本也可以看到从“传统模式”到“民主主义模式”的转变。追究分析这一变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例如：站在军人精英顶点的山县有朋，以西南战争（1877年）为契机，翌年制定参谋本部条例，开辟了通向统帅权独立制的道路，试图分立军事机构与政治机构；另外，“军人敕谕”（1882年）严格禁止军人干预政治；等等，也许都可以用这里所说的“民主主义模式”的视点来分析。

关于“渗透模式”，三宅也用两页的篇幅进行了介绍和批判。

^① 参见三宅正树《政军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156~161页。

这是通过从上至下对军彻底灌输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激发他们对文民的自发忠诚，从而抑制军对政治的介入型的文民统制的一种方法。这种模式具体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北朝鲜）等特定的国家，他们对军队的统制和监视由配置到各部队的政治委员负责。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党（劳动党）领导的国家体制是这种模式成立的条件，除此之外都不属于这种模式。

对于以上三种模式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诺德林格有如下的论述：

在考虑这三种模式的局限时，一般认为非西欧世界的“文民统制”有可能成为不确定的制度。“传统模式”虽然非常有效，但军人与文民的本分在本质上具有很大的区别，由此产生的现状来看，“传统模式”实际并不十分合适。“民主主义模式”具有潜在的有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所谓文民的伦理，为使其内在化需要时间与适当的环境；况且即使达到这一目的，但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压力，虽然痛苦但也许不得不放弃。特别是文民的指导者们，政治的管理和过分干涉等，恣意践踏包括军事制度在内的军的基本规则时，更是如此。“渗透模式”在过去曾完成的模式当中例外有效。但是若要实行“渗透模式”的话，除非具备弱小军队这一稀有环境，不然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模式也只适用于安定的体制。^①

也就是说，诺德林格认为，在非西欧各国，这三种模式均含有决定性的局限性，文民统制本身成立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事实上，

^①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1977), pp. 18 - 19.

从他提及局限性之后，做出“没有广泛适用并且行之有效的文民统制的模式”^①的结论，便能知道他对于其成立是很悲观的。关于这一点，三宅也用“三种模式无论哪种，除了极个别的以外，明显可以看出实行起来都是困难的”^②概括，最终做出悲观的结论。但是，达到这些结论的议论过程，使人们加深了对“文民统制”的深刻理解，也给我们提示了探求更高可能性的问题。

就是说，至于“传统模式”，不用说，它作为近现代社会对军事的期待已经成了过去的遗物。而“民主主义模式”，通过政治与军事、文民与军人在一定的原理下确认双方的作用，相互尊重，有可能构筑某种对等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模式是有可能抑制军的政治介入的一种模式。在此意义上，这种模式可以认为是最为理想的模式。但是这里的问题，说是在军人一方，毋宁说是在文民一方。

正如过去众多政军关系论学者所指出的，政治指导者的腐败和无能等导致信赖受损，成为军人介入政治的主要动机的事例很多。至于“渗透模式”，今后权力一元化会很困难，在与西欧民主主义诸国的权力多元化方向相结合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做最完整的“文民统制”，但在其成立条件的持续性这一点上，还存在问题。例如中国和北朝鲜等维持该统制必然困难。

以权力一元化为前提，通过单方面的命令及服从关系而成立的“文民统制”，与其表面上的坚固相反，经常含有不安定要因。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文民统制”只能是在文民获得军人的信赖，并且文民亦信赖军人，军人不是追求扩大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履行在安全保障方面的任务与责任自觉作为自身终极使命的情况下，才能确立最坚固的“文民统制”的话，那么这种政军关系，到底是通过什么才能确立呢？正如诺德林格反复论述的那样，理解处于

①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 and Governments*, p. 19.

② 三宅正樹：《政軍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161頁。

“文民统制”成立困难的政治环境中的非西欧各国现状，给我们提示了究明理想政军关系的方法与途径。

此外，诺德林格同在第一章就有关政治介入的三种类型，导入了“调停者”（moderators）、“守护者”（gurdians）、“支配者”（rulers）用语，明示了政治介入的水准，并通过“近卫兵方式的调停者”（praetorian moderators）、“近卫兵方式的守护者”（praetorian gurdians）、“近卫兵方式的支配者”（praetorian rulers）^①等小标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正如三宅所关注的，诺德林格对其中的“近卫兵方式的支配者”最为关心。在此“近卫兵方式的支配者”竭尽全力对国内进行统治，他们把“基本上所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和半政治组织，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均被定为非法”，^②军部作为政治以及社会的变革者登场，这便是非西欧诸国政军关系的典型形态。对此，诺德林格在介绍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论述。

三宅最后在第四章“作为支配者的将校”中也提到“支配的三种类型”。^③介入政治后，站在支配政治一侧的军，证明自己支配的“正当性”（legitimacy），可以被分为“领袖的正当性”（charismatic legitimacy）、“传统的正当性”（traditional legitimacy）、“合理的、合法的正当性”（rational-legal legitimacy）三种类型。这个分类的确具有深刻意义，并富有启发性。其中，关于“合理的、合法的正当性”，因为也是解明战前日本政军关系实态的重要的关键词，所以根据实际的政治过程检证合理的、合法的支配的正当性这个工作就是不可或缺的。

在理解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以下的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将对政军关系史进行检证分析。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终章还将论述。

①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 and Governments*, pp. 22 - 27.

②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 and Governments*, p. 27.

③ 参见三宅正樹《政軍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162～163頁。

**第 I 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大正
末期的政军关系**

第一章

围绕两个师团增设问题的 政治与军事对立

一 前言

日俄战争以后，一方面日本国内诸势力之间形成“举国一致”体制的意向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围绕着军备扩充方式问题，政党势力和军部势力，换言之，政府（国务）与军队（统帅部）之间的对立也更加明显。“两个师团增设问题”事件（1919年）就是这一对立的典型代表。本章试图对这一对立激化的背景及其过程进行研究，弄清“两个师团增设问题”事件给以后的政军关系带来的后果，并对当时政军关系的结构加以分析。分析之前，先对当时的政界状况作一简单描述。

日本历史上通常所说的“桂园时代”是从1901年（明治34年）6月2日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成立开始，中间经过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06年1月7日成立）、第二次桂太郎内阁（1908年7月14日成立）、第二次西园寺内阁（1911年8月30日成立），直至第三次桂太郎内阁（1912年12月21日成立）因第一次护宪运动总辞职为止。日本政治学研究者坂野润治称这一时代为“1900年体制”。这个时代是以桂太郎为代表的官僚势力，同以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为代表的政党势力之间既对抗又妥协的

时代。^①

那时，山县有朋选择了桂太郎，伊藤博文选择了西园寺公望，各自代表的“元老”政治得以传承。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是代表两种势力的明治国家的第二代领导者。“元老政治”虽分为长州派系和萨摩派系，但在以自由党和进步党为首的政党势力得以伸张之前，明治国家创始期的“藩阀”政治之间形成了妥协的关系。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与通过削弱敌对势力以扩大己方势力的期望相比，增强彼此间的妥协和协调，构筑“举国一致”体制，已成为当时各种势力的共同目标。与此相关联的论述可参见季武嘉也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总体战的日俄战争，在给予各势力政治自信的同时，越来越提高了他们对‘举国一致’体制构筑必要性的认识。结果，他们不但明确了共同的目的，而且达成了政治上的合作。”^②

也就是说，日本领导势力在超过国力极限的状态下，艰难地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虽然当时在领导权分配上存在分歧，日本的领导者为了准备再次与俄国开战，以及实施因战争胜利而被迫加速的所谓的“大陆经营”（入侵中国市场和确立在朝鲜半岛的霸权），就不可避免地利用“举国一致”来调整利害关系达成了一种共识。^③特别是，考虑到在日俄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日本海军实力派山本权兵卫，以及打败了被认为是世界最强的俄国陆军的桂太郎的政治影响力，可以说快速形成了该时期官僚、政党势力和能够与之对抗的陆、海军之间的连带结构。

因此，可以说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西园寺内阁和陆军的对立很激烈，但就总体而言，政军关系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的。的

① 坂野潤治：《大正政変——1900年体制の崩壊》，ミネルヴァ書房，1982，第117~176页。

② 季武嘉也：《大正期の政治構造》，吉川弘文館，1998，第51页。

③ 参见季武嘉也《大正期の政治構造》，第51页。与以往所说的“桂园”时代相对，季武认为在桂太郎（官僚）、西园寺公望（政党）以外应加上山本权兵卫（海军），为了表示该时期三种势力相互间的关系和作用，他提出了“桂园权”时代的说法。

确，作为山县有朋官僚势力的主要代表，其继承人桂太郎和伊藤博文组织的政友会以及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之间存在着协调关系。与这种协调关系有所不同，对合作没有诚意的山县有朋及崭露头角的陆军中坚官僚田中义一都不认同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的“举国一致”路线。特别是西园寺内阁期间，围绕陆军提出的“两个师团增设”问题，内阁和陆军之间出现纠纷。田中义一由此认为，如果建立以政党为主体的统治形式的话，必将会对军事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身为陆军中坚层的田中义一，在山县有朋的支持下，与西园寺内阁之间的对立日趋深化；同时，他还就如何能够加大陆军势力在统治阶层的作用积极实施了策略。正如小林道彦分析的那样，“伴随着增师问题的政治化，山县有朋意识到这就是‘君主主义’和‘政党政治’之间的中心争论点”^①，以山县有朋和被视为其有力接班人的田中义一为首的、以陆军为基础的保守势力，对急速而至的“举国一致”体制，当初并没有表示出赞成之意。

所以，山县有朋等人在实现“两个师团增设”的过程中，抑制了以政党为主体的政治体系的形成。限于此点，围绕“两个师团增设”所展开的政军关系，是决定日俄战争后日本新的国家体制方向性的重要环节，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企图通过小林所谓的“君主主义”，即设置非政党的天皇制体系，来阻碍建立政党占据优势的政军关系。下面从上述视角出发，就“两个师团增设问题”进行具体的探讨。

二 陆军的扩军要求与西园寺内阁

1. 问题的原委与背景

在日俄战争中，由于大量动员、消耗兵员，暴露出日本军事能

^① 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 1895年～1914年——桂太郎と後藤新平》，南窓社，1996，第279页。

力的极限。日俄战争后的扩军计划，就是以对这段痛苦经历的反省为开端的。这些反省表现为，做好再次与俄国交战的准备、扩充装备军力以图保护在大陆的既得权益、积攒为实现“大陆国家”日本所需的军事力量等。一句话概括：以陆军为中心的扩军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整備出一个能够适应日俄战争后远东地区新形势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

日俄战争后，扩军计划的实施草案在战争中就已见端倪。大本营陆军参谋部，作为1905年（明治38年）3月以后实施作战方针的一环，向内阁提交了一份以补充已经接近极限兵力为目的、新增设六个师团为主要内容的《师团增设意见书》。^①同年7月，内阁以财政状况恶化为理由拒绝了此项要求。同年8月，时任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的儿玉源太郎又向大本营陆军参谋部提出了《陆军兵备急设案》。^②《陆军兵备急设案》的具体内容是：为了应付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全线开通带来的俄军强化状况，要求进行以增设步兵四十八个大队、骑兵一两个联队为主的大规模增兵。这一提案也被内阁以财政为由搁置了。上述增设师团要求的提出，都是陆军以日俄战争中兵力消耗大大超过了战争初期预想为理由而提出的。

日俄战争即将结束的1905年，在提出上述扩军案的同时，已经在实施扩军行动了。同年3月31日，军部下达了从各师团抽调兵力，编制第十三师团的动员令。4月17日又下达了编制十四师团的动员令。7月17日，又相继下达编制十五师团和十六师团的动员令。这些措施都是按照上述《陆军兵备急设案》等师团增设计划实施的。当时战争基本结束，加上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朴次茅斯（Portsmouth）会议”马上召开，此时下达

① 陸軍省編《明治軍事——明治天皇御伝記史料》（以下略称《明治軍事史》）下卷，原書房，1966，第1517页。日俄战争时日本陆军兵力为13个常备师团、2个预备师团、7个预备混成旅团、6个预备步兵旅团、1个独立重炮旅团。

② 陸軍省編《明治軍事史》下卷，第1518~1522页。

编制十五师团和十六师团动员令，则明确地显示出它不仅是日俄战争后扩军构想的重要环节，而且是非常露骨的扩军具体措施。^①

这样，从日俄战争中就开始的师团增设计划，随着1907年（明治40年）9月18日《军令陆第四号》的颁布，第十七、十八师团的增设正式得以实施。当时，陆军常备有十九个师团，为了最终达到二十五个师团的目标，扩军计划共分两期实施。第一期预定是增设四个师团。第十七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增设是第一期预定的四个师团中的两个师团。围绕着另外两个师团的增设，政府和陆军之间产生了对立和对抗。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师团增设问题”。^②

1905年（明治38年）8月，山县有朋在《战后经营意见书》中这样说：日俄战争后，日本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做好和俄国再战的准备：“今后我们就是要大力扩充陆海军，以便无论何时都能对付敌人的复仇。”^③他还断言：“战后的军备扩充，乃关系帝国生死存亡之大事，纵令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④另外，陆军制定的年度作战计划《明治39年度日本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中，已经明确写入了今后的大陆作战将由防守策略转向进攻策略的内容。^⑤

例如，《明治40年度日本帝国陆军作战计划》第一章（目的）第一款中记载，“帝国陆军基于帝国军队用兵纲领，以向俄国发动攻势为目的”^⑥，而且此后这个基调也没有发生改变。可见，作为

① 大江志乃夫：《国民教育与軍隊——日本軍国主義教育の成立と展開》，新日本出版社，1974，第209页。大江志乃夫指出：“说起来，增设第15、16师团，是为了战后增设师团打下基础，趁着签订讲和条约时的混乱，利用临时军费紧急增设的。”

② 参见額瀨厚《近代日本の政軍關係——軍人政治家田中義一の軌跡》（大学教育出版社，1978）“第一章 大陸国家への道”中“第二節 帝国国防方針と田中の役割”，第18～34页。

③ 大山梓編《山县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第287页。

④ 大山梓編《山县有朋意見書》，第287页。

⑤ 陸軍省編《明治軍事史》下卷，第1563～1564页。

⑥ 原剛：《日露戦争後の帝国陸軍作戰計画とその訓令》，《軍事史学》第18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48页。

日俄战争后师团增设计划的背景，是为了准备和俄国再战，采用大陆作战进攻策略，其前提就是必须建立起能够大量动员士兵的体制。

但是，陆军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扩军计划，并没有和当时的统治阶层达成一致。这是因为负担着陆军急速扩军的财政经济基础，在当时实在是过于脆弱。日本虽然算是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但完全没有从讲和条约中获得赔偿金，那时日本国债高达 25 亿日元，仅支付外债本金和利息，一年就要花掉 1.44 亿日元。^①而且，还需要支付南“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南部——译者注，下同），以及桦太岛（库页岛）等新殖民地的经营费用。在这种状况下的急速扩军，实际上是相当勉强的。

当时，隐然在财界有着影响力的井上馨曾“主张减少师团增设，且不动用实业”，^②而且高度评价第一次桂太郎内阁在《朴次茅斯条约》即将缔结之时，抑制了陆军六个师团增设要求的举措。以井上馨为代表的财界对待陆军扩军计划的态度，显示了日俄战争后，随着财阀的出现，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金融资产阶级发言权的增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开始不断出现了反扩军的倾向。特别是进入 1910 年代以来，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期，随着当时财政出现大问题，财政改革被提上了日程，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甚至明确地表示了对增设师团的否定意见。

出于以上背景而导致问题政治化的，是第二次西园寺内阁（1911 年 8 月 30 日成立）时期，围绕着“两个师团增设”问题，在陆军和由与陆军相对抗的海军支持的政友会内阁之间的对立与抗争。海军由于在作战构想及扩军上与陆军形成竞争，因而两者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在这种形势下，金融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以

① 由井正臣：《二箇師團増設問題と軍部》，《駒沢史学》第 17 号，1970 年 5 月，第 8 页。

②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二卷，福村出版社，1965，第 158 页。

及民众也开展起了反扩军运动。

进入 1910 年代之后，陆军的扩军要求因山县有朋等人物的作用，一段时间内态度曾十分强硬。这一时期，山县有朋不断地向寺内正毅（当时陆军大臣）传递旨在以扩军为当务之急的书信及意见书。例如，他在 1911 年（明治 44 年）7 月 31 日的意见书《对俄警戒论》中主张，不仅俄国还有清国和英国，为了与之对抗，“这个时候最紧要的是加速对陆海军的整顿”。^① 但是，面对山县有朋的一系列扩军要求，桂太郎及寺内正毅等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②

究其理由，在于寺内正毅等判断认为：山县有朋的师团增设计划要求太急，而且进入 1910 年代后是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的时期，实施扩军计划是不现实的政治抉择，况且扩军对陆军本身来说也有极大的危险性。就当时而言，寺内正毅的判断要比山县有朋更为合理。但是，后来这种状况发生了逆转。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决定把财政改革作为内阁最大的课题。1911 年（明治 44 年）12 月 9 日，作为内阁的咨询机关，设立了以西园寺首相、原敬内相为会长的临时制度改革局，并开始积极讨论、制定财政改革的实行方案。^③ 西园寺首相对相当于副首相的内相原敬、司法相松田正久吐露了自己的决意：“45 年度（明治 45 年）在行政上进行大改革，并运用这一改革成果带来的富余填补财政缺口”。^④ 然而，陆海军的扩军计划并未顾及内阁的财政改革方针，而是像往年一样，依惯例提出。

在海军方面，前任内阁（第二次桂太郎内阁）的海相齐藤实，在 1910 年（明治 43 年）5 月 13 日，向桂太郎内阁要求建造战舰

①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第 336 页。

②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 年》，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第 67～72 页。

③ 关于设置临时制度整理局，参见山本達雄先生伝記編纂会《山本達雄》，1951。

④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三卷，第 187 页。

七艘、巡洋舰三艘。为此，提出了以追加继续费 3946 万日元（明治 44~49 年度的总计），充实费 3.6745 亿日元（明治 44~51 年度的总计）为内容，名为《海军军备充实之议》的大规模扩军案，并要求把这一扩军案的具体实施编入明治 44 年度的预算。齐藤实海相还在接受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留任请求时，把接受海军扩军案作为了留任的条件。西园寺内阁将其总额削减至 8222 万日元，由议会通过了海军扩军案。但是对于同样是明治 45 年度预算中的悬案——陆军的实现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西园寺内阁则坚持了不妥协的态度。这也是内阁和陆军之间形成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园寺内阁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是从 1912 年（明治 45 年）5 月 15 日召开第 11 届众议院总选举时，执政党的政友会获胜之后开始的。在这次选举中，政友会增加了 2 个席位共获得 209 个议席，官僚派的政党组织中央俱乐部则减少了 20 个席位仅获得 30 议席，无党派获得 47 个议席。政友会的胜利意味着西园寺内阁的财政改革方针得到了选民的支持。^① 这一胜利给予了西园寺内阁信心，促使内阁加快了实施财政改革的步伐。

面对这种形势，无论是要求扩军的陆军，还是对政党势力的增强抱以警惕态度的官僚势力，都不愿看到政友会资产阶级政党化以及其支持者的国民大众政治意识的高涨。当时，财政改革的实行责任者之一的原敬内相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就实施财政改革的协议达成后，在下届议会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官僚派系发生冲突。”^② 可见，他已经预见到内阁和陆军及其相关的官僚势力之间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了。

① 前田連山：《原敬伝》下卷，高山書院，1943，第 173 页。前田指出：“在桂内阁的底层，紧缩财政的愿望，如同世间的舆论一样。不管是松方、井上这两位元老，还是涉泽荣一、高桥是清、近藤廉平、早川千吉郎等财界的巨头都认可其必要性，在西园寺内阁成立的同时，他们就以井上馨的名义向首相提出了建议。”

②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三卷，明治 45 年 5 月 20 日，第 231 页。

1912年6月以后，以财政改革为议题的内阁会议频繁召开。同年8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陆军通过陆相上原勇作试探性地提出了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西园寺首相意识到这是陆军对财政改革方针的抵触。为了使陆军撤回增师的要求，西园寺开始直接与陆军元老山县有朋交涉，向他说明了就当时财政状况实现两个师团的增设是不现实的。此次交涉获得了山县有朋的让步。但是，山县有朋主张：如果陆军自主节减经费开支，挤出增设师团的财源，内阁应该对此给予承认和协助。^① 桂太郎还提案：用增设两个联队及将原本是临时派遣的韩国统监护卫改为常备化，来代替两个师团的增设。此时，陆军内部对增设要求的内容并没有统一，也没有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

进入10月，暂时趋于平静的增师问题的讨论再度被点燃，其中政治元老井上馨转变态度，开始赞成增师，陆军实现扩军的欲望不断增大。针对此局面，原敬内相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西园寺及其背后的山县是不会在今年满足上原的扩军要求的。”^② 他表示，已经到了必须明确和以官僚势力为背景的元老势力划清界限的时候了。10月下旬，陆相上原勇作在陆军省次官冈市之助、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及军事课长宇垣一成的支持下，进一步强调要求增设师团，并在11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递交了扩军实施案。财政改革的实施责任者当时的藏相山本达雄对陆相上原勇作进行了说服工作。他认为：如果陆军强行实施增师的话，会引起国民对陆军的反抗情绪。

在此之前，上原勇作曾主张如果内阁会议不能通过增设师团案，他就没有必要向阁僚们说明要求增师的理由。11月22日首相西园寺亲自要求陆相上原勇作在内阁会议上，明确陈述要求增师的理由，这也是他希望上原勇作能有所让步。在此之前的11月13日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三卷，明治45年8月30日，第250页。

^②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三卷，明治45年10月18日，第257页。

内阁会议还通过了财政改革案，针对陆相上原勇作再度提交的增师案给出了拖后两年实施的妥协案。但是，因为双方没有达成一致，12月2日，上原勇作陆相就增师的必要性进行了单独上奏，同时递交了辞呈。虽然西园寺首相在考虑陆相的后任问题时，向山县有朋发出了请援，但是山县有朋却以内阁应当按陆军要求从明年开始实施增设师团的态度予以拒绝。后来，西园寺内阁在后任陆相人选问题上，由于陆军拒绝推荐人选而被迫全体辞职。

附带说明一下，当时旨在财政改革的内阁究竟取得了多少紧缩财政的成果呢。这里有一些数据，除陆军省和特别会计外，各省改革的规模为：制度改革减额 2000 万日元，财政年收入自然额增加 1600 万日元，明治 44 年度剩余金 1000 万日元，总计 4600 万日元。而在这笔财源中，补充减税用去 1000 万日元，充实海军用去 700 万，补充年财政收入不足用去 800 万，共计 2500 万日元，差额的 2100 万日元返还了国库。^① 另一方面，对陆军提出的减额要求为从常规费的 8000 万日元中缩减 700 万日元，但陆军实际上紧缩的金额仅 195 万日元而已。^②

2. 财政改革问题与反扩军的动向

由于 1910 年代日本统治阶层的变化、国家财政的恶化以及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等国内外诸条件的影响，陆军的扩军计划引发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财政改革，即紧缩财政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缩小政府、国家的支出，缔造廉洁政府和简洁行政。此举措的基本理念是进行国家行政改革。这和强行加大国家支出，且无法直接还原国库的扩军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扩军带来的利益，享受者只能是陆军和协助它的官僚势力。因此，增设师团在此时显然不可能成为诸势力的共同目标。

田中义一在 1912 年（明治 45 年）2 月 21 日写给寺内正毅的信

① 《東京經濟雜誌》第 1676 号，1912 年 12 月 7 日，第 5 页。

② 信夫清三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史》（1），日本評論新社，1954，第 183 页。

中，抨击了西园寺内阁没有利用 1911 年 10 月中国爆发辛亥革命这一时机扩大在中国的霸权的消极态度。信中也对政友会内阁的支持者海军进行了这样的评价：“对帝国向大陆发展感到不高兴的一部分人，也是只晓得扩充自己的地盘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人。”^① 田中义一认为，内阁在中国政策上比较消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海军的支持。后来，田中义一指责海军是陆军在实现大陆国家构想上的阻碍，不断地对海军展开批判。当时陆军的立场正如田中义一在下面一段文字中所记述的那样，吐露了田中义一自身的危机意识：

就此情况与四周形势来看，我陆军于最近的未来将遭遇非常之苦境。每思及此而独自心痛。重压的到来已为时不远，我们是否能发挥力量予以抗拒，的确已为今日必须思量的问题。（《寺内正毅关系文书》，以下简称《寺内文书》）

特别是 1912 年初，适逢辛亥革命几经周折，最终迎来清朝皇帝退位，共和制即将实现的局面。当时，日本陆军认为辛亥革命是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入侵的大好时机，因此，向内阁提出要派陆军一个师团进入南“满洲”，结果，这一建议遭到了内阁的否定。日本国内，西园寺内阁正要全面实施财政改革计划。面对这样的时局，陆军很伤脑筋。田中义一在给寺内正毅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句话，随着时局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考虑我陆军生死攸关之时了”。^② 接着，在 3 月 20 日写给寺内正毅的信中，田中义一把西园寺内阁作为直接批判的对象：

① 《寺内正毅宛田中義一書翰》（明治 45 年 2 月 21 日），《寺内正毅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9。

② 参见山本四郎《辛亥革命と日本の動向》，《史林》第 49 卷第 1 号，1966 年 1 月，第 45 页。此外关于辛亥革命和日本陆军关系的研究还有：由井正臣：《辛亥革命と日本の対応》，《歴史学研究》第 344 号，1969 年 1 月，第 11 页；野沢豊：《辛亥革命と大正政変》，《論集日本歴史 12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有精堂，1977；等。

我想您已经察觉到，现任内阁埋头于制度改革，全不顾陆军的主张。对此我认为陆军应采取的态度是制造出一个让内阁回避的借口，同时使扩军在将来政略上不会成为争论的对象。^①

总之，田中义一认为，财政改革作为西园寺内阁的最重课题，目的是阻止陆军扩军。为了粉碎这一目的，必须“制造让内阁回避的借口”。换言之，此时田中义一就认为，推翻阻止陆军扩军的内阁是不可避免的。他虽然强调政军关系协调的必要性，但是，归根到底只是强调与支持扩军路线的内阁之间的妥协。田中义一企图建立的是与理解“陆军立场”的内阁之间的协调关系。

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田中义一私下主张要撤换当时的陆相石本新六。其原因是石本新六陆相在西园寺内阁的外交内政中强调扩军构想时，态度不够强硬。田中义一的更换陆相行动，以4月2日石本新六病死、三天后上原勇作中将由第14师团长（宇都宫）就任陆相而告终。当时，田中义一为了使上原勇作任陆相，不断地游说陆军高层，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上，田中义一在4月3日写给寺内正毅的信中就这样建议：尽快地由山县有朋推荐上原勇作，利用这条线使陆军的意志达成一致。^②

陆军在对抗内阁的财政改革过程中，于6月上旬正式决定实现扩军增师计划的顺序。具体内容可以从山县有朋写给寺内正毅的信中得知。^③田中义一在接到山县有朋的指示后，在“京城”（现在的首尔）与寺内正毅会谈时，转交了山县有朋写给寺内正毅的信。信中，山县有朋表示，遵循内阁的财政改革方针，整顿、减缩陆军的一般管理，在扩充军备的费用不强行由国库负担的状况下，推进

① 《寺内正毅宛田中義一書翰》（明治45年3月20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0。

② 《寺内正毅宛田中義一書翰》（明治45年4月3日），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寺内正毅關係文書》，315-11。

③ 由井正臣：《二箇師団増設問題と軍部》，第10-11页。

和实现扩军计划。山县有朋并没有就增设两个师团的具体计划和要求增加军费提出明确的方针。但是，和县山有朋的意向相违背，田中义一和寺内正毅通过会谈，达成了在陆军扩军目标上一致意向。即以“朝鲜配备”名义新设师团，实际上就是新增设两个师团。

那时，寺内、田中组合，一边对抗海军的扩军，一边以增设朝鲜师团为表面理由，正式开始了把增设两个师团编入来年预算的具体活动。接受了寺内、田中意向的上原勇作陆相，抢在各省递交预算案给大藏省之前，向西园寺首相试探性地提出了把增师预算纳入预算的要求。从此，西园寺内阁就陷入了如何对应陆军增师要求的困扰之中。那时，即使是在陆军内部，对增师的具体实施方法也不完全一致。

8月16日，围绕着增师问题，西园寺首相和桂太郎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桂太郎就增设两个师团问题表示出了自己的看法：“增师问题是山县有朋的主张，与其和中间的寺内正毅进行协商，还不如直接去找山县有朋进行协商为好。”^① 他判断，如果对山县有朋说明财政现状，山县有朋会放弃增师的要求。8月28日，西园寺首相拜访了山县有朋，就增师的不现实性进行了说明。山县有朋表示理解财政现状，但他同时强调自己的一贯主张，即如果陆军通过节减经费开销，实施军备扩充，内阁应该予以认可。他又提出，既然增设两个师团在此时无法实现，内阁应该准备一个代替案答复陆相上原勇作。^② 由此可见，山县有朋和桂太郎作为陆军的最高首脑，并没有把这两个师团的增设视为当务之急来考虑。

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是以寺内正毅和上原勇作陆相为首，以田中义一及宇垣一成等陆军中坚干部为骨干而实施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此要求就比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发言权分量低。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超过了陆军的范围，他们要从国家

①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記》第三卷，明治45年8月17日，第246页。

②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記》第三卷，明治45年8月39日，第250页。

大局出发对陆军的政策进行指导，只不过表面上回避强硬的态度，在克制自己而已。^①

在田中义一等提出扩军要求不断加强的同时，西园寺内阁的财政改革也逐步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关于这一进展过程，后藤新平在9月5日向桂太郎传递了题为《政界通信》的报告，报告了内阁财政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充实海军的财源，在实施减税（1000万日元）中也把关键的增设两个师团排除在外的情况。^② 陆军知道内阁的财政改革案已经着实地开始具体实施，这使田中义一加深了本来就有的危机感，为了挽救陆军的劣势，他开始就扩军的必要性游说各种势力。

那时，井上馨对作为军制改革重要环节的增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因此，田中义一和井上馨接触，并通过井上馨的介入，于11月9日获得了在首相官邸向内阁官僚说明增设师团必要性的机会。^③ 对田中义一的举动，内相原敬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田中所说事情实在没有什么新意。”^④ 正如同原敬日记记载的那样，田中义一的内阁游说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果。之后，田中义一又游说大隅重信、《万朝报》的黑岩周六等人，希望得到政界和舆论对增师的支持。但是，舆论的反应和田中义一所期望的正好相反。

例如，《东洋经济新报》在题为《绝不允许陆军扩张》的文章中，对于增师这样反驳道：陆军增师的理由之一与俄国威胁论相

① 伊藤隆编《大正初期山県有朋谈话笔记》，《史学雑誌》第75篇，第10号，1966年10月，第67页。西园寺与山县有朋会谈时，山县说没有听陆军大臣提起过增师议案。相关研究还有竹越與三郎《陶庵公 西園寺公望伝》，叢文閣，1930，第281~282页。西园寺增师必然成为难题，向桂太郎提起此事时，回答说现在增两个师团是不可能的；向山县提起时，山县也说还不是时机，应让天皇出诏禁止。如果明治天皇在位的话，就好办了。现在的天皇还年轻，不便困扰。

② 田崎末松：《評伝田中義一——15年戦争の原点》上卷，平和戦略総合研究所，1981，第309页。

③ 参见井上馨侯伝記編纂会《世外井上公伝》第五卷，内外書籍，1934，第280~282页。相关研究还有山本達雄先生伝記編纂会《山本達雄》，第333页。

④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三卷，大正元年11月9日，第260页。

关，“虽然对我国来说陆军频频扩军不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浪费，而对俄国则不同，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俄国会由此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因而会加强在远东地区的扩军，其结果会导致我国的不安而不得不进而扩军”。^①

《东京经济杂志》也发表了题为《增设师团妥协论不可取》的报道，全面支持内阁的财政改革。文章中写道：“西园寺首相和山本藏相共同反对两个师团的增设，且反对的理由充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山本藏相声称，两个师团成立是和财政改革方针相违背的，如果实现增设他断然辞职。西园寺首相也明确表示支持政府的方针：事到如今，即便有元老的忠言，或者民间有一两个企业家声援陆军，首相都不应放下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山本大藏大臣去容忍陆军的主张。”^② 这些报道充分反映了在民众中反扩军的时机已经成熟。

紧接着，由商界人士举行的反扩军运动也不断高涨。10月20日召开的第19届全国商业会议做出了支持政府财政改革的决议。11月7日商界的干部又拜访山本藏相，表示对他予以支持。^③ 另外，以中野武营为首的东京少壮派实业家们也决定支持反增师运动。^④ 11月28日，以国民党代议士泽来太郎和伊藤和也为首结成了“反对增师同盟”。^⑤

伴随着反增师运动的深入，为了达到从制度上抑制陆军增师要求的目的，以国民党代议士中野武营、山田英太郎及田川大吉郎为

① 《社説 陸軍の拡張断じて不可》，《東洋經濟新報》第603号，1912年7月15日，第10页。

② 《社説 師団増設案の妥協説を排す》，《東洋經濟新報》第1675号，1912年11月30日，第4页。

③ 《社説 躊躇なく断行せよ》，《東洋經濟新報》第615号，1912年11月15日，第4~6页。

④ 《社説 重ねて軍制改革の必要を論ず》，《東洋經濟新報》第617号1912年12月5日。

⑤ 《大阪朝日新聞》1912年11月28日。

首，决定向政府提出在政府内成立国防会议的要求。^① 设立国防会议的构想是，作为军备问题的解决办法，设置由军界、政党、商界及官僚出身者组成的专门会议，这样就可以交换和调整各界层的意见。可见军备问题从此时开始已经不是军队方面的单独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政策全局的问题。这就把军备的性质和规模与国家政策及国家财政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起到抑制军部单独行动的作用。

但是，对于设立国防会议的构想也存在着这样批判性的见解：“国防会议的设立与期待的相反，不仅助长了军人的跋扈，也酿成了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争议，开军人插嘴国家政事之先河，导致国家财政基础危机，妨碍制定军国政策方针，替军政当局者制造逃避责任的理由等，其弊害举不胜举。”^② 即便如此，国防会议的构想在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时代的1914年（大正3年）1月31日第31届定期常会上，以犬养毅国民党总裁提出《关于设立临时国防会议建议案》为开端，正式启动，在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时代，即同年6月23日以“防务会议”为名实现了设立国防会议。^③

正是这一系列的反对增设师团的气氛和运动，以及在设立国防会议的设想上政党势力表现出对军备问题的参与姿态，让田中等陆军省的中坚干部感到实现增设师团的困难，并开始为此摸索对策。

三 扩军问题的政治意图

1. “主张增设两师团意见书”与内阁的应对

1912年（大正元年）11月，增师问题进入最后阶段，田中义

① 《大阪朝日新聞》1912年12月2日。

② 莊田秋村：《非国防會議論》，《東京經濟雜誌》第1682号，1913年1月25日，第13页。

③ 参见藤原彰《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前の日本軍部（2）》，《歴史学研究》第395号，1973年4月。作为增师问题的解决案，山县有朋、桂太郎等陆军首脑提出了设立国防会议的构想。这只不过是当局将扩军正当化的一种手段而已。以这个构想为基础，在大隈内阁时召开了防务会议，这个会议对让各方面同意扩军起到了作用。

一等人就增师的必要性撰写了《意见书》发给各界，企图卷土重来。据《田中义一传记》中记载，这时期以陆相上原勇作的名义，向拒绝扩军、以强硬态度坚持财政改革的西园寺首相，递交了由军事课长宇垣一成起草、田中义一修改、以扩军为内容的《趣意书》。^①

《趣意书》是田中义一等人对增师问题看法的概括。同时期，还有众所周知的由宇垣一成执笔、田中义一修改、颁发给有关方面的《主张增设两个师团意见书》（简称《意见书》）。^② 虽然，现在还无法验证，但从《趣意书》和《意见书》的内容和执笔时间几乎同时这一点分析，二者可能是同一个文件。^③ 就《意见书》是宇垣一成根据上级田中义一的指示撰写的这点来看，《意见书》汇集了以田中义一为首的陆军中坚干部对增师理由最具体的叙述。

《意见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在这里必须反复强调，大量历史事实和现在同各国交涉的状况告诉我们，进取的对外政策的背后常常需要相当充沛的兵力作为后盾。”这再一次明确提出了陆军的一贯主张：要扩大在大陆国家的霸权，“进取的对外政策”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以充实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但是，对陆军这一主张，当时不仅没有得到各阶层的理解，相反“却蒙受那些没有达观我国百年大计的近视论者们的批判”。

这里所说的“近视论者”指的是那些反对增师的财界人士和媒体方面的人物，而且“今天我国政界的现状是，从一部分有影响的政论家到朝廷的当权者，都被近视论所迷惑。”《意见书》在此主要是批判了连政府关系者也被“近视论者”反对增设师团论所“迷惑”的现状。同时还认为：特别是西园寺内阁以推进财政改革为借口，拒绝陆军的增设朝鲜两个师团的要求，这样的内阁政

①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編《田中義一伝記》上卷，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1958，第493页。

② 《宇垣一成關係文書》（四），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③ 井上清：《宇垣一成》，朝日新聞社，1975，第77～82页。

策是“对我国发展的阻碍”。

关于增师理由，《意见书》做了如下说明。

第一，由于西伯利亚铁路复线开通，促进了俄国军事力量的强化。为了应付这一现状，军备扩充政策必须作为当务之急对待。特别是俄国远东军事力量强大，直接威胁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不得不承认，在朝鲜增设两个师团可解燃眉之急，所以仔细观察计算彼我的形势，为了国家的前途，出于自己的责任断不能悠然漠视不管，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事态令人痛心”。

虽然，把俄国的威胁作为增设朝鲜两个师团的理由，但是，这一时期日俄之间的关系，经过这一年（1912年，即大正元年）7月日俄第三次协商会议，两国再一次确认了彼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此时在欧洲协约三国（英法俄）与同盟三国（德奥匈）对立中，俄国作为协约国的重要一员，在亚洲已经开始采取极力回避纠纷的方针，这对日本来说，是至今为止从来没有的良好状态。

当然，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在军事上，俄国是第一假想敌，是日本在大陆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但是，事实上，至少在那时，俄国和日本之间，丝毫没有在军事上发生冲突的迹象。因此，《意见书》把对俄国的对抗政策作为增师的依据，很显然是无视现实的，当然也就缺乏说服力。

第二，辛亥革命以后，对华政策得到了积极的开展，为了获得同其他列强一样的权利，加强军事力量是非常有必要的。《意见书》中，就当时中国形势这样叙述道：“纵观支那的形势，去年年末，在长江沿岸，由于爆发了革命动乱，清朝廷覆灭，中华民国建立，表面上时局虽然好转，但是，各省巡抚依然拥有强大的兵权，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国家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时刻。处于此等时期的列国的态度是谁都想拥有能够排除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单独解决支那问题的实力，所以各国都在用保全外国领土的美名来相互牵制，实际上是都在孜孜不倦地图谋各自国家利益的增长和发展。”（《宇垣一成关系文书》，以下简称《宇垣文书》）。

田中义一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发出了“清国自身是否具有维持国内秩序的能力”^①的质疑，并把中国当做日本发展大陆国家时不可缺少的资源供给地。文章中他这样说：“在解决昔日支那问题的最后时刻，为了帝国永久的安宁与发展，我们必须占据主动地位，即今天在朝鲜扩充两个师团就是为了巩固对支那的政策。”他认为，在中国为了和欧洲列强抗争，确保“主导地位”，军事力量的支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错过此时机，日本在中国的霸权就会受到损失。

在对中国政策方面，政府与军事领导之间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即鉴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及工业生产水平较低的现状，就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获得权利。但是，由于要回避与欧洲列强直接对立，加之财政状况恶化，陆军的对华政策的实施受到了抑制。正因如此，陆军为了迫使内阁改变消极的对华政策，强行提出了增师的要求。也就是说，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是陆军企图把其大陆国家构想推出台的政治战略的重要一环。两个师团的增设不但具有单纯的军事效果，而且也具有政治意图，这才是田中义一要求增设师团的本意。围绕增师问题展开争执的结果，导致了西园寺内阁的总辞职。但是，对于陆军来说，倒阁仅仅是达到其实现大陆国家构想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②

《意见书》中关于增师理由还指出，在日俄战争中临时征集来的并进行了教育的士兵，到了大正3年就会兵役期满，他们的退伍

① 田中義一：《随感雜錄》，《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八），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② 由井正臣：《二箇師団増設問題と軍部》，第12页。由井正臣：“陆军增师的目的是对中国的殖民地侵略，日本利用地理上、军事上的优势，来达成目的。”井上清：《宇垣一成》，第81页。井上清：“入侵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为了与列强争夺势力，需要紧急争强军备，这才足以对应当前的局面。”藤村道生：《国家総力戦体制とクーデタ計画——寺内構想から陸軍パンフレット問題まで》，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1930年代論として》，創世紀，1981，第107页。藤村道生：“宇垣的增设论，并不是茫然的扩军，其目的在于干预中国革命，设立预备兵团。”三者均阐述了增师理由和陆军对中国政策的关联性。

会给国防带来重大损失。为了补充兵力，增设两个师团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强调说：“是出于战时有人员消耗的实际情况要求增设师团的，如果拖延到大正2年以后则国防上可谓是非常危险了。这也是为什么陆军当局不能等到国家财政缓和之后再提出增设两个师团的原因。”也就是陆军主张说，虽然增设两个师团是以扩充军备为名，实际内容不过是补充一部分兵力损耗而已。

对于政府的应对态度，陆军批评说：“拒不承认此等刻不容缓紧急事态的挡路诸公唯一的拒绝借口就是财政方面的事情，像这种关系到国家存亡的行动，要怎样才能得到你们的首肯呢？”对内阁以财政改革为理由而拒绝扩军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但是，这一理由也如同上述理由一样，由于并不具备立刻就需要充实军备的国内外紧急形势，所以，将其作为增师的理由也就显得比较薄弱。

《意见书》中，还列出了增设两个师团所需经费的陆军预算。根据《意见书》，增设两个师团第一年所需经费大约1000万日元，增师后的维持费大约740万日元，这些经费，根据国家的财政现状，陆军已经做好了不完全依靠国家负担，而是通过节省经费开支来填补扩军所需费用的心理准备。关于处理扩军和财政的关系，《意见书》这样写道：“纵观全局，可以明显而毋庸置疑地看出：增设两个师团是出于世界时局和接受过培训的在乡士兵的减少等国内外形势的迫切需要。而这一措施并不会阻碍帝国财政的缓和，这一点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并由此断定内阁以财政问题为理由拒绝扩军是一种误解。

关于《意见书》传达到什么级别，有着怎样的影响力，现在无法做出充分的验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意见书》撰写于11月份，即围绕着增师问题陆军和内阁形成对立的最后阶段这一点，了解到陆军中坚干部层，企图利用《意见书》达到打破受阻状况的目的。关于这一点，上原勇作陆相后来的强硬态度可以作为证明。

1912年11月22日陆相上原勇作正式向内阁提出增师案，28

日，上原勇作陆相在讨论增师问题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在与陆军次官冈市之助及军务局长田中义一等，就与内阁交涉问题沟通后，再一次提出辞任，表明了其强硬的态度。在这次内阁会议上，政友会出身的西园寺首相、原敬内相、松田法相及财界出身的山本藏相等内阁官僚们认为，财政改革和增师是不可能同时进行的。相比之下，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财政改革，增师作为个别问题，可延期实行。针对内阁这一态度，陆相上原勇作对政府的妥协案，即延期案表现出坚决的抵抗态度。其理由是陆军的改革，是以增设师团为目的的改革。不管内阁如何贯彻行政改革，在改革和增师之间，把两者分离考虑是不行的。他解释说，就扩军所需临时费用 983 万日元来说，使用正常军费来扩军是绰绰有余的。大正 2 年的正常开支是 100 万日元左右，陆军节约额是 200 万日元，除了支付正常开支还有剩余。即使会给国库造成新的负担，完成增师也不会超过 280 万日元。并且，其中有些要求还是 4 年以后的事。^①

在这次议会上，针对原敬内相要求陆军说明增师计划或者说明陆军改革的细节，陆相上原勇作表示，内阁不接受增师的话他就不给予回答。相反，他指责政府推行的财政改革是为了筹措海军的军费。^②

2. 寺内军部内阁构想的受挫

上原勇作陆相单独上奏，强行要求增设两个师团，应该说是有所预谋的政治行动。从《寺内正毅关系文书》中题为《两个师团增设问题备忘录》的文章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根据《两个师团增设问题备忘录》^③ 记载：陆军认为西园寺内阁财政改革的目的是，不只是提高政友会声望，同时也意在强化政党内阁的基础，而且，由于陆军强硬态度，政友会为了抑制陆军先发制人，让内阁总

① 荒木貞夫編（代表）《元帥上原勇作伝》上卷，上原勇作伝記刊行会，1937，第 609 页。

②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三卷，大正元年 11 月 28 日，第 268 页。

③ 《二個師團増設問題覚書》，《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0-1。

辞职，企图把所有责任嫁祸于陆军。由此预测内阁下一步将以各省分别实施改革来孤立陆军，并对陆军大臣进行辞职劝告，通过山县等人做陆军首脑们的说服工作，目的是抑制陆军增师推进派。

虽然无法弄清这篇文章是在几月完成的，也不论陆军所推测的内阁意图究竟如何，但至少西园寺内阁所采用的对付陆军的策略，就是文章所指出那样。这里，应重视的是陆军针对内阁所采取的行动。《两个师团增设问题备忘录》从六个方面以“陆军的处理程序”为名，概括了11月中旬以后，以上原勇作陆相为代表的陆军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两个师团增设问题备忘录》中，就扩军所展开的内阁和陆军对立的意义做了如下论述：“概括地讲，时局使原本单纯的增设师团复杂化，政党内阁借此复杂化不断巩固自己。这不仅使增设师团成为泡影，也使得我国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期，即日本帝国是朝着民主国家发展，还是朝着君主国家发展。在这种岔路口上更需要依靠顽强意志与协作精神的协力才可渡过。”（《寺内文书》）

在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陆军不仅将增师问题作为围绕军备扩充所导致的军政对立，还将其作为事关政党内阁大是大非的根本问题，陆军对此抱有深刻的危机意识。日俄战争后，日本统治阶层逐渐发展为官僚、军部及新生政党势力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政党势力的抬头使官僚和军部的地位不断降低。这种权力构造的变化是引起统治者内部对立的主要原因。就其意义而言，军部实施增师，亦即扩军的第一目标就是试图提高其自身的政治地位。

另外，财政改革也不仅是以缩减行政机构为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缩小官僚势力的权限。因此，阻止财政改革对于官僚势力来说意义重大。^①这也是官僚势力和陆军在对待增师问题上步调一致的重要原因。不同的是，虽然官僚势力从根本上坚持反对政党，但是，

① 山本四郎：《明治より大正へ 政友会を中心とした政界の変遷》，井上清編《大正期の政治と社会》，岩波書店，1969，第31页。山本四郎：“在社会构造的变化中，政府与藩官僚的对立决定了财政整理的成败。如果成功了，藩阀官员就会陷入窘境。”

到了政策决定阶段，它不像陆军那样态度强硬，而是采取了柔和的态度。此时的陆军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政党势力的强大定会招致自身政治地位的下降，因而危机感日渐加深。

1912年底，财政改革日趋具体化，西园寺内阁对陆军态度也更加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以田中义一为首的陆军中坚干部层，为了强化陆军的政治势力，以便使陆军的政策得以实施，便有了组建以寺内正毅为首的军部内阁的想法。

就这一设想实施顺序而言，首先，陆军预见到西园寺首相在与山县会谈后，如果其陆相人选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将会就增师要求 and 内阁方针不相容这一点进行上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天皇一定会问询桂太郎，这样就可通过桂太郎的努力，驳回内阁的上奏。其次，“如果内阁总辞职一事上奏，陛下一定会召集元老们进宫就此事进行询问，那时，由桂太郎大将直接出面，山县有朋和大山严两元帅助阵，井上馨附和，奏请救命允许内阁辞职，同时组建以寺内正毅为首的新内阁”（《寺内文书》），即可一举成立寺内军事内阁。最后，在寺内内阁成立的时候，通过接受由井上馨陈诉的国防统一必要性这种形式，借此机会“彻底消除海军的野心，巩固陆军在国防上的地位”。概括上述内容，寺内军部内阁构想目的：一是推翻政党内阁，二是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三是阻止海军的扩军计划。

不过，寺内军部内阁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态度，他们是否支持寺内正毅是重要的前提。但是，正如前面所述，与军事指导者相比，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更是政治指导者，他们不得不优先考虑政治，因此，也就不一定能够全力支持寺内正毅。而且为了平息民众的反增师运动，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无疑不适合在此时做出成立军部内阁的判断。田中义一在得知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立场后，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元老。但最终还是以寺内军部内阁构想的失败宣告结束。

从12月6日到17日之间，围绕着西园寺内阁总辞职后的后继内阁人选问题，共召开了十次元老会议。会议中，作为首相的候补

人选，松方政义、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及桂太郎等人被提名。但是，会议始终陷于泥潭，暴露出原本掌握政治的元老们的势力已经不断减弱的倾向。^①这也是政治及军事领域里，权力分立化倾向的一种表现，更是诸元老们苦思冥想出的，对付当时日渐高涨的民众反陆军、反增师的对策。在元老会议召开的过程中，田中义一等人一直都在为寺内内阁的实现展开着积极活动。

这期间，田中义一就内阁总辞职的前后经过及确定首相候选人的原委，向在朝鲜的寺内正毅做了详细的汇报。^②例如，在11月5日发的电文中，田中义一这样写道：“今天内阁宣布总辞职。明日6号，在宫中将召开元老会议，其结果一定和预期的一样，政友会的桂大将是会议中心，事实上大将自身也有此感觉。此时，我们许多人都期待阁下您的决定。阁下您时下可和大将彼此互通想法，确定行事方针，前途绝不悲观。推荐桂内阁的意思日趋明显，期盼宫里招阁下回京，您回京后再向您传递可供参考的建议。”（《寺内文书》）由此可见，这是田中义一在判断实现寺内内阁可能性很高的状况下发出的电文。其根据，一是桂太郎的态度，二是后藤新平在翌日发出的电报中表明他也有同样的看法。然而，7日的电文内容则预测了元老会议的最终结果可能将延期，同时就井上馨和大山岩请求松方正义组建内阁的要求被松方正义拒绝之事，以及通过桂太郎获得了牧野伸显和松田正久做西园寺的工作让松方组建内阁等事一一做了汇报。9日电文中这样陈述道：“让松方侯出马，十有八九是得到山县、井上、桂三公认可的，萨摩出身一派与海军联合也积极鼓动松方出马。但是，松方本人却不愿意，同时，事实上西园寺侯并不看好松方侯的出马。”（《寺内文书》）

① 坂野潤治：《大正政変——1900年体制の崩壊》，第118页。坂野潤治：“松方内阁持有维持紧缩财政的观点，山本权兵卫内阁持有海军扩军的观点，寺内正毅内阁则持有希望实现增师的观点。”

② 《時局二閱又ル来電寺内正毅宛田中義一電報》，《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0-2。

概括地讲，在元老中间，希望组建松方内阁的理由在于他们认为：紧缩财政论的支持者松方政义会沿袭西园寺内阁的路线。因为，能持续财政改革，不仅是平息民众反增师要求的上策，而且是再建财政的好方法。但是，10日和12日的电报显示，组建松方内阁的计划已成泡影，而且作为替补的平田东助内阁案及山本权兵卫内阁案也分别遭到拒绝。

此时，首相的候选人数越来越集中，12月13日，田中义一发给寺内正毅的电报中，就组建寺内内阁构想事实上已经失败之事做了汇报。电文中写道：“桂公应该支持阁下这件事希望您同山县公协商。今天早晨在山县公处，桂公表示要报效国家，可见桂可能出马，也许他认为这是最后为国尽忠而下的决心。今天的会议也大体支持桂公。”（《寺内文书》）指出桂太郎出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此时，田中义一进言寺内正毅应该持有的态度是：“我们期盼阁下坚守在朝鲜不动，等待时局的改变。”（《寺内文书》）

桂太郎被确定为首相的后继人，组阁从17日开始，21日第三次桂内阁成立。在15日的电报中，田中义一就桂太郎组阁的经过进行了汇报，并表示了自己对山县有朋最初的目标就是组建桂内阁的不满。田中义一表示他要为增师问题承担责任，为此决定辞去军务局局长。同时就应继续贯彻陆军一贯主张“国防统一”的重要性也做了阐述。

另一方面，从田中义一等人策划的军部内阁的首班领导人寺内正毅的动向来看，他在11月就曾公开表明其组阁的决心。例如，11月1日，他在给田中义一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自知力量微薄，但是，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若不挺身而出，则不是男儿所为，如果委我重任，必实施前文的宗旨。”^①但是，当桂太郎实现组阁之后，他知道组阁无望，在写给田中义一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心

^① 《田中義一宛寺内正毅書翰》（大正元年11月1日），《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情：“感谢您的抬举和关怀，和一切名利、欲望相比，小生有的只是一颗忠心报国的赤诚之心。”^①

关于桂内阁得以成立的经过，寺内正毅在信中写道：“正如贵电中所述，既然山县公尊意已决，吾等当与后藤男爵商量，若男爵能尽力说服桂公，尚有希望。”^② 这表明了，他是想通过得到支持寺内内阁的后藤新平的协助，来实现陆军的扩军要求。关于田中义一本人，他这样建议：“您此时辞去现职亦出于不得已，妥善安排后任为盼。”^③

以上是田中义一和寺内正毅在西园寺内阁辞职到桂内阁成立期间，来往书信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了解到，组建寺内军部内阁的构想，是在没有得到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充分肯定下，由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干部们提出的。同时，以寺内、田中为首的陆军中枢派和山县、大山等陆军出身的元老及桂太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一种乖离的关系。

无论如何，陆军中枢派系企图以增师问题为突破口，达到推翻政党内阁，获得官僚势力的支持，成立军部内阁，解决陆军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设想，被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元老势力，在反增师运动的压力下阻止了。元老们向桂内阁提出，应该在国防会议上对陆海军军备扩张计划的暂时延期和军备问题进行讨论。后来，田中义一对自己在这一个时期的行为这样评价：“将通过这个问题推翻内阁看做是山县、桂派的阴谋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只是想解决陆军长期不能解决的增设师团问题，当然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结果是中坚层意见的集成，也是他们内外活动所致。

① 《時局二関スル来電 田中義一宛寺内正毅書翰》（大正元年12月10日），《寺内正毅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0-3。

② 《時局二関スル来電 田中義一宛寺内正毅書翰》（大正元年12月13日），《寺内正毅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0-3。

③ 《時局二関スル来電 田中義一宛寺内正毅書翰》（大正元年12月16日），《寺内正毅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0-3。

元帅（上原勇作——作者注）不是煽动者，反而是被强拉硬拽进去。如果说我们是被人唆使，那也不是山县公和桂公，而是井上馨。”^①

对于这段话虽然我们不能只做表面上的理解，但是恐怕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增师问题是在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干部的主导下开展起来的。从前面列举的文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西园寺内阁总辞职是陆军有计划的行动，其中，陆相上原勇作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后来，上原勇作在总结自己要求增师的失败时说“赌输了”，这流露出他后悔的念头。^②实际上，田中义一等一直向上原勇作传递着实现增师可能性极高的信息。增师事件另一方的当事人西园寺公望就此事做了这样回忆：“并不是否认两个师团的增设，只是想将其延期到财政改革之后。对于这一点山县没有什么异议，但是由于军部多数人的决定，即使是山县的威信也无法改变局面。……但是，无论是山县还是桂，都不会蠢到把我视为敌人，和我斗争。尤其是不会采取借陆军问题来推翻我这样笨拙的手段。”^③

但是，事实上如前所述，西园寺内阁总辞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以田中义一人为后盾的上原勇作陆相的强硬态度，以及山县有朋拒绝接受陆相任命。“从头至尾都认为实施增师刻不容缓，不懈努力地呼唤舆论支持”^④的田中义一，他的行为动机，看来是出于对政党政治极为强烈的戒备心。此时，政友会不仅实行财政改革，同时还拟将小区选举法案提交议会，这些都是以强化政党政治为目的的行径。按照田中义一预测，随着政党政治的不断强化，必然会与陆军的大陆国家论相抵触。

关于这一点，学者由井正臣认为：“田中对西园寺内阁的批

① 小泉三申（策太郎）：《随笔西园寺公》，《小泉三申全集3》，岩波书店，1939，第269页。

② 荒木贞夫（代表）编《元帅上原勇作传》上卷，第619页。

③ 小泉策太郎记录，木村毅编《西园寺公望自传》，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1949，第145~146页。

④ 井上馨侯伝記編纂会：《世外井上公伝》第五卷，第280页。

判，归根到底是因为他认为政党政治将阻碍陆军开展大陆政策，于是采取了对抗的姿态。”^①另外，学者坂野润治还指出了此姿态与田中义一等人组建寺内军部内阁构想的关系：“从利用两个师团问题实施倒阁，企图建立寺内军部内阁开始，田中义一充分认识到了政党势力的重要性。旨在建立寺内陆军系内阁的田中义一，虽然反对纯政党内阁，但他计划要建的寺内内阁，还是一个以桂新党为基础的政党内阁。田中义一始终都没有考虑要在君主内阁和政党内阁之间做出单纯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②

由井正臣和坂野润治两位学者的基本观点出入甚大，主要还在于由井正臣是以田中义一在增师问题上的行动为焦点，而坂野润治则着眼于大正政变以后田中义一的行动。事实上，正如坂野润治指出的那样，田中义一通过大正政变，开始认识到政党政治作用，并对政党组织予以了强烈的关注。由于“大正政变”所显示出的民众力量，已经被吸收到了政治体制内部，因此人们认识到，已经不可避免要依赖政党政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增设两个师团以及寺内军部内阁构想的受挫，不仅给了田中义一从根本上修正政党观的机会，而且也使他认识到日本已经进入了政军关系密切化的时代。^③

四 大正政变期间田中义一的政党观

1. 对桂新党构想的反应

1912年（大正元年）12月17日，作为增设两个师团问题军方中心人物的田中义一，为了承担责任，辞去了军务局长的职务。

① 山本四郎：《辛亥革命と日本の動向》，第11页。

② 坂野润治：《大正初期における陸軍の政党観——田中義一を中心にして》，《軍事史学》第11卷第4号，1976年3月，第56页。

③ 相关研究参见山本四郎《大正政变の基礎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70）；《大正政变》（《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8，現代1》岩波書店，1963）；《増師問題をめぐって》（華頂短期大学《研究紀要》第6号，1961年12月）；《大正政变と軍部》（《歴史学研究》第234号，1968年3月）等。

而在第三次桂内阁成立的同时，他又去任步兵第二旅团（东京）团长。事实上，田中义一在辞职后仍意欲增设两个师团和组建寺内军部内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①寺内正毅关于此事，在给田中义一的回电中这样写道：“您此时辞去现职亦出于不得已，妥善安排后任为盼。”^②对田中义一的辞职表示同意。此时，寺内正毅判断，如果把对陆军批判的矛头对准田中义一的话，将来会出现危险，让他暂时脱离陆军中枢不失为上策。

然而，田中义一对此时期发生的，被称为“情投意合”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之间的反复的政权交换，即由官僚政治和政党政治妥协导致的政权交替极为不满。鉴于这种妥协政治的不断持续，田中义一考虑到：由于受到政治状况的左右，增设师团势必会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靠近政友会中陆军出身的桂派是当务之急。^③

当时，政友会和桂太郎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正如政友会的实权派原敬在日记中所云：“即使有朝一日藩阀或官僚残党们为了固守孤垒反抗我们的话，他们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赞成桂太郎的英明主张。”^④实际上，桂太郎很早就有将官僚和政党联合起来的想法。

但是，直至桂太郎第三次组阁之前，在政友会内部，他还与原敬持有不同的方针。原敬已经表明了自己和桂太郎建立联合，向陆军妥协的意图，但是，桂太郎却认为强化和海军的关系更为有利。这对于桂太郎来说，无形中增添了动摇其政权的不安因素。因为，第三次桂内阁是在与政友会，亦即原敬的协作下运转的，并且桂太郎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12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0-2。

② 《田中宛寺内電報控》（大正元年12月16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0-2。

③ 坂野潤治：《大正政変——1900年体制の崩壊》，第72页。坂野潤治在此介绍并引用了《财部日记》，说明当时宇都宫太郎（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财部彪（海军次官）还有田中等陆海军的中坚干部对桂太郎接近政友会实施“情投意合”路线感到不安。

④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三卷，明治44年1月26日，第84页。

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能将陆海军的扩军计划推迟一年。^① 更何况，围绕着扩军问题，不仅陆军，而且海军对桂内阁也越发抱有不信任感。^②

在这种背景下，为巩固政权基础，桂太郎进而决定结成自己的政党。根据这一构想，他在自己原有的政治势力，即官僚政党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政友会的一部分会员准备结成新党，目的是以此为根基，强化所谓“情投意合”路线后新的统治基础。

根据山县有朋《大正政变记》的记载，1912年（大正元年）12月18日，桂太郎向贵族院敕选议员大浦兼武表示了组建新党的意向，并说此事已获得了山县有朋的同意（实际上不同意）。翌年1月13日，又向玄洋社社员杉山茂丸讲了此想法，接着在写给山县有朋的信中表达了为了结成新党，不得已而解散议会的计划。对桂太郎结成新党的构想，山县有朋、大浦兼武及平田东助（贵族院敕选议员）等山县派系的人物均表示出反对的意向。^③

1月19日，桂太郎感到有必要在议会上发表组建新党的意向，于是通过山县有朋的秘书官入江贯一向山县有朋传达了这一意向。桂太郎对入江谈到了结成新党的理由：

以往在内阁因为受政党的左右，吾之政策得以实行者八九，有二三成不得不让步。如果有了属于自己的政党，那就能使吾之政策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能够充分实现为国家的理想了。^④

概括地讲，桂太郎想利用新党结成，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大正元年8月12日，第245页。桂太郎向原敬提出建议：“此时停止事务整理以外的一切事情（减税问题、陆海军增费问题）如何啊。”

② 参见坂野潤治《大正政変——1900年体制の崩壊》，第三章，第117~176页。

③ 参见山本四郎《大正政変の基礎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70）《资料篇》。

④ 山本四郎：《大正政変の基礎研究》，第643~644页。

基础的政党，即具有官僚政治和政党政治双重影响力的政党，以便确保在处于山县有朋绝对控制之下的官僚派阀和贵族院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为了增强与政友会及陆海军势力进行对抗的能力，桂太郎还企图结成对内实行“皇室中心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国民的大政党”。^①

桂太郎构想组建“国民的大政党”的目的在于分离政友会，削弱其影响力。但事实上，对政友会会员活动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促成了政友会和海军的合作。特别是由于政友会和海军在反对陆军增师计划上意见一致，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陆军，认为桂太郎结成新党的动向是导致扩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为此，山县有朋再三告诫桂太郎，关系到增设师团的行动一定要慎重行事。^②

在山县有朋看来，活跃于增师问题的田中义一和桂太郎并没有什么区别。田中的目的在于实现增师和建立起旨在扩大军部势力的寺内军部内阁。当时的统治阶层至少是政友会和海军联合，桂新党及陆军势力的三权分立格局。进一步说，还可以加上对桂新党势力和陆军依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山县有朋等的元老势力。

桂太郎决心改变政治、军事两种权力分立的领导层结构，从而掌握主导权。中央俱乐部等官僚政党的组织再编强化就是这一计划的具体表现，桂太郎的第三次组阁也是实施这一计划的一环。^③

① 德富猪一郎：《公爵桂太郎伝》坤卷，原书房，1976，第700页。桂新党于1913年12月23日成立立宪同志会，其中干部有加藤高明、大浦兼武、大石正巳、河野广中、若槻礼次郎等人。

② 《桂宛上原書翰 附山県有朋意見書》（大正元年11月7日），《桂太郎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65-1；《桂宛山県書翰 增師問題处理ノ方針》（大正元年12月10日），《桂太郎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70-150；《桂宛山県書翰 增師問題处理ノ意見》（大正元年11月28日），《桂太郎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70-149。

③ 若槻礼次郎：《古風庵回顧録——若槻礼次郎自伝 明治、大正、昭和政界秘史》，読売新聞社，1950，第194页。若槻礼次郎：“桂公在与政友会的妥协中很吃力，政友会固然代表着国民，他自己也代表着国民参政，在议会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另外，关于桂新党的建立意图，参见岡義武、林茂校订《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政治——松本剛吉政治日記》，岩波書店，1959，第3~4页。

针对桂太郎的结党之举，田中义一又是怎么看待，并希望采取怎样对策呢？下面以当时田中义一写给寺内正毅的信为史料作一分析。

首先，田中义一认为，在第30届议会解散后，桂新党结成会被明确地提到政治日程上来。关于如何面对新党结成后的局面，他这样说：“万一时局分化为海军和政友会，与陆军和新政党对立的话，就国家大局说，实在是令人担忧之大事。今后，在政党之外，加强陆海军之间的协作应是当务之急。另外，最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为了迎合社会的趋势政府失去了权威，而政府如果失去权威最终将影响皇室尊严，以致社会上出现了用英美思想来解释钦定宪法的情况。”（《寺内文书》）^①

在这里，他指出，陆海军之分裂为政友会亦即海军，桂新党亦即陆军的事态，“就国家大局说，实在是令人担忧之大事”，所以陆海军应该和政党划清界限。他还也明确指出军队和政党组织的不同，认为认同以政党为主导的组阁，与容忍用英美思想解释宪法是一脉相承的。田中义一已经意识到政党政治的膨胀，将会导致军部势力的减弱，作为陆军的紧急政治课题的增师，亦将出现受制于政党政治的方策略的危险。^②

不过，桂新党的实际状况与田中义一设想的政党相距颇远，特别是在新党结成时桂太郎在吸收国民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态度，令田中义一非常不满。在给寺内正毅的信中他写道“桂公为达结党之目的，不断向国民党低头，极为令人遗憾”，同时他指出采取向国民党的改革派屈从的对应态度，会对将来的桂新党产生重大的影响。^③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2月2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3。

② 山本四郎：《大正政変の基礎研究》，第454页。山本四郎：“田中此时的政治思想和元老们基本没有什么不同。”

③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2月2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3。

总之，就本质而言桂新党即便有着官僚政党的性质，但是在如何对待已有政党的态度上，要按照政党逻辑行事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为此田中义一在当时认为：政党是代表民意或者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它是同绝对主义势力的军部、官僚及元老等相对抗、对立的政治势力。

2. 政党观的改观

随着陆军强行要求增师导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倒台，由政友会的地方支部、商业会议所、新闻记者团等团体提出了“打破阀族！反对增师！拥护宪政！”的口号，拥护宪政运动相继在全国各地展开。

拥护宪政运动是政治力量逐渐增强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产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政党势力（政友会和国民党），企图把绝对主义势力及藩阀势力从权力主体的宝座上拉下来，自己成为权力的主体，从而确保自己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力及影响力。因此，运动始终以民众一定程度的参与为背景，目的在于最终推翻藩阀性质的桂内阁。

大正政变主要是指由拥护宪政运动导致的第三次桂内阁倒台的过程。田中义一认为，由产业资本阶级为核心，民众广泛参加的反政府倒阁运动是明治国家体制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变。

1913年（大正2年）2月15日田中义一在给寺内正毅的信中写道：“关于最近的政变，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望您尽快了解实情。时局在随着那些人险恶用心而变化，不仅有损皇室的尊严，也关系国家之安危。为此，吾深感不安。”^①他还指出：民众在拥护宪政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活跃动向，有可能动摇绝对主义权力及天皇的统治结构。他甚至预测到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抬头，这些近似过敏的反应，暴露出了田中义一的绝对主义军事官僚本质的政治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2月15日），《寺内正毅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4。

观。出于这种观念，也许田中认为，出动军队平息混乱局势和将军事力量使用于政治，最终确立军事的秩序才是最好方法。

另外，在大正政变推倒了第三次桂内阁后，对于其后的山本权兵卫内阁（1913年2月20日成立），田中义一做了如下的分析：

山本作为政友会的傀儡并无新建树，此人或者依赖诏敕，或者窥视政友会的镇抚效果，寻求出动的时机，出头露面。
(《寺内文书》)

总之，他认为山本首相作为政友会的傀儡者，“明显被西园寺、原等人所利用”。^①山本权兵卫作为藩阀势力中海军以及萨阀的代表，他对政友会的妥协态度让田中义一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因此，在这封信的最后他指出，山本内阁的出现，表示出陆军危在旦夕，这直接关系到“国家之危机”。

田中义一所说的“国家之危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受政友会和海军支使的山本内阁“强行要求陆军实施改革，拒谈陆军增师，不过是想自本年度起以增加征募人员来打发陆军，并借长阀之名破坏陆军，这些都应该引起吾等极大的注意”。^②

田中义一认为山本内阁将财政改革作为重要课题，其背景就是为了阻止陆军增师。因此，他意识到在藩阀内部长阀和萨阀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针对这一对立的出现，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得到桂新党的支持。不管桂新党的现实状况如何，一直不认可桂新党的田中义一的此举，表明他的指导方针有了巨大转变。

田中向寺内正毅进言中表示，应代替不可救药的桂太郎援助桂新党。导致无法实现增设师团的山本内阁财政改革方针，被田中义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2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4。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7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6。

一认为正反映了政友会的“横暴”。为了对抗这一“横暴”，“作为一时之策，可以推举大隈为总裁，各势力彼此做出一定的让步，与国民党一起建立起以往曾经有过的大团结临时机构。这样，既可以掌握时局，又可以期待若干年后出现适当的变化”。^①他所谓的“一时之策”就是，为了和政友会对抗，在桂新党中加入国民党的力量，组成反政友会联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并不是指参与组建桂新党的改革派，而是一直强调与政友会增进联盟的反改革派，即犬养派。^②

此时，田中义一为了达到反山本内阁的政治目的，开始考虑推荐大隈重信任新党总裁。当时，大隈在民众中仍然很有人气，而且自从改进党以来，其作为政党政治家的形象正日益显赫。田中义一痛感到政党政治的必要性，但他的此举又绝非表示他对政党政治的理解，不过是政治均衡论的产物，并未跨出其机会主义者原有的思考领域。

事实上，田中义一认为：“就大隈的政纲而言，如昔日那样提倡政党内阁主义的话，新政党将与其政见不相容而导致两者之间无法共存。但如果大隈当政的话，这些将可以融通。”^③可见，田中义一构想的新政党并未标榜政党内阁主义，而是以皇室中心主义为基调的政党组织。

山本内阁在同年6月份，发表了目标为7037万元的财政改革大纲，并借此机会，根据文官任用令的改革，打开了政党人员进入官场的大门。另外，针对国民日益高涨的反军阀情绪，他着手改革陆海军官制。不用说，这些都离不开政友会的支持。相对于山本内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7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6。

② 坂野潤治：《大正政変——1900年体制の崩壊》，第157页。坂野潤治：“自改进党时期以来大隈重信一直是犬养老师，而田中推举大隈重信为桂新党总裁，其目的是将犬养拉到反政府的一边。”

③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7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6。

阁的攻势，田中义一对新党参加者中最为期待的后藤新平和平田东助的表现更是不满，这反映了田中在没有看到自己所期待的新党作用而产生的焦躁情绪。对此，田中这样说：

陆军委曲在原松田的膝下，会使陆军的威信降低，这等于陆军自己把自己投进政党的旋涡中。倒不如此时局面突变，陆军顺应局势采取挽回陆军威信的必要手段。（《寺内文书》）^①

田中义一的计划是作为政友会的反对派而支持桂新党，并想将此支持不断强化，结果并未奏效。因此他也表露出消极的态度，即由于陆军又一次被排除在政党的圈外，所以只能致力于维系陆军的威信了。由于山本内阁已经完全确立了优先海军和政党的指导性政策，此时田中也只能作出如此的政治判断。

田中义一还在另外的信中这样记述了自己窘迫的心情：“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增设师团了，而变为谁掌握大权的问题，此时，陆军即将陷于沦为政党陆军的危机之中。”^② 也就是说，在陆军从属于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已不再是单纯的能否实现增师的问题，事态已经严重到发展成为了“大权的问题”。

田中义一不仅在陆军内部，对山本内阁的陆相木越安纲没有向内阁强烈要求增师，反被政党所笼络不满；同时也对自己所信赖的山县有朋没有拿出打开局面的良策不满。他在给寺内正毅的信中这样写道：

此时，军人中袖手旁观者大有人在，和我个人的得失相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10月28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9。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11月2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20。

比，陛下的陆军已经处于被卖给政党的危急关头了，倒不如转告宇佐川阁下，请他秘密进言拯救陆军于危险境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中略）小生有着在万不得已之时投入旋涡，采取挽回局面的手段的觉悟，如果没有人能使陆军摆脱危险，陆军则会一落千丈、军纪败坏，士兵会丧失军人的意志，陛下的大权会从根本上遭到破坏，这使令人倍感忧虑。（《寺内文书》）^①

这里，田中义一对政党（具体指政友会）的不信任感，成为他否定政党的理由。所谓“拯救陆军于危险境地”或者说“挽回局面的手段”指的是“在定编外增加一个旅，与去年相比，不得已而通过增设师团来打开陆军被动的局面”。^②说到底，田中义一坚持增强军备，并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推翻山本内阁，达到实现寺内军部内阁的构想。其最终目标是一举打破政党主导的政治局面。

五 陆军的危机意识及其解决办法

1. 联合产业资产阶级

由于第一次西园寺内阁（1906年1月7日成立）所采取的积极政策的结果导致了国家财政膨胀。以内阁第24次议会（1908年3月26日开会）为契机决定对行政财政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西园寺内阁为了挽救国家财政危机，对酒税、砂糖税、烟草税等都实施了增收。这也引起了全国实业团体的反对。

在此背景下财界人士以第10次总选举（1908年实施）为转机真正开始进入政界。当时，丰川良平（三菱管事）、中野武营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11月2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20。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11月2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20。

(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关西铁道社长)、仙石贡(九州铁道社长)、片冈直温(日本生命保险会社社长)、岩下清周(北滨银行专务董事)等人为了向政界进军组织了戊申俱乐部。^①他们想借着进入政界，直接在议会层面上确立起保护财界、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策。

陆军执拗的增设师团的要求，引起了资产阶级反陆军、反藩阀意识的高涨，并对支持陆军增师要求的藩阀、官僚政治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的军备论就是“经济军备论”，^②所反对阻碍资本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非经济不合理的军扩论。^③

然而，资产阶级也不是磐石一块，负担军扩所产生的增税最多的是产业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对政治的反应最为敏锐。支持桂内阁的涩泽荣一(涩泽财阀的创始人)、益田孝(三井和名的理事)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并没有和产业资产阶级采取统一步调。大正政变期间的拥护宪政的运动就是由以产业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交询社发起的，^④他们极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陆军的立场。他们参与组织策划并支持政友会，政友会也因此采纳了他们的政策要求，使其自身的资产阶级政党性格越来越浓厚。

大正政变期间，由产业资产阶级支持的犬养毅(当时立宪国民党常务委员)、尾崎行雄(当时政友俱乐部成员)等为中心结成了拥护宪政会。拥护宪政会的基本运动方针^⑤在于，以标榜“发挥

-
- ① 参见大久保利谦《日本全史10 近代Ⅲ》，东京大学出版社，1964，第22页。
② 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的基本问题》，《真说 日本历史》第11卷，雄山阁出版，1959，第12页。
③ 中野武营：《增师问题と吾々の立場》，《东京商业会议所月报》第五卷12号，1912年12月，第1页。我等商业会议所就战后经营坚持的唯一主张，就是培养国力、发展实业，即改善尚武的政策，巩固财政，不得谋求增加赋税。
④ 交询社的主要人员有朝吹英二、门也畿之进、池田成彬、本多精一、菊地武德、小山完吾等人。
⑤ 参见住谷悦治等编《讲座日本思想史2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思想》，芳贺书店，1967，第28页。

政党主义”达到确立能够反映社会舆论的政党政治。

支持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杂志《东洋经济新报》，在大正政变期间坚持发挥了一贯批评军阀暴行和官僚擅权的舆论阵地的作用，提出了发展政党政治的主张。由此希望能够达成提升产业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目的。^①

身为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的中野武营认为，由于陆军单方面的军备扩张而导致国库财政状况恶化，进而成为增税的原因，使得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失。为了防止此种事态的再次发生，1912年（大正元年）11月30日，他提出了成立国防会议的要求。国防会议提出了“整顿帝国国防”^②的目标，这是产业资产阶级自己提出的国防方针，目的是阻止无视经济合理性的陆军及其扩军路线。

在扩军、增税等的政治争论之中，产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在大正政变期间他们终于提出了“拥护宪政、打破藩阀”的这种扩大自身政治发言权的口号。由此他们向绝对主义势力提出了把权力转移到产业资产阶级所支持的政党势力手里的要求。但是，作为广大群众运动的参加者，他们最终没能实现民众那种“拥护宪政”、实现“宪政常道”，从而扩大政治权利的要求。从结局上说，大正政变除了使统治阶层内部权力主体地位发生动摇和对

① 《社説 なんぞ官制の改革に着手せざる》，《東洋經濟新報》第616号，1912年11月25日，第882页。杂志社论：“（陆军）之所以跋扈而跳梁，不外官制的结果。如何才能既保存现有官制，又能使陆海军安分守己呢。不论怎样的政治家，若不向陆海军低头的话，断然不可能组成内阁。（中略）面对如此时局，根本问题就是改革官制，不论何等军历均可成为陆海军大臣次官。而这正是除军阀之外，全社会的宿愿。”《大阪朝日新聞》，1912年10月21日，该全国商业会议联合会于1912年10月，第19次大会（在东京召开）通过向政府提出建议，列举了政府应该迅速解决如下课题：“一、政费膨胀，负担过重。二、政费分配不当，军费过重，产业费过少。三、官业膨胀，民业被压制。四、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五、对外贸易逆差，兑换制度危机。”因此该会要求政府进行财政整顿。然而，为实现上述目标，产业资产阶级必须进入政党的认识此时业已强烈存在。

② 《大阪朝日新聞》，1912年12月2日。

立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实现。^①

大正政变所表现的，可以说是一个以桂内阁对政友会、陆军对海军、绝对主义势力对资产阶级、长阀对萨阀、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等“统治阶级内部的多元矛盾与对立”^②为外在形式的政治过程。因此，当统治阶层内部成员由于置身于这种政治状况之中，而且又几乎都与各种不同势力有着某种利害关系时，也就无法对来势迅猛的政变做出切合事物本质的颇有远见的政治分析。^③

由此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和矛盾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认为大正政变其实是企图调整和解除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和解除矛盾的方法。尾崎行雄一语破的地指出：“拥护宪政不仅仅为了打倒一个内阁，还在于要攻破阀族的壁垒，奠定立宪政体的基础。”^④这一主张又是最有力的调整和解除矛盾的方法。但是，这一点恰恰也是绝

① 上杉重二郎：《議會政治の發展》，《新日本史講座7 資本主義時代（下）》，中央公論社，1949，第32页。上杉重二郎：“护宪运动的展开，无论如何要说到资产阶级的成长。一般都认为此事必须议会的多数派来组建政权，就是所谓的确立‘政宪常道’，由统治阶级考虑便于运营的机构。”中瀬寿一：《憲政擁護思想の進出と展開——第一次護憲運動の指導理論》，《史学雑誌》第72编第2号，1963年2月，第50页。中瀬寿一：“他们（资产阶级）从未希望通过与军部官僚彻底地抗争，来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但是他们为了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抑制着以往那种绝对主义势力自以为是的专制，有着平缓地建立自身政治领导权的志向。”相关研究还有江口圭一《都会小ブルジョア運動史の指導理論》（未来社，1976年）。

② 中瀬寿一：《憲政擁護思想の進出と展開——第一次護憲運動の指導理論》，第59页。

③ 德富蘇峰：《大正政局史論》，民友社，1916，第163页。德富猪一郎（苏峰）：“一句话，宪政拥护运动的结局，只能说是剪灭了长期跋扈于政界的长阀，又迎接了本来蛰伏于政治一隅的萨阀。（中略）赤裸裸的现实是：长阀发起了征讨，萨阀受到一边倒的拥护，最终引发了藩阀各方向的争斗。”木下成太郎：《大正政変を顧みて》，国民時報社，1914年，第13页。从属政友会的代议士木下成太郎说：“处于悲惨境地的阀族们，于绝望中着手组织政党，成立了立宪同志会，借以掩饰自己的末路。其他的国民党离党者，则与旧中央俱乐部成员联合，成为阀族政治家的走狗或附庸。”

④ 尾崎行雄：《尾崎行雄全集》第10卷，平凡社，1927，第112页。

对主义势力，特别是陆军所不能接受的。

这是因为，尾崎行雄主张：建立立宪政体就在于创立由议会多数派掌权的政权结构，从而在根本上颠覆少数绝对主义统治的政治结构。^① 总之，以军部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势力警戒的主要对象，就是意欲吸收资产阶级各种政策要求的政党内阁主义。

前一节我们从田中义一的书信里了解了他的政治观念，现在稍微参考一下田中义一以外的军事官僚的见解，由此比较他们与田中义一的大正政变观、政党观的差异，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田中在陆军的地位。首先是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在给寺内的书信中对桂新党的动向有如下的观察：

说到桂公组建新政党并以此为组建内阁的基础，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倒不如在此时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以改变内阁被接连解散的局面。除了像拿破仑那样用枪炮来使人心一新之外别无他策。（《寺内文书》）^②

桂新党组建新的政党组织，意在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军事政权，以达到排除政党的目的，这种过激的见解在当时是明显存在的。特别是长谷川对尾崎行雄等人的旨在拥护宪政、实现宪政常道的运动，不仅在内容上触及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还被理解为危及了国家体制。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与田中义一的认识相同。即

① 京口元吉：《大正政变前後》，白揚社，1940，第6~7页。京口元吉：“大正政变是坚守政宪常道的政党内阁主义的政党一派，在得到了民心的同情的背景之下，针对以山县为中心的保守官僚的超然内阁主义官僚跳梁跋扈的果敢挑战，这一挑战可以说大正7年9月的原内阁以后的政党内阁时代得以产生的前哨战。”石井金一郎：《大正政变》，《史学研究》第50号，1953年4月，第72页。石井金一郎：“民党打出‘推翻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最终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此打开了通往‘政党内阁时代’的道路。”与京口一样，石井将大正政变作为确立政党制度的里程碑，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② 《寺内宛長谷川書翰》（大正2年2月18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38-35。

便如此，田中义一也没有看清桂新党和政友会是具有同样性质的政党组织，仅仅在对国民党进行利用这点上对其进行了对照性的比较。^① 作为上原勇作派的一员，参谋长大岛健一在给上原的书信当中这样写道：

事关国防利益的得失，此大权事项当由党议作出决定。由于采取了外交、财政的形式，此政治时期就难免会受到政客的攻击，随之而来的是内阁的命运如何发展。与此同时，虽经几度更迭，还是在政友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内阁，实为成功之举。企盼一个超脱国家政党之外的、公正有力内阁的出现。（《上原勇作关系文书》）^②

可见，他对于建立在政党利益和策略之上的国防方针，以及受其左右的政党政治极为不满，希望出现不为政党干涉的超然主义内阁。大岛健一虽然没有像长谷川那样提出行使强硬手段，但不难想象其旨在建立超越政党的军事内阁期望。总之，大岛健一也是持完全排斥政党的见解，和田中义一相比，在政党对策方面上显得比较保守，应该说近乎于长谷川的立场。

长谷川、大岛健一的意见是彻底奉行军队统帅权独立的原理原则，从而实现军队从政治中完全独立出来。此主张的真正意图在于，无论发生怎样的政治变动，也要坚持军队政治地位的不变性。从这一点来看，田中的政党观、政党对策极富于柔软性，或许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陆军内部的少数意见。但是，为了应对今后政党势力扩张事态，此时也出现了对田中观点的妥协，为了保持统治阶层内部的统一性，在

① 北冈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年》，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第132页。北冈认为田中能做出这样的对应证明田中是一个持有灵活的政党观念的人。

② 上原勇作關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關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第146页。

陆军内部，也有人认识到田中风格的政治判断素质也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在以长谷川、大岛为代表的军事官僚与田中的政党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毕竟田中的政党观是以对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资产阶级、政党势力给予一定的评价，甚至不惜与之妥协，也要提高军部政治地位为目的的。陆军以大正政变为契机，在与已经具有了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和政党势力的妥协与对立关系之中，为了确保自身地位和名分，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与这些新兴势力形成了联盟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很早注目这一点并且能在现实的政治中具体实施的只有田中而已。^① 为了对此再做些许探讨，接下来我们将针对山本内阁时期的陆海军军制改革问题，看看这个问题是怎样对军部产生冲击，而田中义一对此又是如何应对的。

2. 军部大臣对现役武官制改革问题的妥协

坚持增师的陆相上原单独上奏辞职，而陆军拒绝推出后任陆相人选，导致了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瓦解。这是以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00年5月确立）为根据所造成的，即历代内阁如果不顺从军部的意向，就无法任用军部大臣。反过来军部则可据此制度随意迫使内阁倒台，或是利用此作为牵制，以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并阻止政党出身者就任军部大臣。于是，宪政拥护运动中讨伐军阀横暴的舆论就向保障军队政治独立的“统帅权独立制”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发起了攻击。

受此舆论动向的影响，第三届桂内阁成立之后，召开的第30次议会（1912年12月27日开会）期间，元田肇（政友会）、尾崎行雄等对桂内阁提出了《关于内阁措施及其政纲的质问书》。^② 其

① 藤原彰：《第一次世界大戦直前の日本軍部1》，《歴史学研究》第383号，1972年4月，第60页。藤原彰：“军部在大正前后的政治危机中，并未与资产阶级、政党对立，反而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的推进者。”军部在大正政变以后，逐渐向资产阶级代言人发展，因为资产阶级的资本储备水准过低，市场过小等内部矛盾，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求军部的合作。

② 前田莲山：《歴代内閣物語》上卷，時事通信社，1961，第443页。

第2项质问为：“依据现行官制，陆海军大臣只限于现役大、中将，现行内阁的宪政是否会因此而受到阻碍？”当时桂首相回答：“它没有给宪政运行带来阻碍。”

但是，在此后发起的宪政拥护运动中，桂太朗的亲信田健治郎（当时贵族院勒选议员）提出了“陆海两相可以任用文官之革新”^①的发言。就连陆军出身的藩阀桂太朗也言及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改革，国民舆论对藩阀以及军部的批判也日趋激化。

桂内阁总辞职后，海军出身的山本内阁对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改革是积极的。以政友会为友党的山本内阁，正如预想的那样，将这一问题作为内阁的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在1913年（大正2年）2月27日再开的第30次会议上，政友会俱乐部（尾崎行雄派）和国民党就该问题共同递交了质问书，山本首相对此的答复道：“关于陆海军大臣现行任用制度，由于其对宪政运行没有起到有效的保障，政府经过慎重审议，认为有实施改革的必要。”^②就此，官制改革的实施被正式列入政治日程。

原敬作为山本内阁的内务大臣热心地推进官制改革，针对国民舆论打倒军阀的要求，他表示政友会是能够以政策反映舆论要求的政党，并且以抑制军部，特别是陆军权限，相对降低其政治地位作为目标。^③

3月8日，在众议院，犬养毅、林毅陆（政友俱乐部）等人向山本政友会内阁提出质问：是否认为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会对宪政

① 《田健治郎日記》第4册，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205，大正2年1月8日。

② 井上清：《宇垣一成》，朝日新聞社，1975年，第91页。田中在《大正2年2月2日付 寺内宛書翰》中，对桂的态度做如下记载：“这次桂公的政党，却主张对陆海军大臣的官制进行改革，令人担忧。”《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3。

③ 前田蓮山：《歴代内閣物語》下卷，第30页。原敬在日记中记述：“改革陆海大臣现役的规定，缓解国内舆论。”另外，对陆海军官制改正问题，记载最详细的是山本四郎《大正政変の基礎研究》（第2节《陸海軍官制物語》，第181-207页）与之相比，本节有所不及。

运行产生着阻碍?^① 3月11日,山本首相对此质问做了与先前同样的答辩。官制改革问题开始在议会上公开讨论,改革实施的机会由此相应增大。^②

虽然,山本内阁的改革官制举措是政友会和宪政拥护运动反对军阀的产物,却没有遭到海相齐藤实的反对。^③ 陆相木越也以“就此问题与政府争执只会导致内阁更替,不利于将来增师问题的解决”^④为理由,对山本首相的官制改革表示赞同。

然而,陆军对山本内阁坚定的官制改革动向有所察觉且反映强烈。例如,陆军次官冈市之助在山本进行议会答辩的前一天,给寺内发了如下的电文,主张抵制官制改革:

山本在留任陆军大臣期间,虽对陆海军部的官制改正明确表示不同意,但不得不得碍于政友会的情面在明天议会上对今后的改善进行答辩。因此仍存在虽陆军大臣不同意,但为了总理不得不进行说服的状况。作为其当事者表示出在不远的今后会自行处理的意思。(《冈市之助关系文书》,以下简称为《冈文书》)^⑤

那么,陆军反对的理由到底在哪儿呢?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表明自己的见解曰:“在军务上虽然不影响预后备役大臣,预后备役士官也被允许加入政党,但一旦加入政党的人被任用为陆海军大臣的时候,就有军事秘密泄露的可能。”^⑥ 预、后备役的军人

①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第8卷,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刊行会,1956年(影印本),第1514~1517页。

②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第8卷,第1549页。

③ 中村菊男:《大正政変と林毅陸》,《法学研究》第34卷第9号,1969年9月,第124页。

④ 德富蘇峰編《公爵山県有朋伝》下卷,原書房,1933,第877~878页。

⑤ 《岡市之助電報控》(大正2年3月10日),《岡市之助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6-10。

⑥ 前田蓮山:《歴代内閣物語》下卷,第37页。

加入政党实际上在以前是不被允许的。虽然这并不符合事实，但却有观点认为：任用资格范围的扩大会使政党介入的可能性变大。这种对政党的警戒心就是他们主要的反对理由。^①虽然陆军的元帅奥保鞏等多数元老持强硬的反对论调，但中坚分子冈等所考虑的是“增师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当然就更无法遏止对陆军的非难攻击”。^②

出于如此原因，长谷川于4月24日就官制改革的不适当性上奏天皇。因为山本首相已经就官制改革的必要性上奏并得到了天皇的承诺，所以陆军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措施。^③内阁会议于5月2日决定了对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改革。结果是销去“现役”二字，军部大臣的任用资格扩大为预备役和后备役，6月13日得以公布实施。

陆军之所以放弃了反对官制改革，直接原因确实在于天皇的意志，而且与增师问题的背景也是有关系。木越安纲陆军大臣在受陆军内强硬派攻击而加入山本内阁的当初，就已经明确做出了由于事关增师、官制改革乃不得已的判断。其后寺内在致冈市之助的信中，也承认就结局而言实施官制改革乃上策：

眼下陆军内部再一次出现破绽，面临再次被舆论非难的时

① 山本四郎：《大正政変の基礎研究》，第189～192页。该书中介绍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所藏《参考資料（4）大正2年6月13日の勅令第164号案》，同时探讨了陆军中坚层反对官制改革的动向；《陸海軍官制改正顛末 山県宛木越書翰》（大正2年3月11日），《山県有朋關係文書》，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7-3。木越叙述了当时陆军所应采取的对策，曰：“对于陆海军官制的现役大中将妨碍宪政运行的质疑，最初应回答以没有妨碍。至于与政党的关系，待总理大臣声明改革时，可由陆军大臣说之以势必造成现任内阁去留事态的利害关系。”这表露了他倒阁的决心。原田熊男：《西園寺公と政局》第5卷，岩波書店，1951，第53页。西園寺公望谈到反对陆军官制改革的理由时说：“说实话，就是要防止政党的人成为大臣。”

② 《寺内宛岡電報控》（大正2年4月），《岡市之助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6-11。

③ 《寺内宛書翰》（大正2年4月26日），《岡市之助關係文書》，16-12。

刻，无论陆军对此问题持绝对拒绝或是不持明言意图的姿态，应以所谓以柔克刚的态度，根据今后增师问题的进展考虑对策。《冈文书》^①

持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田中，在致寺内的书信中写道：“官制问题的解决恐怕会最终导致增师问题的无法实现，趁着官制问题还是悬案之时强烈要求实行增师才是上策。”^② 所以可以作为实现增师的交换条件承认实施官制改革。^③ 寺内、田中等陆军主流以实现增师作为交换，旨在强化参谋本部的柔软政治应对，使陆军内的官制改革反对派的矛头有所收敛。这样陆军和山本内阁之间达成妥协，后来陆军最大限度地利用此妥协成果，最终实现了增师。

在这一连串过程中我们看到田中的见解在于：由于山本内阁受到了政友会的支援，作为强硬论的一方就要向政友会给予利益的返还，即采用来自政党政策的均衡论，此乃实现增师的一条近路。与此同时田中敏锐地对此官制改革问题中的政党政治的存在，抱有深刻的危机感。于是，田中在山本内阁和陆军对立日益深刻的这一年3月，以《关于拥护帝国建军的根本意义》为标题，发表了围绕官制改革的是非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官制改革对在宪法的运用上是有害的，之所以敢于强行改革，是出于强化政党的权限的需要。文章说：

当今怀有政党内阁主义的政治家当中，有人认为现行陆

① 《岡宛寺内書翰》（大正2年4月30日），《岡市之助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17-13。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5月1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3150-15。

③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年》，第145页。北岡伸一认为陆军妥协的理由，在于山本首相受到强烈的反陆军舆论支持，以及山县没有积极的反内阁行动。

海军军部官制与内阁组织的要义相矛盾，主张对此进行改革。但若参照帝国宪法则会发现这些想法均是谬论。在我国制定行政各部的官制以及文武百官的任命都是根据帝国宪法第10条全部权力归天皇所有。因此不仅依据行政上的必要制定适当的制度，任命帝国宪法上的国务大臣也关系到天皇的信任，国务大臣各自承担起直接辅佐天皇的责任。因此他们不同于英美那样依据议会多数制选出的政党、再由政党组阁就是很明白的事情了。有这种论调的人从根本上误解了宪政的效用，将是否便于维持政党政派的权利当做基础、奉为神圣，这不是拿着其他国家来从根本上破坏卓越而又有特长的帝国宪法是什么呢！（《田中义一关系文书》，以下省略为《田中文书》）^①

在这里看到的是用绝对主义对明治宪法的解释，其本身虽是毫无根据的解释，但从中可以看出：田中那种断然拒绝引进英美流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基本政党观，完全没有改变。按照他的看法，正是那种以正常执行宪政为理由的政党所提出的官制改革要求，反而是出于对宪法的错误解释的产物，是政党内阁制违反了宪法。就田中看来，正是政党的官制改革要求排斥了绝对主义对明治宪法的解释，他的主张就在于阻止自由主义的解释，即阻止英美流宪法解释的现实化。

所以，应该说虽然田中最终出于实现增师目的而尝试向内阁妥协，但作为根本的政党观却是一贯不变的。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通过妥协使陆军的政策得以实现的田中，在本质上仍是个反政党主义者。他的这种两面性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正

^① 《田中義一關係文書（田中家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4。该资料在小林幸男《海軍大臣事務管理問題顛末》（《法学》第12卷第1号，1963年）中也有所介绍。

因为如此，一旦陷入即便妥协也未能实现增师目标的困境时，他就激烈地批判了与山本内阁步调一致而不热心于实现增师的木越陆军大臣。^①此外，他还批判山本内阁实靠施行财政改革，而对实现增师持的消极姿态，认为内阁是“借长阁的名义对陆军进行破坏”，^②露骨地表达了自己的敌对情绪。

六 结束语：对反政党观的助长

陆军在陆海军官制改革问题上向山本内阁作出让步妥协之后，接着就凭借参谋本部权限的强化，提出了军内部的组织再编的建议。田中之所以认为内阁成员陆军大臣对编制、动员事项负有责任，主要是因为他接受了政党的介入。所以为了解除这一原因，有必要将编制、动员的权限从陆军省分离出来，即把这一权限移至天皇直属的军事机关的参谋本部。而参谋本部的自立性又是按照统率权独立制和帷幄上奏制等特权制度，受到法制严格保护的。

所谓田中的参谋本部强化论，是在第3届桂内阁时期就早早地表现了出来。在大正政变桂内阁陷入危机的时候，他在致寺内的信中说：“在此时刻考虑到参谋本部的活动以及今后的趋向，毋宁像以前那样将动员编制移至参谋本部，以确保其在政党之外具有坚固的基础，还是很必要的。”^③即为了回避政党干涉，而把编制、动员的权限从陆军省向参谋本部转移。编制、动员事项虽仅限于陆军省的管辖，但仅作为预算的处理就必然受到内阁政策方针的左右。仅就政党势力意欲利用这一点压制军扩而言，田中的意见在军内也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5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5。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7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315-16。

③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2月2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315-13。

是很有说服力的。^①

然而，陆军的参谋本部强化论受到了舆论和新闻界的批判。例如陆军预备役将校西本国之辅在《军相官制改革肇祸论》为题的报道中，针对参谋本部强化的理由阐述道：“可以想象得到当长阀军人看到出现了文官出身的军部大臣时，必然会进行强烈的舆论上抗议，所以对参谋本部只有采取宠信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任用文官为陆军大臣的话，也能够抬出参谋本部来与之抗衡。他们要么会彻头彻尾地让陆军大臣受到进退维谷的痛苦，要么就采取通过大臣来操纵内阁的狡猾策略，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②他已经看透了以田中为首提倡的参谋本部强化论的政治意图。

总之，西本认为参谋本部强化论，意在从制度上排除政治对军事的介入或干涉，与此同时以统帅权独立制为盾牌，重新强调军事独立性的行为。像这种露骨的政治意图即便在宪法上也是可以提出多种异议的。

例如，政友会成员、法律学者的林毅陆说：“从立宪政治的本义来说，由于负有辅佐宪法责任的国防大臣拥有了诸多的权力，同时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设立所谓直属天皇的特别机关，虽使其拥有巨大的权限，但也并非一定是可喜的现象，倒不如说就是因为这个妨碍了宪政的运作。”^③由预算问题所制约的编制、动员的权限，如果完全被不涉及政治力量的参谋本部掌握的话，在宪法上将作为重大障碍。特别是林毅陆的批判，要求实现拥护宪政运动所揭示的“宪政常道”，已经有了以此为前提取得政党、资产阶级权利的意识。

① 田边元二郎：《军制改革意見》，《太陽》第19卷第5号，1913年4月1日，第137页。田边元二郎（退役陆军步兵少佐）：“从军部利益的本意来说，编制、动员依然作为参谋本部的工作，如果认为使其从陆军省的一般工作独立出来更有利的话，势必造成陆相与内阁不得不去留都同步的局面，因此是有利于避免将国防卷入政治斗争之弊的。”

② 《日本及日本人》第609号，1913年7月1日，第23页。

③ 《日本及日本人》第610号，1913年7月15日，第32页。

在一连串反陆军活动的背景之下，这是一种旨在强化以政治统治军事的观点。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宪政常道”，这一观点也强烈地意识到解决陆军统治的课题已经迫在眉睫。

然而，就在这样的议论之中，参谋本部强化论先是在1913年6月3日起草了《统帅命令等省部之间协议案》，^①在同月6日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就“三官衙业务担任规定”的必要性进行了上奏，^②在7月8日《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关系业务担任规定》得以上奏，^③并于10日被裁可执行。

就这样统帅命令、编制、动员、人事等权限被移交给参谋本部，陆军省在权限范围方面取得了优势的地位。^④具体的战时编制、作战计划、训令、动员计划令及其细则、年度动员计划令及其细则、动员令、复员令、动员军队的任务及其行动、军队的向外国派遣及其军队的任务行动等业务的草拟者，以及持有这些业务的最终决定权者为参谋总长。^⑤

很明显，在军事行政的主要事项的决定权基本上都由参谋总长掌握的背景之中，是有其彻底强化统帅权独立制，以便抑制政党势力扩张之意图的。在反陆军、反军扩的舆论日益高涨的时候，陆军以参谋本部的强化取代官制改革的实施，是在不懈地进行着政治独

① 《寺内宛岡書翰》（大正2年6月3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237-10。

② 陸軍省編《陸軍省沿革史——自明治37年至大正15年》上卷，巖南堂書店，1969年（影印本），第15~18页。

③ 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戰史叢書 陸軍軍需動員1計画編》，朝雲新聞社，1969，第131页。

④ 參見井上清《大正期の政治と軍部》，井上清編《日本の軍国主義3 軍国主義の展開と没落》新版，現代評論社，1975；藤原彰《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前の日本軍部1》，第62页。藤原彰：“他们（指陆军——著者注）一面拖延官制改革，一面企图强化参谋本部和实现增师计划。”

⑤ 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戰史叢書 陸軍軍需動員1計画編》，第133~134页。

立化的促进工作。

如此形成的统帅权独立制的制度化进程，后来又与反陆军舆论成比例地向前推进着，其结果使得陆军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其政治发言权亦不断扩大。这就意味着当时陆军官制改革和参谋本部的全面强化，已经迎来了陆军政治地位强化发展的一个历史转折点。^①

但是，执著于陆军军扩主张的田中等陆军中坚干部连，与陆军上层部之间围绕军扩的方法论，也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分歧。在田中为代表的中坚干部连一方，仍然是尽可能地在与各种势力的对抗之中，寻找着以军事介入或干涉政治的机会，他们的这种强硬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然而在陆军上层部一方，他们认为面对各种势力之间一定程度上潜在的反军队情绪，强制军扩只会使反陆军的感情增强，不如暂且与山本政友会内阁妥协，借此等待下次机会。出于这种分歧，陆军上层部对于田中的一连串行动，虽然也予以了一定的评价，但同时也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对其敬而远之的氛围。

在这种状态的背景下，田中突然提出了外出旅游的计划。10月，田中在给寺内的信里写道：“就个人而言，小生为这次旅行煞费苦心；而就公事来看，小生乃是因为碍事而被放逐外国的。需要说的是，对于中原中将阁下的意见，小生认为是极其正确而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② 信里暗中透露了陆军内部的对立状况。田中还遇见了山县，此次外出旅游也是得到山县赞同的。^③

另外，寺内也在给上原的信里也写道：“对田中的事情得知了

① 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大江志乃夫认为统帅权对于提高军部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对这一作用的实际政治过程做出了解说。但是，毕竟当时强化参谋本部权限，是针对以大正政变为契机而扩张的政党政治势力的一项对策，而且对后来政军关系的构造与展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惜本书对此几乎没有涉及。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10月6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15-17。

③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2年10月10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315-18。

您的意见，所云甚是。当初自己的想法是以满足他的希望，于公于私将来都是有利的。今天，已经可以不必再为增师问题或解决陆军内部问题等事担心了。”^① 就山县、寺内、上原等陆军上层部来说，田中这一陆军中坚干部的代表者，最活跃的增师、官制改革论者，在此时从政治斗争中被隔离开来也是不得已之事。

田中从陆军中央层的撤退，也就意味着陆军政治活动的暂时退步。由此可见，田中在当时的确有着政治中坚军事官僚的地位。同时也可以说，这一时期陆军内部事实上的主导权，正在不断地向以田中为代表的中坚层下降。

大正政变时显著出现的资产阶级步入政治领域及其政党势力膨胀的新型政治形势，必然地促使了陆军内部政党观或政治观的变化。于是，陆军保持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理由阐述就成为当务之急了。就这层意味而言，田中的确是陆军适应时代要求所最适合的人选。这一点，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期，陆军以及田中通过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而推动大陆政策的实际情况中，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

田中等中坚军事官僚，期待着通过陆军在与这些政党势力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在新时代的权力构造中，能够找出保障和扩大强大政治发言力的方向性。这一期待意味着在构造新的政军关系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军队的优秀人才。此后田中作为头领的军事优秀人才在各种探索过程中，逐渐萌发了建立以军队为主导的政军关系体系的企图。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两个师团增设问题所反映的军事优秀人才层所具有，特别是与政党政治之间对抗、妥协关系必然性的自觉认识，毋宁是对后来日本政军关系基本结构的一种检验，以及宝贵材料的提供。也就是说，在通过表面上的对抗关系确保组织公正性的

^① 《上原宛寺内書翰》（大正2年10月11日），《上原勇作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第325页。

同时，也构筑了实际上的妥协关系，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合理地达到军扩和权限强化的认识正在形成。

这种认识在此后正式建立政军关系的构筑过程中，特别当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形态的总体战化的事态时，就以更加明白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确，战争形态的改变最终成为了日本政军关系的决定性要素，而各种各样的事实表明，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调整和统合政军关系的那些活动了。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政军关系的变化

一 前言

1914年（大正3年）7月28日开始的、历经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往的战争相比，无论是战争形态还是武器装备，都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国家总体战争的样式。从兵力动员人数及战斗所消耗的武器弹药、战车、飞机、潜水艇等近代兵器上，第一次看出全面动员经济和工业对战争的作用。

与此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的总参谋长汉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在总结德国战败原因时说：“大战之长期消耗战的结果，最终取决于联合国一方众多人员和丰富物资的压倒优势。”^① 他预测未来的战争将会是更为彻底的总体战。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总体战，而且将来的战争也会是更为彻底化的总体战，这样的预测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的共同认识。

日本以遵守日英同盟为由，作为联合国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派出小规模驱逐舰舰队在地中海与德国海军交战。日本陆

^① Hans von Seeckt, *Gedanken Eine Soldatenund Zukunft des Rriches*, 篠田秀雄译《一軍人の思想》，岩波新書，1940，第83页。

海军的战略目标是击破德国的东洋舰队及攻占其作为根据地的中国青岛、威海卫。与此同时，日本陆海军从大战进行之中抽调那些积极参战的武官派往欧洲战场，努力进行总体战的实况调查，把握各参战国的战争指挥状况及战时动员现状。所以，日本陆海军派遣武官了解到的总体战实况在日本国内得以详细传达，所搜集的情报汇集成为大量的刊物颁发给有关方面。^①

对总体战带来的冲击作出反应的不只是陆海军人。1917年10月15日，山县有朋在写给当时山口县知事林市藏的信中表露了他对如何取得今后战争胜利的看法：“举国民，尽国力。依靠所谓上下一统，举国一致之力。”^②他还谈到不能坐等战争结束，世界大趋势已经进入总体战阶段，因此制定相应的对策已经是当务之急。不仅像山县有朋这样军界领导和在官界也保持隐然势力的实力派有着如此见解，而且在政党界人士中表明同样的认识者亦不在少数。其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国民党总裁犬养毅。犬养在1918年（大正7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大会上，号召“全国男子皆当兵，全国工业皆成为军器军需之工场”。^③他主张，对于彻底的全民皆兵主义和必需的工业动员，是应该从经济合理性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基调予以促进的。

这种国家总体战体制的构筑过程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极大地决定了日本政治领导与国家目标形态，确是事实。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大正民主主义时期，国民的参政意

① 額瀨厚：《総力戦体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国家総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第11～25页。陆军于1915年12月27日在陆军省内成立了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并编写发放了研究报告书。

② 德富蘇峰編《侯爵山県有朋伝》下卷，原書房，1969，第288页。

③ 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伝》中卷，原書房，1968，第406页。相关研究还有角田順校订《宇垣一成日記》（1），みすず書房，1968，第327页。宇垣一成：“未来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交战、军队的操纵，而是包含了整个国家能量的大撞击，能否挖掘并运用全部的能量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鶴見祐輔：《後藤新平伝 第九卷》，国民指導者時代，太平洋協會出版部，1944，第162页。后藤新平认为应站在国家长期发展的角度上讨论原料、动力（石炭、石油、水力）、粮食、生活用品的分配问题及人口、危险思想、国家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

识及参政机会都在不断增加，这就给军事领导层自上而下、整体划一地进行适应国家总体战之国家机构的再编带来了困难。正如两个师团增设问题所表现出的那样，在大正民主主义时代背景下，政党势力不断强大，完全按军事官僚构想的那样，顺利地实现国家总体战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在国家总体战体制构筑过程中，中坚军事官僚的总体战构想，是运用怎样的逻辑和行动来实现的这一历史，弄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军关系的特质。具体地说，就是以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由田中义一为首的中坚军事官僚通过接近政党的形式，实现其新型政军关系为研究背景，对构筑国家总体战体制这一国家目标始末进行实证性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总体战体制的构筑，虽然尚未作为重要政治目标，成为政治、军事领导层的共同课题，但是陆海军中坚军事官僚，已经在大战中就开始筹划如何对待时局的转变及战争形态向国家总体战的改观了。大正民主主义中，在本质上以反对民主主义为组织原理的军事组织，在实现构筑总体战体制之军事、政治目标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一种意识正在高涨，它认为如果积极肯定军事组织存在理由的话，就应该把建立顺应时代之政治形态作为当务之急。这种新的政治形态就是军队与政党的合作，大战后的政军关系就是在如此顺应战争形态变化而变化的新形势下形成的。^①

下面，先追溯一下以国家总体战为表现形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的冲击及日本的对应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面对近期

① 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构建总体战体制过程中，政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参见木坂順一郎《軍部とデモクラシー》（《國際政治》第38号，1964年4月）；由井正臣：《総力戦準備と国民統合》（《史観》第86、87册，1973年3月）；山口利昭：《国家総動員研究序説》（《国家学会雑誌》第92卷第3、4号，1979年4月）；藤村道生：《国家総力戦体制とクーデター計画》（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1930年代論として》，創世記，1981）；雨宮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黒沢文貴：《大戦期間の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等。

为适合总体战体制，政府领导层在进行国家机构再编过程中，对于作为大框架的共同课题的构筑总体战体制问题，其内部的动向。由此，又针对时代课题产生的军部与政党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观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也就是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党政治的展开与日本陆海军的作用，从其引起当时的政军关系的改观意义上进行了剖析。总之，本章所强调的是，构筑总体战体制是在自身成为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突现出其政军关系和总体战体制对应型的构造及性质。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与应对

1. 政治、军事领导者对国家总体战的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国家所具有的各种能力。所谓总体战战争引起了统治阶层诸势力军事中坚层的强烈关心。他们估计，将来的战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表现出的总体战更为彻底。因此，为了适应将来的总体战，他们开始着手以国内政治体制的再探讨及构筑适应总体战阶段的新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总体战体制研究。

陆海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动员在欧洲的驻在武官和观战武官，对大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成果通过《海军差遣者报告》、《欧洲战争纪实》、《偕行社记事》等刊物提供给有关部门。此外，1915年（大正4年）12月，陆军设立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①同年10月临时海军军事调查委员会^②

① 关于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详细情况，参见黒沢文貴《臨時軍事調査委員会について》（《紀尾井史学》第二号，1982年12月）、額額厚《臨時軍事調査委員会の業務内容》（《政治経済史学》第147号，1980年11月）等研究。

② 关于临时海军军事调查委员会，参见芥藤聖二《海軍における第一次大戦とその波動》（《歴史学研究》第530号，1984年7月）、黒沢文貴《臨時軍事調査委員会と田中軍政》（櫻井良樹等編《国際環境のなかの近代日本》，芙蓉書房出版，2001）等研究。

设立。

这些正式的大战研究机关，早在大战期间就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结果，不仅使陆军、海军内部备战总体战趋势高涨，而且也使财政界痛感有关心和研究总体战准备政策的必要性。^① 1915年以来，关于总体战准备的言论，更加活跃而成为一般杂志和出版界的主要话题，大量的评论和单行本相继发行。^② 包括陆军、海军调查机关撰写的研究报告在内，其言论特征不外：适合总体战阶段的军事装备的编制，促进其近代化，且能够承担庞大军需品制造的军需工业动员体制的确立；以及面临总体战进行国民精神和思想动员的必要性等等。在大战期间历任陆军要职的田中义一，也活跃地通过演讲活动宣传总体战准备政策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的总体战准备政策，并要求设置总体战准备机关。

例如，早在1915年12月3日举行的退伍军人会上，时任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就在演说中谈到国家总体战的概念时说：“今后的战争已不是只需要军队和军舰的战争，必须是倾注国民全部的力量才能最终决定成败的国家总体战。”^③ 田中义一在他任陆相时期，也积极参与退伍军人会及青年团组织的演讲活动，并且通过出版界广泛地唤起一般国民的总体战意识的提高。其中，他谈道：“欧洲的

① 参见额颯厚《総力戦体制研究》。书中对国民党总裁犬养毅的产业立国论，寺内内阁的内务大臣后藤新平的大调查机关案，寺内首相的经济顾问西原龟三《戦時經濟動員私議》（1917年3月）等问题做出详细论述。

② 主要专著有：三宅寛太郎：《欧州戦争日録評論》（報効学社，1915～1916）；楠瀬幸彦：《国民皆兵主義》（黒潮社1916）；大日本文明協会編《欧州大戦の経験》（大日本文明協会，1916）；二宮重治：《欧州戦と列強の青年》（川流堂小林又七，1916）；山田毅一：《軍政と国民教育》（放天義塾，1917）；山口圭藏：《欧州大戦と日本の将来》（宝文館，1917）；佐藤綱次郎：《国民的戦争と国家総動員》（二酉社，1918）；大庭久吉：《国防争議評論》（二酉社，1919）；仏教連合会編《時局講演集 第一回，第三回》（仏教連合会，1918～1920）；横山雄偉：《世界戦争に現れたる日本陸軍首脳者の無能力》（横山出版部，1919）；宇都宮鼎、佐藤綱次郎：《国防上の社会問題》（冬夏社，1920）。

③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編《田中義一伝記》上卷，原書房，1981，第420～422页。

战争是举国之战，战争已经不是军人自己的战争。”^①他强调在总体战阶段，国民和国家团结一致战争形式的重要性。田中义一能如此迅速地形成对总体战的认识，其背景在于，他身居参谋本部的中枢位置，有条件利用大战研究的成果充分地把握大战的实际状态。^②

就总体战思想宣传普及的理由而言，由于田中义一认为以往一贯倡导的“良兵即良民”的思想，在大正民主主义状态下，由于反军事思想的高涨，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此，便有了导入新的总体战概念来强化国防思想教育的意图。田中义一所期待的国防体制是，通过对现役军人及青年团、退伍军人会等组织的日常动员，实现“国民军队化”。但是，在大正民主主义状况下，包括“军队国民化”在内的宣传，都并非是以军队民主化为目的，而是企图将军队和国民结成的一体化作为总体战准备的理由来推进的。

与此相关，田中义一经过多年的努力就任政友会总裁后，发表了题为《政党存在的意义和党员觉悟》的演说，其中谈到自己进入政界的动机时说：“我多次经历战争，又对最后的这场欧洲大战进行思考，痛感日本的军政必须从根本上改变。”^③可见，他认为总体战认识包括了对军政存在方式进行变革的内容。为此他说：

无论如何必须废弃国防只是军人的国防这一观念，国防的范围并不始终是军队及军舰，应该考虑到全体国民的生活已经是国防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改变国防只是军人的责任这一狭隘的认识。在国防是国民的国防这一前提下，应该将所有国防组织予以国民化运行。^④

① 田中陆相讲话：《軍生活と在郷生活》，《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59。

② Leon Dote: *La guerre totale* 《總力戰》，1918，第19~21页。书中将总体战定义为只有在政治上、经济上、工业上、知识上、金融上等各个领域进行动员才能实行的战争形态。

③ 立憲政友会編《政治講座》，日本政治学会，1926，第3页。

④ 立憲政友会編《政治講座》，第4页。

在田中义一看来，国防不能停留在狭义的军政领域，它应该是以全体国民日常动员为前提而构筑的体制。国防不是军人的专管事项，而是全体政治的，或曰需要全体国民完成的任务。就田中义一来说，军事从政治独立出来，并拒绝来自政治的一切干涉这一传统的日本陆军思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① 进而，田中还从更加具体的总体战准备政策的视点出发，解释了自己的“国防组织国民化”观点，他说：

在军事上最为提倡之事应是动员。所谓动员就是指组织一定程度的、适应战时需要的人马，也就是被称为编制之事。但是像过去那样只在狭义范围动员的话，对于将来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所谓动员就是实施总动员。必须实行全方位的总体动员。……如果这样，就不是像过去那样只在小的范围计划，而是一切都处于备战状态，必须从国家全局上考虑。即所谓动员就是国家总动员。^②

总体战准备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国家总动员在平时应该位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地位，并且由此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不止田中义一，从大战结束后到1920年代初，许多论者都持这种观点。其中，田中义一着眼于国家总动员的观点是具有先驱性的，当时他任参谋次长，所以能够动员部下进行关于国家总动员的研究。其中，参谋本部第一课森五六大尉受命撰写的题为《全国动员计划必要之议》的报告中，在制定的总体战体制计划案中，描绘了国家总动员体制的蓝图。^③

① 竹村民郎：《独占と兵器生産——リベラリズムの政治構造》，勁草書房，1971，第109页。这个发言表示田中放弃了以往德国式的军政不分流的国防思想，开始急速向主张军政分流的西园寺—原的路线靠近。

② 立憲政友会編《政治講座》，第9~10页。

③ 《全国動因計画必要ノ議》的主要部分，收录于齋藤厚《総力戦体制研究》，第199~205页。

在《全国动员计划必要之议》的开头，关于“动员”是这样定义的：“在军事上，当然包括国家的一切组织，要从平日状态向战时状态转移这一事业的总称。”^①这与过去单纯的军事用语明显不同。早在1917年（大正6年），田中义一就认识到面临“国家全般组织”的战争的“动员”的必要性。报告书中提出，有关将来构筑总体战之全国动员计划的制订乃时代所需，对于其所要达成的目标，报告书有着这样记载：

开战初期的作战部队总是期望速战速决，以致充分兵力及充实丰富军需品的需要激增。为适应此等需要，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力。尔后，战事进入持久状态，这便是国力与国力的较量。战争成败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平时所蓄积的综合国力的强弱及其机构在战时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运用。实际上致力于举国一致发展积累国力，以便达到组织好国势使之能够适应战时要求，就是所谓全国动员计划的必要之所在。^②

报告书还指出：将来总体战开始时，按照全国动员计划的实施要求，在平时进行军事动员的同时，做好确保“国家全般组织”动员顺利实施的准备是很必要的。从此认识来看，当时的日本并没有从大战中充分地吸取教训。也就是说，在大战期间，德国由于实施了全国动员计划，在诸个战争中接连获胜；相反，英国、法国等国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在挽回劣势上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这一教训，应该值得日本认真地吸取。在以《帝国现状》为题的一节中，还列出大战各参加国的动员计划状况及日本落后状况后，对计划实施时所面临的任務做了如下的说明：

① 額瀨厚：《總力戰体制研究》，第199页。

② 額瀨厚：《總力戰体制研究》，第199~200页。

本来，国防计划和与之相适应的平时诸设施之完备，只有两两相互作用才能在战时发挥极大的能量。所以，此设施如果仅仅依赖军事当局自己计划行事来达到目的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毋宁顺应国防总目的，将其作为国家事业进行统一领导，使军事配备和生产的增进之间达到平衡。而各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的设施，即使是一时有利于促进国民福利的增长，也很难应付战时的特殊需要，最终会妨碍军事活动，导致所谓经济战的失败。这的确是在国务统一的基础上确立国家总方针，在平衡、调和的前提下计划增强国力的理由。^①

这里重要的是，为了确实实现总动员计划，统帅制（军事）与国务（政治）之间的调和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点被揭示的是，越进入彻底的总体战阶段，就越能够形成取消军事和政治的区别，其根就是两者统一性实现最初总动员体制的认识。但是，如何处置总体战计划的具体目标和实施的主体由谁担当等问题，文中没有明显的说明。报告书的最后，就当时必须准备的计划列举了八项计划。

第一，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学校和社会的国民教育必须顺应军事上的要求。

第二，战时资源的调查（人、马、物件等所有项目）。

第三，通信、运输机关的装备及其战时运用计划（所谓铁道船舶动员计划）。

第四，军需品或者同类产业的保护及奖励。

第五，军需品诸工业的扩张计划（所谓工业动员计划）。

第六，军需品及生活必需品的原料调配调查或者战时补给计划。

第七，军用资金的调配及战时金融的调节计划（第六和第七

^① 額綱厚：《総力戦体制研究》，第201页。

是所谓经济动员计划)。

第八，战时，特别是开战初期社会变化的整顿方案。^①

为调和国政而制定的以上诸计划，应通过国务和统帅的统一机关来实现。这时，统一机关的委员长是内阁总理大臣或者根据救命任命的元帅，委员由国务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司令部长等组成。

准备计划列举的各事项，不仅包罗了后来发布的众多国家总动员计划的内容，而且为推进军用汽车补助法（1918年3月25日公布）、军需工业动员法（1918年4月17日公布）等法律创造了时机。^②另外，军需局（1918年5月设置）、陆军省工政课（1918年6月设置）、国势院（1920年5月设置）、资源局（1927年5月设置）等国家总动员为目的的准备机关也相继设置了。临时军事调查委员永田铁山的《关于国家总动员意见》（1920年5月）对兴盛的国家总动员思想进行了集大成的汇总。

这一系列总体战政策的共同点是，通过在实施机关配置大量的军事官僚，于是，确立统帅优先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意图更加明显。^③此时，田中义一通过总体战，痛感到国务和统帅之间调和的必要性，并在实际中极力推进以军队为主导的总体战政策。关于这一点，在以后总体战政策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地显著化。其原点的确已经包含在此报告之中了。

概括田中义一的总体战政策构想，无外乎有两点，其一是通过有效利用退伍军人会及青年会组织促进“军队国民化”或者“国民军队化”。其二是应该从平时就开始，尽早尽快地确立以工业为中心，动员国家所有力量的体制。其中，“军队国民化”或者“国民军队化”的立意，不仅是想向国民灌输适合总体战阶段的国防

① 額纈厚：《総力戦体制研究》，第201～202页。

② 参见原田敬一《近代日本の軍部とブルジョワジー》，《日本史研究》第235号，1982年3月。

③ 木坂順一郎：《軍部とデモクラシー》，《国際政治：平和と戦争の研究2》第38号，1969年4月，第7页。

新概念，而且与期待确立起军队和国民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谓国防新概念，不是过去那种纯军事为对象的国防，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意义上的国防。田中义一在大战结束那年就认识到：“如果国民精神紧张不起来，就无法使国防的要素达到完备状态。”^① 所谓“平时战争论”的本意，也是说“国防”是指与所有领域间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问题，而且“国防”作为无比重要的国家课题必需根植于国民的意识之中。

特别是进入1920年代，在八幡制铁所的工人大罢工（1920年2月5日开始）、日本最初的国际劳动节（同年5月2日）等工人运动高涨时期，田中义一对退伍军人会和青年会的作用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同时，他还瞩目于1922年（大正11年）10月31日成立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对此他这样说：“发生在那个国家的舍己奉公精神、一丝不苟的组织能力以及统治力量，是让人吃惊的，这才是以军人为主力，应该给予认可的团体。也正因为如此，才拯救了赤化较重的意大利，打败了社会党和共产党。”^② 他企图通过用退伍军人会模拟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达到强化国家主义的目的。

1924年（大正13年）1月，田中义一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退伍军人会联合会，他对来自各地的代表说：“镇压社会主义，保障国家秩序及维护安定的国民生活，必须靠各地退伍军人会的努力。”^③ 他认为，退伍军人会的作用是抑制社会主义赤化思想，“退伍军人会应该努力地、集中精力去进行当务之急的思想善导”。^④

① 田中義一：《国民指導の方針》，日蓮宗宗務院編《布教講習會講演録》第四輯，日蓮宗宗務院，1918年，第15～16頁。

② 田中義一：《大処高処より》，兵書出版社，1925，第147頁。

③ 帝国在郷軍人会本部編《皇太子殿下の御結婚奉祝のため上京の連合分会代表同席上に於ける本会々老田中大將口演要旨》，《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④ 帝国在郷軍人会本部編《皇太子殿下の御結婚奉祝のため上京の連合分会代表同席上に於ける本会々老田中大將口演要旨》，《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也就是说，田中义一主张的“国民军队化”或者“军队国民化”实际目的就在于，以退伍军人会和青年会等组织为经常性媒介，向国民灌输“国防”思想，促成支持总体战体制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再生。^①由以上主张可知，田中义一是将对国民思想的、精神的动员，作为确立总体战体制之重要条件予以深刻认识的。^②

实际上，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军部为中心的国民思想、精神上的动员越来越受到关注。临时调查委员会1918年7月发布的《关于交战各国的陆军》^③中的《民心的动员》一项里，在各种动员中列举了“精神动员”，指出这不仅是获得总体战最后胜利不可缺少的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途径，而且也是为了达到统一鼓舞民心的目的。也就是说，不必田中义一发言鼓动，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那些志在构筑总体战体制的军事官僚，^④也认为对“国防”问题应无条件地支持，还有，努力树立适应长期战争之顽强精神的思想团结也是最为必要的。^⑤从这种意义上讲，此时，最值得他们警惕的问题就是出现动摇团结的社会各种矛盾。

因此，这些军事官僚，在1920年代初期，对于不断显著化的

① 参见《战友》第179号，1925年5月。1925年（大正14年）3月，改订在乡军人会规定后，正如“不能一提到在乡军人会的修养，就立刻认为那只是战时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所述，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强化了思想动员的作用。

② 古屋哲夫：《民衆動員政策の形成と展開》，《季刊現代史》第6号，1975年8月，第26页。古屋哲夫：“在日本形成反革命思想战线体制政策的前提是，将报德会、青年会等各团体动员在国体体制之内。”

③ 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编《交戦諸国の陸軍に就いて》，1918年7月，第30页。动员民心，事实上是国家动员的根本。

④ 角田順校订《字垣一成日記》（1），みすず書房，1968，第325页。田中的部下字垣一成在日记中说：“军人本来就是国防的直接责任者，但国防仅靠军人是不够的，还需要国民共同承担国防的责任。所以军人更应教育国民加强国防责任感，同时回报为军人准备了充足武器的国民。”

⑤ 高須武次郎：《一般国民ニ軍事思想ヲ普及セシムヘキ具体的策案》，《偕行社記事》第534号，1919，第35页。全国动员是能够完善国防，使国民公平完成兵役义务，振兴军事思想的政策。

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及要求裁军的呼声，抱有极大的危机感，这就增强了他们对现存政治、经济等社会诸制度改革的关心。^①这些都与后来1930年代的“国家改造运动”有着联动作用。

但是，1920年代的状况反而更增大了有着构筑总体战体制志向的田中义一等军事官僚的危机感。特别是以第二次护宪运动为象征的政党势力的扩张，并没有取得基于政军关系调和的国家团结局面。这对田中义一来说是极大的苦恼和焦躁，不过他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边继续标榜“军队国民化”和“国民军队化”，一边竭尽全力地通过以300万退伍军人为核心来改造国内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这一经历，田中义一虽然一方面企图强化退伍军人会和青年会组织，但同时也开始感到自己作为军人身份力量的不足。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田中义一进入政界的历史背景中，有着对大战教训的吸取所产生的总体战认识，及其对应过程上的重要原因。

2. 政军合作的摸索与实施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划时代兵器群，从根本上转变了过去的兵器体系。而且，这种向新型兵器体系转变的事实，又极大地冲击着当时的日本陆海军，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了现在的日本距离总体战的兵器水准相差甚远。由此，为了使新型兵器体制导入并在日本进行生产，以田中义一为首的一部分军事官僚认识到，建立充实与以往完全不同理念的军需工业、确立相应的动员体制已经成为紧迫的任务。

例如，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在写成的《关于欧洲交战各国的陆军》中，详细地介绍了参战各国的工业动员状况。第二版（1917年6月发行）在论述关于“工业动员”的必要性时，还强调指出国内军需工业动员是否完备是战争成败的关键。^②在改名为

① 相关研究，参见吉田裕《第一次大戦と軍部》（《歴史学研究》第460号，1978年9月），戸部良一《第一次対戦と日本における総力戦論の受容》（《新防衛論集》第7卷第4号，1980年3月）。

② 額顯厚：《総力戦体制研究》，第36页。

《关于交战各国的陆军》的第四版（1918年12月发行）中，提出将来的总体战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巨大的军需品。在进一步强调“工业动员”重要性的同时，提出“工业动员”应由行政机构中央机关统一运营，通过推进官民联合加深军产协作。对外提出了应确保原料资源的运输及实行供给体制组织化。^①

此时，为了实现军需工业的广泛普及和政策化，森五六、铃村吉一、宇垣一成、近藤兵三郎、吉田丰彦、筑紫熊七等中坚军事官僚，通过内部杂志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讨论。^② 田中义一认为，国家总动员的思想在各领域、各层次的均匀分布，以及召集者们在对总体战认识上的一致，正是国家总体战体制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

此时，与精神、思想动员受到同样重视的是工业和经济动员。田中义一曾论述：“战时的国防又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竞争。在平时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在战时的国防中也不可能赢。”^③ 他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目标在于，创建从属于国防的经济动员体制和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构造。但是，田中义一对自己期待的工业、经济动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内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以他信赖的中坚军事官僚们制成的资料为线索，就其要点作一整理。

首先对小矶国昭的资料进行分析。田中义一在任参谋次长期间，重用参谋本部第二部第五课兵要地志班长小矶国昭（后来出任首相），并派遣小矶国昭去中国调查资源。作为调查结果，小矶国昭在《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经营资料》及《帝国国防资源》（小矶少佐方案，1917年6月作成）中建议，军需工业动员不可缺少的工业原料供应地应该着眼于中国资源，并且，就实际状态及获取手段作出分析和建议。

① 額額厚：《総力戦体制研究》，第38页。

② 臨時軍事調査委員会編《工業動員要綱》，《臨時軍事調査委員 第二年報》，1918年1月。书中发表了军需工业动员方面的集大成的论文。

③ 田中義一：《国家總動員の要素と青年訓練の意義》，辻村楠造監修，《国家總動員の意義》，青山書院，1926，第261页。

小矶国昭在此报告书中指出：在总体战阶段，经济战的优劣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此时，必须把战时自给经济的运用作为首要条件。而且，关于确保作为物理性基础的资源，他认为“将来，由中国承担的供给会越来越多”，^① 这表现出他对中国资源的重视。很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强硬的背景下，热衷于总体战体制构造的军事官僚们已经视中国为日本的资源供给地了。为了发展适合总体战阶段要求的巨大军需工业发展和经济动员的平时准备，无疑需要与之相应的庞大资源。这就是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经济、军事侵略的真正原因。^②

其次对铃木吉一的资料进行分析。随着军需工业必要论的展开，军需工业动员法（法律第38号）立案也趋于具体化。关于此法的基本目标，我们可以从陆军炮兵少佐铃木吉一的论文《工业动员》中了解到。文章中说：

工业动员的第一要旨是，在民间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法规。即仅仅是产品订货、管理，以及征发、下达生产命令的问题。总之，其宗旨在于根据战争的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为战争提供优良品。^③

总而言之，军需工业动员法的意图在于，从根本上扩大总体战阶段所需军需品大量生产的生产部门，普及高度近代化兵器生产的工业技术。根据大战的教训，在军需品生产中，又特别以向新型兵器化转变作为紧急任务，进而，由异常增多的弹药消耗所反映的战

① 参謀本部編《帝国国防資源》，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蔵，1917年6月，第11页。

② 鈴木隆史：《總力戦体制と植民地支配》，《日本史研究》第111号，1970年4月，第91页。鈴木隆史：“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大陆进行殖民地统治，是日本不断准备总体战的一个基本要素。”

③ 《偕行社記事》第524号附录，1918，第18页。

争持续能力的增强，也显示出，军需品生产仅仅依靠陆海军的工厂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因此，军需品的生产依赖于民间企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接下来再对吉田丰彦的资料进行分析。与铃木吉一共同起草军需工业动员法的重要人物吉田丰彦指出“在如何确保军事工业和民间工业联系的问题上，特别要重视国防与产业的调和点。换句话说，能否发现军事工业与民间工业的相关点，以及如何顺应军事的需要等，官与民共同的全力以赴”^① 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他强调此法制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武器、弹药生产的民间依托。

在今天看来，军产联合必要论的提出，是热衷于总体战体制构成的田中义一等军事官僚从大战的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其具体内容是：提高以往民间的军事技术水平，加大武器生产的民间依托以及根据官民合作扩大技术交流等等。虽然，这其中也有被忽视的地方，但是已经开始向有计划的方向转换。以田中义一为中心的军事官僚，在军需工业动员法颁布后，开始积极从事促进军产联合及由此导致的军备近代化和军事编制的合理化。概观那时田中义一最关心的航空兵力的建立和培育，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充实军备构想的经过。

首先，田中义一在任参谋次长期间就着手修订《国防方针》，1917年（大正6年）6月，又制定了作为所需兵力，即平时20个师团，战时20个师团，合计40个师团的新国防方针。与过去相比，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分别减少了一个师团，而足以取代此裁军的，是集中精力提高军备的近代化及耐战能力。因此，表面上看是以削减师团为内容，实际上是扩大军备计划的重要一环。但是，

① 吉田豊彦：《軍事上ノ見地ヨリ器械工業ニ対スル希望ニ就イテ》，《各種調査委員会文書講演綴》第36卷，国立公文書館藏，第5页。吉田豊彦：《軍需工業動員ニ関スル常識の説明》，偕行社，1927年。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陆军中将筑紫熊七等都为该书作序。宇垣一成在序文的一开始写道：“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欧美各国列强争相不遗余力地研究国家总动员，制定各种方针政策，从增加资源到具体用途管制等细节，毫无遗漏之处。”

在大战期间，由于俄国大革命的爆发，作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假想敌的沙皇俄国消失了，这就使扩军计划失去了有利的依据。因此，为了适应大战时期出现的总体战的要求，导入军事近代化、三单位编制、军团制等一系列的军制改革就被作为扩军的理由提了出来。

其次，田中义一在任原内阁陆军大臣期间，为了实现标准兵力 25 个军团的编制目标，曾极力主张实现以投入 20 亿日元的 25 年计划为内容的陆军扩充案。但是，遭到了如下舆论的强烈反对：“俄国军国主义崩溃之后，我国在此时扩充陆军就一般道理上是有必要予以正面反对的。从增师问题开始不过几年，又在大扩军方案中加进军团编制等内容，这就逼着政党内阁对此迎头反对。”^① 田中的陆军扩充案从此开始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

在那些自由言论的共同反省中，有不少人认为，田中义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作为军备扩充案的依据，没有说服力。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状况在客观上促使了要求军备缩小的舆论高涨，与此相反，军备扩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没有得到合理解释。^② 面对舆论压力，加之当时的藏相高桥是清以财政困难为理由反对陆军军备扩充案，又加上原首相从中说和，田中义一无奈暂时取消了军备扩充案。关于田中义一取消扩充案的理由，《田中义一传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吸取欧洲战乱的教训，将来的军备改革是必将要进行的。因此，此时固执地按旧套追求军备扩充并非上策。不如在此时充实既存部队的自动火器、大炮等，进一步完善已经编制的电信队、飞行队等装备，加紧对顺应新时代军备的调查研究。俟上述行为成熟时，再正式实施军备扩充才是明智的。^③

① 无名氏：《軍団仮面の陸軍大拡張案を難す》，《中央公論》1918年11月号，第28页。

② 参见吉野作造《陸軍拡張に反対す》，《中央公論》1918年11月号，第48~51页。

③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編《田中義一伝記》下巻，第183页。

最后，田中义一在新国防方针及陆军军备扩充案的构想中，由于关注大战中大量兵力的连续而集中的动员，最终导致被批判为只关心常备兵力肥大化之后，又一次确认了平时军备近代化及加速提高军需工业生产能力的必要性。他明确指出，军需工业的发展是同民间企业的活性化分不开的，军产合作的强化才是最终实现军备扩充的合理途径。

田中义一积极参与陆军航空兵力的创立和培育是军产联合的典型事例。田中义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水艇、坦克及战斗机的出现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其中尤感航空兵力的成立太迟了。为此，他就任陆相的同时就把井上几太郎（后来的航空部本部长）招到陆军省，命令他推进航空兵力充实计划。

后来，井上几太郎被田中义一任命为临时航空技术训练委员会委员长，开始着手航空兵的培训。田中义一全力以赴支持井上几太郎，并且从出兵西伯利亚的临时军事经费中挤出钱来解决委员会的必要开支。^① 在田中义一任陆相的1919年（大正8年），新设了陆军省航空课及航空学校（设置于日本埼玉县的所泽），从法国招聘航空将校，增加了航空中队。1920年（大正9年）又增设了两个航空大队，新设立了航空局，设置了陆军航空制度委员会，同时奖励民间航空事业，设置航空学校分校等，两年之间陆军航空行政的原型已初具规模。^②

在田中义一的授意下，井上几太郎在企划充实航空兵力时，希望“脱离‘兵器行政’这一陆军一贯的传统，信赖民间工业”。^③ 由此，航空飞机制造全面依存民间工业的局面得以形成。就飞机制造行业来说，兵工厂的生产业绩虽然出现过不良情况，但陆军在那时已经把航空飞机的制造完全委托给了中岛、三菱、川崎及石川岛等民间企业。

① 井上幾太郎伝記刊行会編《井上幾太郎伝》，1966，第236页。此外在田中义一传记刊行会編《田中義一伝記》下卷（第210～216页）中也有田中很关心扩充空军实力的记载。

②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編《田中義一伝記》下卷，第187～188页。

③ 陸軍航空本部編《小笠原中将想ひ出の記》，陸軍航空本部，1939，第63页。

其中，尤数海军出身的中岛知久平与田中、井上的关系甚为密切。后来，在陆军航空飞机的生产中，中岛作为主力生产者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①在以飞机制造为象征的军产联合动向中，军事技术向民间工业的转移，民间工业的活性化等经济优势日益显著。但此时，田中义一等人倡导的航空兵力充实论，在陆军内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虽然，在军需工业动员体制确立这一点上是有一定共识的，但在围绕着军备充实所形成的对立却越发明显。

这种对立包含了总体战阶段时期围绕着军备状态、武器体系展开的基本对立，即所谓“根本改革派”与“现状维持派”的两派对立。^②“根本改革派”以田中义一为中心积极主张促进军事近代化，“现状维持派”的代表人物是上原勇作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等人认为，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无法适应极大的兵器近代化，即使持有近代兵器体系，要维持它也是困难重重。上原勇作等人还批判了田中义一等人推进的削减常备军和以充实航空兵力为象征的军备急速近代化、机械化措施。^③

这样，围绕田中、井上进行的航空兵力充实计划，两派之间的对立不断深化。特别是1921年（大正10年）6月围绕着空军独立问题的两派冲突，与陆军内部主导权的争夺相互重叠，成为了后来的总体战准备政策推进过程的一项内容。在空军独立问题上，虽然

① 竹村民郎：《独占と兵器生産》，第109页。中岛之所以从海军退休，是因为中岛知久平预见到空军的未来，而试图与井上、田中等陆军航空实力派联合。

② 《大阪朝日新聞》，1922年1月15日。介绍了两派围绕“步兵操典”（1923年改订）改订的斗争。

③ 《上原元帥宛田中書簡》（大正13年7月29日），《上原勇作關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社，1976，第269页。“维持现状派”的田中重认为，从日本的国力来看，不可能坚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长期作战，所以应该从平时就拥有大量的常备军，开战时将所有军队一齐投入进去，实现短期决战型的军备状态。与此相对，陆军中将橋本勝太郎《經濟的軍備の改革》，隆文館，1921年，第171页。橋本勝太郎“现代战争，特别是大战，科学应用的优劣巧拙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败，且已经得到极大的证明”，对现状维持派的大量拥有常备军的政策进行了批判。另外，关于两派对立的内容，纈纈厚《總力戦体制研究》第四章《軍部批判の展開と陸軍改造計画》（第73~100页）中也有介绍。

没有像英国那样设立空军省，但是主导权基本上掌握在陆军的田中、宇垣一派手中。

进而，在清浦内阁期间的陆相候选人问题上，上原勇作极力推荐的福田雅太郎在竞选中败北，由田中义一推荐的宇垣一成就任陆相。这样，田中、宇垣派的优势地位就被确定了下来。这一系列的对立和抗争，可以视为“长州阀”和“萨摩阀”的派系斗争。从历史背景分析，这是围绕着以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大战后的总体战阶段所展开的对立。

此时，以陆军省为中心的各部门，几乎都已经被军制改革派的中坚军事官僚占据。然而，受国际军缩的影响，国内的军缩舆论高涨，实现更高水平的军备扩充显然很困难。当时，作为总体战准备政策的一环，如果打算充实军备的话，也只能是断然削减已经肥大化的备师团数和兵员，利用削减节省出经费，转用于实施军备的近代化了。

山梨军缩^①分两次断然实行了相当于5个师团人员的清理，继其之后的宇垣军缩（1924年7月）在陆军制度调查委员会领导下，“陆军决意以自身的经费实现自给自足，果敢实施减少战略单位（师团）……为改善编制投入最大的经费，以确保增添飞机和其他新兵器装备，达到充实国军内容的实效”，^②以此作为自身的目的。在1924年（大正13年）8月13日、16日、26日召开的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围绕陆军制度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上原派的尾野实信、福田雄太郎、町田经宇等人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是，最终他们的反对遭到无视，4个师团被迫废除，大约4万名兵员被断然裁减。军缩的实际，正如陆军当初计划的那样，把裁军节省下来的军费全都用在了强化航空战斗力等军事近代化上。这就是实质上

① 参见藤原彰《军缩会議と日本陸軍》，《歴史評論》第36号，1978年4月，第20页。

② 《陸軍制度調査委員第一次報告》（大正13年7月31日），陸軍省編《密大日記》1924，五册之一，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藏。

以军备体制转换为目的，形成了真正的军备扩充政策。^①

就此意义而言，宇垣军缩既是对伴随着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潮而产生的要求军缩舆论的回应；又是对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对军事问题不断介入的限制；也是一次证明并显示军部独立性的高度政治判断。同时，也成为田中义一等人依据大战教训把大力推进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具体为国策层次进行讨论的机会。

也就是说，以宇垣军缩为契机，一方面平息了国内围绕着军缩而展开的政治和舆论的争议，另一方面围绕设置国家总动员机关的行动也活跃了起来。第50~51届议会上关于国防讨论的结果，确立了“国防基础在于国家总动员”^②的基本认识，并具体化为国家总动员机关设置准备委员会（1926年4月）的新设。陆军通过任命军务局长畑英太郎为委员，军事课员永田铁山为干事，使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新设了陆军省内部由统制课和动员课组成整備局（同年10月，整備局长松木直亮，统制课长西村迪雄，动员课长永田铁山），陆军也独立开始了国家总动员机关业务内容事项的研究准备。

经过国家总动员机关设置准备委员长达一年的审议，1927年（昭和2年）4月20日作为田中内阁的基础，设立了作为总动员资源统制运用的筹备机构的资源局。处于内阁总理大臣管理下的资源局的设置，意味着田中义一等陆军军制改革派中坚军事官僚所

① 角田順校订《宇垣一成日記》（1），第464页。宇垣对于军缩的意义，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述：“顾及国民的呼声、愿望之军部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举改变多年来国民的不信任情感，开两者融为一体之端绪。这也是这次改革的原因之一。即舆论先行地宣传改善国防力量，唤醒国民关于缩小军备、与地方休戚与共的自觉，以及开辟军民一致的举国融合国防的这三点，乃迄今鲜为人知且藏于吾胸中的潜在理由。”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古屋哲夫《民衆動員政策の形成と展開》，《季刊現代史》第6号，1975年8月，第33页。古屋哲夫：“宇垣军缩的目的是，以削减师团为代价，在一般社会中扩大军的势力，使总动员对策上升为国策。”古屋哲夫认为，宇垣军缩正是田中、宇垣一派将国家总动员政策当做国策的契机。

② 《国防ノ基礎確立ニ関スル建議案》，大日本帝國議會誌刊行會編《大日本帝國議會誌》第15号，1930，第860页。

主张的国家总动员的构想终于作为制度被确定了下来。^①

就这样，作为大战教训的总体战政策的立意及其具体化策略的国家总动员构想，在田中义一手中终于得以国策化。同时，日本陆军也达到了巩固自身存在与谋求政治地位的目的。可以说，资源局的设置不仅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部主张的国家总动员思想得以作为国家政策目标被提出，而且被制度化了。这样，军队就获得了合法参政的制度的、客观的条件。

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凡有助于增强国力的人力和物力、有形无形的一切事物。”^②这也是对田中义一所提倡的国家总动员思想直截了当的概括。可以说，大战后，以田中义一为中心而推进的国家总动员政策的具体化，尽管进展曲折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资源局设置前后，国家总动员政策的实际进行过程及其内容。当时，财界、官界、政界同其他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其中，政党势力如何应对军部所主张的国家总动员政策的问题应该是最大的课题。为此，田中义一积极地靠近政界，他通过就任政友会总裁，将其活动领域从军事扩大到了政治。因此，在下一节我们对田中义一进入政界的背景及其动机进行分析，厘定所谓政军接近的政治过程。

三 对构筑国家总体战体制的展望

1. 政党内阁的成立与政军关系的调整

田中义一在出任原敬内阁陆相时期，从首相原敬到政友会党员，从财界到官界结识了许多知己，利用这一人际关系，他窥视着进入

① 参见額瀨厚《総力戦体制研究》，第三章《国家総動員の法整備とその実施機関》。相关研究还有山口利昭《国家総動員研究序説——第一次世界大戦から資源局設置まで》，《国家学会雑誌》第29卷第3、4号合并号，1979年4月。

② 资源局：《資源の統制運用準備施設に就いて》，陸軍省編《甲輯第四類 永存書類》，192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図書館蔵。资源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具体表现。

政界的时机。另一方面，原敬内阁以后，日本国内的政治一直动荡不安，围绕着政界再编问题开始进入混乱时期。总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原敬内阁时期，以大战景气的经济急速增长为背景，政治及经济两方面的政策也得到了积极的开展。然而，原敬暗杀事件（1921年11月4日）前后，这一政策的极限及失误也陆续暴露了出来。

也就是说，严重的财政膨胀和物价高涨迫使国内经济政策不得不修正，加之象征国际军缩的华盛顿海军军缩会议（1921年11月）的召开，促使了国内军缩舆论的形成，再加上要求实施普通选举的国内民主化动向、社会主义运动、劳动争议的激烈等重要课题先后出现，使统治者各阶层之间出现了共同的危机意识。这一危机意识由于原敬暗杀事件的表现更为扩大。原内阁以后的政治状况，一直持续在统治阶层的克服危机，亦即政界再编的动摇之中。^①

原政友会内阁是日本政党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它实际是在协调非选出势力与选出势力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建立的。所谓非选出势力是指由田中义一率领的陆军，受山县有朋影响较大的官僚势力，枢密院，贵族院最大派系的研究会等；选出势力是指占众议院绝大多数席位的政友会。确实，原内阁的阁僚除了海军大臣以外，几乎都被政友会党员占据，就此来说，它是政党内阁。但是，从执掌内阁的主流来看，它并没有脱离中间内阁的特性。也就是说政党内阁的真正含意是排除非选出势力的一切干涉，以选出势力为主体的内阁。

作为原敬内阁的两大支持者的非选出势力和选出势力的领导者是山县有朋和原敬。但是，一方面，在原敬被暗杀后，山县有朋病

① 参见乌海靖《原内閣崩壊後における「挙国一致内閣」路線の展開と挫折》（东京大学教养部《人文科学纪要》第45号，1972年3月），伊藤之雄《護憲三派内閣の形成と展開》（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6 政党内閣の成立と崩壊》，山川出版，1984年10月），伊藤之雄《護憲三派への政治過程》（《日本史研究》第259号，1984年3月），松尾尊允《政党政治の発展》（《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9 現代2》岩波書店，1963年）等。

逝（1922年2月1日），这样两大势力之间的稳定关系开始崩溃；另一方面在政友会内阁时代，反政友、反山县派系官僚势力和在野党宪政会，怀揣各自的想法，提出取代政友会、重建新政界的构想。这就是非选出势力的“举国一致内阁”路线与选出势力的“政党内阁”路线的对抗。^①

所谓“举国一致内阁”路线，是反山县系官僚势力的后藤新平，与长州阀对抗的萨摩阀以及政友会时期少数在野党的革新俱乐部的联合，他们在“举国一致”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瞄准了建立政权的目标。政友会一直维持着占众议院绝对多数的势力，原敬和山县有朋死后，他们对政权的维持能力开始减弱。但是由于参与到“举国一致内阁”路线中，显然更进一步加速政友会支持基础的崩溃，因此纷纷与其划清界限。

继原敬内阁之后，由于高桥是清内阁的总辞职，1922年（大正11年）6月12日，以萨摩派官僚和贵族院（研究会、交友俱乐部）为基础的海军出身的加藤友三郎组阁成功。1923年9月2日，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此时，失去政权的政友会，虽然对山本内阁进行阁外援助，却离政权的宝座越来越远。1924年（大正13年）1月7日，作为“举国一致内阁”路线的延长，清浦奎吾内阁成立，并表明了抨击政党政治的基本态度。政友会为了恢复政党政治，以“宪政常道”为理论基础，开始朝着以“政党内阁”路线为基本形式的方向转换。

也就是说，政友会在同传统的政权形式构想“情意相投”路线、“举国一致”路线的决裂过程中，放弃了同非选出势力的协调和联合关系，旨在实现选出势力独自为主体的真正执行“政党内阁”路线的政权形式。为此，政友会采取了和夙敌宪政会联合的做法，以确立政党政治为目标，开始了第二次护宪运动。于是，他们宣称要打

^① 鳥海靖：《原内閣崩壊後における「举国一致内閣」路線の展開と挫折》，第67～68页。

倒抨击政党政治的清浦内阁，不断努力扩大护宪运动的影响。

原敬死后，支持高桥总裁的政友会的实力人物横田千之助，在回应要求建立普通选举制度、健全财政等民众舆论时，开始认识到扩大政党基础在于民众，认为非此则无法确立将来的政党政治。出于这一方向他决心要刷新政党。^①随后，以横田千之助为中心的政友会总裁派，排除了党内强烈的反对，结成与宪政会、革新俱乐部三者之间的护宪三派联合，从而强化了政党势力联合。但是，政友会内部，以床次竹二郎为首的反总裁派（149名），由于对此极力反对而脱党结成了政友本党，其结果导致了政友会的议席锐减至129席。政友会仅在清浦内阁1924年5月10日实施的总选举中就失去了24个议席，加上宪政会的48个议席，共计151议席，与政党势力的扩大形成了鲜明对照。

同年6月7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但是，内阁主要官僚都被宪政会所占据，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依靠向宪政会妥协来维持自身党势已是竭尽全力。横田千之助等政友会干部为了挽回党势，主张施行普通选举制，果断改革贵族院等，以求得到舆论的支持。但是，由于在这些主张上与同宪政会产生竞争而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就在党内充满焦虑感的时候，主张刷新政党的领导横田千之助病逝（1925年2月），接着，高桥总裁也在主持党的建设中深感力不从心决意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政友会的干部们开始了选任接替横田、高桥之后任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政友会在选择发展横田千之助的“政党内阁”路线，选择恢复原敬内阁的与非选出势力联合执行“情意相投”路线，还是选择“举国一致”路线之间犹豫不决。^②就在

① 关于该时期横田的思想和行动，参见荒木武行《横田千之助論》（大観社，1925），高田一夫《政治家の決断》（青友社，1969，250页以下）等。

② 关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的政治过程，参见伊藤之雄《護憲三派内閣の形成と展開》，松尾尊尧《政党政治の發展》，土川信男《護憲三派内閣期の政治過程》（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6 政党内閣の成立と崩壊》）等研究。

政友会选择将来发展方向的过渡时期，田中义一作为高桥是清后任的有力候选人最终得到了提名。

在政友会内部，关于拥立田中义一的内幕说法不一，对田中义一的期待也是各种各样。作为前总裁，高桥是清在后继总裁的选任上有着绝对的发言权。最初，他把党内最大的实力派横田千之助毫无疑问地视为自己的后任。^①但是，横田千之助死后，他就打消了从党内选择后任的念头，决定从党外招聘。

关于拥立田中义一的诸多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横田千之助生前就同田中义一身边的西原龟三、森恪等人有过接触，他死后由政友会干部小泉策太郎为中心继续实现对田中义一的拥戴。^②另一种说法是久原房之助（久原矿业株式会社创始人）委托长州出生的军人三浦梧楼拥立田中义一，由三浦梧楼向横田千之助和小泉策太郎进言拥立田中义一。^③此时拥立田中义一并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要明确为何要拥立田中义一。在了解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清理一下政友会及政友会的相关人士对田中义一的评价。

政友会第二代总裁山县有朋死后，作为准元老在政界颇有发言权的西园寺公望就总裁后继问题在同松本刚吉面谈时说：“目前，党内首领如有优秀者则罢，但是，就现有人选看，选出中间内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④据西园寺公望的判断，从政友会内部选出党首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他了解到拥立田中义一的动向时指出：“如果听到说将来田中要当总理时感到不安的话，那是因为

① 石上良平：《政党史論原敬没後》，中央公論社，1960，第247页。另外，从原敬内阁开始，到犬养毅内阁结束，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权利状况的变化这个角度观察政党史的研究有成澤光《原内閣と第一次世界大戦（1、2）》（法政大学《法学志林》第66卷第2号、第3号，1996年2月）。

② 山浦貫一：《森恪》，高山書院，1943，第491页。

③ 相关研究，除石上良平《政党史論原敬没後》（中央公論社，1960）外，还有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第5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79）等。

④ 岡義武、林茂校订《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政治 松本剛吉政治日記》，岩波書店，1959，第377页。

田中将会与谁结成组合，如与后藤，或者西原、藤田、久原形成组合为好的问题上，有着种种负面评价，所以必须予以注意。”^①

西园寺公望意识到在政友会党内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指导者，党外招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意识到政友会在替代以贵族院为主体的清浦内阁中要想夺回政权，建立“中间内阁”性质的政权形式是符合现实之举。虽然无法具体判断西园寺公望所言的“中间内阁”为何种形式，但是可以说它是处于“超然内阁”的清浦内阁与“政党内阁”的原敬内阁之间的内阁形式。可以认为它更近似于加藤友三郎内阁。就此意义上讲，西园寺公望对田中义一身边的原、藤田主计、后藤等人，及以前的寺内“超然内阁”的重要人物的动向非常警惕并抱有担忧。

实际上，在田中义一就任总裁、组建政友会内阁期间，上述人物及小泉策太郎、山下龟三郎（后来的山下汽船社长）、福原俊丸（研究会常务）等人，作为田中义一的智囊，非常活跃。这些智囊，对内提出“产业立国论”的口号，试图通过扩充财政和地方利益的预算规模，达到扩大地盘的目的；对外通过修正欧美协调路线，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政策。特别在外交方面，坚持欧美协调路线的西园寺公望，在此路线选择问题上对拥立田中义一也不得不抱有戒备心。^②

田中义一被招聘为政友会总裁时，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是他的现役军人身份。即使他退伍，继山县有朋之后他在陆军中的潜在影响力及他对退伍军人会和青年会事实上的统治等，在国民舆论中也有强烈

① 岡義武、林茂校订《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政治 松本剛吉政治日記》，第378页。

② 保利史華：《田中義一——宰相となるまで》，第一出版社，1928，第213页。保利史華：众所周知，久原房之助是田中的有力支持者，“具有捻出不明党费的能力，是成为政党总裁的第一条件。田中在久原房之助的帮助下具备了条件”。他起到了田中的政治资金的作用。山崎一芳：《久原房之助》，東海出版社，1939，第96页。久原房之助自己也说：“我想让他（原注：指田中）推行大陆政策。”期待着田中内阁对中国展开强硬的外交。

的反应。横田千之助生前在回答正力松太郎（读卖新闻社社长）关于拥立田中义一可能性的询问时说：“我还无法下决心。总之只能仗剑观望了。”^①可见他对拥立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持慎重态度。同样，高桥总裁也担心国民对田中义一陆军大将身份持有不好的印象。^②

另外，也有不少人对于田中义一和退伍军人会的密切关系表示担忧。田中义一在就任总裁后，回答是否能在竞选中战胜古岛一雄（革新俱乐部干部）这一问题时，自身也是脱口而出：“啊，那是当然。我拥有着三百万退伍军人！”^③据古岛一雄后来回忆，那时听到田中此话就认为田中义一缺少作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而且他后来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确切地说，田中在原敬内阁时期，就对陆军内部的军备扩充计划的强行突破论进行批判，与内阁保持步伐同一，从而获得了内阁的信任，这是在为获得拥立做准备。不过关于拥立田中义一的问题，直至横田千之助死后才在政友会内部取得大体一致的看法。对田中义一的上述评价，使政友会与其相关者陷入长期不安之中。即使是这样，由于政友会内部的状况及其他政党的客观条件都决定着拥立田中义一是必要的。后来，由高桥总裁等人决定的拥立田中工作的直接执行者小泉策太郎这样说：

原敬内阁时期已经开始脱离了政党政治这一基础，从高桥内阁，到加藤友三郎大将继承为止，时运已经转向中间内阁。因此，我相信实现田中内阁也并非没有希望，即便我本人也曾觊觎过神器。^④

① 木舍幾多郎：《ひとり言——政友会の思ひ出》（上），《政界往来》1940年9月号，第116页。

② 石上良平：《政党史論原敬没後》，第233页。

③ 鷲尾義直編《政界五十年——古島一雄回顧録》，三元社，1951，第235页。

④ 小泉策太郎：《原さんの遭難から田中総裁の登場まで》（6），《中央公論》1935年9月号，第249页。

也就是说，在小泉策太郎等政友会干部拥立田中构想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对原敬内阁和高桥内阁时期实施的政党政治不抱希望，而开始倾向于组建处于“政党内阁”路线与“举国一致”或“超然内阁”路线之间的“中间内阁”的认识。最终，可以说支持原内阁的非选出势力和选出势力再次形成协调、合作的关系。

就其背景而言，由于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从加藤友三郎内阁，至清浦奎吾内阁，在人们的意识当中一直都呈现出一种非政党内阁的印象。小泉策太郎等人拥立田中义一为党首，则期待他能在促使非选出势力与选出势力的联合上起作用，并企图由此建立政友会的单独内阁。但是，以贵族院为后盾的清浦超然内阁的成立引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运动中要求建立政党内阁的呼声高涨，这就使拥立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之举受到抑制。此时，曾积极拥立过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干部，也在期待成立政党内阁的过程中，对拥立田中开始踌躇。

这种情况下，坚决拥立田中的小泉策太郎和久原房之助等人，在党内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然而，以加藤高明宪政会总裁为首的护宪三派（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内阁的成立（1924年6月11日），使得本来就很勉强的拥立田中之事很难再继续开展。

也就是说，小泉策太郎拥立田中或者说是实现田中内阁的构想，是要成立和宪政会对抗的政友会单独内阁，其主要目的是扩大政友会的势力。田中义一是实现这一构想的王牌。但是，在要求建立政党政治的舆论不断高涨之时，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作为党首，就显得有些与时势相背离。

然而，表面上为三派的护宪三派内阁，实际上是宪政会主导的内阁。对此，政友会内部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其结果导致拥立田中为党首，组建政友会单独内阁成为势在必行。其中一些党员公然喊出打倒加藤内阁的口号。1924年（大正13年）秋天，高桥总裁辞职，党内多数成员虽感不安，但还是在拥立田中义一时投了赞成票。从此，推翻加藤内阁，实现田中内阁的行动就正式开始了。

同民众广泛参加的第一次护宪运动相比，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明

显性质在于，它是以实现政党为主体之政治运营目的的运动。实际上，它突出反映了围绕着政权形式问题，各政党间的协调和对立的过程。^①就此意义来说，护宪三派内阁中，政友会如果要组建单独政权，在政策主张等党的性质上就必须和宪政派有明显的区别。为此，政友会通过再一次和军部、长州派官僚、贵族院等非选出势力的联合，结集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以此为后盾准备提出政友会独自的政策。但结果是政友会和第二次护宪运动的成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并没有确立政党政治，而是选择了和原敬内阁雷同的中间内阁形式。于是，原本由山县、原敬所担负的促使非选出势力和选出势力联合的重任，这次就落到了田中义一的肩上，这也成为拥立田中的最大理由。

当时，政友会周围的人，除田中义一以外，还提名后藤新平、伊东巳代治等有实力者为总裁候选人，这表明为了巩固党的支持基础，已经开始吸收非选出势力。政友会这样的政界再编构想在于，“若论以田中为新总裁的根本原因，就是要结束三派协调，实现政友会的单独行动”。^②

1925年（大正14年）4月13日召开的政友会议员总会，决定由田中义一就任总裁，接着5月14日召开的政友会临时大会，正式任命田中义一为第五代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就任总裁后，在政友会内部“由于再度迎来了田中义一，意欲组建政友会单独内阁的气氛横生，在此产生了以转让地租为契机，使内阁不统一而迫使阁僚总辞职，然后再由政友会单独组建内阁的阴谋”。^③田中义一就任总裁一事是政友会自己放弃了原本向政党政治转换的机会，它

① 伊藤之雄：《護憲三派内閣の形成と展開》，第59页。伊藤之雄：“横田和小泉对高桥总裁的辞职并没有做过多的挽留，因为考虑到‘政界改编’所以出现了拥戴田中成为下任总裁的动向。”

② 《“被衣を取れ！”“覆面を脱げ”田中政友会新総裁！》，《中央公論》1925年5月号，第3～11页。

③ 平野嶺夫：《岡崎邦輔伝》，晚香会，1938，第29页。

同奉行欧美协调主义和坚决普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的宪政会不同，其结果是不断向“反动”的政治方向发展，成为“右倾化”的重要转折点。^①

2. 与军事官僚合作的摸索

以原敬内阁的成立为标志的政党内阁时代序幕的揭开，是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不仅抑制了军阀、官僚主导的政治运营，也增大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及可能性。同时，形成了作为议会基础的选出势力与军阀、官僚等非选出势力之间的对抗格局，打开了以选出势力为优势的政治运营局面。具体地说，以普选运动为象征的民主化要求，获得了普通选举法实施的胜利，农民劳动党和劳动农民党等无产阶级政党相继成立。由此，作为天皇制权力支柱的军事机构也在民众要求削减军备的呼声中，不得不实行像宇垣军缩那样的裁军，这也储蓄了民众左右政治的力量。

在实施上述政策的过程中，虽然强行实施了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等国内的反动政策，但是由于清浦奎吾反动内阁在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政党领导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中被推翻，所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国内政治趋势已经难以动摇。不过，作为第二次护宪运动的结果，虽然诞生了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中心的护宪三派内阁，但在普通选举法颁布前后，政党政治的运动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接连出现。即作为组建了原敬内阁而且曾着政党政治先鞭的政友会，在任命总裁时却压制内部有实力的元老党员，如同前面所叙述的那样选择了非选出势力出身的陆军大将田中义一。

持续至犬养毅政友会内阁为止的政党内阁时期，军人出身就任政党总裁的只有田中一人。作为“宪政常道”靶子的军人出任总裁登上政治舞台，这本身虽说是从原敬开始的政党内阁时代中的特

^① 参见坂野潤治《政党政治の確立》，《岩波講座日本歴史9 近代3》，岩波書店，1985。

殊事件，但也可以说这是国家总体战构筑这一国家目标导致的新型政军关系构造的萌芽。也可以说，日本陆军实力派田中义一被要求出任政友会总裁的政治过程，正是当时政军合作的象征性事件。

就此事来说，无论对于政军哪一方面，都具有互补的意义。决心就任总裁的田中义一在陈述其接受就任请求理由时，简要概括了政军联合的基本逻辑。即1925年（大正14年）1月19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和歌山市举行的演讲会上，就其进入政界的动机这样说：“实现吾之理想的是政治工作。现在是立宪政治的时代，脱离政党就无法从事政治。……我将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政党方向。为了更新政治我将会苦心经营。”^①

前半段话中他判断以政党为主体的“立宪政治”之政治形态已经确立，积极地参加政党是实现其“理想”的途径。但是，在后半段话却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利益、目标由一党来代表，受一党的党利党略左右状况的不满，同时也表明其将会从根本上改革政党的决心。这也可以说是他对政党政治的严厉批评。作为田中义一，虽说政党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组织，但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并没有像加藤高明内阁那样，在政党政治的展开上做出令人满意的举动。

田中义一对政党的认识表明，他基本上不承认确立政党政治的必要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认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并不坚持宪政会那种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扩大政党的大众基础，安定天皇制国家之主张。田中义一究竟对政党组织有什么要求？他的上述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

必须坚决避免以往那种搞小动作的政治，要大力宣传新型产业立国的根本政策。国防要从根本上国民化，经济、产业、教育等一切意义皆源于此。由此彻底实现国家总动员的意义，

^① 田中義一：《軍事ヨリ政治へ》，《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18。

打破中央集权这一弊端，实施地方分权，实现凡事以市、町、村为基础进行协商。（《田中文书》）^①

田中义一在领导政友会时，对政策立案的根本问题表示极大关心，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政策构想。首先，我们对他关于产业立国策略和国家总动员政策的关系之论述作一分析。

田中义一认为：“所谓产业立国策略是，能给予疲惫的产业带来活力，能使混乱的实业界秩序井然，是使我国国民经济组织最终得以恢复的政策。”^② 其政策的主要目的又在于对经济的统一控制。他认为经济的统制化不仅是振兴产业的国家领导，而且有利于重点强化基础产业。关于产业立国策略，在同年11月14日召开的政友会中央大会上，田中义一说：

此次会议是在我帝国的政治、经济、思想都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我们此时是站在能否扭转乾坤之决战的分水岭上。……此时，如果不下决心振兴产业，我国的前途将难以想象。这就是我党为什么主张产业立国，促使国民觉醒的原因。^③

此时正值进入1920年代后半期，在经济低迷、政治动荡时期，如何克服国家危机，使国家不断走向强大是田中义一最关心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他认为把充实产业作为国家大政方针来推行时，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是不可缺少的。田中义一

① 田中義一：《産業立国策の遂行と海外発展》，《田中義一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57。

② 田中義一：《我が党の主義本領——産業立国を標榜して国民の覚悟を促す》，《政友》第297号，1925年12月，第2页。

③ 田中義一：《第一線に立って民衆に訴ふ——我が産業立国と更始一新の新意義》，《政友》第298号，1926年1月，第3页。

理想中的国家是把强行动员国民作为国策，随时能获得强大支持的强权国家。但是，这一主张是以政友会的名义发表的，作为国家代言人的政友会，无论如何绝不是国民代言人的政友会。此时的国家，可以说是以经济政策的积极主义为基础的产业立国策略的支持者资产阶级和对此予以支持的官僚阶层的国家。因此，作为产业立国策略的具体推进方法，田中义一推出国家总动员论，他说：

我认为，为了打开这一艰难局面，只有展开国民总动员，扩大生产，才能对内获得安定，对外展示国力。这就是我们立宪政友会提倡产业立国，号召天下，引起国民共鸣的原委。消极退缩的方针无论在何时都是不可取的，特别是时下状态只能积极进取是不可置疑的。在实施产业立国的方针时，各种配套的局部计划是必要的。例如，整备交通，改善金融，确立关税政策，改善生产组织等等。概括地说就是，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军备，还是外交，都要以此大方针为基调进行必要的整理健全。^①

虽然，产业立国策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活动的活跃，但是从政策的本质上看，它并没有超过原敬内阁时期就显示出来的政友会政策的传统。这一时期，因为有即将形成政友会政权这样党内时机的帮助，再加上批评宪政会的紧缩财政及财政改革等“消极退缩方针”，都显现出了两党的不同点。田中是将国家总动员论作为产业立国策略的具体方法提出来的，他在谈到这一意义上的国家总动员时说：

国家总动员的要素并不仅仅有军事，它包括农业、工业、

① 田中義一：《第一線に立って民衆に訴ふ——我が産業立国と更始一新の新意義》，《政友》第298号，1926年1月，第3页。

教育、学问、技术、交通运输、地方行政等所有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实现此目标，或者是依据国防及国家总动员的见地，各行各业尽其所能，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吾痛感，必须让国民了解此观念，从产业、经济、教育到其他领域，必须努力地做好一切事情，使国家观念和皇室观念不断旺盛。（《田中文书》）^①

田中义一所言产业立国策略，并非从狭义上讲的产业振兴政策，而是在政策展开上要实现的一种国民相互共有的明确的目的意识。他特别强调了其意义的重要性。所谓“目的意识”就是培养“朝着国家兴隆迈进”的国民意识，其结果是促使“国家观念和皇室观念不断旺盛”。

此内容表示，从政友会总裁的立场出发，田中义一作为天皇制国家守护者的军人，他意在通过产业立国策略、国家总动员论等口号，唤起人们对国家亦即天皇的忠心。对于田中义一来说，这种两面性并不矛盾，而是自然而然地在政策主张里获得的一定调整，进而达到逻辑化。作为一党之首，他明确了自己在政治领域里的作用，首先是要守护和发展国家即天皇。

由此可见，田中义一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军人时期的思想，政友会也在适应田中义一特质的过程中不断地趋于保守化、右倾化。政友会通过拥立田中义一为党首，目的是全面实现自己的独特性。为此，就当时的政治状况而言，必须让国民知晓田中义一所指出的国家全面危机性。总之，在国家处于危险之时，为了克服国家之危险，除了应该培养国民对国家即天皇无条件的忠心之外，国民对国家的积极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关于这一点，田中义一这样说：

^① 田中義一：《軍事ヨリ政治へ》，《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18。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存在的几多棘手问题。而走出这一困境的方法是在各种设施政策中，以国家民生共同协力为基础，从根本上改造有机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在注重这一点时，必须赢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田中文书》）^①

田中义一所提到的“危机”的内容虽然不甚明了，但是此“危机”作为“国家民生共同协力”应该克服的对象，他在其演说中主张：要打破“欧洲诸国决定着世界的国际关系，而空有强国虚名的我国仍然停留在旧式政治舞台上”^②的现状。在他看来，尽管为了克服危机必须提高国民的斗志和在思想上对国家即天皇的忠心，但是在国内那些要求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实体却成为了分裂国家的原因。所以，田中义一作为党总裁对政友会的期待是：

现今的日本，正处在所谓对内对外的国难之际，顺利的应付此局面对我党来说并非易事。与以往不同，今后我党成员应彼此互助，以“一扫国难”为责任，担当起国政之重任。同时，就完成此重大任务而言，今后我党自身无论如何也绝不能孤军奋战，彼此要懂得，没有国民的支持是不行的。特别是在普通选举法颁布的今天，我认为，在考虑过去政党势力及可动员力量的基础之上还应该有新的想法。（《田中文书》）^③

① 《立憲政友会臨時大会に於ける田中新總裁の演説》，《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22。

② 田中義一：《国家民生の共同協力を俟つ》，《政友》第291号，1925年6月，第2页。

③ 《政友会支部長會議ニ於ケル田中總裁ノ演説要領》，《田中義一關係文書》，124。

田中义一认为，在国家处于危机即“国难”关头，政党的作用并不是通过组建“政党内阁”实施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而是依据“举国一致”排除一切政治争斗，实现有着共同目标的政治运营。所谓“共同目标”虽然是指“一扫国难”，但是，到后来却是指包含各领域，以国家即天皇为名的强权统治和统合。田中义一在此意图的基础上展开了他的国家总动员论，企图达成其政治目的。因此，他认为根据普通选举法的实施，正确把握党的基础及党员力量的扩大，与现实强权统治和统合并不矛盾，且可同时进行。

因此，田中义一认为，政党组织的扩充强化并非以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目的，而是广泛地实施国家总动员，并通过它创造出适合于愿望中的“大陆国家”日本之强大的统治体系。为此，田中决意从军界进入政界，通过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企图通过自己的领导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在政党组织中，政友会为田中义一提供了实现这一意图的政治场所。

对此，石上良平分析田中义一进入政界的理由时说：“（田中）作为山县的继承人，就必须如同山县、桂及寺内那样成为总理大臣。而要想成为总理大臣就必须首先做党首。他认为政友会是唯一能得手的政党”。^①但是，田中义一坐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是他实现自身政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田中义一将自己置身于政治舞台，是表示其天皇制国家守护者所应尽的职责。由于田中义一缺乏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在党政运营技术上是外行，因此也有其不得不依赖智囊团的一面。尽管如此，由于田中义一自身的政治素养和作为军人的国家观、天皇观与当时的政友会气质相投，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田中与政友会相互间政治目的是相同的。^②

① 石上良平：《政党史論原敬没後》，第340页。

② 关于田中内阁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参见坂野潤治《日本陸軍の欧米観と中国政策》（細谷千博、斉藤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政党政治の中国政策》（近代日本研究会《年報近代日本研究2 近代日本と東アジア》，山川出版社，1980）。

田中义一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自己加入政友会的抱负和动机，其中最显著的又是显示其作为天皇制观念代表者的存在。正如前面所引用的田中义一的言论所示，他那种简单明快的国家主义的同语反复，至少说是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异常现象。

客观地说，就当时的国内外时局分析，很难判定此时是否是危机时期。在这种状况下，田中义一将其设定为危机时刻，并推出国家总动员论为克服此危机之策，其目的是通过把政治争论的焦点集中至此，达到缓和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利用政友会实现举国一致体系。这一策略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可以从田中内阁大约两年的政治运营中得出答案。此时，至少在田中义一看来，他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对于田中义一的政治表现，社会舆论是如何评论的呢？渡边铁藏（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就田中义一就任总裁的用意是这样分析的：

高桥政友会总裁辞职，将地位让给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男爵这一举动，犹如雷阵雨后的晴天霹雳，让政治通们吃了一惊，世间也是喧嚣四起。着眼此变化，可见政友会已经准备结束和宪政会并肩作战，开始反咬对方。但是，由于此时现任总裁参加了护宪运动，并列席了护宪内阁，这就使得实现这一转变显得有些困难。尽管转机遇到困难，但与其相比更难的是总裁作为内阁的一员深受伤害。即，在把握创建政权机会时，为了解决随之出现的问题，不得不采取更换总裁的方式。（《中央公论》）^①

总之，应该从田中义一的就任总裁，看清其中通过打倒护宪三派内阁，组建政友会单独内阁的企图。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友会自

^① 渡边铁藏：《政党軍閥に降服す》，《中央公論》1925年6月，第18页。

身利用政党政治的发展机会，甚至到了拥立军人出身者为党首的右倾化、反动化地步，这引起了舆论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渡边铁藏这样论述：

此时正处于实施普通选举时期，不顾党的名誉，没有忍耐精神，恬不知耻地接受陆军人士做党首的这一政党心态和行为被质疑和蔑视，这不能不说是自作自受。^①

在渡边铁藏看来，推举实施普通选举法这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的斗争对象，而且是与民主化不相容的军人出身者田中义一就任总裁，是政党的失败，是对国民期待的背叛。类似这样的批判，在当时的传媒中也很醒目。例如，三宅雪岭指出：“马上要进入普选实施的时代，政党应该从自身选出党首。这次虽然是无奈，但是今后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作为政党必须有政党发展的样子。”^②表示出他对政友会在政党政治发展上所具有的成熟度的疑惑。同时，就田中义一的军人出身进行批判的也不少。例如：相马由也说：

高桥氏的离去，似是而非地有些墨索里尼武断政治的影子，因为，除了显示退伍军人机关和战友以外，面对国民他（指田中义一，译者注）没有发表任何足以充分肯定的政治思想。本来应该像西园寺那样在国民面前明确自己政治思想轮廓的田中大将，在无任何政治素养的状况下，却突然成为政党党首，这就如同郭公捣毁莺巢后洒脱而至是一样的。^③

① 渡边铁藏：《政党军阀に降服す》，第21页。

② 三宅雪岭：《政友会論》，《改造》1925年5月号，第234页。

③ 相马由也：《私と俎上の四將軍問題》，文成社，1926，第308页。

当时，田中义一的确在国民中已经很有名气，但这并没有超出他的军人界限，他本人不可能具有成熟的政治思想和就任总裁应有的素质。政友会为了获得政权和成为第一大政党，拥立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为总裁。如果是战争年代则罢，但是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刚刚发生护宪运动之后，拥田中义一就任极有可能建立政权的政党总裁，其举动很难让人理解。何况，田中义一对普通选举制的态度是“如果国民训练如同我们所期待那样实施，并且，退伍军人会和青年会这两大集团也如同我们预期的那样发展，那么，普通选举应该取得圆满成功”，^①可见指责他“无政治素养”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在那些对田中义一的评论中，对其军人出身却被拥立为党首之事，以重视军缩舆论为理由，持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确实，当时国际上军缩呼声高涨，国内财政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缩小军备就成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课题。况且已经实施了两次军缩，即山梨军缩和宇垣军缩。例如：

在这般时局中田中义一将军为什么会介入政界？反正陆军不可能逃脱被缩小的命运，为了国家必须实施军缩。但是，由陆军中无名之辈实施显然是困难的，这其中也冒出了文官出任陆相之事，让这些一般人物草草实施军缩实在是荒唐。无论如何要说的话，就应该视其为自己的事，让有绝对威望的人物实施合理的缩小。……用心地推荐进入政界的人物，他（田中义一）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进入政界会产生极大的政治意义。^②

① 田中義一：《軍事ヨリ政治へ》，《田中義一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18。

② 《“被衣を取れ！”“覆面を脱げ！”田中政友会新総裁！》，《中央公論》1925年5月号。

田中义一就缩小军备一事这样看：“我等根据自身的军备意识，必须选择恰当时机。”^① 这表明了他赞成军队合理化整顿和军备近代化的意向。同时，如同宇垣军缩所表现出的那样，他相反可以引领国内的军缩舆论，使其充分认识进一步关心国防的必要性。这一点正如同我们前面所述的那样。

毋庸置疑，田中义一进入政界的主要动机中肯定有解决军备和国防问题，^② 在这里，田中所谓适当“时机”的军备实际就是宇垣型的军备充实政策的情况，也已经没有必要再解释了。以军备问题挤进政界的田中义一，若就其作用而论，不外乎唤起国民对国防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将扩充军备乃对中国积极外交的物质保证这一必要性同政治、外交问题相提并论，并且使其成为政友会的重要政策。

四 结束语：对总体战体制构筑的展望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的有关总体战体制构筑的志向在统治阶层达成一致的过程，又是必须从根本上对以往政治、军事、经济诸领域中分权、分工构造进行修正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将来很可能发生的所谓总体战的战争形态，并非仅仅军事领域就可以单独应对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大量消耗军需品的战争形态，因而理所当然地要求平时就开始扩充军需工业。

另外，由于飞机、潜水艇的出现，战争不断向空中和海上扩大的问题，也将使非战斗人员受害及其生活环境不断被破坏的事态迅

① 《政友会臨時党大会での田中総裁演説》（大正14年5月14日），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編《田中義一伝記》下卷，第393页。

② 角田順校订《宇垣一成日記》（1），第461页。关于田中加入政友会与军缩问题的关系，宇垣一成曾说：“田中大将加入政党，由于与预期的情况多少有些出入，所以不得不先就任小小政友会的总裁。由此必须看到陆军的人事处理也是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之一。”

速扩大。正因为对这一事态的预测，在寺内正毅内阁时期，就开始构想军需工业动员法的制定，原敬内阁时期又产生了设置国势院以便积极把握和增强国力的认识。

换言之，在总体战阶段，军事作为自立的存在而发挥机能的范围很窄小，由于以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为中心的非军事领域的军事化已成为必要的条件，因此所谓政治与军事两领域的划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本章中，对军界领导层的代表田中义一的主张和行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正如田中义一自己所强调的“军队国民化”和“国民军队化”口号所概括的那样，总体战阶段的那种政治和军事一体化、一元化的方向，原则上是遵循政治为主导形式而设定的。由于国民动员以及民需工业向战时军需工业转化做准备等，都没有法律上、制度上的规定，因此这里的研究也仅限于国民精神和意识方面的探讨。

通过本章研究，我们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国内政治结构从根本上得以改造的政治过程，概括地说，此过程就是构筑应对总体战的政治体系（即总体战体制）的过程。军方对建立这一新型政治体制最为积极，而特别积极致力于政治领域与军事领域结合的军事官僚，就是提倡“国防国民化”的田中义一。

的确，正如本章第二节中所叙述的那样，在新型政治体制的构筑过程中，虽然在政治体制的实施机关里配置了大量的军事官僚，并希望他们掌握总体战的主导权，但是这并没有立即表现为军事官僚对作为政治领域核心而明显崛起的政党势力的无视。因为军事官僚清楚地认识到，作为总体战体制构成之必要条件，确立“国民”动员和企业动员（国家总动员体制）的重点是“国民”的军事动员。因此，对受到“国民”承认而初次建立的政党势力（即选出势力）的作用予以了越来越高的期待。

实际上，正如第三节中所探讨的那样，原敬政友会内阁的成立拉开了政党政治的序幕，田中义一因为认识到了总体战阶段政党政治的作用，所以开始尝试着向政党靠近。也就是说，田中义一、宇

垣一成等总体战派的军事官僚，是从国家总体战的角度上着眼，试图接近政党政治的。

当然，此时田中义一的观点在军部内部不可能完全被接受，福田雅太郎、上原勇作等军部旧势力的存在是绝不容小看的。实际上，他们同田中义一、宇垣一成等人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立。^①

的确，就任政友会总裁，进而组建内阁的田中义一，其政党观与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实践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尽管如此，田种义一为了达到实现总体战体制之目的，成功地进入政界，并积极地融入政党政治的历史潮流。暂且不论，田中义一自身的政党认识及接纳他的政友会内部所出现的众多问题，以他为媒介来协调统一军事和政治的步调，确实是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围绕着政军关系的政治状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确发生着改观。

这种改观由于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其发展虽说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政军关系的基本框架却因此明确地设定了下来。正如前面反复论述的那样，针对总体战战争形态设定的构筑总体战体制的课题以及民众对政党政治的期待感和不信感是一对矛盾，正是这对矛盾的演化最终促使了政治和军事关系朝着相互依存方向的发展。

根据以上观点，可以认为日本政军关系的基本性质，是在处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政治即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军事即总体战体制的构筑这两大课题的过程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为了应

① 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年，第251页。关于总体战体制构造的军内对立状况，雨宫昭一：“他们（田中、宇垣）继承藩阀，特别是军内长州派系的遗产，而与政党势力妥协且特别致力于达成政战两策略的一致。另一方面，是那些以上原勇作和福田雅太郎为代表的纯武士，他们恪守着统帅权独立制度。所以，这些人与意欲修正统帅权独立制度的政党势力，以及与之妥协的田中、宇垣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对总体战，诸势力之间达成了大体的协议，在努力构筑总体战体制的同时，形成了如何构筑合理政军关系的构想。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构筑总体战体制的过程中逐步实体化了的政军关系构造，也在明治国家自身的宪法构造的极大作用中得以形成。于是，由明治宪法规定的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在政军关系的正式修正和改编中，急速地显露出自己的头角。

第Ⅱ部 大正时期围绕内政外交 展开的政军关系

第三章

西伯利亚干涉战争时的 军事领导与外交领导

一 前言

西伯利亚干涉战争时期，日本政党政治的开拓者原敬首相、陆军中坚官僚山县有朋所支持的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章就将田中义一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试对这位政治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言行予以梳理和考察。^①如果把原敬当做政治上的代表，把田中义一当做军事上的代表的话，那就必须附加若干条件。因为，尽管原敬有总理大臣的职位，却不能代表全部的“政治”，而且其在指导战争方面并没有发挥出全面并且绝对有力的作用。这

① 关于出兵西伯利亚研究的专著有：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有斐閣，1955）；井上清：《大正期の政治と軍部》（岩波書店，1969）；原暉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渉1917～1922》（筑摩書房，1989）等。相关论文有：藤村道生：《シベリア出兵と日本軍の軍紀》（《日本歴史》第251号，1969年4月）；吉田裕：《日本帝国主義のシベリア干渉戦争》（《歴史学研究》第490号，1981年3月）；百瀬孝：《シベリア撤兵政策の過程》（《日本歴史》第428号，1984年1月）；平吹通之：《シベリア出兵決定経緯と陸軍》（《軍事史学》第34卷第2号，1998）；井竿富雄：《シベリア出兵構想の変容》（《法政研》第66卷第4号，2000）；高橋秀直：《原内閣の成立と総力戦政策》（《史林》第68卷第3号，1985）等。本书主要参考雨宮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中的《第二章 政党政治と戦争指導》（第79～179页）。

不是否定原首相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只是因为执政党政友会内部及政府内部，的确存在着立场明显不同的异己势力。

同样，把陆军的田中义一作为“军事”上的完全代表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让人犹豫。但是，从政军关系方面看，在把握西伯利亚干涉战争时的战争、外交指挥实际状态的基础上，把原和田中作为政军的主要代表人物，并将他们的活动作为着眼点的话，看来是没有异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作为联合国军的一员，被要求参加欧洲战线，这是日本陆军向俄罗斯出兵的起因。虽然参谋本部于1917年（大正6年）10月就完成了《关于出兵欧洲的研究》，^①但其内容就出兵本身始终保持极端消极的姿态。作为日本陆军，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经济余力将兵力投入欧洲战线这样的现实理由，同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没有看到具体利益。

直到同年11月爆发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影响波及西伯利亚地区，陆军内部才开始讨论以“保护居留民”名义出兵的问题。^②这个以“保护居留民”为名义的出兵构想是极为消极和带有防卫性的方针。但是到了1918年却出现了利用西伯利亚阻断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影响，以十月革命为良机将西伯利亚从欧洲分离出来，并在日本的影响下促使西伯利亚独立这样的积极并且具有攻击性的方针。

当然这个方针不可能停留在陆军的独自方针上，因为像这样涉及与欧美诸国的联系以及如何对待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讲明显属于外交问题。因此，陆军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当然就

① 参谋本部编《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影印本）第一卷附录篇，新時代社，1972，第7~21页。

② 《居留民保護ノ為極東露領ニ対スル派兵計画》，参谋本部编《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第29~33页。在十月革命爆发的月份（1917年11月）里，制订了该计划，实际上从当时就已经开始商讨从满洲和西伯利亚两方面出兵的计划。

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成为与外交相关的政治问题了。也就是说，不得不把它作为涉及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双方面的问题来处理。从此，继寺内内阁之后的原敬内阁，在基本上把陆军的出兵计划作为中心的同时，又把它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正面考虑与西伯利亚出兵相关的战争、外交指挥上的政军关系调整与合作课题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系列的西伯利亚出兵正值政党政治的开始时期，也就是说以直接反映民意之有力政党为后台的原内阁，究竟怎样协调与原本不太得民意支持之陆军的关系，就成为了问题。以下在关注上述问题的同时，还研究探讨对西伯利亚出兵政策有关政军双方当事者的对立和妥协的政治过程，即围绕政治、战争指挥权，在从出兵西伯利亚的设想到毅然出兵整个过程中，将寺内正毅内阁及原敬内阁（政治）和从参谋次长升任原内阁的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军事）之间协调的特征作为主要课题。

因此，本章与前章一样，从政治领袖（原敬）与军事领袖（田中义一）的动向入手，探讨政军关系开展的过程，最终逐渐阐明出兵西伯利亚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军事行动，其政治、军事领导都是在政治的全面主导下展开的。视点不只停留在田中是原内阁一员这一点，从当时的国际动向来看，完全出于希望能够对付社会主义政权，而不得不在外交水平上保持协调的政军关系；而且，应该强调从当时的政军关系的性质来说，上述事情也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二 出兵的经过及其构想

1. 沙俄的解体与出兵政策

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支柱是，以军事威慑为背景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与以协调姿态为内容的所谓“日支亲善”这两项大相径庭的政策方针。之所以形成了这样的对华政策，是因为需要与当时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保持一定的均衡关系。

但是，由于大战的爆发，破坏了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既存的平衡，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不处于欧洲主战场的美国，通过向英国、法国等协约国输出武器提高了发言权，势力得以提升。

在此期间，忙于制定对华政策的日本政府和日本陆军，在大战爆发的同时，其实更早，就为如何对付美国战后参与亚洲地区的问题苦思焦虑。例如，当时身处参谋本部的田中就给寺内内阁写了如下信函：

今后交战各国均陷入疲惫不堪、战局均衡容易破坏之时，可考虑一面佯作出兵俄国，一面与美国合作，以作构建和平先驱之此方针，此策既可谓外交舞台之表演，也可保持振作之精神。（《寺内文书》）^①

因之，在大战期间，田中图谋通过日俄协约，强化与英法俄三国之关系等，以确保从中国获得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田中在对华政策上强硬姿态与妥协姿态的两面性，正是他想通过各种手段巩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所取得之利益的政治表现。从这一点来说，对田中而言，对美政策就成了比以前更须深思熟虑的重要课题。

但是，1917年（大正6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权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俄国脱离了协约国战线。这对当时日本推行其大陆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沙俄的解体，使得远东地区均衡的力量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使西伯利亚出现了“力量真空的状态”。^②而且，此前共达四次

① 《寺内宛書翰》（大正4年2月3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332～33。当时田中对美国的看法，参见三谷太一郎《増補日本政党政治の形成——原敬の政治指導の展開》（東京大学出版社）；坂野潤治：《日本陸軍の欧米観と中国政策》（細谷千博、斎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關係》，東京大学出版社，1978）等研究。

② 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第52頁。

的日俄协约实际上已经失去作用，远东地区日俄两国的联合战线的建立，把中国本土也划入了其范围之内，这就意味着阻碍日本今后在中国，特别是北满地区扩大势力的主要因素已经消除了。

与此同时，俄国脱离了世界大战战线，也就意味着欧洲东部战线实质上的消亡，德国可以在欧洲战场的西线集中兵力与英国、法国对峙。因此，英、法两军的艰苦作战达到了顶峰，这也使得英国、法国不得不从远东政策撤出，从而为日本从北满进一步向沿海州方面扩大并获得支配权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为了所谓的“大陆国家”日本的发展，日本陆军很早以前就把其具体的支配地区的范围从北满扩大到西伯利亚东部，并将获取东支、西伯利亚两铁道的管理权作为目标。因此，在俄国革命爆发后，陆军制订了占领东部西伯利亚，包括沿海州的计划，并且开始派遣谍报人员，意在巩固“大陆国家”日本的落足点。

但是，原内阁的陆军大臣田中，在军官面前称出兵目的是为了在“满洲、蒙古、朝鲜，包括西伯利亚设置宽阔的缓冲地带”，^①以此来回避日苏两国的冲突。也就是说，他强调了军事上的意义，一方面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类似“开拓西伯利亚之宝库，则人口问题、粮食问题，及国家富强皆自行得以解决”^②这样的重视经济价值的议论。

日本陆军期待能以此为契机，确保日本在沿海州的势力范围，并把日本海作为日本内海的，实现所谓“日本海内海构想”。同时，把满洲及沿海州作为日本本土防卫上的前进据点，这也将成为向西伯利亚西部以及中国内陆（华北、华中）侵略的据点，具有

①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会編《田中義一伝記》下卷，原書房，1981，第4页。此外参见高橋治《派兵》第一卷，朝日新闻社，1973，第34页。陆军少尉家村新七（第14师团第15联队）的证言：“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是占领沿海州。之所以这么做看看地图就会明白，如果沿海州成为日本的领土，就会成就日本的国防。”

② 德富猪一郎監修《西伯利亚》，民友社，1919，第2页。

极高的战略要地的意义。

俄国革命一爆发，日本陆军为了活用这个好机会，早早就开始制订占领西伯利亚的计划。英国政府于1917年（大正6年）12月26日，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向西伯利亚共同出兵的提议。最早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议题是在此之前的12月17日的外交官调查委员会上提出的。此后，应对出兵提案、制订日本陆军占领西伯利亚计划，以及作战准备等，都已成了当时的重大课题。与大战爆发及向德国宣战时消极地对待向欧洲战线出兵不同，这次同样是出兵，却具有与前者完全不同的意义。

田中是自始至终领导制订出兵计划的负责人，他的态度反映在了以下两个《意见书（草案）》中。首先，在《田中参谋次长关于西伯利亚出兵计划的意见（草案，大正7年）》之中，总结了该问题以及出兵西伯利亚的目标：

在如今的状况之下，自重则使国危。不如利用俄国人的敌忾之心来防卫德、奥势力的东渐。在此契机下，应商议如何包容与我国生死攸关的中国。并且保全对国联诸国的信义，对于在远东处于悲惨境遇的俄国人实施怀柔，使之成立自治国。将来加以指导，开发其资源富裕地区，故不可放过此时机。如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则失信于列国，将我国防上的沿黑两州置于德、奥势力之下，使我国在战略上陷入包围之中，不仅会丧失日本海的制海权，还会招致德奥俄各国的轻蔑，终致中国人辱慢我国，不能不说是自行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之中。^①

田中在这里表示了下述的判断，即积极出兵西伯利亚的意义在于能够防止“德奥势力的东渐”，原有的在中国（特别是北满）扩充支配权的这一目标，将被认为是完成了“对国联诸国的信义”，从

^① 《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9。

而有可能回避欧美列强的批判。而且提出判断：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一机会做出有效的行动，反而会恶化与欧美列强的关系，甚至不得不导致对中国的影响力降低。田中基本上写出了与日本陆军统帅层一致所持有的相同的意见。也就是说，在尽力抑制日本帝国主义内含膨胀主义性质的同时，写出了上述具有代表性见解的记录。

在外交调查委员会，正针对出兵的对与错，出兵的内容及目的等问题持续的议论之时，于1918年（大正7年）7月制定的《田中参谋次长关于出兵西伯利亚计划的意见（机密·草案）》^①中开始就指出：“若于今中止此计划，则帝国政府将失信于俄国稳健分子，招致国联诸国的猜疑，布尔什维克探知到日本的行动后，则彻底不可能取得其信任。”再一次强调了出兵是为确保与国联诸国的信义这一道理。另外，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田中还简单指出，为了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日本政府必须采取如下方针。

就英国、法国等国联诸国要求出兵西伯利亚的提议，田中提出了三点应对的政策方案。其中第一案，提出了日本应采取与国联诸国相统一的步调。如果不能答应其要求的话，“日本也应承认出于自卫上的必要，鼓励他们继续进行单独的军事行动”。田中指出了日本应该积极掌握军事干涉的主导权，并逐渐认清这样做的必要性方向。其第二案已经进入了具体出兵的准备，同时“劝诱英、法、美、中国等执行统一步调，而且一旦得到除美国之外的联合各国，或英法的同意，便可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这里要说联合国诸国之中，即使在美国不参加的情况下，只要与英法等国保持同一步调，就应该进行军事干涉。这个政策对美国的立场考虑得相对少一些。以上的两个意见方案，采取了不受美国的向左右的外交、军事政策。

但是，在第三案却提出：“各国中即使有一国（尤其是美国）如果不同意出兵，就不该进行军事援助。”与上述两案不同，对于出兵的决定作了条件限制。指出了经协调商议获取美国同意的重要

^① 《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50。

性，把美国的立场放在优先地位考虑。在上述三方案中采取哪一个，虽然最终还是要经过首相、外相、陆相的三方协议，但是据田中的预测和期待：

商议结果，如果决定执行第三方案就必须得到美国的同意。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那么非常遗憾，就应迅速地中止西伯利亚自治体独立的运动，派遣的诸官员也有必要迅速召回。（《田中文书》）^①

这两个意见书之中，前者的企图是，以田中为首的参谋本部独立地推动西伯利亚的独立自主，并且通过向它公然派遣军事援助来确立日本的统治权。这以直接的方式表明了参谋本部的强硬方针。与此不同的后者，则可以说是较慎重地考虑到由大战趋势所引起的远东情势的变化和对将来的预测，这是将这些条件充分地纳入视野之中所进行的极其巧妙的政治判断。换言之，前者的意见书明确了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后者则可以看做对达成这一目的实施手段的说明。这里应注意到的是，在后者的意见书里关于对第三案的考虑及其内容，也就是说对取得美国同意的重要性的认识。

事实上，到了1918年（大正7年），田中在给寺内首相的书函中，一面指出共同出兵不可避免的实际状况，还相反地从另一面“若不可能共同出兵，倒不如将其作为日本一国之工作更合适”的角度论述了协同出兵的合理性，因为从“各国的武官们都开始进行着防范日本将来在远东扩张势力的活动”的现实状况来看，共同出兵不仅回避了与国联诸国的矛盾，还能达到日本意在调整帝国主义诸国间相互利害关系的目的。^②

① 《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50。

② 《寺内宛田中書簡》（大正7年2月12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32-62。

田中的这种对美态度，在后来国内各阶层围绕着与美国共同出兵之目的、方法、兵力规模等问题进行意见调整时，成为了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下面就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日本陆军制订的出兵西伯利亚计划的内容和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首先，参谋本部就将来对俄罗斯、德意志的作战准备，早于1917年（大正6年）11月就策划制订了《为保护居留民出兵俄领远东计划》。作为具体的派兵计划其内容如下：

一、在沿海州派遣临时混合编制的约一个旅团，主力在浦盐，一部分配置在哈巴罗夫斯克及其他要地，保护居留民，并对铁道和电线进行掩护。

二、在北满洲派遣同样的兵力，主要由满洲及朝鲜驻扎部队进行编制，其派遣主要在哈尔滨，一部分配置在齐齐哈尔等要地，保护居留民，并对铁道和电线进行掩护。（《西伯利亚出兵史》）^①

到了第二年，适应局势状况的变化而策划制订了《沿海州增加派兵计划》（1918年1月末）以及《对后贝加尔州方面派兵计划要领》（1918年2月），对前面的派兵计划进行了若干修改。并且，一个月后（3月）制订了更加正规的出兵计划——《关于出兵俄领远东的计划》。在沿海州方面约一万九千名，在后贝加尔州方面约五万一千名，将合计约达七万名的派遣军的出动计划通知陆军省。而且提出了作为这些兵力使用的经费开支，出兵后一年间需要约三亿日元的巨额数字。^② 2月28日陆军中央部为了推进实施出兵计划，设立了以田中为委员长的军事协同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为

① 参谋本部编《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影印本）上卷，第20页。

② 参谋本部编《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影印本）上卷，第20页。

中心，逐步决定了之后的出兵计划中的使用兵力、准备资材、缔结中日军事协定、设置军事行动准备机关、支援“谢苗诺夫”（Semenoff，译者注，下同）支队、变更年度动员计划等方案。

通过这一系列的计划，陆军实质上已经在参谋本部的指导下，秘密地进行着出兵计划。参谋本部的意图明显在于，取得从北满至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统治权，以及掌握对东部中国、西伯利亚两条铁道的管理权。^①当出兵的问题作为当时的外交、军事政策主要课题表面化，成为包含社会舆论的议论对象时，陆军早已做好了随时可以作战的准备。就此，菊地昌典做了如下记载：“大正7年春季，早在社会舆论对出兵西伯利亚可否的议论达到沸腾阶段时，侵略计划就已经完成了制订，只要再找个理由让军队上陆就可以了。”^②

因此，陆军面临的课题是，为了实现已制订好的作战计划和出兵的目的，为了尽早使寺内内阁采纳日本陆军制订了的方针而展开工作。在此，田中参谋次长对陆军高层、元老及政界各阶层开始了说服工作。

2. 出兵的说服工作

首先，笔者想就山县有朋对出兵问题的态度进行探讨。山县在《时局意见》（1918年3月15日）中有如下论述：“当前内外怱怱我国出兵者频仍，若敌国入侵中国边境特别是满蒙之地，则帝国之安宁及权益将受威胁，为了维护我帝国之生存与东亚的治安，应分秒必争地直接发动扫荡。不要因顾虑到国联诸国的意图而彷徨。”^③山县主张日本从保障获取权利的对象地区——满洲的角度来看，也应直接出兵，打倒苏维埃政权。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出兵的目的旨在抑制德国势力进入远东，在动员陆海军之时，军需用品的补给，也不得不期待英国、美

① 上原勇作伝記刊行会編《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50页。

② 菊地昌典：《ロシア革命と日本人》，筑摩書房，1973，第3页。

③ 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第355页。

国的援助。因此，山县说的“若不明确这些国家的意向，我国就贸然决定态度的话，他日将会陷入危机境地，这也是我之所以始终关注英美国家对俄政策的原因”，^①从而明确了维持与英国、美国之间关系协调是出兵的前提条件这一见解。原敬就此问题，在与山县有朋会见时也指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器军需品等只能依靠美国。”^②

并且，被认为是在此之后制订的《西比利亚出兵意见》（1918年）中写道：“必须要有所觉悟，一旦实施出兵，则不可能接受新政府（苏维埃政权）的要求，更会与新政府干戈相见，可能出现视俄国全体为敌人的局面。”^③如此在指出出兵的重大意义的同时，还提出如果国联诸国要求日本军撤兵，为了避免日本军陷入困境，有必要事先与国联诸国进行交涉这一见解。

山县认为不得不考虑到与国联诸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的理由是，美国作为筹措军费的基地，对其依赖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意见书里，做出如下论述：

向英法两国募集军事公债是不可能的，然若美国坚持自己的主义反对帝国出兵，则必不仅不会答应帝国的贷款要求，亦使我国收回在美储蓄的资金陷入困难，帝国是否能独自筹集军费呢。（《山县有朋意见书》）^④

就这样，军费的筹措问题被直接提了出来，实际上不得不在金融上依靠美国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后进性，限制了日本在外交、军事政策上的决策。至少山县认为这样的实际情况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政策上最大的课题，并断定出兵一旦成为现实，与美国采取统一步

①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356页。

②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四卷，福村出版社，1965，第376页。

③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379页。

④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379页。

调，是为达到日本原本目的的必要条件。为此山县早就对出兵包括北满及西伯利亚西部地区正式进行了事先调查，对活跃在说服以陆相大岛健一为首的陆军高层同意出兵的田中发送了如下电文，督促其注意和控制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东清铁道，不用说是我军事上所必需的，日本如果对此应采取果断的国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我不同意英法的对俄政策，何况日本政府伴随其政策，欠缺一贯的国策，甚为令人担忧。若近期英国的政策发生变化，则使日本单独陷入困境。敬请深思熟虑世界各地的局势，判断日本的实力，寻求国家永久性利益。军事策略与政治策略固然是因时制宜而制定的东西，但在今日之时还希望不要发生混淆。（《田中文书》）^①

这种情况下，山县认为“日本的实力与世界大趋势”相互对应的外交、军事政策的合理推行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山县看来，田中的一系列行动不得不得说是，明显对日本的内情和世界各地的现状认识不足。雨宫昭一就此在《关于近代的战争指导构造与展开（上）》中引用了电文“对于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山县明确地指出出兵应维持日俄战争形态——即以重视对外关系为基础（政略主导的政军一致），其具体内容（军政两权应集中在政府及各机关的机能承担两略的分流和统一）——这一基本设想。山县基于此设想批判了与这一设想相反的参谋本部的行动”，^②从而表明山县打算直接通过田中来改变不服从军政两略一致方针的参谋本部的

① 《山県元帥ノ対露政策ニ関スル暗号電報》（大正7年4月30日），《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53。

② 雨宮昭一：《近代における戦争指導の構造と展開（上）》，《教養部紀要》第8号，1976，第58页。后被收入雨宮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79）。

姿态。

从这一角度来看，田中意在使战争策略优先于政治策略，至少也是试图改变以政略为主导地位实施的军事及外交路线。这明显地脱离了山县在政略主导下的军政两略一致的原则。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存在不得不依靠欧美诸国的金融的内在矛盾，这就限制了山县的基本立场是政略主导方针；而田中的设想是，为实现“大陆国家”日本的构想，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出兵西伯利亚算是战争，就有必要尽早形成以战略为主导的战争指导体制。田中还考虑到，应尽早创建起与此相关的原本是制度化特权——军队的独立统率权能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机能的国内状况等各项方案。

在内阁里，虽然有像本野一郎外相这样的强硬派出兵论说者，但是寺内首相却与山县一样，此时对于出兵却一直采取了谨慎的态度。^①因此，田中全力对寺内首相展开了劝说工作。例如，田中在1918年，企图在西伯利亚树立反革命政权并进行了各种工作。其中为促进援助霍尔瓦特，在给寺内首相的书函里做了如下记述：

愚见认为，该方面（指东部西伯利亚地区，作者注）的局势时刻在变化，为达到阁下原本的目的，望能迫切解决关于“霍尔瓦特”之事，如若不然则会导致失此良机。（《寺内文书》）^②

田中督促日本政府立即开始援助霍尔瓦特，并且，在此信中还谈到援助的方法：

① 参见鹤见祐辅《後藤新平》，後藤新平伯伝記編纂会，1937，第800页。关于寺内正毅对出兵的观点，在《西伯利亚出兵論（大正7年3月13日付意見書）》（《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441-10）中也有记载，其内容与山县有朋的观点基本相同。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7年2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32-64。

愚见认为，今通过外交手段实不为上策，不若采取单纯军事当局者之间商议的形式。追求事实上的效果方为可取之策，深思为盼。（《寺内文书》）^①

也就是说，田中提出的权宜方针是，为了避免与欧美列强发生摩擦，不采取明显的援助，仅采取由军事情报机关承担所有工作的形式。对于田中来说，只有确保内外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在投入兵力能取得具体效果的情况下，才有正式出兵西伯利亚的可能。由于山县和寺内等本来就充分了解田中的这些动机，所以田中为了寻找说服他们的理由而冥思苦想。最后，田中给寺内首相发送了以下书函：

当今各方面反激进的思想日益膨胀。若袖手旁观则不光激进派，就连稳健分子也将抱怨难以信赖日本，随之必然提高美国的信赖度。请阁下明示尊意，以便与陆军大臣及大藏大臣交涉。（《寺内文书》）^②

田中在这里也意识到美国的存在，提出日本应在美国正式出兵西伯利亚以前，投入兵力，占领先机。

一方面，持反对出兵态度者中，田中的最强对手就是政友会总裁原敬。而且此时原的反对论点与山县及寺内的观点基本一致。原敬在1917年末的日记里写道：“当务之急是下决心充实我国国防，以备万变。即使万一俄德与我国开启战端，疲惫不堪的英法两国也不足以依赖，若与美国为伴，则至少可得军费援助。”^③ 由于苏维

①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7年2月15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32-64。

② 《寺内宛田中書翰》（大正7年4月27日），《寺内正毅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332-70。

③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第350页。

埃政权的登场，原敬承认日本有可能与苏维埃政权或德意志开战，而且在此之前应该把强化国防作为当前课题。他还认为，如果开战，美国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平时还是发生战争，都应与美国维持协调关系。只有这样才是，最终能够使日本在大陆的地位得到提高，并且权利能够得到扩大的合理方法。

所以，原敬还在日记中写道：“出兵内地是陆军提出的意见。陆军的意见只是以陆军为中心的，并不明白大局。如果不按其说行事，田中义一等似乎企图说服山县，通过山县来给寺内施加压力。”^① 他强烈批判了田中等陆军的行为。同时，原敬在此时对不主张出兵，正确地说是对出兵持谨慎态度的山县、寺内等也持有戒心。

原敬把陆军这种不明白“大局”的行动称为“陆军外交”，并且给予严厉批判。1918年（大正7年）8月7日，原敬在与伊东已代治的会谈中说：“有传闻说，陆军打算无视美国的意思，在他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就出兵西伯利亚。”^② 在美国提议协同出兵作战以前，原敬所代表的，正是充分认识到日本资本主义对美国的依赖性通过运营外交政策才是日本所面对现实——也就是所谓的“对美协调派”是很有势力的。对田中而言，虽然也认识到了日本的现实，但还是想得到北满及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这个适合“大陆国家”发展的经济、军事基地。^③

所以，田中为了能进一步说服那些有实力的反对出兵的人和对出兵持慎重态度的人，想出了通过别的手段来实现出兵的办法。那就是通过缔结中日军事协定，由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出兵北满的请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第379页。

②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第429页。

③ 此时期，以田中义一为首主张出兵的强硬派还有上原勇作（参谋总长）、中岛正武（参谋本部总务部长）、福田雅太郎（参谋次长）等人，同时在外务省还有本野一郎（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外务书记官、首相秘书官）、木村锐一（政务局第一课首席事务官）等人与之呼应。

求，并以此为借口实现出兵西伯利亚。

军事协同委员会设置后，作为派遣军队到西伯利亚的准备计划，决定了七项工作。其中之一的《缔结日支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里记载：“迫于时局的出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对俄、德的作战中，支那军队应协助我军，并就军需补给等方面有必要建立相互密切合作关系，故对支那提议缔结日支军事协定。”^①对于田中来说，这个协议缔结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迷茫的日本在其对中国政策中对段祺瑞、徐世昌的北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从而实现日本占优势的所谓的“合作”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争取到中国军队在日本军出兵西伯利亚时对日军作战以及军队的配合与协助成为了当前目标。北冈伸一就此指出：“这就意味着日本为了实现西伯利亚作战计划，必须确保能够得到中国的同意与协助。”^②

在这个协定案中规定，“在北满洲、蒙古东部及远东俄领地以西的西伯利亚东部”主要是日军持有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因此，对于田中来说，不能采取由日本单方面提出条件缔结协定的形式，而要采取日本承诺中国方面提出要求的形式。田中认为这样做既能够回避与欧美产生摩擦的手段，同时又应中国的要求，也将成为日本出兵北满洲、蒙古东部及俄领远东地区的绝好借口。^③在这个意义上，从田中于1918年2月2日，发给日本驻中国武官坂西利八郎少将的电文的“就中日军事合作问题应让对方提议”^④也可以看出，田中对协定寄予了莫大的期待。^⑤

在此之后，中日军事协定于3月25日交换了中日间联合御敌的公文，接着在5月16日签订了陆军联合御敌协定，5月19日签

① 参謀本部編《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上卷，第21页。

②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年》，第219页。

③ 相关研究，参见関寛治《現代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誕生》（福村出版社，1996）。

④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7年第2册上卷，外務省，1969，第267页。

⑤ 黒田甲子郎編《元帥上原勇作伝》下卷，元帥上原勇作自伝刊行会，1938，第119~120页。

署了海军联合御敌协定。日本政府根据由此获得的日本军队进入北满及在北满的驻留权，从而取得了对蒙古东部及西伯利亚东部进行军事干涉的垫脚石。^①但是，缔结协定的目的明显是在国际政治上为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找借口，那也是田中为了打开政治工作上的局面从而促使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苦肉之计。^②原敬针对这一点看透了田中等缔结协定的目的，他就中日军事协定做了如下日记：

其文稿极为简单扼要，只是说面对德意志势力加之俄国，若有必要采取行动时，中日共同行动。具体裁虽是依中国所提要求，然实为他要求由中国提出要求，事实上是我国期望所在。^③

协定通过对北京政府的援助，换来了日本在北满以“联合御敌”为名义的驻留权。原敬在此批评了“陆军外交”制造了强行派遣军队的已成事实，还表示了对没能够阻止“陆军外交”的日本政府的不满。

如此，日本陆海军虽然依据中日军事协定成功地创造了出兵北满地区的条件，但就排除欧美列强的干涉取得出兵借口这一点，在日本国内的领导层中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由于中日“合作”关系的确立，对于山县和寺内来说，最大的课题就是要避免出兵西伯利亚反而会给美国干涉中国带来借口。

特别是寺内内阁在1917年（大正6年）1月5日制订了以保护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与列国同步为骨架的对中国政策后，更是希望通过借款对中国实施经济统治并且培植亲日政权。仅此而言，就与田中的一系列出兵工作完全不同。中日军事协

① 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第117～120页。

② 関寛治：《現代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誕生》，第257页。

③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第398页。

定签订以后，英法也在国联共同提议出兵西伯利亚，成为外交调查委员会上的中心议题。即使这样，原敬也一贯强调要顾及美国。

比如，原敬在1918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时应特别注意到日美关系，不得不说日美关系亲密与否关系到我国将来的命运。然日美动辄疏远的原因，在于美对我侵略西伯利亚及中国的野心心怀猜忌，故应竭力避免加重其猜忌的行动。此方为我国利益所在。”^①

虽然说山县、寺内、原敬的看法，在视点上存在不同，但是作为基本一致的外交方针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田中等的行动虽加深了与高层领导的矛盾，但也不是没有一致的意见。所以，田中等提倡出兵的人渐渐陷入了孤立的处境。但是，1918年7月8日，美国政府提出了有条件出兵的提议，从结果上来说把田中等提倡出兵的人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同时，田中在说服高层领导同意出兵的过程中，也进一步认识到了有必要与，特别是以原敬为中心的各政党及财界保持紧密关系。这个认识以田中在政策上接近原敬的方式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三 田中的变化与对原敬的接近

1. 统治阶层在出兵政策上的动摇

美国在其提出的共同出兵提议中，将出兵目的限定于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出兵区域限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所出兵力为日美双方各出7000人，并提议达到目的后发表立即撤兵的日美共同宣言。也就是说，在“有条件出兵”的条件下，日美将站在完全对等的立场上派兵。面对美国提出的共同出兵的提议，寺内内阁改变了以往的慎重态度。1918年（大正7年）7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同意接受美国出兵提议的决定，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基于独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第406頁。

自的判断，大大打破了美国“有条件出兵”的框框。

在寺内内阁中，从一开始就赞成出兵的后藤新平外相（1918年4月23日就任）对外交调查委员会的伊东已代治委员说：“从帝国地位出发，仅出兵浦潮实为不足，很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亚方面。”^①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果断实施的是“无条件出兵”，出兵之意图是在政略上将西伯利亚置于国防之内。

这一点与陆军中要求出兵的田中的观点完全一致。田中在得知美国提出了出兵提议后，对上原总参谋长说：“既然反正要出兵，那就该派遣战略上需要的兵力。”^②如前所述，反对出兵的最大理由是因为美国始终反对出兵，如今这个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要求出兵的趋势明显高涨起来。在内阁会议通过出兵的决定后，如何实施突破美国的“有条件”出兵的政策，以及如何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无条件”出兵的论点成为了新的课题。实际上，以原敬为代表的对出兵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人仍坚决反对出兵，并在外交调查委员会这个“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7月12日的内阁会议通过了出兵决定后，后藤新平外相（13日）、山县有朋（14日）、寺内首相（15日）连日对寺内内阁及陆军最大的抵抗势力——政友会总裁原敬展开了说服工作。但是最终也没有使原敬妥协，争论的舞台被转移到了外交调查委员会上。提倡“无条件”的以寺内首相为首的内阁成员们，明确提出“以美国的提议为契机，出兵一个师团的兵力到浦盐，在西伯利亚只派遣美国需要的兵力……先派遣一个师团，若有必要可再行追加”^③的观点。原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成为阻碍与美国保持协调关系的要因。

但是，7月17日的外交调查委员会上以抑制原敬等人的反对

① 小林龍夫編《翠雨莊日記——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會議筆記等》，原書房，1966，第126頁。

② 田中義一伝記刊行會編《田中義一伝記》下卷，第2頁。

③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第417頁。

意见的形式，拟定了回复美国的电报要旨。^① 其中成为焦点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出兵多少的问题，日本政府回答说：“帝国政府虽然并没有向它们派遣多数兵力的意思，但是认为这不具有事先就限制出兵数量的性质。”也就是说，这表示了出兵多少由日本政府独自决定的意思。这也表现了事实上存在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可能。另一个是出兵区域问题，日本政府说：“由于地理上的缘故，帝国对本国的安宁及切身利益抱有深刻的危险感，故遵照前记出兵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同时，根据实际的形势，也应有出兵西伯利亚的可能。”这里暗示了日本打算出兵西伯利亚地区的设想。

其间，日本陆军依据7月20日包括寺内首相在内的大岛陆军大臣及田中的三方会谈的结果，决定派遣第三师团和第十二师团，并且扩大出兵区域。^② 对于陆军来说，虽然接受了美国的出兵提议，但实际上履行的绝不是“附带条件”的出兵，而是将以往设想的“主动出兵”更加具体化，公然表明了要实现大举出兵西伯利亚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一举达到掠夺资源的意向。不用说，这自然是与美国提出的“附带条件”的出兵提议截然相反的内容。就这一点说，与在出兵内容上强调要与美国保持协调，关照美国的原敬的意见有着根本的不同。

但是，美国国务次官鲍克在收到石井菊次郎驻美大使的答复书后，于7月25日与石井大使会谈，再次要求贯彻实施“附带条件”的出兵。在这个会谈中，美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结果，日本政府提出了将兵力限制在一万到一万两千人之间，如果有必要出兵西伯利亚，将重新协商的妥协案。这样美国政府基本上使日本政府同意“附带条件”的出兵，两国政府大体上达成了妥协。经过以上协商，日本陆军于8月2日，美国陆军于8月19日发表出

① 参謀本部編《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上卷，第24页。

② 参见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をめぐる日米関係》（《ロシア革命と日本》，原書房，1972）。

兵宣言，各自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译者注）。虽然日本政府在实质上成功地获得了出兵西伯利亚的机会，但是日本陆军对其间日美交涉的内容以及日本政府的外交姿态持有以下见解：

至此，我国政府的处理颇为优柔寡断。关于出兵接受美国的提议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却还没有决定动用兵力。参谋本部基于用兵上的角度献计献策，却每遭政府干涉、压制。不仅错过战机，动辄大胆干涉纯粹的统帅事项。而且当事者朝令夕改，令我等处于徒劳奔命、疲惫不堪之处境。（《西伯利亚出兵史》）^①

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为了能实现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对在美关系中采取非妥协的态度。同时，陆军也表示要坚决排除日本政府对派出兵力、派兵区域及作战计划干涉。

从这一点来说，强调对美和谐关系的这次出兵计划，对于一直企图通过侵略大陆，使陆军的作用正当化，进而实现“大陆国家”日本的参谋本部以往的计划也是一种危险的否定。而且，以原敬的发言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对派遣兵力、作战计划的干涉，引发了干涉统帅权这个军部无论如何都要拒绝的问题。^②

尤其是由于美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无条件出兵”的提议（7月25日），导致了日本不得不修改在7月12日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无条件出兵”决议，这件事使陆军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③ 陆军把原敬率领的政友会的行为，看做对独立统帅权的赤裸裸地干涉，上原参谋总

① 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をめぐる日米関係》，第28页。

② 关于参谋本部、政党、内阁围绕出兵的争论焦点，参见雨宫昭一《戦争指導と政党——外交調査会の機能と役割》（《思想》第622号1976年4月，后收入同作者《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

③ 参见雨宫昭一《近代における戦争指導の構造と展開（下）》，《茨城大学 教養部紀要》第8号，1975年3月。

长面对政友会这样的攻势，出于抗议的目的也暗示有要辞职的打算。^①

在此期间，陆军一面对日本国内抱有危机意识，一面着手实现把派兵符拉迪沃斯托克转换为大规模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② 陆军此时打算先出兵北满及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而出兵的借口就是那个中日共同御敌协定。7月24日，以上原参谋总长的名义给中国的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发去了“就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东部要求中国协助之训令”^③的训电，企图依据该协定的第十一条，以应中国请求的方式派遣日本军队，以便使此次出兵正当化。实际上，田中在当天给斋藤发出了如下训令：

帝国之计划为，即使支那方提出异议，而不影响与国联他国之关系，则可实施出兵。汝应如此考虑前往交涉。（《西伯利亚出兵史》）^④

如上所述，参谋本部对实施出兵计划抱有莫大的决心。此时，参谋本部对政府内部提出的出兵理由是，过激分子及德军对参谋本部所支持的谢苗诺夫的攻击迫在眉睫。^⑤ 结果，参谋本部于8月9日下令动员驻屯在满铁沿线的第七师团，为此日本政府于同月13日正式宣布出兵“满洲”。在此前后，关于参谋本部占领东西伯利亚的意图，有着如下的记录：

一、使列国绝对并永远承认帝国在俄领远东地区的优越权，于西伯利亚东部及靠近此处的支那领土的地域内鼎力扶植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第429页。

② 参见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第235页。

③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7年第一册，第928~929页。

④ 參謀本部編《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上卷，第237页。

⑤ 参见黒羽茂《シベリア干涉戦争と日本の立場》（上）（《日本历史》第181号，1963年6月）；J. W. Morley, *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 191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31 - 133.

帝国势力。

二、于上記地带全力拥立对帝国友善的统治机关，形成有力的缓冲地带。^①

其间，一贯坚持参谋本部扩大出兵方针的领导者田中的行为及日本政府的加强兵力，引起了美国的抗拒和猜疑。在国内主张通过维持对美协调关系来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原敬，以及支持原敬的资产阶级对陆军不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苦于应付抢粮暴动的寺内内阁趁机于1918年9月29日总辞职，原率领的政友会内阁登上了舞台。因此，参谋本部及田中等陆军中间层的出兵计划在新政府内外关系中都明显出现了流产的可能。例如，以下的报道就直接展现了当时的情况：

后藤为政界之宠儿，田中乃军界之骄子。追随宠儿、骄子，煽动宠儿、骄子，则天下风云翻覆，终无宁日。田中如同落入出兵论的旋涡，在其中灵巧航行。对田中来说，如无进一步行动，则外交上的暗礁如今日这般危险，出兵论亦犹如摇曳于风中的烛火，前途未卜。^②

日本政府最终承认了参谋本部扩大出兵范围的政策，这使美国逐渐采取了强硬态度。对美国来说，美国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原本目的，就在于阻止日本出兵北满及西伯利亚东部并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日本出兵北满及西伯利亚东部是美国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因为在该地域扶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就意味着美国立即失去了进入中国、亚洲的据点。^③

① 参謀本部編《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上卷，第237页。

② 鐵拳譯：《軍閥の驕兒》，《中外新論》第12卷第9号，1918年9月，第94页。

③ 參見黒羽茂《シベリア干涉戦争と日本の立場》（上），大浦敏弘《極東ロシアに対する米日干渉とその破綻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一）》（《阪大法学》第12卷，1954年1月）等研究。

在分析9月29日制订的原敬内阁的出兵政策时，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日本陆军对寺内内阁的出兵政策的反应。如上所述，日本陆军的不满来自其反对外交调查委员会干涉了统帅权，并在围绕出兵兵力问题上原参谋总长甚至表示要辞职。从这个时期跟田中会谈过的小泉策太郎给原敬的信中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参谋本部对现任政府的不满超出外界想象的。田中等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打开目前局面，他曾频繁地对首相谏言说希望首相不要错过卸任的时机。（《原敬关系文书》，以下简称《原文书》）^①

小泉在这里告诉原敬，田中与寺内首相的关系已经完全冷却，并分析认为，令其关系冷却的理由是：“近来寺内的态度极为模糊不清，如同想象的那样尽是在维护内阁的体面上下工夫”。^②而且，这个时期的山县也在书信中表示了对寺内首相失望。

田中等人明目张胆地私下活动，愚见认为有相当的证据可以相信他会在近期内发动政变。虽然有一部分的旁观者说，军界为了达到扩张陆军的目的需要现任内阁维持下去，即使困难也会支持现任内阁维持到下次议会。但是陆军方面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背离到外界想象不到的地步，阁下应当早有所明察。（《原文书》）^③

① 《原宛小泉書簡》（大正7年8月9日），原敬文书研究会編《原敬關係文書》第一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第556页。

② 《原宛小泉書簡》（大正7年8月11日），原敬文书研究会編《原敬關係文書》第一卷，第557页。

③ 《原宛小泉書簡》（大正7年8月11日），原敬文书研究会編《原敬關係文書》第一卷，第557页。

从小泉的信中可以看出，田中在对寺内内阁的出兵政策心怀不满的同时，也从抢粮暴动中进一步认识到寺内内阁政治领导力的下降。国内的政治出现内乱，而在外交上对美关系明显恶化，田中认为如果支持这样内外政治都极为紧张的寺内内阁，则反而会制约陆军自身的行动。所以对田中来说，为了保全日本陆军的地位并且打下陆军基础，也要尽快地从根本上修正与寺内内阁的合作路线，并期待能在国内发挥强大政治领导力的内阁上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敬就是田中所期待的有力的政治领导者，所以，田中开始与原敬接近。可以说原敬与田中接近的过程及其背景，反映着当时国际环境中所限定的日本式政军关系的实际情况。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田中自身充分认识到以往的政治统治明显是很有限的，就像抢粮暴动（1918年）所反应的那样，如何应付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民众，就成为了紧急课题。在大战后民众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样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田中深刻感到没有民众的支持，仅靠领导层的统一意见，想要建立“大陆国家”日本是不够的。所以，田中向有广大民众热烈支持的原敬靠拢，就是希望能够从吸收了民众政治能量的政党势力那里取得对陆军的支持。在此之前田中一直是把政党当做陆军的敌对势力，但是此时田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田崎末松认为，田中接近原敬是田中的“变节”。田崎提出了以下观点：“田中自从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案以后，作为陆军的首脑，一直主张实施‘对外强硬路线’。所以从田中的立场来说，同意原敬的意见就意味着全面否定自我主张的矛盾。”^①不管怎么说，田中成为了原敬内阁的陆军大臣。下面，笔者将对此时期

① 田崎末松：《評伝田中義一——15年戦争の原点》下卷，平和戦略総合研究所，1981，第874页。相关研究还有高橋治《派兵》第二部，第209~210页。高橋认为田中之所以会向原靠近，是出于以下理由：“对田中来说不过将骑的牛换成马而已，田中已经认识到所谓的元老政治必然会越来越行不通。而且，通过接近原，就能从政治体制内阻止原一定会提出的压制陆军的政策。”

原敬内阁的出兵政策以及田中的出兵设想的变化进行分析。

原敬从寺内接过政权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西伯利亚出兵政策成为阻碍发展对美协调关系的重要因素。抑制参谋本部强硬的扩大出兵路线计划就成为原内阁的重要课题。因此原敬从组阁前就开始努力做陆军的工作。原敬在成功地取得绝对主义势力——以山县为首的众元老的支持后，又成功地使田中进入了内阁。由于田中对参谋本部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又是扩大出兵派的领导人，所以从田中进入内阁，就可以看出原敬意在间接地抑制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的行动。站在这个角度上，对原敬来说，接近田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从田中与原敬以往对出兵政策的态度来看，就这个问题两者应该会发生冲突。至少做参谋次长时期田中的观点，和原敬强调保持对美协调关系、主张应由内阁领导出兵的观点，基本上找不到共同点。但是，从田中在原敬组阁前后的发言中，可以明确看到他打算修正以往的强硬路线。比如说，原敬在1918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就出兵西伯利亚一事，田中也认为此非上策而且是没有必要的事，这一点与我的想法一致。就其他军备上的事，我大致说了我的意见，大体上田中也说跟我看法相同。但事实上在具体问题上他是如何考虑的就不得而知了。（《原敬日记》）^①

原敬认为田中入阁，是可以利用山县、田中强有力的影响，重新考虑陆军提出的出兵政策的好时机。因此，田中认识到有必要修正出兵政策，是促使原敬决定让田中担任陆军大臣的重要理由。为了保持与田中的后台——山县的关系，确保与山县、田中这条线的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第3頁。

协调关系对原敬来说是很重要的。原敬认为这才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定的条件，同时也是可以发挥强大政治领导力量的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中成立起来的原敬内阁，从10月下旬开始首先实施在西伯利亚减少兵员的措施。提出了削减案：第一次案中计划削减约一万四千人，第二次案中把派兵总数控制在二万六千人。并且于12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以上派兵削减案。此外，就东支铁道管理问题，也原则上变为国际管理方式，并于1919年（大正8年）2月10日签署了铁道协定。^①

基于原敬内阁制订并实施了削减派兵计划，对日本独自扩大出兵政策抱有警戒态度的美国政府对日的姿态也有所缓和。对原敬内阁来说，建立对美协调关系这个课题，姑且算是取得了成功。而正是田中陆军大臣的合作态度，支撑了原敬内阁不断提出的削减派兵计划。从以下原敬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此时田中是如何看待出兵政策的：

田中说，在西伯利亚的军队，即使西面有英法要求援助，也无法前往；而且如今已完成了当初救援捷克斯洛伐克的目的，基本没有必要驻屯大军于此。现在即使只停留一点的军队，不光难免惹来各国的怀疑，还会招致美国的不快，又需要莫大的费用。如果在议会上被人问到为什么要投入巨资将军队驻屯此处，则无言以对。因此对国家来说算不得上策。只要留下负责保卫治安的守备队，其他召还后改为平时编制，阁下意下如何。^②

在此之前，1918年10月22日的外交调查委员会上，在犬养毅曾向田中询问日军是否有攻占西伯利亚的可能时，田中回答说：

① 細谷千博：《ロシア革命と日本》，第148页。

②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第50~51页。

“观目前西伯利亚之状态，不管什么情况最终可出动五个师团。至于阁下问到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我个人不得不说，想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①也就是说，田中明确认为即使投入很多兵力，也未见得会取得成功；不如瞄准实际利益，只留少数兵力守住铁道更合算。

由此可见，田中已经大幅地修正了以往出兵路线一边倒的态度。田中也做出了如果再加深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戒心的话，必然会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不利的处境这样的判断。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想要建立“大陆国家”日本，那么与美国保持协调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此外最重要的还在于，由于田中十分担心以抢粮暴动为契机登上政治舞台的民众的政治能量，会转化为对陆军军事开销巨大的批判，所以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方针政策。

为此，田中限制了参谋本部主张扩大出兵的行动，全力协助原敬内阁提出的削减派兵计划。在撤兵措施取得天皇同意后，田中以不给参谋本部判断机会的方式单方面下达了撤兵命令。由此也可以看出田中强烈的决心。但是，当时陆军整体的动向与田中的态度并不一致，特别是参谋总长上原以及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宇垣一成等人，在原敬内阁成立的前后依旧打算扩大在西伯利亚西部出兵的范围。

他们在1918年9月20日公开了《就东欧战线构成的研究》，^②其内容是以所有常备师团全部派往西伯利亚为前提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出兵计划。但是，企图在对美协调关系下建立“大陆国家”日本的田中，是不会同意在这样短时期内大规模出兵占领整个西伯利亚西部的计划的。

由此可知，为了建立“大陆国家”日本，田中主动选择了比

① 小林龍夫編《翠雨莊日記——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會議筆記等》，第273頁。

② 參謀本部編《西伯利亞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上卷，第236頁。另參見角田順校訂《宇垣一成日記》（1），第179頁。宇垣一成在其日記中也認為原內閣最為重要的課題就是決定構成東歐新戰線的相关方針政策。

较现实的手段，在国内与政党势力合作，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协调关系。也可以说，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西伯利亚、抢粮暴动等内外都展开新的政治环境下的被迫选择。这个选择也是为了能够跟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亚洲的利益，扶植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基础势力所作出的合理判断。

2. 决意撤兵的背景

原敬内阁的西伯利亚政策，虽然是从实施削减派兵计划开始的，但是到了1919年（大正8年）的5月，该方针开始有了明显的修正。此后，原敬内阁的西伯利亚政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原敬内阁与参谋本部之间基本的对立仍然存在，而且呈现波动。其中的陆军大臣田中，有时候忠实地执行原敬的路线，有时候也采取了率先为修正方针铺路的姿态，在顺利执行原敬内阁陆军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陆军大臣田中的立场，牵制了因强行主张扩大出兵而打乱了本应统一指挥作战的参谋本部。像陆军大臣田中，即使在陆军内部也积极主张一元化战争指挥实力人物，因其担任内阁大臣，结果就是相对缓和了舆论对陆军的批判，从而更加巩固了田中在陆军中的地位。而且陆军大臣田中也获得了政界、财界的一定认同。但是，原敬内阁于1919年5月17日宣布承认欧姆斯克（Omsk）的科尔扎克（Korczak）政权，提出了干涉西伯利亚西部地区的政策。陆军大臣田中也在5月17日召开的外交调查委员会上答辩说：“对俄政策保持不变，且公然承认欧姆斯克政府的话，今后若该政府请求我国出兵，相信我帝国仍将是义不容辞的。”^① 这句表明了侵占西部西伯利亚地区的意图。

原敬内阁之所以提出新的出兵政策，是试图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阻挡俄国革命的影响从远东地区波及日本，但是如果过分介入俄

^① 小林龍夫編《翠雨莊日記——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會議筆記等》，第501～502页。

罗斯远东地区的话，又恐招致与当地美国势力的对立，所以原敬内阁希望日军能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多少缓解一下这种局势。但是，参谋本部一直都想获得以沿海州为中心的东西伯利亚的权益，并且意图投入大量兵力确保侵略大陆的据点。所以原敬内阁的新出兵政策遭到了参谋本部的强烈反对。总之，即使到了此时，参谋本部也坚持俄领远东地区第一主义，对以东西伯利亚为根据地反对科尔扎克的谢苗诺夫加强了援助。

参谋本部于1918年（大正7年）11月27日制订了《俄领远东各机关指导纲要》，以大谷喜久藏浦盐派遣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通知给各部队，要求贯彻执行拥护霍尔瓦特及谢苗诺夫的方针。即使是在同年12月8日，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达成共识，而决定支持欧姆斯克的科尔扎克政权后，参谋本部也依然继续援助谢苗诺夫。但是，田中根据陆军大臣的权限，采取了抑制参谋本部的强硬方针。他于12月12日向大谷司令官发去态度强硬的电报说：“谢苗诺夫的行动往往缺乏慎重，导致我国也受到拖累，我国民应放弃同情之心。他不明大局、感情用事、急于求成、不谨慎的行动接连不断，故坚决中断给予他的援助。”^① 命令参谋本部及派遣军要遵从原敬内阁的出兵政策。这样原敬内阁才能于1919年5月承认科尔扎克政权。其间田中强有力的合作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田中的作用，参谋本部的强硬方针受到了一时的抑制。另一方面，政友会的有力支持势力——财界，也持续对原敬内阁的出兵政策给予了很大影响。财界希望能把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剩余资本投入下一个对象地域，也就是西伯利亚。所以，财界对俄领远东地区的关注度渐渐高涨起来。比如，以1918年（大正7年）8月9日成立了以目贺田种太郎（前日本帝国政府特派财政经济委员长）为委员的临时西伯利亚经济援助委员会，并以此为开

^① 《大谷司令官宛田中陸相電報》（大正7年12月11日），《西受大日記》大正7年第2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端，1919年（大正8年）1月18日又集结了三井、三菱、久原、古河、住友等大企业，组织成立了远东兴业团。同时，关西的财界也向政府提出了《关于保证对俄贸易的请愿书》，要求扩大在西伯利亚的贸易范围。由于同年5月2日临时西伯利亚经济委员会的早川千吉郎（三井银行理事）委员和木村久寿弥太（三菱合资会社总理事）委员强迫原敬内阁承认科尔扎克政权，所以可以说财界的要求是原敬内阁提出承认欧姆斯克的科尔扎克政权的直接动机。^①

其后，与科尔扎克政权持续纷争的谢苗诺夫投降，科尔扎克成为西伯利亚的唯一政权，日本政府也开始了正式的援助。但是，原敬内阁的出兵政策得以稳定也仅仅是一瞬间的事。因为自加藤恒忠作为驻欧姆斯克政府的全权大使赴任后，渐渐发现科尔扎克的政权基础并非万全。

进入7月（1919年）后，科尔扎克政权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为了支援科尔扎克，阻止布尔什维克势力渗透到该地区，日本政府于7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讨论是否有派兵的必要性。自此事态急剧发展，以致同月15日，住在欧姆斯克的松岛鹿夫要求日本出兵，而且同月18日，驻日俄罗斯大使库尔本斯基要求日本派遣两个师团的兵力支援科尔扎克。以此为契机，原敬内阁不得不再次讨论是否应该对西部西伯利亚地区增派军队，以及占领整个对西伯利亚的政策。

在这样的事态中，田中于8月13日向外交调查委员会递交了备忘录，并在其中写道：“随着世界大乱，国民思想为之动摇，不容乐观。更何况，帝国在朝鲜已经感觉到该派的侵袭，故今日不得不大讲特讲处理此事之方法。”^② 田中强调：为了阻止“该派”，即布尔什维克军“侵袭”殖民地朝鲜以及满蒙地区，所以在西部西

① 《日本とコルチャック政権承認問題——原内閣におけるシベリア出兵政策の再形成》，第128～129页。

② 《日本とコルチャック政権承認問題——原内閣におけるシベリア出兵政策の再形成》，第148页。

伯利亚地区投入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在西部西伯利亚投入大量兵力的构想，明显与田中以往的东西伯利亚政策不同。如果说田中以往的增兵构想是攻击性出兵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构想则带有很强的防御性。参谋本部也已经制订了增派军队到西部西伯利亚的计划，^①田中的出兵构想成为8月14日内阁会议上的讨论事项。出于经济上不合理考虑而反对出兵的高桥是清藏相与田中在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第二天，即15日的外交调查委员会上也提出了增援西部西伯利亚这个议题并进行了活跃的争论。田中在此发表了以下见解：

不得不承认我帝国为了防范过激派东进，采取建立缓冲地带这个自卫方针已经成为眼下当务之急……为了国家，渴望此时各位能承认，维持贝加尔湖以东的秩序乃我帝国之任务这一方针是眼下最大急事。（《翠雨庄日记》）^②

田中以阻止过激派，即布尔什维克派侵入俄领远东方面为理由，要求获准增援西部西伯利亚地区。不过，田中的增兵论说到底仍是在原敬内阁一贯对美协调路线框架内的增兵论。犬养、平田委员在提问中担心由于增援造成军费的增大以及与欧美列强的关系恶化。田中对此回答说：“说到是不是要以国联为赌注继续在西伯利亚的行动这件事，把军事上的意见放在一边，从国策上来讲，已经是没有时间来考虑了。”^③从以上答辩中也可以看出田中的观点。

也就是说在田中的增兵论中，明显是坚持将原内阁的对美协调关系这个“国策”放在了“军事”之上。结果，9月8日在原敬

① 参谋本部编《西伯利亚出兵史——大正7年乃至11年》上卷，第356页。

② 小林龍夫編《翠雨莊日記——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會議筆記等》，第641～642页。

③ 小林龍夫編《翠雨莊日記——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會議筆記等》，第645页。

首相、田中陆相、内田康哉外相、加藤友三海相均出席的情况下，就该问题向派遣军司令官大井成元、驻西伯利亚大使加藤恒忠发出了训示，内阁的总体决议是在慎重对待对美关系的同时，希望能近期内维持现状。此外，原在大正8年（1919年）9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不管俄国怎么样，现在的情况是只能尽力维持我国在西伯利亚的势力，而后待其变化。另外，尽力保持与各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美国，不得与其经常保持充分沟通。我训示了以上内容，而且陆相、外相也对各方面进行了训示。”^①

此后原敬内阁的对西伯利亚政策虽然持续动摇，但是一步也没有迈出保持对美协调关系的这个框架，所以田中的增兵论内容实际上是极为受限制的。尽管如此，田中作为陆军大臣，在围绕实施增兵论和继续维持对美协调关系这两个政策上，还是渐渐陷入了困境。他在第二十五次外交调查委员会上吐露了痛苦的心情：

如果幸运能维持与美国的协调关系，我陆军万分希望能早日实施增兵之举；如果说万一美国表示不同意增援那该怎么办的话，作为帝国不应对我军陷入如此危险状态而袖手旁观，根据不同情况而采取某种措施。但时至今日不得不说，撤兵断非上策，如果将我国派出的军队撤离西伯利亚的话，则立即会波及朝鲜八道；而将在满蒙的兵力撤离北满的话，则意味着放弃北满的力量。（《翠雨庄日记》）^②

事态应该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即使坚持增援的话，也看不到收拾事态的希望，更何况这样想取得美国的同意又根本没有可能。如果强行实施增援的话，恐怕以后想撤兵都困难。这就意味着，此时原敬内阁对西伯利亚政策自身已经破产。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第138頁。

② 小林龍夫編《翠雨莊日記——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會議筆記等》，第728頁。

就在田中的这个发言前后，1919年11月15日，科尔扎克等欧姆斯克政府首脑因受到苏维埃军队的攻击放弃了欧姆斯克。田中于11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提交了派遣6000人的增援案。但是，高桥藏相说：“今后以我国一国之力想维持西伯利亚的安宁，不光财政困难，也缺乏理由，在内政上也说不过去。应与美国交涉，要么共同援助，彼若不肯，退而求其次不妨取得其同意做后援的约定，再若不肯，不如退兵。”^① 高桥的发言代表了内阁的多数意见。也就是说，田中的提案事实上遭到了否决。田中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竭尽全力让大家了解并承认，现在已经到了增援或者退兵二者择一的时刻，为了对付万一的增援，准备还是要准备的。

1920年（大正9年）1月9日，美国突然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军。一直动摇不定的原敬内阁此时也就撤兵逐渐统一了意见。例如，原敬首相在1月9日与田中陆军大臣座谈的时候提出了撤兵的方法：“我认为在此驻屯军队会成为各国猜疑的焦点，而且耗资甚大，国内舆论上也会对此产生疑问。但是从该地方的特殊关系上来说当然也不可能轻易就撤兵。所以在将来实施计划的时候，应不失时机地召集在留居民彻底地撤兵。仅防守浦盐、或者与支那共同守备其领土内的东清铁道。如此可使局势发生变化。”^②

田中也回答说：“实际上退兵的话，我心里也在考虑，最初的出兵是因为要援助捷克，所以没有离开捷克的时候可守备各地，其撤退后可退至浦盐等地，我考虑撤兵时可以采取这个名义。”^③ 可以看出两者就退兵的方法与条件上，观点是基本完全一致的。此后，1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以姑且退兵至乌拉基斯托克为条件，决定派遣5000人到6000人的兵力前往满洲，强化对苏维埃军的防御体制，意图确保满洲地域的安全。就这样，决定从西部西伯利亚

①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記》第五卷，第174页。

②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記》第五卷，第200页。

③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記》第五卷，第200页。

的扎巴伊科尔及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撤兵，这应该说是西伯利亚撤兵的第一步。

其间，田中提出作为退兵的一个环节要求增派兵力的观点，除了纯粹军事上的意义外，也带有向一贯主张强硬的参谋本部暂时妥协的意思。田中向原首相讲述了“陆军内部的感情”，^①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陆军表示对撤兵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面对从扎巴伊科尔、哈巴罗夫斯克地区退兵马上就要成为事实的现状，对田中来说最大的难关，就是如何统制参谋本部。

此后，1920年（大正9年）4月4日发生了乌拉基斯托克事件，5月2日发生了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日苏两军爆发了军事冲突。为此在6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从哈巴罗夫斯克撤兵。虽然参谋本部表示坚决反对撤兵，但实际上却朝着退出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方向发展。同年年末，山县有朋在与原敬座谈的时候，提出了从西伯利亚全面退兵的政策，此时原敬对山县的提案是持反对姿态的。^②

山县是想让原敬首相注意到，由于美国已经从西伯利亚撤兵，如果日本继续出兵的话，必定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原敬内阁到此为止已经于6月28日发表了从萨古列昂及扎巴伊科尔撤兵的声明，又于9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相继通过了从哈府撤退的决定。以山县此次提出的全面撤兵为契机，原敬内阁的西伯利亚撤兵政策从局部地区撤兵转变为全面撤兵。百濑孝就山县的态度评论说：“山县终其一生不变的就是，想要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和主张与列强保持协调关系。在英美认同的范围内试图进行对外扩张，但是如果英美反对的话就会撤退。”^③这一观点认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为英美先进帝国主义国家所限制，对英美所具有的从属性。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第201頁。

②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第319頁。

③ 百瀬孝：《シベリア撤兵政策の形成過程》，《日本歴史》第428号，1984年1月，第87頁。

此后，在1921年（大正10年）1月22日再次召开的第44届帝国议会上，又围绕西伯利亚政策问题展开了论战。在野党宪政会反复要求原敬内阁从西伯利亚全面撤兵。原敬内阁此时执行对外依然表示反对撤兵、事实上决定撤兵的政策。这是田中陆军大臣在4月8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的。田中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说，从山东撤兵的同时，“关于西伯利亚问题也应抓住这个好机会以退兵为上策”。^①这是田中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从西伯利亚完全撤退的提案。由于新推出了对西伯利亚、满洲、朝鲜的统一政策，原敬首相于5月16日将各地军司令官、总督、领事召集到东京，在召开的会议（后被称之为东方会议或满朝会议）上承认将田中提案的全面退兵方针作为内阁的统一方针。^②

到此时为止，原敬内阁采取全面退兵的方针已经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个是由于美英批判日本加大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同时从世界整体来看和平主义也有所抬头；此外各国渐渐开始承认苏维埃新政权，如果日本独自与国际政治逆行的话，则有相当大的危险。而且就国内政治的动向来说，山县和在野党宪政会提出的退兵意见是合理选择，其发言也很合时宜；从经济动向上来说，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景气已经呈现后退的倾向。因此出兵的巨额军费已经成为日本财政的负担，这一观点在日本国内逐渐形成共通认识。

同时，军事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伴随着出兵西伯利亚政策的延续，其自身目的的不明确日益暴露，士兵的军纪颓废逐渐明显。而且，由于战斗区域的扩大、兵站的延伸，军需物资的补给也超过了上限。此外，由于不得不分散派遣兵力，导致日军需要在各地对付苏维埃政权的游击战。日本的付出虽然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想，但是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第371页。

② 关于东方会议内容及意义，参见雨宫昭一《シベリア撤兵過程と東方會議》（《歴史学研究·別冊特集》，1979年度历史学研究会大会报告，青木书店，1979）。

仍旧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国内反军国、反陆军的国民感情逐渐抬头等理由，原敬内阁不得不承认反对退兵是缺乏根据的。^①

虽说有着上述情况，但为什么田中要在此时直接在内阁会议上明言撤兵呢？最为重要的原因，可以说这是田中务实地对待国内外形势的结果。田中从参谋次长时期开始，就率先主张出兵俄领远东以及西部西伯利亚。而他这样主张，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那时当地在政治上出现了空白。

但是，1920年（大正9年）4月6日，在维尔夫内丁斯克（后转移到齐塔）（Chita）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在逐渐安定后要求日本不要干涉内政，这样至少在国际政治上日本就失去了干涉的正当性。乌拉基斯托克方面派遣军司令大井成元（1921年1月由立花小一郎接替）在向士兵训示出兵目的时说，“此次出兵是应政治、外交的需要，与普通的国防作战大为不同”，^②由此也可以看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军事目的。倒不如说西伯利亚政策纯粹就是政治和外交上的问题，而且随着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随时存在退兵的可能性。

就这一意义来说，虽然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撤兵是典型的半途而废，但是田中选择在这个时候撤兵，可以说是从现实角度出发作出的决定。而且，当事者的田中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西伯利亚出兵本来就具有很强的非军事性的性质。所以，田中作为内阁的一名成员能够从政治判断的角度出发提出退兵的主张。同时，对于从一开始就对西伯利亚政策发挥领导作用的田中来说，早点亲手解决这个问题，能确保有充裕的时间对付下一个政治局面。

实际上，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西伯利亚政策的转变虽然给田中和

① 参见藤村道生《シベリア出兵と日本軍の軍紀》（《日本歴史》第251号，1969年4月），吉田裕《日本帝国主義のシベリア干涉戦争》（《歴史学研究》第490号，1981年3月）等研究。

② 男爵大井成元大将述《西伯利亚出兵に関する思いでの一端》，外務省調査部第一課，特第10号，1939年5月，第16页。

陆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田中在此期间内以此作为代价换取的政治“成果”亦不在小：一是田中修正了以往那种建立“大陆国家”日本的构想，二是切实地接近了政党。另外认识到通过军政一致手段制定适应大战后国内外政策的必要性，并且摸索出了一些实战的手法。

特别是应该注意，在围绕西伯利亚出兵的政治斗争过程中，由原敬和田中分别代表的政治和军事人物，形成了围绕指挥战争问题的政军关系基本框架，并做出了相当合理判断的历史事实。同时由这两个人所体现出的政军关系来说，不仅展示了一个典型事例，而且对此后政军关系的展开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更具体地说，西伯利亚出兵在初期是特别明显的所谓“陆军外交”，因原敬与田中调整政军关系的基本方针而得到了调整，从而将其危害控制在了最小限度。可以说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与其对立不如构筑协调政军关系的范例。

田中在1922年4月8日的内阁会议上，以生病为由向原敬首相表明了辞职的意愿。田中称：“今日病倒甚为遗憾，为了无论如何能够与阁下再共掌政局，万请允许此时静养。”^①因原敬首相的执意挽留，田中没有辞职。但是，田中自前一年2月26日心脏病发作以来，经常说自己身体不好。在东方会议最后一天的5月25日，田中再次表明辞职。结果，原敬内阁于6月18日接受了田中的辞呈，从6月9日开始由田中鼎力推荐的山梨半造接替了陆军大臣的职务。此时，田中近三年的陆军大臣经历宣告结束。田中在此后获得短暂的调整，正如第二章所见，后来通过加入政友会，又正式地重返政治舞台。

四 结束语：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原型

围绕争夺对西伯利亚战争的领导，从政军关系的视点重新审视

^①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五卷，第371页。

政府内部动向，可以总结出以下要点。即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就其政治领导和战争领导的范畴而言，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还处在政治领导和战争领导未分化时期，但以日俄战争为契机，日本军政关系出现了军人及军事权力的膨胀化。换言之，伴随着军部的成立，军政明显地呈现出两个领导机构分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加剧，又起因于原敬内阁成立时所开始的政治领导对政党政治时代战争领导的介入。作为这一分化的制度条件，则是统帅权独立制度。

但是，进入了大正时期后，政党组织作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相互协调，甚至一体化的意向日渐强烈。而且这绝不仅是政党方面的要求，在痛感有必要与政治、外交上保持同步的军部中，浮现出了一批采取该姿态的军事官僚。雨宫昭一指出了这一史实，他认为：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是“政党，即议会势力开始参与以统帅权直接决定最高国策的时期，同时也是面对日俄战争时旧的战争领导形态开始崩溃，取而代之的新型战争领导形态在现实的、具体的政治过程中，开始明确出现的时期”。^①正如雨宫昭一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政军关系正在摆脱以往的形态，开始构筑新型关系。

在此，借用雨宫昭一的说法就是：“在机能上是政略主导的政战两略一致，而在机构上则是政治、军事两权向政府的集中，与政治、军事两当局机能分工关系的统一。”^②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从最初的未分化到以日俄战争为契机的二者分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军事领导独立化倾向的清算，在清算方法上二者的合理一体化。说到底，是在采用两权向政府“集中”系统的同时，又确立了政治机能和军事机能的“分工”系统。可以说，正是这种集中与分工地位与作用的明确，才是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实际情况。而政府和军部围绕西伯利亚出兵决策的对抗与调整的政治过程，则是突

① 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第90页。

② 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第91页。

出描绘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实例。

正如本章所分析过的，出兵西伯利亚的政策不仅是日本军事领域的问题，而且也是与欧美列强的外交冲突中的一环，是需要一贯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来解决的问题，其政军关系上的调整与协商是必不可少的。如大家所熟知的，称陆军不顾大局任性而为的“陆军外交”，而一直予以牵制、批判的不仅有原敬，而且作为实力派的山县有朋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这从山县的言行中是可以清楚看到的。

山县的基本立场是强调重视对美关系和强调政军关系的紧迫性，这一立场最终成功地约束了田中的行为。这还使此后的田中认识到，政军关系的一体化对最终建立“大陆国家”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从田中在坚持实施西伯利亚出兵后，总是以对美协调关系为基本点来决定增援与退兵计划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政军关系的调整在当时虽说并非一帆风顺，但这种调整的确通过设置外交调查会，使得政府主导的政治、军事领导得以展开，而且通过调查会中后藤新平所代表的官僚以及财界的积极支持、参与得以实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权力的集中与机能的分工”这种政军关系的构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调查会才得以具体实现的。

田中在此后加入政友会，并就任该会总裁，率领政友会执掌了政权。正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到过的那样，贯穿田中一系列政治行动的基本立场，就是为了构筑日本型政军关系，使军事接近政治是必须条件，而且需要在政治主导（即政略主导）下达成政军两略的一致。在西伯利亚政策的展开过程中，也是由于接受了山县的影响，田中在增设两个师团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反政党立场逐渐消失了。^①

从原敬内阁时期就出兵西伯利亚问题的处理来看，当时的政军

① 有关田中进入政界的背景，参见藤原厚《近代日本の政軍関係——軍事政治家田中義一の軌跡》，大学教育社，1987，第203～246页。

关系整体上是构筑了良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西伯利亚退兵以后，即 1920 年代的政军关系仍能一直顺利地维持下去。反之，从出兵到撤兵，由于以原敬首相为中心展开了有力的政治领导，引起了军部内部对政党政治极大的不满及反作用力。虽然军部的不满极为强烈，但是此时期国际上裁军的形势高涨，加上国内外的舆论都要求世界和平，所以军部的政治发言权在活跃的政党统治中不断被削减。在这样的形势中，作为大陆政策及构筑总体战体制的骨干，军部为了能持续发挥一定的政治作用，就要求确保其自身的正当性。在进一步加深认识以后，从出兵西伯利亚到撤兵西伯利亚的这系列政治过程，对军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第四章

围绕陆军军制改革问题政军 之间的抗争与妥协

一 前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日本陆海军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中国针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反日民族运动激化，对德战争结束后占领原德属南洋诸岛，预料到大战后日本会乘机侵入中国的美英等欧美诸国必将对立等等，考虑到日本将要陷入国际新形势的包围，所以着手准备军备扩充。

1917年（大正6年）3月，陆海军着手国防方针的修订工作，起草了各种《国防整备案》，提出了军备扩充的构想。《国防整备案》于第二年5月根据陆海军协议被调整成一体化成案，6月12日上奏天皇，同月29日得到批准，被制订成新的国防方针。根据此方针，假想敌国的顺序由以前的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改变为陆军的敌国为俄罗斯、美国、中国；同时海军把美国设想为第一号敌国。海军把两个8艘战舰队和一个8艘巡洋舰战队合计编制成一个由24艘舰只组成的主力舰队，实现了所谓的《八八舰队案》。^①

① 关于1918年（大正7年）《帝国国防方针》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国家总体战形态所规定的内容，参见黑野耐《帝国国防方针の研究——陸海軍国防思想の展開と特徴》（総和社，2000），第3章《第一次世界大戦と大正7年国

对此，1918年（大正7年）9月29日，替代了寺内正毅内阁而登场的原敬内阁，提出了作为四大政纲之一的《国防的充实》，表现出了在大战景气背景下对军备扩充的欲望。在第42届帝国议会上，同意向陆军追加4.8282亿日元、对海军追加9.1445亿日元的正常维持费，就是很明显的表露。^①

在这样的时机中，海军的军备扩充由于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海军力量增强的因素，国民还比较易于接受。相反，由于沙俄崩溃，陆军第一假想敌国已趋于弱化，这就使陆军军备扩充的理由变得没有说服力了。于是，陆军军备扩充的理由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现代兵器的飞速发展，必须实现军事的现代化，以及需要实行以导入欧美先进诸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用的陆军军队编制的三单位制和军团制为代表的军制改革。在此过程中，陆军提出了为实现25个军团标准兵力编制的总经费达20亿日元的25年持续事业计划的陆军扩充案。

针对该陆军扩充案，原敬首相把被认为是军扩论者的田中义一拉进内阁。为实现与美国的协调、抑制军部的政治介入，以及实现强化政党政治等政策，尽管是军队扩充的问题，内阁也要把握其主导权，尽可能地压制军部的要求。为此原敬首相对军部特权制度改革表现出积极姿态。把殖民地总督的武官专任制修订为文武官并用制、原敬首相就任临时海军大臣执行事务管理等举措，都是改革的成果。但是，尽管一部分得以实现，从整体上来看还是停留于不彻底的改革。

防方針》第2节《大正7年国防方針の思想》，第167~189页。相关研究，参见山口利昭《国家総動員研究序説》（《国家学会雜誌》第92卷，第3、4号，1979年4月），額瀨厚《臨時軍事調査委員會の業務内容》（《政治經濟史学》第174号，1980）等。

① 参见藤原彰《軍事史》，東洋經濟新報社，1961，第271~272页。1918年度的直接军费为5亿8007万円，占年度财政支出总额的58%；1919年度为8亿5360万円，占65%，1920年9亿3164万円，占46.8%，1921年度8亿3792万円，占41.9%，1922年度6亿9029万円，占45.5%。

不过，仅仅在陆军军备扩充案是否充分地具有经济合理性这一点上，军部和政党之间产生了对立，这意味着政党对军制改革的要求从最初开始就包含一定的局限性。看来，政党能够提出更多的非妥协的军制改革要求和对军部的批判，还有待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支持的裁军社会舆论的形成。

本章就从以上背景出发，首先要探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适应总体战阶段军事力量再编强化作为一大目标的军部，特别是陆军所谓的总动员政策，在以大正民主主义为契机的政党政治的展开和要求裁军舆论的抵抗中，是如何进行推进的。论述的中心将着重于对军部批判的舆论产生推动力的政党所进行的军制改革，以及抵抗改革的军事官僚所做的对应过程。^①

更具体地说，要阐明的问题有：应对总体战而进行军事装备现代化及大量生产，由于日本工业能力水准的低下始终受到限制的问

① 关于当时陆军的性质，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政军关系的改观》。相关研究还有：藤原彰：《総力戦段階における日本軍隊の矛盾》（《思想》第399号，1957年9月），后被收入《日本軍事史》上卷，日本評論社，1987）；今井清一：《大正期における軍部の政治地位（上）、（下）》（《思想》第399号、402号，1957年9月、12月）；木坂順一郎：《軍部とデモクラシー——日本における国家総力戦準備と軍部批判をめぐって》（《季刊 国際政治》第38号，1969年4月）；芳井研一：《日本における総力戦の構築》（《日本史研究》第131号，1973）；由井正臣：《総力戦準備と国民統合》（《史観》第86、87号，1973年3月）；吉田裕：《第一次世界大戦と軍部——総力戦段階への軍部の対応》（《歴史学研究》第460号，1978年9月）；山口利昭：《国家総動員研究序説——第一次世界大戦から資源局設立まで》（《国家学会雑誌》第92卷，第1、2号，1979年4月）；戸部良一：《第一次大戦と日本における総力戦の受容》（《新防衛論集》第7卷，第4号，1980年3月）；藤村道生：《国家総力戦とクーデター計画》（三轮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の1930年代論として》創世記，1918）；横山久幸：《日本陸軍の軍事技術戦略と軍備構想について（1）（2）》（《防衛研究所紀要》第3卷，第2号，2000年3月）；額綱厚：《総力戦体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国家総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黒沢文貴：《対戦期間の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佐藤鋼次郎：《軍隊と社会問題》（成武堂，1922）等。佐藤鋼次郎在《軍隊と社会問題》（成武堂，1922）中谈到了陆军改革方案的“军队的社会化”、“彻底的军队民主主义”等内容。

题；以及围绕军事装备应有发展模式而产生的陆军内部的对立、抗争应该如何解决的问题。在对这两个问题把握的同时，进一步阐明坚持军备充实政策的陆军（军事），与推进国内经济再建和以日美关系为中心的协调外交路线的原敬内阁（政治）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妥协的过程。

其次，以所谓总体战体制构筑这一国家目标为背景，试图指出当时政军关系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阐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陆军为中心推进的一系列总动员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性质，探讨成为当时政军关系焦点的，以陆军为中心的军扩计划和军制改革问题的实际状况。在此基础上，就作为军事即军扩计划，政治即军制改革问题的直接当事者的军部和政府、政党之间的对立构造，以及二者为实现总体战体制构筑这一国家目标进行妥协的过程。总之，本章的目的在于接续前一章节阐明的在国内政局的变化中，政军关系基本构造形成的过程以及其背景。

二 对军部的批判和政党的军制改革案

1. 大正时期对军部进行的批判

大正时期对军部展开的批判，是以大战中开始兴起的以吉野作造等代表的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为背景的产物。吉野在被当时视为自由报界代表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若干以军部改革论和反对军备扩充论为中心的论文。^①以吉野为代表的对军部的批判在1922年（大正11年）最为激烈。这一年《中央公论》3月号，以“陆军军备缩小论”为题编辑特集，登载了水野广德的

① 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陸軍の拡張に反対する》（1918年2月号）、《軍隊の非文明》（1919年2月号）、《軍事思想の普及》（同年4月号）、《徴兵制度改革の急務》（同年6月号）、《軍隊生活の内的的改革の必要》（同年11号）、《学校における兵式体操の研究》（同年12月号）、《国防計画の根本義》（1920年10月号）等。

《陆军军备缩小之可否及其难关》和三宅雪岭的《缩小陆军和改善军事思想》。

其中水野认为，近一年来陆军裁军论的急速高涨，关于各党派联合起来在帝国议会上不断提出陆军缩小案的状况，一方面是基于各党派的政党策略，另一方面是“从对批判性舆论很敏感的政党据此制订政党政策一事，也多少能够察觉到舆论的趋向”，^① 政党对军部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并且，水野认为陆军军备缩小论的根据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由于陆军第一假想敌国沙俄的崩溃，日本军队已具有相对减轻军事力的余地；二是通过平时兵力的整编缩小达到国家经济的再整编。并且认为，这些争论最终归结点是，国民生活的安定，涵养民力，振兴产业，以及纯军事问题方面的改善兵器、军人待遇，由军队再编提高效率。

总之，议论的中心是，如果不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积极政策，军事装备只要保持维持国内以及朝鲜、台湾治安所必要的兵力就足够了。因此，常备兵力应根据内外形势尽可能地以少数精锐化为目标，为此也要考虑建立起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兵力所需要的准备体制。同时说明，军事力量规模的规定应以国策规定为前提，若无此规定的话，军事力量将会无限地自我增殖下去。另外，裁军论中还有关于军制改革的兵役年限的问题，即缩减兵役年限，以图提高军事教育能力。最后水野对军部利用特权制度为盾牌，对军制改革要求充耳不闻的现状进行了如下的尖锐批判：

今天军阀的跋扈，虽然其罪之根源在于军阀，但另一方面

① 水野広徳：《陸軍軍備縮小の可否と其の難関》，《中央公論》1922年3月号，第82页。此外，水野広徳在《中央公論》上发表的文章有：《華盛頓會議と軍備縮減》（1921年10月号）、《軍備縮小と国民思想》（1922年1月号）、《軍事上より見たる海軍協定》（同年2月号）、《帷幄上奏權と統帥權》（同年5月号）、《軍部大臣開放論》（同年8月号）等。关于水野的研究，参见栗屋憲太郎等编《水野広徳著作集》全8卷（雄山閣，1995），大内信也《水野広徳——帝国主義日本にnoと言った軍人》（雄山閣，1997）等。

宪法上的不合理以及承认官制上难以理解制度存在的国民也应该说是负有责任的。对于此制度，如果不首先进行改善的话，不管国民如何喊破喉咙大声喊叫缩减陆军，他们这些军阀也会依仗帷幄上奏权，以大臣辅佐的官制为武器而不顾国民的要求。所以要决定是否应该缩减陆军时，需要首先确立对大陆的国策，然后看到有缩小之必要，就应对作为军阀武器的官制进行改革，废止军阀的帷幄上奏权。^①

进而，《中央公论》1922年12月号，以“值西伯利亚出兵全面失败、全部撤退之际埋葬军阀的送葬词”为题编辑特集，刊登了为打击军阀所形成的缩减军备舆论，以及为推进实施缩减军备开始具体的活动，导入陆海军大臣文官制，反对军部的政治介入，废止帷幄上奏权等特权制度的必要性等内容的论文。就这样与自由主义的报界动向并行，各政党之间也推出了军部改革论。

政党里最先提出军部改革论的是国民党，它在与政友会的对抗上表现得最为积极。国民党首先在1919年（大正8年）3月25日向第41届帝国议会（1918年12月~1919年3月）提出了《关于陆海军大臣及台湾、朝鲜总督并关东都督任用资格的质问主旨书》，要求修改军部大臣和殖民地长官的武官专任制，主张导入文官制。不过，国民党的该主张在第14届总选举（1920年5月10日实施）中由于政友会大胜而自消自灭了。

在1921年（大正10年）1月20日的国民党大会上，总裁犬养毅发表了以产业立国主义为代表的新的军备改革论。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军事、国际关系为支柱，相互之间互相补充，主张采用协调和谐的国家政策。也就是说，有关经济方面，实施财政整顿和裁军，提高产业生产性，继续提升能够在国际市场充分抗争的经济能

^① 水野広徳：《陸軍軍備縮小の可否と其の難関》，《中央公論》1922年3月号，第91页。

力；在国际关系方面，贯彻面向世界的产业第一主义，明确日本和平主义的国家立场。犬养所提倡的这个所谓产业立国论，依据经济合理性在总体战阶段保持高效率的军事力量，以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目标。仅仅在这一方面，就成为了政财界和希望创出适合总体战阶段的军事力量的军部内革新派可以达成一致的内容。

同时，一直对军部批判持消极态度的宪政会、政友会也在第45届帝国议会（1921年12月~1922年3月）上对军部进行了批判，在第45届帝国议会上呈现出的批判气氛犹如“军部批判议会”一般。到此各政党相继提出了军制改革案。最初的是在1922年（大正11年）1月28日尾崎行雄和岛田三郎联名向众议院提出的《关于陆海军事军备以及特例的质问主旨书》，内容为导入军部大臣文官制、废止军部大臣帷幄上奏权等。

接下来2月1日，宪政会的野村嘉六提出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和要求废止帷幄上奏权的质问主旨书，2月7日政友会提出《关于陆军的整顿和缩减的建议案》，同时政友会干部大冈育造在全体大会上对军部的特权制度进行了批判。另外，3月6日国民党的西村丹治郎和植原悦二郎提出了《关于陆海军大臣任用的官制改正建议案》。在闭会前一天的3月25日全体大会上通过了该提案，各政党对导入军部大臣文官制所持的赞成意见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提出上述建议案的其中一人是植原悦二郎，他在提出建议案的理由中提到要求缩减军备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关系时说：“如果不对此官制进行改革的话，虽然我国的国力和国民全体迫切期望，也如同海陆军整顿一样根本不可能实现。”^①为了缔造适合总体战阶段的军事力量，不能单靠专门负责军事领域的军人作为军部大臣，应让具有广泛知识和视野的人物来担任。这一军部大臣任用资格扩大的主张，打破了被认为是阻碍政党政治强化要因的军部大

①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刊行会編《大日本帝国議会誌》第13卷，大蔵省印刷局，第947~948页。

臣现役武官制，政党想要确立能够统治军事的制度，力图实现政党一直以來所持有的主张。

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在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签订第二天，即1922年（大正11年）2月7日，政友会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陆军整顿缩减的建议案》，国民党也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军备缩减的决议案》。这些裁军要求，首先重新探讨缩减现有军事力量，进而是经济的调整，最终实现适合总体战阶段的军事力量的目标。

提案者之一的大冈育造认为，将来的战争必将会采取更加高度的总体战形态，为此，现代兵器的开发和装备，以及培养能够推行、指导总体战的有才能的军事干部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应该导入对国民进行以普及军事思想为目的的军事教育。

犬养毅也从自己主张的产业立国论出发，提出了兵役一年、削减有关的陆军学校、削减10个常备师团、增加军事工资、改良充实兵器、向学校及青年团出借武器和充实精神教育等具体措施。^①政友会、国民党提出的两个议案还归结为以“政府把陆军步兵的服役年限缩短为1年零4个月，并且实行各种机构的统一，以期减少经费4000万日元”^②为要点的《陆军军备缩减建议案》。^③此议案是两党通过共同提出的形式在议会所进行的审议，在1922年3月25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得到了批准。

一连串的裁军要求是具有国内、国际背景的，即国内从1920

①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刊行会編《大日本帝国議会誌》第12卷，大蔵省印刷局，第655~656页。

②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刊行会編《大日本帝国議会誌》第12卷，大蔵省印刷局，第1273页。

③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刊行会編《大日本帝国議会誌》第12卷，大蔵省印刷局，第1273页。尾崎行雄：《軍備制限論》，紀山堂書店，1921，第80页。尾崎行雄指出缩小军备的理由是：“对陆军进行适当整编的话，可以节俭相当的国家经费，将此投入到教育、学生的事业上，仅此就将增强国家的富庶与力量。不仅如此，作为间接的利益，被免除兵役的壮丁可以从事生产，在无形中增强了国力。”

年（大正9年）3月出现的战后恐慌而引起的财政危机，以及从国际上来看，按照1921年（大正10年）7月美国总统哈定的倡导，主要以削减主力舰为中心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的召开为代表的裁军动向。裁军运动的代表领袖尾崎行雄亲自向众议院提出《限制军备决议案》，1921年2月10日在全体会议上以38票对285票的极大差距被否决之后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全国各地进行以要求裁军运动全国化的演说，获得了很大反响。尾崎的裁军要求运动得到了自由报界的极大支持，《中央公论》反复登载与裁军论相关联的论文和报道，同样《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军备缩减决议案》（1921年2月12日），《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限制军备和军阀的势力》（1921年2月19日）等也相继发表。

另外，同年9月17日，为了有组织地推动要求裁军运动，由尾崎行雄、岛田三郎、吉野作造和堀江归一四人为首发起组成了军备缩减同志会。有很多各界的裁军支持者参加该会，并以“军备缩减，打倒军国主义，确立和平政策”等为口号，要求缩减军备的活动愈加广泛。另外，以武藤山治为中心的日本实业组合联合会也在同年3月开始了军备缩减运动，其中武藤主张通过实现裁军“从威胁健全财政的军事费用的过重负担中解放出来，结余资金投入发展民间工业”等。除以武藤为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求裁军外，垄断资产阶级也积极参与裁军运动。同年10月以乡诚之助为团长，以涉泽荣一、井上准之介、和田丰治、藤山雷太、团琢磨等为发起人的实业视察团对欧美各国进行访问，所到之处都进行游说：宣扬日本是努力实现和平主义的国家，为此希望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取得成功；阐述日本在经济政策方面致力于推进与国际情形的协调等等。

2. 陆军的危机意识与军备改造计划

如前所述，以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为背景的要求军制改革、军备缩减的舆论形成，以及议会中军备缩减建议案的相继提出，进而原敬内阁中越发明显的政党对军部政策干预等，从1919年（大正8年）初开始活跃起来的这一连串对军部的压抑政策日趋明朗。例

如，原敬内阁几乎在组阁的同时，对以往朝鲜、台湾、关东州等殖民地或租借地的总督或都督（关东州为都督）的任用资格进行了官制改革，实行了不只限于武官，文官也同样可以任用的制度。也就是说，出台了对被视作军部牙齿的殖民地官僚地位重新认识的政策。对此，陆军抱有特别深刻的危机意识。这在以下文字中可以看出来：

至今为止所看到的舆论状态，以言论自由为盾牌对有关国防状况加以议论……制造不切实际的言论以诱惑无知的国民。他们所谓的国防方针并没有政务根据，全凭众议院来左右把持得到。其蔓延已经达到阻碍国事进行的程度……政党之流以及一部分针对陆海军的野心家等观察到这种情绪并加以利用……更加煽动舆论对两者的言论进行争辩，进而成为了议会讨论的问题……政党之间阐述的议论更有加强约束军令独立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如此下去的话必定会导致不保，也有威胁建军基础的危险，实在是令人十分寒心的事情。（《田中文书》）^①

在此情况下，与危机意识相反，军部持有帷幄上奏权、统率权独立制、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为代表的特权制度及以此为根据的制度上的特权。另外作为天皇直属机关的军队，这样的精神特权都有强烈的思想根底。正因如此，对于军部来说，固执地抱有军队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制约的观念，对以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为背景所展开的对军部批判，和以平等主义为基调的民主主义思想向军队渗透的可能性，理解为动摇对以天皇为顶点的绝对主义的阶级组织——日本军队在政治、精神上的地位之类的危险问题。

其中，与殖民地官僚任用资格的扩大相关，特别是被视为改革中心的军部大臣（即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问题，军

^① 《田中義一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部认为一旦任用资格扩大到文官，由政党人来就任军部大臣的话，军队就不是国家即天皇的军队，而变成受党派性质左右的不安定的军队，必将导致现存军队的秩序崩溃。以民主主义为原则的政党对军部的统治，正如“民主主义是军队组织最强有力的溶解剂”^①所形容的那样，是军部最为警戒的。

军部为了对一连串的批判进行对抗，首先对政党要求最强烈的军部大臣任用官制展开了批判，提出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根据和正当性，即“统帅权神圣论”、“军部大臣专家论”、“文官不适合论”等内容。

如此，随着军部反攻的逐渐展开，对军部的批判由于政党间策略纠葛而渐渐出现了步调混乱，军制改革案最终也只得达成妥协的结果。在政党政治对军部政策方面，就是在最为有利的时期，政党之间的联合也乱了阵脚，这就更加助长了军部的政治性反攻。与总体战体制构筑有着特别重要关联的是，在军部内形成了一种认识，即政党和舆论对军部的批判与军部的抵抗之间的对立，将成为构筑总体战体制的决定性障碍。

由此，出现了坚决推动适合总体战阶段的军队装备现代化，以及深化国民对军队理解的政策主张。最初由退役军人出面，在限制现役军人活动的军队以外的场合，通过出版物、讲演等开展宣传活动。

比如陆军步兵中尉中尾龙夫在1921年（大正10年）出版了《限制军备和陆军的改造》（文正堂书店），其中认为限制军备、整顿军备的目的，在于从现有预算中拿出充当军队现代化的费用。也就是说，构成陆军预算基础的军事预算大约有1.85亿日元的正常维持费，只要不改革和废除现行制度几乎就不会变化。基于这一理由，可以通过以下三项军制改革对此予以取代。

第一，由现在的两年服役制缩短为1年零4个月，由此可节减2464万日元。

^① 角田順校订《字垣一成日記》（1），みすず書房，1968，第208页。

第二，撤除全国 42 处旅团司令部，可节减 520 万日元。

第三，撤除全部骑兵旅团，节减 350 万日元。

由这些节减合计可能出 3334 万日元。^① 如果把这些整顿得出的节减经费用来补充今后三年间国防经费空缺的话，陆军的装备就会面目一新；而且，即使三年后不再进行军备整顿，每年也能从陆军预算中削减出大约 3300 万日元。中尾认为，用这些节减经费充实新式兵器，特别是有必要实行加大扩充航空队。顺便提一下，中尾算出的大约 3300 万日元的节减经费，与 1922 年实施的山梨裁军所提出的 3500 万日元基本相当。

陆军中将桥本胜太郎在上述中尾著述的同时出版了《经济的军备改造》（隆文馆）。桥本在序文中明确提到，对军部以及国防只是军人专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正是应该由一般国民来承担国防这一基本认识。接着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主张在军事作战中，一旦战争开始就有必要集中战斗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为实现该战法，平时做好备战准备是极其重要的。

另外，关于国防意识，桥本提出了“在平时就致力于培养全体国民的军事国防，即广义上的国力涵养，以便在国难当头时能够取得国家各机关的相互动员的效率和决心，齐心协力、胸怀坦荡地行动起来”。^② 据此可以看出总体战的构想，桥本在其他地方对总体战的战争模式是使用“国民战争”一词来表现的。

也就是说，桥本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长达 4 年之久的长期战的理由是，参战各国国民之间对“国民战争”的意识还比较薄弱，而且是由于国民总动员准备不足所造成的。他认为如果这两点能够解决的话就不会演变成为长期战。并且，桥本认为如果以速战速决为目标的作战行动可能实现的话，以人口大约 6000 万人计，

① 中尾龍夫：《軍備制限と陸軍の改造》，文正堂書店，1921，第 7 页。

② 橋本勝太郎：《經濟的軍備の改造》，隆文館，1921，第 51 页。此外，橋本还著有《文武協調——平和の支へ》（弘道館，1922）。

至少陆军 262.5 万人、海军 87.5 万人、后方勤务 250 万人合计大约 600 万人的动员兵力是不可欠缺的。与此同时，为总体战作准备的军制改革，从国力是由军备和经济的乘积为换算的视点来看，军备和经济的调整应该最为优先。在其他方面，他还列举出一般各种学校、地方青年团的军事知识普及，通过强化军队和国民的军事训练从而努力培养大量精锐兵力等。所以其结论是，这些军制改革“应该以国家总动员为目标而计划实施”。^①

陆军上校小林顺一郎也于 1924 年（大正 13 年）出版了《陆军的根本改造》（时友社）。小林认为大战后虽已历经六年，但现在的陆军依然使用以步兵小武器为主体的旧装备，仍在沿袭大战前的旧战术的军队模式。现在必须通过根本改造实现向现代军队的转换。陆军的根本改造最重要的是，通过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启动。就其内容来说，征兵、编制、装备、战争补充机关的准备设施的建立，涉及军队和国民关系改善等全面性问题。对陆军的改造不单单是陆军本身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全体国民的问题。

小林认为在国家总动员组织发达的国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 1000 万人口中至少有 50 万或者 60 万的军队被派遣到战场，而且能够补充战斗所必要的兵器弹药。以法国为例，3800 万人口中大约有相当于 7% 的 270 万人的军队，维持五年战地的兵力。以此比率来看，日本现有人口 7000 万，从中应该保证战时至少能够动员 300 万人（相当于 150 个师团）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确立是当务之急。在此重要的是，要确保支撑 300 万动员兵力所需军需品生产补充的工业能力。小林的结论是，国家总动员体制的树立是“平时作为可以令人生畏的经济武器，就国防政策来说是作为国民国防的内容俨然显示着其所具有的威信”。^②

这些陆军改造计划案，相对而言是以军队装备现代化为重点

① 橋本勝太郎：《經濟的軍備の改造》，第 453 頁。

② 小林順一郎：《陸軍の根本改造》，時友社，1924，第 26～27 頁。

的。与此相对，陆军中将佐藤钢次郎于1922年出版了《军队和社会问题》（成武堂），认为由于迄今为止与一般社会相隔绝的军队合理化、社会化，所以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使一般社会中军队的存在获得正当性和权威性。为此，通过实施学校训练、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少年义勇团等活动，在国民中广泛提高军国主义的气势尤为必要，并且这些还必须是以构筑总体战体制为前提的。

就这样，在大正民主主义时期从各方面展开对军部的批判，助长了军队内部进行自我变革已是不可避免的危机意识，不过这并没有直接形成作为全军的整体认识。但是在以大正民主主义状况为背景的政党政治势力进一步扩张的时期，为确保军部具有一定的政治发言权，且能与政党对抗，军部组织自身必须进行大胆的构造变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这种军部亦卷入其中的新状况下，军队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率先实行“裁军”了，于是其存在的基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动摇，这一危机意识十分强烈。而且在日本型民主化进程中，如何构筑与之相适合的政军关系已成为一大课题。陆军自创建以来首次断然实施的“裁军”是有其成效的。

三 山梨一宇垣裁军的断然实行及其内容

1. 政党的军部改革案

对于从军部内外要求进行的军制改革、陆军改造计划，加藤友三郎内阁（1922年6月成立）的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制订了与此相对应的军备案。山梨陆相于1922年（大正11年）7月4日因军部内外的反对撤回了已发表的《陆军军备缩小案》，并于同年8月10日发表了新的《陆军军备要纲》。其内容是从各步兵联队中废除三个中队而设置机关枪队，从各骑兵联队中废除一个中队而设置机关枪队。分别废除野炮兵旅团司令部三个，野炮兵联队六个，山炮联队一个，重炮兵大队一个，而代之以设置野战重炮兵旅团司令部

两个，野战重炮兵联队两个，骑炮兵大队一个，飞行大队两个。通过缩短兵役年限四十日等，减少将校 1800 名，准士官以下 5.6 万名，马匹 1300 头，节减经费 3540 万日元。

山梨陆相于翌年 4 月还实施了第二次军备整顿，废除了铁道材料厂、师团军乐队两个、独立守备队两个大队、仙台幼年学校，新设了要塞司令部两个。经过这两次军备整顿，山梨军缩完全没有削减常备师团，更换了大约相当于五个师团的兵力目标在机关枪、野战重炮、飞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活跃的近代兵器上的装备，但是就质和量两方面而言，这些仅仅是全体中微小的一部分。

只是，在此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因军队编制的问题，常备师团的数量是以什么理由维持的呢？对近六万人员实行整顿一事，应该会成为在军制、教育、训练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因。即使是这样，关于暂时对常备师团数未加变更一事，山梨陆相在 1923 年（大正 12 年）1 月的第 46 届帝国议会（1922 年 12 月～1923 年 3 月）上的贵族院做了以下陈述：

在战争开始之初，在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日月里，进入了战争状态而且巩固了部队的编成，使其团结一致。就此事，要是不从平时开始做准备的话，是怎么也办不到的。因此，减少平时的师团数的结果是，在战时应该新编制的部队日益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动员实施就会愈加困难。^①

此外，山梨陆相还从日本的工业实力看到在战时重新动员兵力的限度，为此维持了以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为基干的以往编制。山梨军缩是在要求军缩舆论最高涨的时候进行的，从制度上看，它实际上有着强烈的维持现状的改革性质；可在政治意义上，它也有将與

^① 大日本帝国議會誌刊行會編《大日本帝国議會誌》第 14 卷，第 45 页。

论付诸实施的一面。但是，就各方面而言山梨军缩一般被认为是“所谓的整顿而不是缩小”。^①因此，通过山梨军缩达到平息军缩要求舆论是不可能的。

在军界内部也有对山梨军缩仍感不够，对于陆军为构成适合总体战军力而日益庞大的常备师团进行大胆削减是不可避免的议论越来越多。例如，当时陆军航空部高级部员小矶国昭（后来的首相）认为，为了挤出航空战斗力的扩张经费，削减四个师团规模是绝对必要的。^②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着眼于法国战斗机价值的重要性，1923年（大正12年）当时的陆军省军务局航空课长的四王天延孝主张，在大幅度地充实航空兵力过程中，为新兵器的研究必须认识到不惜削减七个师团的必要。^③在这里，通过实行更加彻底的军缩而实现军事近代化的要求，在陆军内部革新派中基本取得了共识。接受了这个见解，成为第三次军缩中心人物的，是田中义一的后继者、清浦奎吾内阁（1924年1月7日成立）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

护宪三派连立内阁的加藤高明内阁（1924年6月11日成立），打出“整理财政”这个重要的政纲，为了使不增税财政政策实施而挤出资金，作为研讨机关设置了财政委员会。同委员会审议的结果，得出了削减四个陆军常备师团以便挤出资金的结论，甚至制订并向内阁提出了《军备缩小案》。基于此，加藤内阁提出陆军节减3000万日元以上经费、海军节减5000万日元的经费的要求。

继清浦内阁之后的加藤内阁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要求陆军缩小军备并得到实现，使得政党势力的扩大加快了步伐，进而抱着即

① 《週刊朝日》1924年9月6日号。

② 小磯国昭伝記刊行会：《葛山鴻爪》，小磯国昭伝記刊行会，1963，第416页。此外，关于以小磯国昭推行的扩充空军构想，参见小磯国昭、武者金吾《航空の現在と将来》（文明協会，1926）。关于小磯国昭的军队近代化论，参见頼頼厚《小磯国昭——国家総動員政策の推進者》（富田信男等編《政治に干与した軍人たち》，有斐閣，1982）。

③ 四王天延孝：《四王天延孝回顧録》，みすず書房，1964，第152页。

便招致军内的反抗危险，也要对内阁财政方针表示理解的态度。他说：“上策是无论如何为了渡过当前难关，对此是无法置之度外的。不，应该说必须以这些作为主体，抱有相当的敬意和适度的诚意来应对。”^① 只是作为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即便知道军备缩小不可避免，还是强烈地认为军缩的主导权不在内阁而必须由陆军来掌握。

其结果是，宇垣于1923年8月制订《陆军军扩私案》，在开头的《军备方针》中列举出三点：“一、无论短期战还是长期战都要做好胜任的准备；二、要设置即使是一部分的军队战也要作为全民皆兵的举国战来对待的设施；三、应以武力战为主但也做好相应经济战的准备。”^② 还在该案的《改革纲领》中列入“无论有形无形都应进行国家总动员”^③ 一项，显然宇垣所构想的军备缩小，是定位于国家总动员构想这一框架之中的。

宇垣的《陆军改革私案》，后来委托陆军制度调查委员会进行审议，在1924年（大正13年）7月13日以该委员会委员长津野一辅的名义提出了第一次调查报告。就在这个报告里，宇垣的陆军改造计划，即所谓的宇垣军缩框架得以形成。据此，1925年（大正14年）5月，开始实行军缩。其中心内容是废除第十三（高田），第十五（丰桥），第十七（冈山），第十八（久留米）的各师团，还有十六个联队司令部、两个幼年学校、一个台湾守备队司令部、五个卫戍司令部。通过这些整顿，削减兵员38894名，马匹6089头，以致1925年度正常经费和临时会计费在预算上合计节省了1295万日元。

另外，在这些整顿的同时，针对总额达1.4126亿日元的新提交的军备扩充计划，还拟定了从1925年到1932年历经8年实行的长期计划，首先新设了一个战车队、两个飞行联队、一个高射炮联

① 角田順校订《宇垣一成日記》(1)，第457页。

② 《宇垣一成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③ 《宇垣一成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

队，还有通信学校、陆军科学研究所；装备了步兵的轻机关枪、火炮、射击器材等。但是，由于其中对兵器装备的近代化工作，正值关东大地震之后的财政危机之时，加之由于次年度以后计划的整备改善而不得不延期后续费用的拨付，遇上了极为困难的时期。

继山梨军缩之后，宇垣军缩的常备四个师团的削减，是迄今为止日本陆军军制史上划时代的举动。但是，从总体战阶段战时动员兵力扩大的必要性这点来看，包含着矛盾的内容。宇垣军缩虽然有着这种矛盾，但也不得不削减师团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后进性使得其工业生产能力水平低下。实际上，总体战所必要的近代兵器体系的装备、大量的兵力动员所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作业资材的高度生产和补充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业生产能力水平低下的问题，明显地成为了制约常备师团以及战时动员兵力的重要原因。

其次的理由是，宇垣军缩时期，日本的一般会计预算大约在15.26 亿日元左右，这其中直接军事费相当其三成，达到近4.5 亿日元。另外，当时常备军就有约30 万人，在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的状况下，明显过剩的军备是宇垣军缩得以断然施行的根本原因。

这两个理由是密切相关的：一边是应对工业生产能力水平低下的现状课题；一边是为了达成充实适合总体战阶段军备，并实现近代化，这两方面必然地要通过兵力削减达到军费再分配，这是不可或缺的。^①

与这些问题相关，陆军省兵器局工政课长铃村吉一中校，于

① 日本的工业水准低下决定了军需工业能力的不足，为了进行弥补，造成了日本军事工业的那种国家资本对军需部门的过剩投资和介入的特征，在总体战的阶段由于不鼓励兵器的民营化，所以无法确立兵器、弹药的大量生产体制。对处于如此境况的日本基本构造进行分析的研究，参见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的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构造との関係において》（御茶の水書房，1972）、竹村民郎《独占と兵器生産——リベラリズムの経済構造》（勁草書房，1971）。

1923年（大正12年）1月，向陆军大臣山梨半造提出了一个以“各部队大正11年度军需动员计划视察的详细报告”为题的文件，就起因于工业生产水平低下的问题做了以下的论述：

计划上各部队应承担的任务，从去年视察的结果来看应该承认一般来说是过重了，在11年度训令起案中应当努力降低要求，努力使之达到实际可能的程度……根据这次视察的结果来看，很难说达到所预期的要求，所以军需品整備能力将掣肘作战，虽然比平素有所好转，但是将来军需品的整備，特别是与动员初期要求的程度进一步缓和是绝对必要的。^①

并且，陆军从1920年（大正9年）度开始，为了贯彻“鉴于帝国的国势、国情，以速战速决主义作为国军作战的根本方针，伴随以灵活补给作战”，制订了陆军军需动员计划，但是到三年后的1928年（昭和3年）就早早地陷入不得不表明“军需品整備的能力将掣肘作战”这种危机感的状况。^②因此，在今后的陆军军需工业动员中央计划中，已经痛切地感到必须全力统制、开发工业基础的各种资源。

可是，1926年（大正15年）10月，在陆军省设置了整備局，该局于第二年11月制订通过了《作战资材整備永年计划策定要纲》，于是裁军以后的军事装备近代化的政策才得以开始真正实行。这个要纲是基于以下观点的产物，即从“必须明确对于缺少后方所需补充补给源的国军来说，对其兵额寄予怎样巨大的期待”^③的认识出

① 陸軍省編《甲輯第四類 永存書類》，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蔵。

②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編《戰史叢書・陸軍軍需動員1》，朝雲新聞社，1967，第97頁。

③ 臨時軍事調査委員會：《國家總動員に関する意見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蔵，第49～50頁。該資料被收入額綱厚《總力戰體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國家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第213～244頁）。

发，认为“国家应整备的战时兵额，根据国家战时可利用诸资源、诸机能的计算，应该可以制定出相关政策来的”^①。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通过预测战时所需作战资材、补充物资的数量，运用既定的预算制订出平时的准备调查计划，从而扩充相应军需工业能力的纲领。

在要纲制订的一个月后又制订了《作战资材整备永年计划策定业务规定》，到1928年（昭和3年）8月左右长期整备计划被制订下来。从1929年（昭和4年）度开始到1932年（昭和7年）度为第一期，从1933年度开始到1937年度为第二期，从1938年（昭和13年）度以后为第三期的时期划分，开始着手所定资材的整备。实际的配备状况是，1928年（昭和3年）度末为止新设了8个轻机关枪师团，但是步兵炮等重火器类的配备并未能像预期的那样推进，最终到第二期终了的1937年度，轻机关枪与步兵炮都完成了各自15个师团常备军的配备。另外通信器材、高射炮的预定配备量是第三期以后才完成的。

那么，宇垣军缩的目的是一面采取满足各政党因军缩而获得财政整顿的要求并作出与国内外军缩趋势相呼应的姿态，一方面巧妙地利用此形势企图完成军事的近代化。但是，在陆海军的合理化与近代化这一点上，仍然存在着确保动员战时兵力、补充精干的将校和下级军官等方面的困难尚未解决，即使是经过三次的军缩实施，结果是在作为军事全体的近代化上，仍然遗留下了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

就原因而言，最根本的还是已经反复强调的因素，即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水平的低下。这就成为了阻碍军事近代化的要因。虽然在其他的问题上围绕总体战体制的构筑，陆军内部路线上的对立也呈现了出来，而且这与陆军的作战计划、作战对象、军队的构成、

① 臨時軍事調査委員会：《国家總動員に関する意見書》，第49～50页。

对国民实施政策等各方面都有着相互关联，但是工业生产能力水平的低下仍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实现以建立陆军总体战体制为目标的“国家总动员”构想，那些陆军内部的对立必须暂且搁置。

2. 宇垣军缩的评价与阻碍军事近代化的要因

宇垣陆相在军缩后的第50届帝国议会的贵族院预算委员会上，对陆军省所辖预算概要进行说明时，对作为总体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如下总括：

第一点是对战争的科学应用，其中机械的利用程度有着前所未有的提高。第二点是战争一般来说会是大规模而且带有持久性的所谓“国家总动员”，即必须倾注一个国家全智全能才能从事。这一点给国防基础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①

宇垣实施军缩，就是基于以上总括的立场，就总体战所采取的对应政策。如宇垣预测的那样，在议会、政党中总的来说善意接受此政策者很多，军缩要求的热潮也暂时平静下来。但是，根据宇垣军缩对四个师团的削减，由于陆军内部也有不顾反对而强行实施的情况，这些都成为了以宇垣为中心通过军缩推进总体战体制构筑路线派，与反对势力对立加剧的原因。并且宇垣陆相在接下来的第51届帝国议会（1925年12月～1926

① 宇垣一成：《国家総動員に策応する帝国陸軍の新施策》，辻村楠造監修《国家総動員の意義》，青山書院，1926，第264页。关于宇垣裁军的研究，参见中村菊男編《昭和陸軍秘史》（番町書房，1968），額田担《秘録宇垣一成》（芙蓉書房，1973），井上清《宇垣一成》（朝日新聞社，1975），棟田博《宇垣一成——悲運の將軍》（光人社，1979），前原透《日本陸軍用兵思想史——日本陸軍における「攻防」の理論と教養》（天狼書店，1994），桑田悦《旧日本陸軍の近代化の遅れの一考察》（《防衛大学校紀要》第34輯，1977年3月），照沼康孝《宇垣陸相と軍制改革》（《史学雑誌》第89卷第12号，1980年11月），高橋秀直《陸軍軍縮の財政と政治》（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官僚制の形成と展開》，山川出版社，1986），一ノ瀬俊也《第一次大戦後の陸軍と兵役税導入論》（《日本歴史》第614号，1999年），筒井清忠《大正期の軍縮と世論》（青木保等編《戦争と軍隊》，岩波書店，1999），黒沢文貴《日本陸軍の軍近代化論》（《大戦間期の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

年3月)的众议院会议上,就四个师团的削减理由,做有这样的陈述:“精锐且多兵可以说和我们的理想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因为国家的财政是有限度的,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选择精锐”。^①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战时扩大动员兵力的志向已经减退,当时已经认识到要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总体战阶段军事力,就有必要采取暂且放弃促进军备的近代化和拥有大量常备师团的方针。这是以宇垣为中心的军缩推进派,即军制改革派的共识。另一方面,对于宇垣的削减方针,因宇垣军缩被废除的第15师团的师团长田中国重中将,在1924年(大正13年)7月29日的给上原勇作元帅的书信中,对宇垣军缩给予了如下批判:

虽然我并不是不同意军备整顿,但我认为那种徒然迎合民心,陆军自己推行缩短兵役年限,减少师团的情况也是完全应该避免的。不难预想如果减少一个师团反对军备者就会要求减少第二个师团,减少两个师团就会要求减少第三个师团。在今日之日本,有必要看到开始让一步的话就是让百步的重要性。像师团减少这样对陆军极大打击的事,影响着国民志气,降低了国民的国防思想,无形中给国防上带来重大缺陷,这是很明显的。(《上原文书》)^②

田中在认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水平低下的前提下,客观地批判了宇垣将总体战构想作为作战方针,有着自相矛盾的强烈的对长期战的追求。即田中见解的支柱是,“没有自给自足能力的帝国,是绝对不可采取欧洲战争那种长期战争的”,^③因此日本的作战方

①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刊行会編《大日本帝国議会誌》第16卷,第685页。

②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第269页。

③ 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関係文書》,第270页。

针必须是“开战当初尽可能集中大量的精锐部队展开攻势，在初战时重创敌人，使之不能卷土重来”，^① 所以“帝国陆军必须尽可能保有多数的常备军”。^② 在此，他对与此相矛盾的宇垣军缩政策提出了反对意见。田中还同意上述军缩的实施会招致国民的国防思想低下的判断，与宇垣认为通过宇垣军缩可以促进“国民一致融合举国国防”^③ 的观点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其他方面，以田中等为代表的反宇垣派之间，对于近代兵器体系的价值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与围绕 1923 年（大正 12 年）改订的《步兵操典》的军内部的论争也有关联。总之，对于步兵战斗向来重视肉搏主义的旧战法，军制改革派认为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积极采用欧美型的新式军队编制和战法，他们与维持现状派之间产生了对立和争论。维持现状派的观点在于，就大量兵器制造而言，从日本工业能力来看是有限的，何况即使装备了近代兵器，也是难以继续补充的，主张无论如何应该通过多兵主义予以补充。

其中，维持现状派虽然与田中国重等有着相同的认识，但是他们主张的是步兵万能主义，这就势必出现精神至上主义的倾向。这些维持现状派批判以宇垣为代表的军事制改革派的军事近代化政策，归根结底是以“飞机万能论”、“机械力主义”为目标的，只不过会招致轻视精神主义的恶劣风潮而已。维持现状派对总体战的对策是，首先在平时就保有大量精神上坚强的士兵，在战时动员并编制以他们为骨干的部队，所谓军事力量最终就是士兵力量，战争的胜败也是受此左右的。

关于这一点，在宇垣军缩的当时，作为军事参议官而反对宇垣路线的福田雅太郎认为：“战争的根本是人。无论机械如何精锐，以机械代替人、减少人员都是错误的。”^④ 福田对通过削减常备师

① 角田順校订《宇垣一成日記》(1)，第 464 页。

② 角田順校订《宇垣一成日記》(1)，第 464 页。

③ 角田順校订《宇垣一成日記》(1)，第 464 页。

④ 黑板勝美編《福田大将伝》，福田大将伝刊行会，1937，第 414 页。

团削减经费，并转用于军装备的充实费的一系列军近代化论提出了异议。总之，根据彻底贯彻国民皆兵主义思想的“国民的军队化”或者“军队的国民化”的口号极力控制平时兵力的一方，与相反地认为通过社会的军事化代替常备兵力的军制改革派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

以田中国重、福田雅太郎为代表的步兵万能论、偏重精神威力论，即使是在陆军当中以参谋本部为中心的作战指挥者也很受重视。对于他们来说，看来并没有充分地理解“不能不承认单凭对我国国民的精神力优越性的信赖，把编制、教育训练等诸制度纳入律法是很危险的”^①的意思。

但是，对军制改革派实施的宇垣军缩始终采取批判立场的军事参议官尾野实信大将、町田经宇大将、福田雅太郎大将等，成为了宇垣军缩人员整顿的对象，他们被编入预备役，作为现役军人的发言权被禁止了。这样一来宇垣通过军制改革派把陆军的主导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于是国家总动员政策得以正式启动。由此可见，所谓基于国家总动员构想实现的、以建立总体战体制为目标的国家总动员政策，是以宇垣军缩为契机掌握陆军主导权的军制改革派所推行的政治计划。

军制改革派后来形成了被称为统制派的政策派阀，成为事实上的陆军核心势力。而且，军制改革派的国家总动员政策展开过程中的最大障碍，还是上述的那种日本工业能力水平低下的问题。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军事近代化的阻碍要因，还制约着军事作战方针的大框架，进而对总体战体制自身的性质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军制改革派和维持现状派之间的对立和争论，只不过是围绕如何处理日本工业生产能力水平低下的问题，如何缔造出适合总体战阶段军事力的问题而采取的方法论层次上的差异。

^① 臨時軍事調査委員會：《欧州交戦諸國ノ陸軍ニ就テ》第四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図書館蔵，第25页。

由此，在所制订的陆军军需动员中央计划里，强调了全力确保以工业实力为基础的资源统制。于是，对资源统制的确保就被看做是当前陆军军需动员计划的最大课题，作为资源供给地的朝鲜以及中国的东北三省地区的资源、工业的开发也由此得以急速推进。

四 削减四个师团的真相与陆军军制改革

1. 削减四个师团的理由

作为综合的国家总动员机关而设置的资源局，在1928年（昭和3年）9月编制了题为《关于资源的统制运用准备》^①的文件。其中以“资源是国力的源泉”来定位，指出“资源的综合即潜在国力的本身。因此所谓资源，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人的、物资的、有形无形的，因而包括了有助于国力发展的一切事物”。而且，资源统制运用的要点又在于，战时资源的统一、确保安定的供给、补充军队的军需物资，进而从安定国民生活等，直至最大限度发挥国力所涉及的范围。其结论是，“现代国防的要素不仅仅停留于拥有精锐的国军，必须尽力发挥国民所拥有的全智全能，利用一切国家可利用的力量和物资来充实国防”。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具体地推进资源的统制运用，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加强人员的统一安置、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调节、交通的统一管理、有关财政金融政策的措施、情报宣传的统一等。再就是，为了提高实施的效果，向国民宣传资源统制运用的必要性，由此说明资源状况的实态，以唤起国民的紧迫意识，从而也推动和创出精神动员的体制。另外，通过这些也可克服军需物资的备而不用，作战资财的固定等等经济上效率低下的问题。

但是，资源的确保和储备是不稳定的，而且工业技术的不发达

^① 陸軍省編《甲輯第四類 永存書類》，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圖書館藏，1928年。

以及作为其起因的工业生产水平低下问题，如前节所述已成为总体战阶段军事近代化的障碍。这一现状又具体地反映为三单位制师团案的问题，即把原来以二个联队为基干组成一个旅团，二个旅团组成一个师团的编制改成为废除旅团，以三个联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团这样的欧美型的编制方式。这所谓三单位制师团案的改变遭到了总参谋部强烈反对，他们认为：

就我国的工业能力与物资的关系而言，无法与欧美诸国相比。假定全军都用新兵器装备，一旦进行大兵团会战，弹药等军需品很可能立即消耗殆尽。因此，必须采用适合我国的特有战术和特有编制。^①

另外，有关宇垣裁军削减四个师团，除由此挤出经费促进军事近代化这种表面上的理由之外，究其根底还是包含有工业生产水平低下的问题。在实施宇垣军缩的当时，任陆军省整备局统管科员、军制改革派之一的佐藤贤了，就不得不削减四个军团的理由做了如下的记述：

陆军的战时动员兵力是四十个师团，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迫于装备近代化之必要的同时，弹药品及其他资财的消耗极大增加，基于当时状况就知道，日本的资源，尤其是工业资源无论如何也难以补充四十个师团之所需。因此，不减少军备的规模范围，增加供给的力度，就不能够保全国防。另外，即使削减兵力，也必须努力促进装备的近代化。这是经过长期在作战资财整备会议委员会上热烈研讨得出的结论。^②

① 《大阪朝日新聞》，1922年2月22日。

② 佐藤贤了：《佐藤贤了的証言——对米战争的原点》，芙蓉書房，1976，第47～48页。

之后，基于此结论，塔曼的解释是：将战时动员兵力从四十个师团中减掉八个变为三十二个师团，由于战时动员师团是平时的两倍，为了减少八个战时动员的兵力，需要削减四个师团。就这样，一方面以积极的姿态加紧军事装备的近代化，一方面由于总体战阶段的军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靠于一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所以要竭尽全力促成经济力即军力的增强。可以说，通过宇垣军缩，日本推进了军事装备的近代化。

陆军构想的军事装备的近代化以及补充作战资财是总体战阶段不可缺少的要因，这一点今天看来也是明确无疑的。但是，在1928年陆军省整备局编制的《作战资财调查概况报告》中，作为该阶段作战资财整备调查的结果，算定所需资财相当于48亿日元。但据预测，当时现有的资财仅为其所需量的15%，约7亿日元。即使通过战时调整，充其量也仅仅能补充所需量的58%，约28亿日元。^①因此，其不足部分的，约12亿日元的亏空就必须从平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补充。即使只是战时调整预计量，如果考虑到由于战时兵力动员出现劳动力低下问题的话，其估算额将更加大幅度降低，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作为陆军，为了确保作战资财的稳定，通过大力推进国家总动员机构资源局的业务，积极实施了总动员政策。一方面，政府也为了重整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认为正是总动员政策才是打破现状的王牌。比如，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1926年1月成立）的大藏大臣浜口雄幸就表明：“为使财政好转，确信在国民总动员中必须采取经济战争的共同战线。”^②不过，这里所说的总动员政策的内容，政府与陆军的着重点以及在采取政策的手段、方法等方面，确实都存有相当的差异。

① 陆军省：《戦史叢書・陸軍軍需動員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図書館蔵，第219页。

② 《東京朝日新聞》1926年1月1日。

无论如何，从实施宇恒军缩时期到浜口雄幸内阁为止，总动员政策在所谓“国家明征”的口号下，通过陆军省整備局、青年训练所、学校教练、青年团等各种组织开展的国民教化运动，以机关、团体等为媒介广泛地开展起来。这里的总动员政策，整体上说，在实现陆军构想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目标这一点上，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

但是，即使进行了上述系列的总动员，其推进过程也绝非一帆风顺。其中，陆军和政府总动员政策路线上存有分歧，这在国家总动员机关设置准备委员会的审议阶段就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例如，准备委员之一的该委员会干事、陆军省军务局科员永田铁山中佐的辅佐，当时任整備局科员的安井藤治中佐，就该委员会中陆军方面的姿态做了如下记述：

负责总动员机关设置准备的是陆军的永田中佐。如果陆军不去推进的话谁也不愿去做，也做不成。首先需要从总动员的定义作出断定。陆军有着大正4年、5年以来调查研究的各种资料，如果没有从总体战的观点出发的总动员措施的话，就不能形成国防的意识，军事调查部也在帮助永田中佐推进此项工作。^①

这里所说的总动员政策不仅仅是指工业动员，正像永田中佐在《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1920年）中所主张的那样，指的是综合地动员精神动员、工业动员等国家各种力量的那种整体的政策。对此，该委员会委员之一、后来就任资源局局长的松井春生，谈及陆军的总动员政策时说：

国家总动员政策中第一重要的，毕竟是保有资源的设施。

^① 陸軍省：《戦史叢書・陸軍軍需動員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図書館蔵，第241页。

以往，所有资源问题的中心就是保有资源，其保有的要点又是已经提到的致力于各种资源的综合发展，这在现在也是完全适用的。现代战争是国力之战，所以构成国力要素的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同时又是国防力的源泉，是国家总动员的前提条件，即使从基于总动员准备的观点出发，注意各部分之间的通畅谐和，区别先后缓急，努力于综合国防力的培育和开发也是极其重要的。^①

这是从日本工业生产能力水准低下的认识出发，对陆军总动员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的暗自批判。而陆军总动员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又在于其陆军军需动员计划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作战资材的备而不用及其固定化问题。

总之，松井认为必须把通过实施保有资源以期强化工业生产能力的作为总动员政策的第一课题。而这里所说的实施保有资源又是基于包括民需在内的综合观点的产物。这些陆军方面和文官方面的不同立场在于，陆军总动员政策是意识到战时工业能力的局限，所以平时尽可能地储备作战物资，以最大限度地强化和维持军力为第一目标。对此，以松井等为代表的经济官僚的认识在于，平时把强化经济力作为先行的要点，为战时能够一举实施军需动员的体制做好准备，由此达到强化综合国力的目的，这一见解与陆军方面是有差异的。

围绕总动员政策，这种陆军与政府的分歧，还成为了浜口内阁（1929年7月成立）时期军政二者对抗的根本原因。浜口内阁为了打破经济停滞的局面曾采纳了以黄金解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政策。军政二者的对抗在表面上呈现的是，浜口民政党内阁要求削减军备与陆军对此表现出的抵抗力。

执政的浜口内阁的民政党为了紧缩财政、节减消费，提议将整

^① 松井春生：《日本资源政策》，千倉書房，1938，第152页。

顿军备、确立军部大臣文官职等作为新内阁的中心政策。浜口内阁接受了此提案，并于1929年（昭和4年）7月9日发表了包括十项内容的政纲。其中，就削减军备问题指出，“对于削减军需的问题，如今各国共同敦促达成国际性协议，其目的不只限于削减军备，更期待取得其实质上的缩减”，^① 由此表明了其坚定实施此项政策的决心。而且，再次请求宇垣一成就任陆军大臣，作为直接的负责人。

可是，针对浜口内阁的军备缩减要求，宇垣陆相于同年8月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干部组成的军制调查会（第二军制改革委员会），对陆军军制改革案进行研讨。军制调查会通过以林銑十郎少将为干事长的干事会制订草案，在此基础上召开临时军制调查会审议决定。干事会于同月16日制订了作为军制改革案的《调查纲要》，该纲要主要以充实新式装备、贯彻预备教育、缩短服役年限、国家总动员物资方面的彻底实施、更改部队编制等为重点内容。

据此，为了实现上述军制改革案，预计需要2000万日元的财源。为筹措财源，在1930年度以后，实行了多达4.5亿日元的充实国防费和其他既定继续费用的整顿，官署工厂学校等的整顿，以及减少战用衣料等订制数。不过，其中有关既定继续费，因为其中充实国防费占据了大部分，而且主要是装备新兵器 and 要塞维持费，所以很难期望从这里挤出财源。^② 因此为了筹措财源，削减兵员就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因为总参谋部对现有常备师团数、士兵数的削减从来就持有强硬的反对态度，军制改革案的实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围绕着筹措财源的方法，军内部的对立不断显露出来。另一方

① 日本銀行調査局編《日本金融史資料》第21卷（昭和篇），大蔵省印刷局，1968，第394页。

② 《東京朝日新聞》1929年8月7日。

面，在浜口内阁成立的同时，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率先提出了经济军备的主张，随后民政党、国民党之中对缩小军备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尤其是这时在伦敦召开的海军缩减会议也取得了进展，政党和舆论就实施海军军备削减的同时，必须促进包括陆军在内的军备合理化、近代化的意见也大量提交上来。针对这种动向，陆军即使认识到军制改革要求乃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出于保持改革主导权的考虑，对军制改革的要求也尽可能保持非妥协的态度。

例如，对于民政党为中心的军制改革案之一的缩短服役年限（一年兵役论），他们认为如果此案被采用的话，那么显然会导致平时动员兵力的降低，那样就不能履行国防责任，对此予以了反驳。^① 作为缩减军备要求的对策，陆军很显然已开始讨论如何通过对军官学校以下的将校教育机构进行整顿统合，对军医学校、经理学校、特科教育机构等进行统合，在不直接导致军事力降低的范围内实行经费筹措计划。

1931年（昭和6年）5月3日召开的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总参谋长、教育总监）会议，按照军制调查会历经一年半以上的审议结果，提出如下结论。也就是通过整顿军马补充部，整顿合并辎重兵和骑兵，将筑城总部和建筑课合并，整顿学校、官署等削减大约两万人，可筹措费用600万日元。另外，财源筹措方面，虽要求对用兵或教育不产生障碍为限实施政策，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为实施军事装备的近代化，也需要巨额财源的支撑。

政府军制改革的要求是通过削减军备而达到减少经费，并将减少掉的一部分经费还回国库，以抑制庞大的军事费用为目的，显然上述军部的军制改革案和政府的意图是完全不相容的。不仅如此，在将来财政状况好转的情况下，陆军依然将重新向政府要求用于军事装备近代化的经费，甚至连同有关的方针以及以此为第二次军备充实计划案的文件都制订出来了。

① 《東京朝日新聞》1929年10月29日。

如上所述，所谓陆军军制改革案，是以整顿军备为名目的军事扩充案，在这一点上，与先前的宇垣军缩是同样的。《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对这些军部的军制改革案的批判报道：“战时人员不能削减，因此平时兵力也必须维持现状，仅为此准备想与各国并驾齐驱的话，增大军备扩张的倾向就是当然的了。”^① 这恰好说中了陆军军制改革的真正意图。

2. 总体战阶段的军备扩充政策

1931年（昭和6年）1月适逢签订伦敦海军军缩条约，政府、民政党更进一步要求陆军裁军。同年5月15日民政党行政调查会，将现有常备师团从17个师团中削减掉3个师团，包括驻扎在朝鲜、“满洲”的部队减少到14个师团，并且废止步兵旅团，通过导入3单位制把1个师团的步兵部队改编为3个联队编制，陆军每年经费从2亿日元削减了2000万日元，对陆海军储存的作战资财，除了需长时间制作的资财以外均予以减少。还要求对军事参议院、教育总监部、筑城总部、运输部、要塞、军医学校、幼年学校、经理学校、陆军兽医学校等进行缩减或者废止。并且政府也将军制改革编成装备的充实计划向后延期一年，把财政预算暂时归入国库，若有不可能实行的情况，则根据政府的行政、财政、税制三案，要求明确按照同样比率削减军费。^②

政府、民政党的这些裁军要求的目的是，实行对陆军实质上的军备整顿，由此将节减的经费归入国库，以阻止像宇垣军缩那样的转账行为。据民政党预计，通过削减相当4个师团的兵员可以节省约2000万日元，通过将充实国防费以及陆军行政机关定员减少2成，大约可节省670万日元，两项合计能够节省约2670万日元。

对此，陆军提出了下列的对策方案，虽然削减相当2个师团的人马，但师团数保持不变。在其他方面，将师团分别设置为重师团

^① 《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5月6日。

^② 御手洗辰雄编《南次郎》，南次郎伝記刊行会，1957，第184页。

和轻师团，改为混合编制，同时实施陆军行政机关的整顿合并，另外，同意根据兵种缩短服役年限。对于悬案的经费削减，转变为新设航空队、改善武器、充实化学兵器的所需费用，并且提出在“满洲”部队增强3个师团的要求。陆军方面强调，浜口内阁成立至今，出于不得已已经将陆军预算压缩、延缓了7230万日元，并认为这在执行上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这样，将节减的经费全部充实于新装备之陆军方针，在做好遭舆论反对的精神准备下强行实施了。最终在同年11月6日，陆军和政府就军制改革案达成了妥协。其结果是对相当于2个陆军师团和1个骑兵师团的兵力加以整顿，由此节减的经费2800万，从第二年，即1932年度开始到1938年（昭和13年）度计划的7年间实施所确定的军制改革，初年度经费暂为580万日元，5年计划所需经费1800万日元。而且，军制改革内容的要点为：（一）改善军备，（二）修改驻“满洲”师团制度，（三）内地师团迁移到朝鲜，（四）改编近卫师团，（五）向台湾守备队增加工程兵，（六）增加飞行队、高射炮队、探照队，（七）增加坦克队、装甲车，（八）新设科学战争学校，（九）新设特科士兵养成机关以及干部候补生教育机关，（十）合并重炮队、工程兵队、铁道队、电信队，（十一）独立守备队以及国境守备队的装备。^①

最后，围绕军制改革，政府、民政党和陆军之间的抗争，集中到了如何转用军政改革所节减下来的经费的问题。但是，如果看一下军制改革的内容就会清楚，该问题始终是以陆军为基础展开的。陆军从来都把军制改革的实施作为总动员政策的主要支柱，从这点来看，政府、民政党未能阻止陆军在事实上的军扩案，这显然成为了陆军主导之总动员政策中的一个分歧点。这些陆军军备扩充计划的实行因同年9月爆发的“满洲”事变的扩大，于次年1月一度延期后而被中止了。

^①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第188页。

但是，陆军通过上述与政府、民政党的抗争，更加强烈地认识到，为展开总动员政策，需要形成包括政党的国民舆论及其相应的具体计划。于是以宇垣军缩为契机形成的诸团体、组织为媒介，以国民动员为目的的诸设施逐渐形成并不断得到具体的完善。

然而，以满洲事变为契机暂且延期并中止的军备扩充计划的实施，从“满洲事变开始前军缩运动出现热潮，但事变后军缩之风也被刮散了”^① 这样的宪兵司令部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军部再度推出了更新的最大目标，即1933年（昭和8年）编制的《时局兵备改善案》。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项：一、充实在满兵力，二、实施补充教育，三、改善紧急需要的诸制度，四、整备作战资财。^②

其中，关于充实在满兵力，是上述的军制改革方案中已经决定的改正驻满师团制度，是内地师团迁移朝鲜的后续，另外也是为了满洲事变后确保朝鲜、满洲地域的治安，同时也是为着强化对苏军事力量对抗的课题。所谓补充教育，其目的是以新编成的部队要员为对象进行短期培训，旨在提高战时动员兵力的质量。所谓改善紧急需要的诸制度，即以下层干部为对象增加将校学员，确立了作为过渡措施的特别志愿将校制度，补充下层干部不足增加特务陆军上士，为合理补充预备干部修改干部候补生制度，新设特科下士官教育机构等为主要实施内容。总之，旨在伴随着战时动员兵力增加以便得到人力资源充实。

那么，1933年（昭和8年）度的陆军省所管总预算总额4.4788亿日元，与1930年度的2.69亿日元，1931年度的1.88亿日元，1932年度的1.863亿日元相比，增幅很大。这是因为1933

① 宪兵司令部：《思想彙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蔵，1931年5月号。

② 陸軍省編《帝国及列国の陸軍》，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蔵，1933年版，第37页。

年度的新增加额相当于陆军预算总额的 56%，达 2.525 亿日元，其中兵备改善部分包括经常费、临时费、满洲事件费合计占了 2.4737 亿日元。其中的细目为在满兵力维持费 1.3813 亿日元、补充教育费 929 万日元、诸制度改善费 1266 万日元、作战资财整備费 828 万日元。

从 1933 年度开始着手具有上述内容的时局兵备改善计划。之后，第二年陆军大幅度改变了对第一假定敌国苏联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有：重视航空作战，毁灭苏联对日作战用的飞行基地及潜水艇基地，并且在日苏开战的情况下，力求以苏联境内为战场，采用积极进攻作战计划伴随战局进展直到贝加尔湖方面展开作战。为此，对苏作战需要 24 个师团的兵力。

陆军的这一军备扩大方针，直至以后的日美开战时期为止，一直没有改变。在推进这些军备扩充的基础上，陆军在其与总动员政策的关系上有着如下的考虑：

但是对此用一句话概括的话，世上往往被国家总动员、国民国防的名目所眩惑，不能说不存在轻视本应当作为第一线的军队力量的倾向。此可谓本末颠倒，国家总动员的准备终究是把维持增进军队战斗力作为生命的，绝非什么可以将军事力量予以置换的事情。^①

这里，由于认识到即使在总体战里也强调作为交战手段的军事力极其重要，所以国家总动员政策最终是以强化军事力为目的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因此，陆军的国家总动员政策具有强烈的军事力量优先的倾向。所以，确立总体战体制计划，本身也是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唯一的目标是创出军事价值为第一指标的军事国家。从而，以强化军事力量为目标的陆军总动员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

① 陆军省編《帝国及列国の陸軍》，第 13 页。

从无视合理性的强行经济运营来看，即使在经济层次也会发生许多矛盾，那些矛盾伴随总动员政策的进展又不断地扩大和衍生。

五 结束语：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出台

当时的政治、军事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当今正处于进入国家总体战的年代，对于战争形态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一点，虽然在认识上存在深浅差，但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点。但是在指导层中，围绕着构筑作为国家总体战对策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步骤和方法，在各个政策构想阶段的对立和摩擦也越发变得明显起来。

不同观点的争议在于在总体战阶段中军事装备体制应占着怎样的位置。如前所述，以宇垣为代表的小矶军制改革派，或应该称之为根本改革派集团，平时极力抑制常备兵力数量，努力推进以航空为象征的装备近代化进程。^①相反，以田中国重和福田雅太郎为代表的可称之为维持现状派集团，他们对适合总体战体制的国民皆兵主义思想持有疑问，主张平时应尽可能保持大量的常备兵力。^②

① 小磯国昭、武者金吾：《航空の現在と将来》，第74页。小磯国昭：“未来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毫无疑问其惨状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各位可能会说：‘何谓科学战争？我们有大和魂。’请问有大和魂的人吸入毒气能不毙命吗？中燃烧弹能不焚烧吗？现在是肉搏战术靠不住、仅凭大和魂也靠不住的时代了。”

② 田中義一：《皇太子御前講演ノ為ノ概要》，《陸海軍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蔵，1924年3月16日。上原勇作派的田中国重针对国民皆兵主义的主张，提出“我国自古以来除了士农工商以外，国防是由武士阶级担任的，尽管封建制度的解体，与明治维新一同废除了四个阶级制度，国防仍为军人所担任的领域”，因此主张一成不变。这是一种认为国防是只有军人来承担的观念，与国防的主体是广义的“国民”，即国家总动员的立场是对立的。与此相对，参见楠瀬幸彦《国民皆兵主義》，黒潮社，1916，第6页。作为军制改革派早期的国民皆兵论之一楠瀬幸彦在《国民皆兵主義》中谈到自己的认识：“欧洲战后的各国军队，在各国都出现了国民化的必然趋势。今后的任何国家仅靠常备军是不能进行国土防卫的。一旦发生战事，举国民进行国防是必然的。而且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的。”在此，楠瀬幸彦最先提出了国家总动员同时就是国民总动员的观点。

这两派的对立和抗争又以宇垣断然实行军缩而达到了顶点。^①在1924年（大正13年）8月13日、16日、26日三次召开的军事参议官会议上，直到最后，反对削减师团的尾野实信、福田雅太郎、町田经宇各大将，如前所述，由于宇垣军缩进行人员整顿而被编入预备役，致使这一对立在事实上画上了终止符。^②总之，这里军制改革派亦即总体战派在与政府和政党的对抗上，整顿了维持现状派，解除了陆军内部的对立，力图实现陆军的统一。

借此之机，政府在1926年（大正15年）4月设立了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对陆军和政府的总体战准备构想的见解进行调整。并且，同年9月在陆军省内设置了负责动员军需品关系的整備局，其第一任动员科长由宇垣派的总体战主导者永田铁山就任。准备委员会具体负责推进国家总动员机关的组织、业务实施方案，和该机构同各省厅的联系等方面的研究，委员长是山川端夫（法制局局长），委员有内阁中的统计局长、内阁拓殖局长，并且从各省中各选出1名委员，松井春生就任主任干事（后为资源局局长），来自陆军方面的委员有任军务局长的畑英太郎，任干事的军务局科长永田铁山。

就这样，宇垣军缩的断然实施，是在尝试设置国家总动员机构的大框架下进行的选择，由此正如准备委员会得以设置那样，陆军和政府、官僚的联系进一步具体化了。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总体战阶段的政军关系成立的条件，暂且在陆军内部为确保适合总体战阶段的阵容和总体战准备达成一致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① 陸軍省編《密大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蔵。军制调查会于1924年7月31日向陆军大臣提交了《陆军制度调查委员会第一次报告》。其中说到“陆军自己解决经费，保证自给自足，因此可不必减少战略单位（师团）”，而且“在编制的改善过程中，将最大的经费投入到飞机等其他新型武器上，以图有效充实军队实力”。

② 《東京朝日新聞》1924年8月27日。宇垣等人与原派（现状维持派）的对立，宇垣甚至“言明作为负责者的宇垣陆军，负责地坚决行使上述改革方案”，而且上原对此也是知道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就此结束。

即使宇垣和其后的永田，军制改革派亦即被视为总体战派的军事官僚，他们通过国家总体战体制的创立而在一定程度上设定了一致的国家目标，第一次使构筑合理并且妥当的政军关系成为了可能。就这一点而言，双方是抱有相应认识的。由此，准备了构筑日本型政军关系的条件。

这里所说的日本型政军关系的构造，从军部方面来看，意味着确立了让民间承担相当程度的动员业务的国家总动员体制，而且这一体系基本上是在军方主导之下实现的。其主旨又是来自山梨军缩和宇垣军缩逻辑的延续，这一点是特别应该强调的。^① 本章第四节以后论述的昭和初期的军制改革，基本上就是在此取得胜利的军制改革派为主导的新型军制改革的尝试，同时通过这次断然实行军政改革，军方在自身与政府、政党的对抗及妥协的政治过程中，最终的目的还是试图为掌握主导权而充分地储备力量。

其中，陆军推进军制改革的理由，正如反复叙述的那样，是为了在军部主导的政军关系中实现总体战体制的构筑。同时实施改革的动机背景，又的确具有面临1920年代出现的大正民主的反军局势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及应对。这种危机意识与应对，在进入1930年代后转化成为了军政之间深刻的对立，致使以往相对安定的政军关系产生动摇。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① 石藤市勝（陆军步兵大佐）：《どうして陸軍を改革すべきか》，大阪毎日新闻社，1924，第55页。石藤市勝：“动员的一部分委托于民间，或者半官半民，关键的中心部坚决由军部掌权，改善各种制度，进行军制的大翻新。”

第Ⅲ部 昭和初期政军关系的 发展与变化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政军关系 对立与统帅权问题

一 前言

统帅权独立制，在战前的日本不仅起着指导战争的決定作用，还在 1930 年代的以军队为主导的政军关系的改观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统帅权独立制真正成为政治问题是 1930 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政府与军部都是由同一种势力构成的政治实体，统帅权独立制在机构与机能的分工上未出现什么特别的弊端。在山县有朋去世的 1922 年（大正 11 年）之前，从第一章涉及的增设两个师团的问题开始，虽然也出现过政军双方明显的对立乃至对抗事件，但是由于山县和桂太郎等集政治领导权与军事领导权于一身的少数领导，有能力不通过统帅权独立制的组织、权限、机构等，而只凭其自身的权限及能力就可以自主地统帅军队，所以，政府与军部能够统一其机能的分工关系并指挥战争。^①

① 参见本书“终章 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构造与特性”；神田文人：《“満州事变”と日本の政軍関係——統帥権と天皇制》（《国際研究》第 3 号，1999 年 3 月）；神田文人：《統帥権と天皇制（一）（二）》（《横浜市立大学論叢（人文科学系列）》第 37 卷第 2、3 合并号，1986，第 40 卷第 1 号，1988）。在近代日本国家发动的对外战争及出兵中，从甲午战争开始，日俄战争、西伯利亚出兵，到济南事变为止，都由政治主导实施战争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后，很明显由军部主导的战争变为常态化。神田文人明确指出这个观点，同时对统帅权独立的生成发展过程及统帅权制度的确立过程做了细致分析，笔者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旦这种以一部分领导人的人格关系为媒介的军部统制变得无法继续的时候，统帅权独立制本来所孕育的危险性就暴露了出来。这就是从机能的角度来讲的军事领域的自立化或独立化问题。反映这一问题的一个具体事例是，在缔结伦敦海军军缩条约时所产生的侵犯统帅权问题。当时，由于海军的不妥协态度，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另外，在这前后的时期，还有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和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时日本驻朝鲜方面部队擅自越境等事件。

在围绕缔结伦敦海军军缩条约的侵犯统帅权问题中，军部打算以统帅权独立制为盾牌来抵制政党的军缩政策。在政府与军部因追查皇姑屯事件真相而产生的摩擦中，也发生了受统帅权独立制庇护的军部无视政治的独断专行和试图拒绝受政治统制的事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中日本驻朝鲜方面部队的擅自越境，可以视做军部侵犯天皇所持有的统帅权的事件。军部一方面运用侵犯统帅权论来抵制政府、政党对军队的统制，一方面在强调天皇大权的绝对优势的同时自己侵犯了天皇所持有的一个最重要大权——统帅权。

在以往研究中，多数观点认为浜口雄幸民政党内阁时所发生的侵犯统帅权论争是政府为一方，与政友会、右翼诸团体所支持的军部为另一方的对立。但是，军部中因对事件看法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派系组织，所以实际上只认为这是政府跟军部之间的单线对立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军部中行动最为活跃的是陆军参谋本部，与其呼应的是海军军令部。

陆军省和海军省对缔结伦敦海军军缩条约持肯定态度，对于侵犯统帅权问题整体上也是消极的。关于侵犯统帅权的论争，主要是以海陆两军的军令机关即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为中心来展开的。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关于统帅权的解释及统帅权独立制的运用方法等问题，政府与两军令机关间呈现出了明显的对立。

从济南事变（济南惨案）到皇姑屯事件，再到九一八事变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围绕着外交方针与事件的解决，军政间在

政治、外交政策方面的乖离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由于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陆军中间层（从统制派至总体战派）抬头，活跃了以构筑军部主导的政治、军事指导体制为前提的各种活动。这种情形同时又引出了构筑政军关系的结果。通过缔结伦敦海军军缩条约时的侵犯统帅权问题，陆军中间层从构筑总体战体制的观点出发，强化了军事政治化的观点，同时也开始对政党取得主导权产生了异常的警戒心。在侵犯统帅权问题的第二年所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中，就政军关系而言，军部与政府之间虽然还保持有一定的联系，但那是以军部占优势为前提的。仅此，侵犯统帅权问题对军部特别是陆军中间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从以上情况可以说，从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1927年4月20日成立）时期发生的济南事变、皇姑屯事件到第二次若槻礼次郎民政党内阁（1931年4月14日成立）时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整个过程中，军部跟政府之间的对立从根本上可以说就是统帅权独立制的问题。军部在济南事变时就以统帅权独立制为盾牌掌握了出兵论的主导权，在皇姑屯事件时又以此为由摆脱了急于追查事件真相的政府对军部的统制。的确，济南事变基本上是在田中内阁的主导下进行的，而九一八事变中则贯彻了以陆军中间层为中心的军部强硬方针，政府是在勉为其难地追随着军部的方针。可以说九一八事件前后，日本的政军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以军部为主导的政军关系。

就本章的目的而言：第一，简要介绍统帅权独立制形成的历史并做出解释，阐明围绕伦敦海军军缩条约所产生的侵犯统帅权问题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在考察军部对该问题对应的同时，探讨打击排除政党论得以深刻化的理由。第二，分析在济南事变、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从军政协调关系的崩溃发展到以军部为主导的政军关系的形成这一转换过程。

第三，从考察政军关系转变原因入手，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的诸事件究竟给当时的政军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这里，我

们应该注意到在前一章中反复使用的“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形态与实际内容相互交错的形成过程。虽然说九一八事变是军部企图制政治统制及以政治为主导的政军关系的事件，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九一八事变也成为确立日本型政军关系方向性的一大事件。^①

二 关于统帅权与统帅权独立制的解释

1. 统帅权独立制的形成

“统帅”一词来源于大日本帝国宪法（以下简称为“明治宪法”）的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中的“统帅”。明治宪法第11条所说的权限被称为统帅（大）权或军令大权。伊藤博文曾就“统帅”一词做过说明：“本条表示统帅兵马之至尊大权，专属于帷幄大权”。^②此外，在陆军士官学校教材《军制学教程》中也写道：“所谓统帅，是指统率并指挥军队；所谓统帅权，是指指挥运用军队的最高权能。”^③这里所说的“统率”，是指将官指挥调动师团级部队的权限，而“统帅权”则是指可以指挥将官的唯一最高的权限，天皇就是握有这种统帅权的最高司令官。

按军制史专家松下芳男的定义^④，广义的“统帅权”是指有关用兵作战事项的“用兵作战的统帅权”，狭义的“统帅权”，是指与军政权——明治宪法第12条中所说的“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军之数量”——相对的第11条的军令权。松下的说法，虽

① 相关研究参见大江志乃夫《统帅権》（日本評論社，1983）“第三部 第二節 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関東軍暴走か陸軍独走か”，第159~170页。另外，关于九一八事变中军部的对应过程，参见今村均《私記・一軍人六十年の哀歓》（芙蓉書房，1970），河边虎二郎《市ヶ谷台から市ヶ谷台へ——最後の参謀次長の回想録》（時事通信社，1962），林久治郎《満州事変と奉天総領事——林久治郎遺稿》（原書房，1978），高橋正衛《昭和の軍閥》（中央公論新社，1969）等研究。

② 伊藤博文（宮沢俊義校注）：《憲法義解》，岩波書店，1940，第39页。

③ 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下卷，有斐閣，1956，第320页。

④ 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下卷，第321页。

说是对明治宪法第 11 条的极为忠实的解释，但是军部自己对统帅权的解释，则从松下所说的狭义统帅权扩大成了广义统帅权。这个扩大统帅权解释的过程，也就是军部扩大其政治发言权的过程。

例如，在 1930 年（昭和 5 年）4 月缔结伦敦海军军缩条约时发生的关于侵犯统帅权的争论中，参谋本部就统帅权发表了以下观点：

统帅的本质在于用兵，故用兵及其计划皆属统帅的范围。用兵之基础在于国防计划，由此看来，制订国防计划亦属统帅范畴。另外，与此有密不可分关系之训练军队、维持军队纪律、建立军队内部组织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统帅范围。具体到何种程度属于统帅，则应依据实际情况予以判断。^①

这里拟将以上观点与 1932 年编写的陆军大学教材《统帅参考》中的下列内容做一比较：

原则上以国家军队为对象的一切命令权均属统帅权。动员军队、出动军队、对军队的指挥运用以及决定军队内部编制、对其进行教育训练、维持军纪等权限悉属统帅权范围。^②

前者表明，参谋本部的想法是以统帅的本质在于用兵为前提，同时将关系到用兵的训练、编制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置于统帅权之

① 瀬川善信：《統帥權問題と參謀本部》，《防衛論集》第五卷第三号，1966，第 23 页。此外，有关统帅权侵犯问题的研究有：岡田昭夫：《ロンドン海軍条約と統帥權干犯問題（一）》（《法研論集》第 58 号，1990）；岡田昭夫：《統帥權干犯論争と陸軍の対応》（《法学政治学論究》第 10 号，1991）；岡田昭夫：《統帥權干犯論争と陸軍（前篇）——統帥權問題研究（その 2）》（《法研論集》第 59 号，1991）；岡田昭夫：《統帥權干犯論争と陸軍（後篇）——統帥權問題研究（その 3）》（《法研論集》第 60 号，1992）；増田知子：《天皇制と国家——近代日本の立憲君主制》（青木書店，1999）。

② 偕行社編《統帥参考》，偕行社，1932，第 15 页。该书被收入防衛教育研究会編《統帥綱領・統帥参考》（影印本），田中書店，1982。

内。即使是在军部为统帅权争论而变得最神经质的时候，对统帅权的扩大解释也是如此。而在后者的《统帅参考》中，不仅是动员军队、出动军队、指挥运用等军令事项，军队的编制、教育训练、维持军纪等军政事项也都被划入统帅权之内。对统帅权的解释被彻底扩大。换言之，这里所说的统帅权是指包括军令权和军政权两权相合的权限。

随着对统帅权解释的扩大，在统帅权独立制上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情况。松下在论及统帅权独立制时写道：“军事事项中的军政事项是由国务大臣来辅佐施行，但是，军令事项并不属于国务大臣的辅弼范围，而是由陆海军令机关来辅佐施行。”^① 总之，统帅权独立制可以解释为：指挥运用陆海军的军令机关的参谋及其本部、海军军令部及陆海军部队的军令权及其责任，从作为军政机关的陆军省、海军省职能的军政权中分离独立，成为天皇及其直属辅佐机关的总参谋长和军令部长的制度。但是，对统帅权独立制也可以与统帅权有着同样的解释，这样的话就可以将其解释为渐渐从军事政治中独立、并从战略的政略中分离出来的所谓“政军分离制”或“兵政分离制”。

《统帅参考》中就统帅权独立制记述说：“为保障统帅权之独立，‘武官地位之独立’与‘其职务执行之独立’是有必要的。政府机关与统帅机关最终仅仅是处在对立平等的地位，任一机关都不得凌驾于另一机关之上。”^② 总之，军部内的统帅权独立制是指行政权与统帅权的平等性，从机构上讲就是把统帅部从政府亦即行政部独立出来。

像这样把“政府机关”与“统帅机关”放在“对立平等的地位”的认识，明显为后来的“统帅机关”的擅自行动留出了余地。这就像是专门为前一年发生的朝鲜方面部队的擅自越境事件作出的

① 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下卷，第294页。

② 偕行社編《統帥参考》，第9页。

解释。这样来看就好像在日本国内存在有“文官的政府”和“武官的政府”两个政府。在本书序章中已经记述过，亨廷顿就日本的政治与军事关系，认为“从日本文武关系的法律结构上来讲，本质上就是军的独立的结构”，^①日本政府分裂为文武两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从原理上来讲属于“二重政府”（dual government）。

2. 陆海军统帅权独立制的结构

陆军的统帅权独立制是以依据1878年（明治11年）12月5日制定的《参谋本部条例》而设置参谋本部为起点的。^②这意味着军令机关从军政机关中的独立，而依据同年12月13日制定的《监军本部条例》，指挥系统的实施机关（当初的镇台）的监军部最终也从军政机关中独立出来。

在《参谋本部条例》中，统帅权独立制被第6条定义为“战时，凡关于军令之事，亲裁（天皇决定）后，直接下达于监军部长，或特命司令将官。此因将官直属于（天皇）大纛之下，本部长参划军令，需经上裁（天皇同意）”。^③此条款虽是有关战时规定，却写明了指挥调动部队的权力完全归属于天皇，军令权是独立于军政权的。本条例第5条是与第6条相对的非战时的规定，虽然在第5条中军令权的一部分作为军政权得到了保留，^④但由于统帅权独立制的本质在于指挥调动军队的指挥系统，所以关于战时的第6条规定与非战时下军政、军令权的统一性，军事一元主义的基调并没有任何关系。第6条意味着实质上的统帅独立制的形成。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130. 市川良一译《軍人と国家》上卷，1978，第130页。

② 中野登美雄：《統帥權の独立》，原書房，1973，第321页。中野登美雄：“统帅权的独立，换言之就是兵权的二元组织，并不是从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时就有的，而是1878年（明治11年）12月5日依照参谋本部条例才开始的。”

③ 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下卷，第11页。

④ 《参谋本部条例》第5条规定如下：“凡军中机务、战略上的动静、进军、驻军、调动命令、行军路程之规定、运输之方法、军队之发差等关于军令事项，皆属本部长管知范围。计划交天皇亲裁后，直接下达给陆军卿加以实施。”

依照 1886 年（明治 19 年）3 月 18 日修正的《参谋本部条例》，到此为止只是陆军军令机关的参谋本部，开始具有了本是海军省事务局执掌的海军军令机能。参谋本部成为陆海两军的综合军令机关，从制度上在参谋本部长的下面设置了“陆军部”和“海军部”。进而在 1888 年（明治 21 年）5 月 12 日，参谋本部改为“参事官制”，参谋本部长改称为“参军”，在“参军”之下设置了“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参谋本部”。但是，由于陆海两军发生了对立，在第二年（1889 年）3 月 7 日参事官制再次改称为参谋本部，海军参谋本部变为海军大臣直属的“海军参谋部”。

与此同时，监军本部于 1885 年（明治 18 年）5 月 18 日改建为“监军部”，并于第二年（1886 年）7 月 24 日被废止。1887 年（明治 20 年）5 月 31 日制定了《监军部条例》，再次成立了监军部，这是作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可以指挥调动军队的实施机关。监军部是 1898 年（明治 31 年）1 月 20 日成立的“教育总监”的前身。无论如何，由于成立了监军部，所以教育行政这一属于军政事项领域的工作就归属监军部的管辖。从此时起，陆军就由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部这三个机关来构成了。也就是说确立了军事三元主义，奠定了陆军军制上的基础。

在制定《参谋本部条例》时，曾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职务权限关系规定了“本省与本部之权限的大略”，并在 1879 年（明治 12 年）1 月制订了《省部事务会议书》，明确了军政事务归陆军省，军令事务归参谋本部管理。这个规定理当然是两个机关的协定事项。可是，这个规定在此后 10 多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伴随着 1893 年（明治 26 年）10 月 3 日《参谋本部条例》的改订，参谋本部的担当事项明记为了“国防及用兵之事”（第 1 条）。这条规定为后来参谋本部在军令事项以外，干涉政治、军事等极为广泛的事项提供了可能性。从结果上来看，这条规定给予了参谋本部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单独行动”的机会。

“国防”明显地超出军令领域之外的概念，可见前面的条款完

全是缺乏妥当性的。可是，参谋本部就是以要对“国防”负责为借口，在国防方针，甚至是国家的全体政策上扩大了其发言权。1907年（明治40年）由参谋本部立案的“帝国国防方针”就是参谋本部扩大发言权最初的具体事例。

另外，1908年（明治41年）12月8日改订《参谋本部条例》时，参谋总长与陆军大臣商定了《陆军省参谋本部相关业务担任规定》，并取得了天皇的同意。^①根据这一规定，参谋本部把战时作战用兵计划所需要的军政事项置于了自己的管辖领域，在军令权之外空前扩大了自己的军政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参谋本部所管辖的事项中，只有一部分是需要与陆军省商议的，而陆军省所管辖的所有事项都有跟参谋本部商议的义务。在这里可以看出军令机关的地位明显高于军政机关。在海军中，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的关系则与陆军完全相反。可以说，陆军统帅权独立制的特征就是，参谋本部具有优势地位，并以此作为原则予以越来越显著的强化。

海军的统帅权独立制是以1886年（明治19年）3月18日改订《参谋本部条例》时，把海军的军令机关从海军省中分离出来，设置在参谋本部内为开端的。但是参谋本部内的海军军令机关于1889年（明治22年）3月7日又回到海军省内，变为海军大臣直属机关的海军参谋本部。此后，海军通过制定《镇守府条例》（1889年5月28日制定）、《舰队条例》（同年7月23日制定）等条例明确了海军的指挥系统。但是，由于保持了由军政机关的海军省海军大臣对镇守府司令官、舰队司令官的命令、指挥权，所以海军的统帅权独立制从其本来的意义上说并没有脱离以前的形式。也

① 陸軍省編《明治軍事史——明治天皇御伝記資料》下卷，原書房，1966，第1650～1651页。根据这个规定由参谋本部负责掌管以下事项：“一、作战计划以及伴随的兵站计划；二、关于将派往国外的陆军各团体（不包括宪兵）的配置、行动等事项；三、攻城及要塞防御计划；四、关于要塞的配置、编制及军备等的计划；（五六略）七、关于交通运输的调查；八、关于铁道及船舶运输（陆军运输部平时的业务除外）的计划；（九、十略）。”

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海军的军政、军令两权均由海军大臣掌握，所以海军实质是军事一元化。

1893年（明治26年）5月19日制定的《海军军令部条例》再次使海军军令机关独立，成立了天皇直辖的“海军司令部”。至此海军的统帅权独立制在平时是比较全面的，在战时则能完全确立起来。《海军军令部条例》第3条中规定：“战略上的海军军令属海军军令部部长的管制范围，军令计划交天皇亲裁后，非战时移交海军大臣，战时直接通知镇守司令官舰队司令官。”^①

在海军军令部独立出来的时候，为了调整海军省与军令部之间的事务，制定了《省部事务互涉规定》、《海军省军令部业务互涉规定》等规定。与陆军不同，作为军令机关的海军司令部所掌管的大部分事项都需与海军大臣商议后才可以定夺，这就限制了海军军令部的主体性。这一点与后来陆军中参谋本部强调发展自己的独自性和特殊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海军保持了军政与军令关系的平行性，从整体上来讲，军政主导型是海军统帅权独立制的实际状态。

与此相对，陆军的统帅权独立制明显是军令主导型。比较陆海两军的政治实力，就会发现相对来说，陆军处于优势地位，这是由于陆军的统帅权独立制整体上来说都是军令主导型。由于海军军令部独立出来以后，海军省对它依然保留有很强的指导性，所以海军的统帅权独立制具有军政、军令权一元主义的机构特色。所以说海军的统帅权独立制与陆军的不同，军政服从军令的统帅权独立制在海军并没有固定下来。

三 统帅权侵犯论争的背景与展开

1. 统帅权侵犯问题的发生

在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前夕的1929年（昭和4年）6月28日

^① 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下卷，第190页。

的内阁会议中决定了“限制军备对策之事”和“关于限制军备之方针”。特别在后者中决定海军军备的目标限于辅助舰（潜水艇、驱逐舰等），应至少保持有世界最大海军（对日本来说是美国）的七成兵力。^①

保持有美七成兵力的方针在次任的浜口内阁中也得到了继续。在海军中，1929年7月9日海军军令部第一班长（作战担当）百武源吾少将以海军大臣的名义编写了《限制军备问题对策之事》及《关于限制军备帝国之方针》。后者的内容为“鉴于我国满足自卫作战方针需求的同时，我国民生活之必需资源需仰仗海外这一特殊国情，仅限于辅助舰有必要保持有世界最大海军的七成兵力”。^②海军在这里也强烈地提出保持有美七成兵力的主张，百武少将将此内容移交陆军，希望能得到陆军的同意。

为此，参谋本部第一部长（负责作战）畑俊六少将于同年7月10日编写了《对海军军备限制问题对策之意见》。^③这个意见书与百武少将提出的内容基本一致。畑少将将此意见书移交陆军省，在取得同意后，到海军军令部拜访了百武少将，通告说这是陆军整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第一卷（満州事变前夜），朝日新聞社，1963，第58页。相关研究有：大前信也：《ロンドン海軍軍縮問題における財政と軍備——海軍補充問題をめぐる政治過程》（《鈴鹿国際大学 CAMPANA》第7号，2000）；加藤陽子：《ロンドン海軍軍縮問題の論理》（《年報近代日本研究 宮中・皇室と政治》，1998）；麻田貞雄：《日本海軍と軍縮——対米政策をめぐる政治過程》（細谷千博、斎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麻田貞雄《日本海軍と対米政策および戦略》（細谷千博、斎藤真、今井清一、蛭山道雄編《日米関係史》（2），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伊藤隆：《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ロンドン海軍軍縮問題をめぐる諸政治集団の対抗と提携》（東京大学出版会，1969）；増田知子：《天皇制と国家——近代日本の立憲君主制》（青木書店，1999）。

② 瀬川善信：《1930年ロンドン軍縮会議開催と日本陸軍》，《埼玉大学紀要》第一卷，第1页。

③ 瀬川善信：《1930年ロンドン軍縮会議開催と日本陸軍》，第1~2页。

体的见解。^①

进而，同年7月31日，海军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招待陆军省首脑，在席上再次就军缩说明了海军的意见。其间就限制辅助舰问题说：“我国海军应根据追击出现在东洋海面上的敌舰队的方针决定其兵力。保持有美七成兵力则在东洋海面上与美舰队具有同等战斗力，故我国海军兵力不可低于美军之七成。美当局的军缩要求如同破坏此七成之均势。”^②再次明确了保持有美七成兵力的方针。就在陆海军在为军缩进行调停的时候，日本政府于10月17日收到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邀请函，并于15日的内阁会议上作出了日本参加的决定。^③

海军通过与陆军交换意见，就军缩问题以“三大原则”的形式提出了最终见解：“一、我军辅助舰保有率应为美军之七成，搭载20厘米炮的一万吨巡洋舰应为美之七成，潜水艇应维持我军现有实力。（二、省略。）三、鉴于以上保有潜水艇的情况，故轻巡洋舰、驱逐舰保有率低于美军七成以下若干亦可容忍。”^④

1929年7月2日，代替田中义一内阁的浜口内阁虽然在其十大政纲之中提出了“促进缩减军备”，但在同年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中决定，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以海军军令部起草的“三大原则”作为日本原则上的要求。

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于1930年1月21日召开，会议曾几次出现波折，从2月26日开始的个别会谈方式获得了成功，于3月14日达成了日美间的最终协定。这个协定中规定海军保有总比率对美为69.75%、对英为67.9%。日本全权代表对此协定商讨后，为

① 参谋本部第三课也以参谋本部第三课长、陆军大佐谷口元治郎的名义编写了《海軍軍備制限問題対策ニ対スル意見》。

② 瀬川善信：《1930年ロンドン軍縮會議開催と日本陸軍》，第2页。

③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原書房，1965，第137~138页。

④ 瀬川善信：《統帥權問題と參謀本部》，第14页。

了取得本国的承认于3月14日联名向币原外务大臣发出了请训。请训电报于15日到达日本后，当天币原外相与浜口首相商议后，将协定内容交给海军的山梨海军次官，希望海军内部能够承认此协定。

海军内部的海军省与军令部就日美协定的内容形成了激烈的对立，并发生争论。海军军令部中，以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大将、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为中心形成了强烈反对的阵营。军事参议官伏见宫博恭大将与海军的长老东乡平八郎元帅也表示反对协定案。特别是后面的两人自始至终都强烈地反对日美协定案，摆出与其承认协定案不如退出会议的强硬姿态，成为后来加藤大将强硬态度的后盾。^①

与此相对，海军省中以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军务局长堀悌吉少将为中心，则采取了比较稳健的姿态来应对此事。从实质上来说，这从代表了他们观点的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大将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除了完全接受协定别无他策，此等（兵力）保有程度亦可进行国防。不应决裂，但应再做最大努力。”^②

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的见解在其态度的强硬上虽有区别，但在贯彻海军军令部起草的“三大原则”这一目标上则是一致的。^③此时，政府已将日美协定案的最终妥协案视为最终界限，所以不得不无视包括海军省“应再做最大努力”在内的海军内部的反对意见。面对政府的姿态，海军省开始做出了让步。1930年3月28日，冈田大将在与山梨中将商议时说：“除了完全接受请训外再无他策，

① 岡田啓介：《岡田啓介日記》，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七卷（滿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64，第6頁。

② 岡田啓介：《岡田啓介日記》，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七卷（滿州事変），第7頁。

③ 《昭和5年4月回訓ニ関スル経緯》，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巻，第22-24頁。

但对美方案中我方感到不足的兵力配备，政府应答应承诺给予补给。”^① 这表明其妥协的见解，由此与加藤大将等强硬派形成了对立。

冈田大将在明白了有同政府妥协的必要性后，特别是对加藤大将开始了要求与政府妥协的说服工作。海军军令部自身虽然没有表示同意妥协的见解，但3月29日，伏见宫大将对冈田大将说：“虽然希望能够实现海军的要求，但如果首相是从全方面考虑认为对帝国的前途有利而下的决断，也只有服从了。”^② 这个发言表明了强硬派的伏见宫大将也勉强同意了协定。政府对请训的回训案于3月31日脱稿，4月1日交内阁会议商议，在与海军充分协商后上奏天皇取得同意后，立即向伦敦发出了赞成日美协定的电报。

对于政府4月1日的回训，由于存在担心国防兵力不足的不安，所以以海军军令部为中心反对签订协定的意见依然很强。加藤大将在4月2日进行的帷幄上奏中提出，“三大原则”中规定的辅助舰的保有量为日本兵力的最低限，故政府的回训案有可能给帝国海军作战上带来重大缺陷，所以希望能够慎重审议回训案的内容。^③ 也就是说，此时侵犯统帅权的说法并没有被提出来。

侵犯统帅权的争论，是以4月21日召开的第58次特别议会上的争论为契机而成为政治问题的。^④ 4月21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① 岡田啓介：《岡田啓介日記》，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七卷（滿州事變），第6頁。

②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第一卷，第83頁。

③ 《時事新報》，1930年4月1日。軍令部長加藤大將在进行帷幄上奏的前一天，对記者团发表了以下谈话：“还看不到外務省的方案，但大体上是可以預見的。我怎么說也是下定决心要为了完成国防的重要責任而指揮海軍。我决心遵从神命一点也不給圣上添麻煩，为了这个决心我将采取行动。而且一两天内我不会上奏。有人認為我的行动是不小心卷入政治旋渦或是为了政治斗争，这种看法纯粹是誤會。”

④ 參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第一卷（第一編“四章ロンドン条約と統帥権問題”），第100～148頁。在第58次特別議会上發生了侵犯統帥权的争论，加藤寬治大將呼應这场争论一般突然转变了态度，开始主張政府的回训案侵犯了統帥权。

美浓部达吉博士在《帝大新闻》上发表了名为《海军条约成立与帷幄上奏，批判军令部的越权行为》的论文。实际上应该说，侵犯了统帅权的说法，是出现于参谋本部对该论文进行对应的过程中。

的确作为在野党的政友会，从第 58 次特别议会召开以前就反对政府的回训案，但其反对的理由是害怕会招致国防力的不足，侵犯统帅权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被提出来。即使是政友会在决定了回训案第二天发表的关于回训案的声明中，也完全没有提及到这个问题。^①而且，在第 58 次特别议会一开头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发表的演说中，也只提到了招致国防力不足是政府的责任，本来国防责任海军的问题应由海军军令部来负责。这里也没有提出侵犯统帅权的说法。^②

面对以海军军令部和政友会为中心提出日美协定案会招来国防力不足的强烈反对意见，浜口内阁以美浓部博士的宪法学说作为理论根据，提出“军令部的作用是对陛下的帷幄大权进行参谋策划，政府可以把军令部提出的意见当做重要参考，但军令部的意见并没有决定权”^③的观点，同时把决定国防兵力解释为属于内阁的辅弼事项，对于反对条约派未做丝毫妥协。

① 《時事新報》（1930 年 4 月 2 日）：“原本不应该把国防当做是一般政务。众所周知，辅弼天皇直接参与国防事务的海军由军令部负责，陆军由参谋本部负责。可以看出国务大臣在国防上不负任何直接责任。不得不承认，在国防上没有任何直接责任的国务大臣，无视有直接责任的军令部的强硬意见而擅下决定这件事，对现在及将来的政治责任来说都非常可怕。”

② 木堂先生伝記刊行会編《犬養木堂伝》第一卷，東洋經濟新報社，1938，第 42 页。政友会犬养总裁在第 58 次特别议会上的代表提问：“虽说总理大臣能够决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但却决定不了最关键的国防力量方面的问题，对用兵负有全部责任的军部也同样决定不了。然而，事实上，军部到底有没有说令国民混乱的话呢，我认为绝对没有。到底以什么来判断呢？国防大臣是对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充分考虑后进行发言的，而这些军事专家们又是以军令部为中心的，军令部却发出了坚决反对的声明。这是不能让国民安心的。”

③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之政局》第一卷（自昭和 3 年至昭和 5 年），岩波書店，1950，第 42 页。

在条约的赞成派与反对派的对立中，美浓部在论文中对4月2日加藤大将帷幄上奏的批判，使侵犯统帅权问题成为对立的一个焦点。美浓部在论文中批判说：“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决定陆海军应保有多少兵力，均是与国家的外交及财政具有紧密关系的事，故其应属于国务与政务，应由内阁担当起辅弼责任，而不应由帷幄大权来决定。”^①

也就是说与统帅大权不同，编制大权纯属于国务事项，自然应该由作为国务大臣的陆海军大臣来决定，最终由内阁来负责任。而利用帷幄上奏权力企图左右编制大权则明显是乱用帷幄上奏权。

美浓部博士的论文得到了条约赞成派的信赖，而对这篇论文最初做出反应的则是参谋本部。^② 参谋本部的白井正辰大尉在论文发表两天后的4月23日访问了海军军令部的福留繁参谋，就美浓部的论文进行了以下协议：

（一）就《帝国大学报刊》所载美浓部博士之《批判伦敦会议回训前后军令部态度要旨》论文，军令部方当如何判断以下事项：

- a. 关于如何判断统帅权；
- b. 从法理上来看军令部行动的是非。

以上为对第一班长级之意见。

（二）希望兼勤参谋能汇报伦敦会议的结果兵力。^③

这是伦敦海军军缩条约中统帅权首次成为问题焦点。而且率先

① 《東京帝大新聞》1930年4月2日。

② 美濃部達吉：《海軍条約と統帥権の限界》（《大阪朝日新聞》1930年5月2日～5日）。此外还有众多批判侵犯统帅权论文章。例如：佐々木惣一：《問題の統帥権、政府と軍備決定》（《大阪朝日新聞》，1930年5月1日～5日）；吉野作造：《統帥権問題の正体》（《中央公論》1930年6月号）；吉野作造：《統帥権独立と帷幄上奏》（《中央公論》1930年7月号）等。

③ 瀬川善信：《統帥権問題と參謀本部》，第18頁。

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当事者的军令部，而是参谋本部。这表明正是参谋本部把握着就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发生的侵犯统帅权说法的实质主导权。同时也证明侵犯统帅权的说法不只是说明了政府与海军军令部对立的单线关系。

4月23日，就参谋本部的质问，福留参谋访问参谋本部时，以“军部对于美浓部博士所论之判断”的立场说：“既有承认解释宪法中决定兵额不属于统帅权范围的一派，又有承认的一派，即将其理解为决定兵额之事属于宪法第11条和第12条中与大权相关联的事项，故此事不应由政务上的单独处理来决定”。^① 海军军令部认为由于宪法第11、12条的统帅权与编制大权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防兵力应由政府和统帅部商量后一致决定。军令部的这个观点否定了美浓部博士所主张的决定兵额不属于统帅大权的观点。福留参谋还撰述了其他几个类似的文书，都是主张政府与统帅部应在一致的前提下决定兵额，政府单独决定常备兵力是侵犯了统帅大权，违反了宪法的行为。

2. 侵犯统帅权论争的内容

此时海军军令部在解释统帅权时把重心集中到了手续问题上，海军军令部把政府与统帅部的一致决定作为了最大要求事项。但是，参谋本部的侵犯统帅权论与海军军令部的主张却包含了与此极为相反的内容。

由于估计到在第58次特别议会上会就侵犯统帅权问题展开的论争，所以法制局在与陆海军两军之间讨论了“军政统帅关系事项”之后，编写了议会中的答辩案。同时，参谋本部自己也编写了答辩案，4月28日以参谋本部第一部为中心做成了最终答辩案。从这个最终答辩案中，可以明显看出参谋本部对这次政府采取措施的见解：

^① 瀬川善信：《統帥權問題と參謀本部》，第19頁。

政府在签订与兵力有关之条约时与统帅部局进行商议，若不商议则是否冒犯统帅权之独立？（答）虽非直属于统帅，然决定兵力属于统帅之全权，故缔结此种条约时，应在充分听取并了解统帅部意见之后，与有关诸国进行协商、签订条约。若不按此手续办理则冒犯了统帅之独立。^①

海军军令部的政府与统帅部应在对等的立场上一致决定兵额的主张，和参谋本部的在决定兵额时应取得统帅部的同意这一主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参谋本部的主张更加彻底地强调了统帅权。参谋本部所指的侵犯统帅权论包含了对政府打破了统帅权优势的批判，从这个意思上说，这表示着参谋本部强烈意识到只有统帅权独立制才是可以保障军部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的特权。同时，也表现出在政军关系中，对军部的绝对优势这一基本条件一步也不退让的决心。

正是因为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参谋本部做出了在各个方面扩大侵犯统帅权争论的举动。例如，参谋本部于5月2日编写的《关于伦敦会议善后策研究》中，并没有把善后工作作为重点，而是在政府无视或侵犯统帅权才是“国防上忧虑不堪之处”^②论点上大做文章。同时，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畑俊六在5月2日出差时就统帅权论争留下了《申送事项》，^③其中在展开对浜口内阁这次决定批判的同时，还主张今后与陆军省共同掀起侵犯

① 瀬川善信：《統帥權問題と參謀本部》，第24页。

② 瀬川善信：《統帥權問題と參謀本部》，第26页。

③ 瀬川善信：《統帥權問題と參謀本部》，第28页。《申送事项》的内容如下：“一、统帅权问题。浜口首相就此问题制订了在议会中极力避免答辩的方针，只要政府持此态度，陆军也和政府保持一致，避免答辩。但贵族院等其他机构进一步逼首相进行答辩的话，作为陆军省应最早站出来表明陆军的立场，声明回训是对统帅权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故到此时机为止，不宜采取行动。”二、基于以上内容，作为参谋应暂时相信陆军省当局的话，继续监视右翼行动。”

统帅权的争论。

另外，参谋本部还于5月27日就统帅权争论问题与陆军省碰头。本来参谋总长预定当天的出差，也因为“参谋本部内统帅权被侵犯不仅仅是海军的问题”的意见而被迫终止。6月2日，海军军令部第一课长访问参谋本部第二课长时，参谋本部第二课长对海军军令部就统帅权被侵犯一事彻底斗争的觉悟不够提出了警示。6月3日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中将与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会谈时，改变了海军已往对追究侵犯统帅权不彻底的态度，决定与参谋本部共同斗争。这些事更表明了在侵犯统帅权争论这件事上参谋本部的主导权。

侵犯统帅权论争的当事人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大将，在4月2日进行的帷幄上奏中并没有涉及侵犯统帅权的说法。但是，当侵犯统帅权的争论变得活跃起来时，再加上有参谋本部背后强力的撑腰，加藤大将将成为主张统帅权被侵犯的代表。加藤大将对已往政府就国防力不足缺乏照顾的不满，转化为对政府在发出回训案前，最终无视海军军令部意见的批判，^①甚至表示出认为侵犯统帅权的元凶就是浜口内阁的强硬态度。^②

由于以前都是以参谋本部为中心展开的侵犯统帅权争论，所以加藤大将强化统一海军军令部全体的意见，准备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企图以海军军令部为中心加强陆海军两军军令部的团结，以便对政府施加压力。但是这一行动被以冈田启介大将为其他军事参议官安慰阻止了。

5月28日，加藤大将为了与海军省保持一致意见，向海军

① 加藤宽治：《六 覚（東郷元帥談、昭和5年3月16日）》，《続現代史資料》第五卷（加藤宽治日记），みすず書房，1994，第470页。反对缔结条约最为强烈的东乡平八郎元帅曾鼓励加藤大将说：“如果不能保证在七成上，那在国防上就不能安心，所以不能跟他们争再减一分怎么样，再减两分怎么样。他们不听我们的意见的话，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回来。”

②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第一卷，第47页。

大臣财部彪大将提出主张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保持共同步调的备忘录。其中写道：“根据宪法第12条的大权规定，兵额及编制属于军务大臣（进而包括内阁）及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的共同辅弼事项，不得由一方单独裁决处理。”^①从备忘录中可以看出，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之间，就统帅权的基本解释还是存在出入的。

海军军令部在这份备忘录中，认为在宪法第12条的编制大权上，海军省与海军军令部的地位平等，也就是说，承认编制属于共同辅弼事项，就可以使海军省承认海军军令部从海军省中独立出来，并具有独自活动的余地。而海军省一方则采取了不涉及宪法第12条的解释，海军大臣为海军省及海军司令部两方代表的这一海军一贯的态度。就统帅权被侵犯的说法，海军省保持了最初的见解。海军省认为：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中商定的辅助舰保有量，属于宪法第12条中规定的军队编制及常备兵额，并没有涉及第11条的统帅大权，所以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所指责的统帅权被侵犯的说法是没有道理并缺乏妥当性的。

如此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见解的不同，不仅源于两者对统帅权解释的不同，其根本在于海军统帅权独立制度的内容与陆军不同这一结构上的因素。在这层意思上，可以说海军军令部视利用侵犯统帅权争论为在海军省内取得与陆军的参谋本部同样地位的机会。此后，参谋本部及海军军令部中后被称为舰队派的急进派，和政府及陆海军省中后被称为条约派的稳健派，一直就侵犯统帅权争论进行着对立与抗争。

其他还有以头山满为代表的军缩国民同志会、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还有以大井成元（原陆军大将、贵族院议员）为会长的恢弘会等右翼团体，以侵犯统帅权之名攻击政府。军部也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第一卷，第106页。

想借此机会恢复其政治发言权，进而决定国家政战两略。但是，受到舆论支持的浜口内阁批准并进而缔结了军缩条约，成为政党政治的一个成果得到舆论与经济界的肯定评价。由于对政党政治主导的政治体制不满，侵犯统帅权问题给军部的急进派带来了很大影响。^①

特别是海军部内，以侵犯统帅权的论争为契机进入了大转换期。一方是在把军备和外交、财政综合考虑后，从合理的立场上来肯定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条约派；而另一方则是认为军备和外交、财政为二元并列，坚持对美保有七成兵力反对本条约的舰队派。两派之间正式发生了对立。以前的海军一直与陆军不同，在传统上其部内的统一都完成得比较顺滑。但是，围绕着对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评价，条约派与陆军的统制派联合，舰队派和陆军的保皇派联合，也就是说，陆海两军就此进入了横断的派系之争时代。而且重要的是，通过派系之争，海军省与海军军令部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931年（昭和6年）12月23日，参谋本部迎立闲院宫载仁大将为参谋长，海军军令部也与之呼应，于翌年的2月2日迎立伏见宫博恭大将为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大将跟东乡元帅一样，是到最后都反对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人物。伏见宫大将就任海军军令部长后，同月8日，属于加藤大将一派的舰队派中心人物高桥三吉中将就任军令部次长。这样，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公布（1931年1月1日）后不久，舰队派就掌握了海军军令部，并且对条约派所聚集的海军省一致施加压力，藉此来对海军省扩大海军军令部的发言权。

① 青木得三：《中村隆英解題》，《太平洋戦争全史》第一卷，ゆまに書房，1998年影印本，第122页。1930年9月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激进少壮军官间成立了樱会，在樱会成立目的书中写道：“从缔结《伦敦条约》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就可以看出，当今这个极度颓废的政党者之流的毒刃正指向军部是不争的事实。”

结果，1933年（昭和8年）9月26日修改了《海军军令部条例》。《海军军令部条例》改为《军令部条例》，海军军令部长改为军令部总长，班长改称为部长。这些改动都是模仿参谋本部的。此外，海军大臣保有的非战时军队指挥权被剥夺，移交军令部总长。另外，依据《舰队令》以下的改正，舰队司令官、镇守府司令官、要港司令官的有关作战计划之事，以后都要接受军令部总长的指示。从此，军令部总长就拥有了与参谋总长同等的军队指挥权，海军的统帅权独立制变得与陆军完全相同了。

另外，在大角岑生海军大臣支持的所谓大角人事调动中，前军令部长谷口尚真大将、山梨大将、左近司政三中将、堀中将、寺岛健中将（前海军省军务局长）等被视为条约派的人物，全部都被编入预备役。与之相反，舰队派中心人物之一的末次大将则于1933年11月15日被起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上述海军在机构与人事方面的改革，都是相当于海军自身在沉默中否定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行动。

侵犯统帅权论争在其争论的过程中，强化了军令机关（特别是海军军令部）的权限，并且成为1930年代以后军部作为军令机关转化为战争指导主体的重要契机。也就是说，首先军令机关通过侵犯统帅权争论，使编制大权（军政权）也包含在了统帅大权（军令大权）之中，成功地扩大解释了统帅权独立制，从而确保了不受政府、议会统制的独自活动领域。其次，虽然侵犯了统帅权的说法在缔结条约的这件事上败北了，但军令机关成功地取得了对军政机关的压倒优势，在军部内的军令、军政两机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海军军令部条例》被修改以后，海军军令部与参谋本部的地位和权限就完全一样了。

再次，通过以上事情，参谋本部、军令部两军令机关代表了军部的实际状态，政府及军政机关都不能对其实施充分的统制。在军部内部也施行了改编，两军令机关强化彼此间的关系，通过实现一

体化来担任了1930年代以后指导战争主体的角色。两军令机关所主张的没有征得军部的同意就决定兵额是侵犯统帅权的见解，实际上是不妥当的。的确，决定军队的编制、常备兵力的编制大权因与统帅权有关，具有应通盘考虑的性质。但是，只要兵力的最终决定与国家预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编制大权就应该属于担任国防的陆、海军大臣的辅弼事项。更不用说军令机关就缔结条约的是非以统帅权或统帅权独立制为盾牌，自始至终采取了强硬的反对姿态。这露骨地表现出了军令机关打算连国防方面条约的批准权也要掌管的意图。

军令机关这样一系列的应对，可以说并不是政府及议会侵犯了统帅权，而是军令机关侵犯了其掌管外的编制大权和条约批准权。在军令机关这样的强硬姿态背后，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着军部整体的统帅权独立制处于绝对优势的认识。也正因为这种认识，此后军部以军令机关为中心、以统帅权独立制为盾牌，扩大了自己的行动范围。

战前日本的政治历程，可以说是政府及议会、政党和军部（特别是军令机关）之间，围绕着统帅权独立制的解释与运用方法，经过了争论、对立、抗争的历史过程。从其内容上来讲，在战前日本的战争指导体系中，什么样的势力成为战争指导的主体并把握住了最高国策决定的主导权就成为了问题。

1930年代以前，也有政府及议会、政党势力成为指导战争主体的时期（例如设置了防务会议、外交调查会），即使是那样也因为受到统帅权独立制的制约而以失败告终。可以说议会、政党势力作为指导战争的主体，事实上手中并没有掌握安定的权力。在以上的对立、抗争关系中，军部最终确保了自己作为指导战争主体的地位。使这一体制安定的契机就是侵犯统帅权的论争，而最终得以确定的事件则是九一八事变。

在下一节里，我们可以通过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外交、军事政策，来观察日本政军关系的变化。

四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外交及战争领导

1. 从出兵山东到皇姑屯事件

在田中义一内阁（1927年4月20日成立）时期发生的济南事变和皇姑屯事件，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那么当时日本的外交与战争领导又是怎样的实际情况呢。

政友会田中内阁的前一任内阁为宪政会的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1926年1月30日成立）。从表面上来看，由于在金融危机的扩大中，台湾银行救济紧急敕令案被枢密院否决了，所以若槻礼次郎内阁不得不集体总辞职。而实际上，中国的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北伐革命，若槻礼次郎内阁坚持与英美的协调外交方针，采取了不干涉主义这一基本姿态，为此国内对若槻内阁的不满也是其总辞职的背景之一。田中内阁成立后，田中自己兼任外务大臣，起用了对中国强硬派的森格为外务次官，加上一向批判宪政会对华关系政策软弱的政友党变成了执政党，所以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变得强硬起来。

1927年5月，北伐军逼近有众多日本人居住的山东，为此日本国内打着保护日本侨民旗号的出兵山东论急速抬头。加上在山东拥有权益的财界的强烈希望，陆军开始抱有国民党势力有可能通过北伐得到扩大，进而威胁从华北到满洲的日本权益的强烈危机感。所以田中内阁刚成立不久，是否出兵山东，出兵的规模、时期等都在政府内外成为问题。

就任田中内阁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是政友会的重镇，也是在财界拥有绝对威望的财政家，同时他又基本上是个紧缩财政论者。而从内地（日本国内）出兵则需要庞大的出兵费用，高桥藏相的姿态就使田中内阁认为，以现在的国库情况来说应避免出兵，如果非要出兵的话从内地出兵是愚蠢的方针。

主张马上出兵的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也不能无视高桥

的见解。陆军于5月2日编写了备忘录，向内阁提出了从“满洲”派兵的出兵方针。^①其大致内容为，要求从满洲调遣四个步兵大队及其附属部队约2000人。但是，在这个方针中还有以下内容：“四、若有必要增加北支那驻屯兵力时，依据第一项从满洲派遣所需军队；五、据第一项及第四项派兵造成满洲部队兵力不足时，应及时从内地补充。”^②也就是说，虽然这次停留在了小规模派兵，但是确保了将来随着情况的变化可以增派军队的前提。这就露骨地表明了在不久的将来，希望能从内地派兵，也就是可以大规模派兵的意图。

但是，这时应注意到，内阁议会于5月27日通过陆军的出兵方针，28日又分别得到了田中首相及铃木庄六参谋总长的同意，马上以“政府声明”^③的形式正式发表了出兵方针。也就是说，从陆军提出出兵方案，到陆军接受高桥藏相附有条件的出兵论，到内阁会议决定这一方案的经过，都是在军政合意上极为迅速地进行的。出兵伴随着财政处理是当然的，而从通过内阁决议实施

① 參謀本部編《昭和三年支那出兵史》，巖南堂，1971年影印本，第22～23頁。相关研究还有：江口圭一：《日本帝國主義史論——滿州事變前後》（青木書店，1975）；江口圭一：《日本帝國主義史研究》（青木書店，1998）；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研究史論》（校倉書房，2001）；白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吉川弘文館，1998）；白井勝美：《泥沼戰爭への道標——濟南事件》（《朝日ジャーナル》，1956年3月号）；井星英：《昭和初期における山東出兵の問題点》（《芸林》第28卷第30号，第29卷第1、2号，1979）；栗屋憲太郎：《張作霖爆殺の真相と鳩山一郎の嘘》（《中央公論》，1982年9月号）；佐藤元英：《昭和初期の対中国政策の研究——田中内閣の対滿蒙政策》（原書房，1992）；佐藤元英：《近代日本の外交と軍事——權益擁護と侵略の構造》（吉川弘文館，2000）。

② 參謀本部編《昭和三年支那出兵史》，第22～23頁。

③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原書房，1965，第96頁。《政府声明》中写道：“最近在支那的动乱，尤其是在南京、汉口及其他地方发生兵乱之际，由于支那官宪没有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导致停留在支那的帝国臣民的身体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此实为严重有损名誉的暴行。”在此声明中出现的保护“停留在支那的帝国臣民身体生命财产”，此后作为取得出兵许可的惯用手法被反复使用。

出兵这点来看，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出兵。就这一点，可以认为保持了本书第三章中讨论的，由政府主导西伯利亚出兵时的政军协调姿态。

出兵被立即实施，驻屯在满洲的第10师团（姬路）、第33旅团接到出动命令后，于6月1日从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7月5日，内阁会议决定命令该旅团从青岛开往山东省中心城市（省会）济南。同月8日第33旅团到达济南。以上，从出兵手续到调兵到济南，军队的行动自然都由参谋本部所管。由这一经过可以认为，参谋本部始终与陆军省及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协调关系，政府发挥了外交、军事主导权的主体性。^①此后，虽然由于北伐的暂停而决定撤兵，参谋本部也始终保持了政军关系的协调。8月30日，政府发表了从山东撤兵的声明，9月8日撤兵。

1928年（昭和3年）1月，下野了的蒋介石再次担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进入4月后再次开始北伐。4月16日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向铃木庄六总参谋长提交请求再次出兵的意见书。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英介、济南总领事代理西田畊一等也向外务省提交同样内容的意见书。4月17日，白川义则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提交再次出兵的提案。一方面，陆军在当天与参谋本部及海军协商后，决定从天津调3个步兵中队派往济南。接下来在1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陆相的提案，陆军方面决定从第6师团（熊本）中派遣8个中队。

这些内容使得第一次出兵山东时为将来出兵的构想成为现实。4月20日政府发表派兵声明，同月25日第6师团到达青岛，5月2

① 参謀本部編《昭和三年支那出兵史》，第30页。神田文人在《“满洲事变”与日本的政军关系—统帅权与天皇制》中也曾引用过此段文字。就派兵的经过，参谋本部说：“通过调查步兵第33旅团决定西进的过程，明确了参谋本部负有责任。在决定西进时机的手续上，陆军省与政府间在意见上有着反复的冲突，导致参谋本部主任部决定了西进的时机，政府也应负责。”这强调了是与政府商量的结果。

日就到了济南。结果 31 日第 6 师团就在济南与北伐第 40 军发生冲突，同月 11 日占领济南城。第二次出兵山东造成了中国方面死伤人数为 6000 人以上（济南事件）。

面对新局面的展开，为了应对预想之外的战斗规模的扩大，陆军当局不光跟陆军省、参谋本部，还跟外务省保持紧密联系，并于 5 月 8 日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增兵。结果，内阁通过了增加一个兵团的决议。决定派遣第 3 师团（名古屋）前往山东。同月 15 日，为了夸耀军事行动的成果和日本军事力的威力，决定给蒋介石北伐的主要对象张作霖提出备忘录。为了解决事态，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涉占用些时间，翌年，即 1929 年（昭和 4 年）3 月 28 日两国达成解决事件的合意。

以上三次出兵山东，虽然不管哪一次都是陆军方面提出的提案，但陆军一贯重视与政府的协调，并迅速实现了出兵。这是由于田中内阁是跟陆军比较协调的政友会内阁，而外务省自身也是由以森外务次官为代表的，在对华政策上可以跟陆军匹敌、主张强硬外交的官僚们指挥的。虽然有以上条件因素，但从派兵——增兵——撤兵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外交、战争领导，还是彻底证明了该时期的政军关系。

但是，该时期也发生了陆军方面与政府不协调的事件。那就是皇姑屯事件。在北伐中，当张作霖的奉系军败北已呈定势时，为了能确立满洲地区的支配权，关东军就制定了让张作霖下野，在新的指导体制下，树立从北京政府独立出来的新政权这一构想。也就是说，关东军企图从中国及中国人民手中夺取满洲地域，并直接进行统制。

与陆军的设想相比，田中内阁及田中自身仅仅打算利用张作霖，利用中国人来实施满洲经营，通过这个方法对满洲实现实质上的支配。由于政府和军部对张作霖的姿态不同，于 1928 年（昭和 3 年）6 月 4 日发生了关东军阴谋炸死返回奉天途中张作霖的事件。而且，因为这是关东军阴谋实施的，所以不光田中内阁，就是

军队中央在事件发生之前都完全不知道关东军的阴谋计划。

该事件是由关东军的河本大作大佐构思，独立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指挥实施的。随着事件真相的渐渐清晰，田中内阁周边及陆军方面掩盖真相的行动活跃起来，田中内阁围绕着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发生了纠纷。^①田中虽然对天皇进行了否认关东军参与的上奏，但最终不得不承认是关东军参与的真相，事态结果发展到了田中因为看到昭和天皇斥责虚假报告的态度，而自身决意辞职的程度。

以上两个事件，如从政军关系的角度整理的话，有必要指出下面两点。

第一，在出兵山东时实现了的军政协调一致的关系，在皇姑屯事件中则完全不存在了。三次出兵山东都是在田中内阁主导下，作为对中国外交的一环来实施的，并且具有保护日本企业及日本国民这一作为国家的“大义名分”，所以作为统一的国策就有可能实现军政协调统一。当然这里还存在有田中政友会对华政策方向及田中自身所拥有的强烈的统率力。与此相对，皇姑屯事件反映的是，到底以张作霖为媒介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满洲）的支配权好，还是废除张作霖由日本直接来统治好的对立。在这一选择上，田中内阁与以军部为中心的诸势力之间没能达成一致。

① 原田熊雄述：《西园寺公と政局》，第4页。田中义一在确定关东军的河本大佐为炸死张作霖的犯人后，明确了要公布事情真相和严惩犯人的态度。而强烈支持田中的就是身为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原田熊雄在书中记述了西园寺公望的意见：“万一发现此事系日本军人所为，必须果断处罚以维护我军之纲纪。不用说日本陆军的信用，就是从国家的面子上来说，即使对支那的感情一时会恶化，也只有严厉处罚，才能维持我国的国际信用。……对内而言，田中出身于陆军军部，能够管理住军部，同时又有政友会这样强力的政党追随，所以，田中作为政党也好，作为首相也好，漂亮地维持国军的纲纪都必然会带来非常好的影响。请下定决心，如果调查出来事实确系日本军人所为，应立即处罚。”但是，正如该书所述“当时，就这一事件，基本上政友会所有的干部都认为，如果事实确实日本的军事行为，应悄悄地埋在黑暗中”那样，以铁道大臣小川平吉为首的隐蔽派占了多数。

第二，通过这两个事件的处理方针，可以看出军政协调一致时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当国家目标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一致，并就达成目标的手段、方法达成合意。当条件不确定，出现的像西伯利亚出兵时那样的权限集中、机能分散的政军结构，明显是脆弱的。从这点来说，围绕皇姑屯事件的政军关系，可以说迎来了一个重大转折点。这种情况在下一节的九一八事变中将更加明显。

2. 九一八事变处理中的政军角逐

九一八事变也与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的阴谋。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以奉天（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附近铁路被炸为借口的这个事件，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既是参谋又是作战主任的石原莞尔中佐实施的。关东军打算通过这个事件刺激中国军队，诱发军事冲突，从而把跟蒋介石保持协调一致的张作霖的接班人张学良势力赶出满洲，使中国东北部（满洲）事实上处于关东军的支配下。

事变发生时，由于侵犯统帅权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浜口幸雄遭到右翼组织爱国者的佐乡屋留雄的狙击，身负重伤。若槻礼次郎接替伤势恶化的浜口幸雄再次操持政权。在此时期，陆军内主张早期解决满蒙问题的建川美次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永田铁山陆军省军事课长等中坚军事官僚们编写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1931年6月19日），明确了武力解决方针。这时还发生了参谋本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在北满洲兴安岭侦察时被中国军队杀害的中村震太郎事件（同年6月19日）；接着7月2日，在满洲万宝山发生了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为开挖水田用水路发生冲突的事件（万宝山事件），日本把这些事件作为借口煽动国民的反华情感。作为陆军，则认为是在满洲发动军事行动绝好的时机。

9月18日下午11点18分，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关东军司令部附属）土肥原贤二大佐的名义给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中将发出了电报，19日凌晨1点7分电报到达参谋本部。这是汇报事变

的第一报。^①此后，关东军称与中国军队进入战斗状态，19日上午8点半收到朝鲜方面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给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的电报，称为了支援关东军，朝鲜方面军（第20师团）已经做好了出动的准备。这是事变发生以前就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商量好的行动，计划朝鲜方面军林司令官以应关东军本庄司令官请求方式，从朝鲜方面军第39旅团中派遣兵到满洲。

19日上午7点召开了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联合会议，杉山元陆军次官、小矶国昭陆军省军务局长、二宫治重参谋次长、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今村均参谋本部第一课长、桥本虎之助第二部长等出席，就支持关东军及朝鲜方面军行动达成了协议。然而，外务省与其下属机关，跟出兵山东时不同，对军部的计划产生不信任感，鲜明地摆出了和皇姑屯事件时一样的批判态度。事实上，奉天总领事林久次郎在事件发生后，密切监视着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并频繁报告给币原喜重郎外相，19日的电报就是以下内容。

第630号（至急电报）：

有报告说参谋本部建川部长乘18日午后1时的列车进入当地，据悉军方对此保守秘密。又据满铁木村理事所云内容，满铁为支那方所破坏，为修理被破坏的铁道，满铁派出保线的工夫，军方并没有在现场附近，可以想象此次事件全为军部有计划之行动。^②

① 事件发生后，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之间的电报内容，参见：嶋田俊彦：《満州事変の展開》，（《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二卷，朝日新聞社，1962）；臼井勝美：《満州事変——戦争と外交と》（中央公論新社，1974）；林銑十郎：《満州事件日記》（みすず書房，1996）。另外，参见神田文人《“満州事変”と日本の政軍関係——統帥権と天皇制3》，“満州事変”，第31～52页。神田文人在书中使用了这些史料，详细记录了陆军省从9月19日到9月22日每天的动向。

②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册，満州事変），外務省，1977，第6页。

总之，这里报告了事件为军部的单独行动，而且当地的关东军今后也有企图积极进行军事行动的计划，请求政府提高警戒。与林总领事持有同样见解的还有满铁总裁内田康哉。^① 在19日上午10时30分的紧急会议中，若槻首相就关东军行动的真实意图向南次郎陆相质疑，陆相对此做了此次行动为“自卫”措施的发言。对此，“政府做出极力避免事态扩大之方针，陆军大臣应将此决议训令关东军司令官”^② 的决定。也就是说，内阁会议的决定否定了暗中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军中央的动向。

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早早决定了“不扩大”方针，这多少对企图扩大战斗和从朝鲜方面军派兵的参谋本部起到了些抑制作用。参谋本部对关东军司令官数次要求从朝鲜方面军派兵请求置之不理，事实上，参谋总长直接向朝鲜方面军司令官下达了没有接到天皇命令前应待机的指示。^③ 但是，虽然参谋总长强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不扩大”方针，朝鲜方面军林司令官并没有遵照指示，反而再三要求增派部队。而作为参谋本部，在出兵西伯利亚和出兵山东时，通过协调与政府的关系，迅速而顺利地实现了派兵计划，同时增兵和撤兵，特别是属于政治领域的事也自始至终完成得很顺利。参谋本部由此经验强烈地认识到与政府保持一致步调是为上策。所以，对朝鲜方面军的越境出兵要求发出了“请自重”的指示。

以上，是事变发生后政府周边的动向，下面通过对朝鲜方面军及关东军，以及军中央的中坚军事官僚动向的探索，阐述其中迫使

①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滿州事變），第26頁。內田在電文中談到關東軍的行動給國際輿論帶來不好影響，從正面批評了關東軍。

②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滿州事變），第25頁。

③ 神田文人：《“滿州事變”と日本の政軍關係——統帥權と天皇制》，第35頁。書中引用並介紹了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圖書館藏未刊行資料《中央戰爭指導重要國策文書》中當時發給朝鮮軍司令官的電報。電報內容：“軍首腦層已經決意從朝鮮派遣兵力，手續上決定採取在取得閣議承認後下達敕令的方式，故本電報發送之後，將在下達敕令的前提下向次長、總長進行匯報。”

政军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与当初重视跟政府协调的省部首脑不同，他们对内阁会议的决定采取了非妥协的态度。然后，受到陆军中坚层的满蒙武力占领论和军部主导论的推动，首脑层也渐渐卷入了强硬方针的执行之中。这就是政军关系的重要变化结果。

作为中坚官僚中心，且有绝对影响力的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中佐，在1929年7月实施的北满参谋旅行中提出了《国运回转之根本国策为满蒙问题解决案》及《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且于1930年3月1日满铁调查课编写的《讲和要领》中公然主张武力占领满蒙。板垣征四郎大佐等人在其编写的《从军事上看待满蒙问题》（石原中佐改其名为《满蒙问题私见》并记录）中，主张要解决满蒙问题除了把满蒙占做日本领土以外别无他策，所以“与其改造国内不如先解决满蒙问题比较有利”。而实施的手段则是“国家的堂堂正正”、“军部主导”、“依照谋略制造机会”、“关东军主导”、“抓住时机”等这样简捷、直接披露了陆军应采用的方法。^①

所以，应注意到军队中央的首脑层与中坚军事官僚层之间，就是否与政府保持协调一致产生相当程度的隔阂。基本上以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陆军内的中坚军事官僚层团结起来，开始操纵军队首脑层，从而更加创造出了军部优势的政军关系。

如果稍微整理一下资料就会发现，在河边虎四郎中佐和远藤三郎少佐记录的《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中，在刚发生事变时有下列文字记载：“就事件处理而言，也有不得超过必要程度的阁议决定，故此军队之行动应遵守此则妥善处之”（电报第15号总长发司令官收），以及“对于阁议决定事项，军部不应强烈反对”（《满洲时局前后策》）。这说明军队充分顾虑了政府的方针，抑制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資料編），第99页。

了自己的行动。^①

此外，9月20日上午10时，在参谋本部召开的三官衙首脑部会议上，陆军大臣向政府提出了军部所谓的“最上策”的强硬方针，声称“军部希望藉此之际一举解决满蒙问题，若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以此为由军部推翻政府亦在所不惜”。^②但是在当天下午3时召开的三长官（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信义教育总监）会议中就“关东军就增派经阁议决定后实施”^③达成共识。这就再次表明了陆军中坚层^④与首脑层之间，不光在处理满蒙的方法论上，还是在是否与政府保持协调一致的认识上也存在不同。

但是，军队首脑层并没有彻底地抑制关东军及朝鲜方面军中坚层的行动。前面引用过的《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中，记录了9月21日在朝鲜方面军以应关东军的请求方式，越过国境去兵满洲吉林时，日本国内研讨了《对于朝鲜军司令发出出动命令之帷幄上奏案》。其中写道：“只有相信并承认朝鲜军司令官的决定是依据当地实情之非常有必要的决定，面临军队已在外国实施行动的事实。值此之际，军队之行动应立足于陛下的发动大权，相信藉此可

①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巻（資料編），第115頁。

②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巻（資料編），第117頁。

③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巻（資料編），第118頁。

④ 所谓陆军中坚层，原指省部的佐官级官僚，本书将其定义为强烈希望建立总体战体制结构的将校集团=统治派。相关研究参见：加藤陽子：《模索する1930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中堅層》（山川出版，1993）；筒井清忠：《陸軍中堅思想幕僚の思想》（《歴史と人物》，1984年2月号）；須崎慎一：《総力戦理解をめぐって——陸軍中枢と二二六事件の青年将校の間》（《年報 日本現代史》第3号，1997）；須崎慎一：《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その時代——天皇・軍部・戦争・民衆》（大月書店，1998）；江口圭一：《満州事变期の陸軍パンフレット》（《法経論集 法律篇》第113号，1987年2月）；三宅正樹：《政軍関係研究》（芦書房，2001）等。

以确保军队士气与军纪，对内外宣扬帝国军队之威重”。^① 虽然这是按照事先的计划，但是可以看出，军部通过对应关东军司令官增兵的请求而派兵的朝鲜方面军林司令官心情的理解，尽力使天皇下达许可的决定。

事态在此期间急速发展，朝鲜方面军在没有得到天皇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发动军事行动，这从后面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当“阁议不承认增兵时的处理”时，“总长运用帷幄上奏请天皇许可出动军队的命令，向天皇上奏说明此时阁议情况，并相信此次擅自越江行为并非侵犯大权”。^② 没有天皇的许可擅自调用军队当然是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但是为了日后统帅权被侵犯的批判，抢占先机写明了“并非侵犯大权”，并于22日名为“朝鲜军司令官的处置并非侵犯大权”^③的记录中极力回避对统帅权被侵犯的批判。不管因为什么理由，没有得到天皇许可，没有天皇命令调用军队就是明显地侵犯了统帅权，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的。

此时，参谋本部的中坚层官僚们，计划推延内阁的承认，由陆军单独上奏取得天皇许可。为此，陆军省的中坚层官僚们，向军队首脑提出了为回避受到侵犯统帅权的批判而保持共同步调的提议。永田铁山军事课长则以增兵问题属政府承认事项，陆军利用军令机关特权进行帷幄上奏，以避开阁议是愚蠢的策略为理由加以强烈反对。

但是在22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全体阁僚成员承认已派兵的事实”。^④ 也就是说，确立了军队造成既成事实后，政府采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121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121页。

③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122页。

④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128页。

取予以事后承认的方式，此后政军的这种关系构造形成了定式。从这层意义上说，在朝鲜方面军擅自越境及事后承认的过程中，政府也成为军部侵犯统帅权的帮凶。此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扩大到整个满洲地区，占领了所有的主要城市，于1931年（昭和7年）3月1日建立了日本的傀儡国家——伪“满洲国”。

五 结束语：认识乖离的政军关系

编制大权明显属于内阁辅弼事项，而军部却彻底拘泥于此始终采取了与政府、政党对立的姿态。但侵犯统帅权问题的本质，“政府对军部的纠纷重点在其政治意义方面”^① 正如同吉野作造在其题为《统帅权的独立与帷幄上奏》（《中央公论》，1930年7月号）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并不是统帅权的解释和军制论的问题，而是导致了军政的对立，露骨地企图转换为以军人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的政治行动。统帅权独立制这一赋予军部的特权，虽被用来当做拒绝政治统制的根据，但其最终仅仅是构筑了政治和军事的机能、作用的分业体制，而不是以权限分歧为目的。在这方面，很明显当时的舆论及媒体都支持政府见解的。

同时，也如吉野在同一篇论文中指出“是我现行国法系统中如何解释政府与军部关系的事情”^② 的那样，这里问题的根本是明治宪法存在着某种缺陷，也就是说，具有允许军部过大解释权的暧昧性。军部利用这种暧昧性，发动了与政府、政党的论争，在失败后又改为积极争取舆论支持。军部之所以认识到舆论支持的必要，是因为意识到了作为被选出势力代表之政党的存在。在军部的尝试失败后，又改变方法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① 吉野作造：《吉野作造選集》第四卷（《大戦後の国内政治》），岩波書店，1996，第338页。

② 吉野作造：《吉野作造選集》第四卷（《大戦後の国内政治》），第352页。

问题是，军部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没有停留在国内政治上，而是在从田中内阁到浜口、若槻内阁的政权交替过程中，政军关系的纠纷在表里一体的外交领域上逐渐鲜明起来。本章开头引用的《统帅参考》（1931年）就强调统帅权为掌管军政、军令的共同权力，就是在统帅权论争中失败了军部所做出的通过坚持把统帅权作为军部的根据地来与政府、政党抗衡的政治判断。

如《统帅参考》的《第二章·政治与军事》中所言：“两者在国法上具有同等地位，作为相对立的东西，只有帝国宪法可以立于两者之上实施统一权能。”^① 军部在此强调了政治与军事在权限上的平等。也就是说，完全否认了集中权限、分担机能这一以集中和分工为原则的政军关系。神田文人引用此处文字，得出“暗示着只有天皇才能立于两者之上”^② 的结论。

然而，从实体的侧面来看，中坚军事官僚们很清楚，天皇不过是形式上立于两者之上，从根本来说，如果军部不能确保与政治保持平等地位甚至取得统制权凌驾于政治，就不可能建立总体战体制。这个认识在1938年（昭和13年）4月1日制定国家总动员法的过程中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在制订过程中，与议会势力为敌，甚至侵犯了一部分天皇大权。这表明军部认为不是以陆军为中心的绝对行政权力就无法建立起总体战体制。

这样，围绕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政治、外交指导权，日本的政军关系迅速展开并发生了变化。这就决定了在从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开始的中日全面战争，到战线的扩大和战期的延长，乃至到其延长的日英美战争中，外交、战争指导权方面的政军关系的大体情况。

① 陸軍大学校編刊《統帥参考》，第29頁。

② 神田文人：《“滿州事變”と日本の政軍關係——統帥權と天皇制》，第61頁。

第六章

至日英美开战前夕政军关系的 改观与日本型政军关系的成立

一 前言

本章将探究的是，从第一次上海事变到与日英美开战前夕这一时期政军关系的新展开。日本对中国进行真正的武力镇压政策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同时也因当时意在回避与日本全面战争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意向而延迟了抗日战线的结成。但是，1936年（昭和11年）12月12日，在西安，以张学良发动的监禁蒋介石事件（西安事变）为契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迈出了“国共合作”的一步，从而结成了抗日战线。在如此的中国抗日民族主义高涨之时，第二年即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的中日两军冲突成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线。^①

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并非是在军中央的统治下计划的，虽然冲突

① 关于日本侵华战争期军部动向的研究主要有：白井勝美：《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中央公論新社，1968）；白井勝美：《満州事変——戦争と外交と》（中央公論新社，1974）；白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吉川弘文館，1998）；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19、20卷，（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1）；秦郁彦：《日中戦争史 増補改定版》（河出書房新社，1972）等。

本身也有其很大的偶发性，但当地的日本军以及军部内激进派主张“一击中国”论，意欲一口气解决中国问题，并且以与德国、意大利的军事同盟为背景来对付苏联的这一方案基本在军部内达成一致。如此军部对中国政策的展开，大体上说以构筑总体战体制为前提，并有把中国作为适合总体战阶段各种资源的补给地，在此意义上的对中国的军事镇压是作为构筑总体战体制的基本条件被大部分军部中间官僚所认可的。从这种认识来看，出于瞄准当时悬而未决的中国全境的一大国家目标开始了中日全面战争。

但是，中日全面战争的持久化、泥沼化，是对现有国力徒然地硬性消耗，站在构筑总体战体制的角度来看，尽可能迅速地解决日中战争的问题成为一个课题。作为解决这个课题的一个方法，日本选择了不再回避与英美发生军事冲突的事态。那就是当时武力强行进驻东南亚。武力进驻是企图阻断英美对中国支援的道路，以及试图掌握当地以石油为主的战略资源，同时也造成了与英美关系的恶化。

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全面战争，再到作为其延长线的日英美开战的时期，本章首先将这一时期设定为“日英美开战前夕”，以这一时期的政军关系的统合与改观作为关键词，对其特质进行探讨。在此，以在日美战争中承担主要角色的海军的地位为重点，弄清政军关系的实况。

更加具体地说，第一，最初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以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3月27日）、塘沽停战协定（同年5月31日）、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为契机，军部的政治发言权进一步得到加强，并且从日德防共协定（1936年11月25日）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的制定（1938年4月1日）总体战体制正式实施的过程，以及通过日德意三国同盟缔结（1940年9月27日）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中国等同盟国的对立鲜明化，最后再依次弄清直至决定对英美发动战争的政治过程中，重点探索政军关系的展开过程。

第二，从政军关系的观点出发，探索在对英美发动战争政策的决定过程中，被视为日美战争主体之海军动向，确认海军所起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过分强调军部亦即陆军的作用，而对从中日战争到日英美战争期间战争领导地位中有关海军作用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直至近几年才有大量有关海军的研究发表。^①可是，就有关政军关系紧密相关的海军的位置该如何定位，依然是个很大的课题。这里就以此为重点进行研究探讨。

- ① 关于日本海军政治作用的研究有：池田清：《海軍と日本》（中央公論新社，1981）；工藤美和尋：《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南窓社，1982）；野村実：《太平洋戦争と日本軍部》（山川出版社，1983）；麻田貞雄：《两大戦間の日米関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今岡豊：《脱文支那事变初期における政戦両略について》（《軍事史学》第10卷第2号，1974年6月）；森松俊夫：《支那事变勃発当初における陸海軍の対支戦略》（《政治経済史学》第168号，1980年5月）；平間洋一：《第一次大戦への参加と海軍——参戦意思決定をめぐって》（《軍事史学》第22卷第1号，1986年）；高田万亀子：《日華事变初期における米内光政と海軍——上海出兵要請と青島作戦中止をめぐって》（《政治経済史学》第251号，1987年3月）；小池聖一：《大正後期の海軍について一考察——第一次、第二次財部海相期の海軍部内を中心に》（《軍事史学》第25卷第1号，1989年6月）；樋口秀実：《日本海軍の大陸政策の一側面》（《国史学》第147号，1992年）；樋口秀実：《第一次上海事変の勃発と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塩沢幸一海軍少将の判断》（《政治経済史学》第333号，1994年3月）；樋口秀実：《満州事変と海軍》（《国学院大学 日本文化研究所紀要》第80卷，1997年9月）；樋口秀実：《日中関係と日本海軍1933-1937年》（《史学雑誌》第108卷第4号，1999年4月）；影山好一郎：《第一次上海事変における第三艦隊の編制と陸軍出兵の決定》（《軍事史学》第28号，1992年9月）；影山好一郎：《満州、上海事変の対応に対する陸海軍の折衝——海軍の対応を中心として》（《政治経済史学》第318号，1992年12月）；影山好一郎：《大山事変の一考察——第二次上海事変の導火線の真相と軍令部に与えた影響》（《軍事史学》第32卷第3号，1996年12月）；影山好一郎：《昭和十一年前後の日本海軍の対中強硬姿勢 広田三原則の策定をめぐる外務、陸、海軍の確執——海軍の対応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歴史》第595号，1997年12月）；相沢淳：《日中戦争の全面化と米内光政》（《軍事史学》第33卷第3号，1997年12月）；進藤裕之：《日本海軍の対米作戦計画構想》（《六甲台論集》第44号，1997）；額綱厚：《昭和期海軍と政局（一）（二）》（《政治経済史学》第344、345号，1995年2、3月）；額綱厚：《日本海軍の終戦工作——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再検証》（中央公論新社，1996）。

二 九一八事变后至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政军关系

1. 海军的中国观及其与陆军的对抗

此时期的日本，通过建立“满洲国”（后来的“满洲帝国”）使军部的政治影响力逐渐扩大，五一五事件（1932年）后又迎来了政党政治的终结，加上因九一八事变的定性问题退出了国际联盟、陷入国际孤立之中。在日本国内，“非常时期”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家的统治逐渐强化。出于控制国内的不安和动摇的目的，天皇制机关说受到了抨击，日本民族主义在席卷全国的国体明征运动中被唤醒。

中日全面战争前一年的1936年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其背景是志在重组由军部主导的国家机构进而构筑总体战体制的统治派，与标榜回归天皇亲政构建天皇制国家的皇道派之间在路线上发生了对立。也就是说，这是一次皇道派以打倒统制派为目的的武装政变。但是，统制派通过以肃军为名义的反武装政变，反而将皇道派从军部中央赶了出去。此次政变同时也成为统制派加速总体战体制构筑的绝好机会。并且，中日全面战争也是由统制派主导的军队中央成功排除主张歼灭苏联论的皇道派，主张“一击中国”论占据优势的时候爆发的。以此为视角，下面从政军关系的角度出发具体地探究其历史事实。

首先，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作为陆军外地派出军的关东军引发的九一八事变，海军对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时，陆军又是以怎样的形式把该事变的计划透露给海军，并如何构想与海军的联合呢？在这里，笔者想从亚洲太平洋战争败战后的1946年1月22日举行的旧海军军人等座谈会记录谈起。原海军大将近藤信竹在会谈中做了以下的证言：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六、七月左右，参

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次长（二宫治重，中将）、一部长（畑俊六，少将，作战）、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在偕行社招待军令部长（谷口尚真，大将）、次长（永野修身，中将）、一班长（及川古志郎，少将）、一课长（近藤信竹，大佐），由二部长建川对满洲的状况进行说明，并谈到当时日本人在满洲筹划事业时所受到的种种干扰，日本人的发展越来越被阻碍，日俄战争的宝贵牺牲已经毫无意义。所以，海军在满洲引起事端是不可取的，是故意找别扭。设置驻满洲海军部，也有监督陆军之意。当地陆军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一年前就开始准备，二作为海军是没有插手的余地的。海军从热河进入北京和天津的做法也是绝对行不通的。^①

九一八事变是与军中央在一定的紧密联系下筹划的，付诸实施之事在战后也已弄清。对此，陆军首脑事前也向海军首脑通报了行动计划，这证实了曾向海军请求援助的事实。问题在于后半部分的海军回应。海军事前知道陆军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计划，即使对此抱有不满意的想法也没有表示出明确的反对之意。

陆军在满洲挑起事端一事海军事前是知道的。但是，海军只是把陆军的作战地区限定在满洲，反对向北京、天津等波及华北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因此，看来作出“当地陆军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而作为海军是没有插手的余地的”的近藤的证言基本上叙述了当时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泽本赖雄（当时海军军务局第一课长）在证言中说：“自己本身是一课课长，却直到事变爆发也不知情。政府反复翻弄着无为的方针，结果是陆军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却取得了可观的战果，致使周围反对的空气渐

^① 新名丈夫編《海軍戦争検討会議記録——太平洋戦争開戦の経緯》，毎日新聞社，1976，第118～119页。

渐消失了”。^①

会谈的内容也变得明确起来，当时海军意在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那是因为中国东北（满洲）是传统意义上陆军大陆政策的根据地。另一方面，海军对从华北到华中地区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也就是说，在陆军和海军之间只要保证互不干涉的默契，作为海军并没有牵制陆军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因此陆军把海军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记录为：“海军方面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似乎并无热情，特别是海相以及海军次官更是如此”（1931年9月29日），“海相只是关注有关中南支那的事情，关于满蒙问题并没什么主见，并且持极消极的态度”（1931年10月2日）等，可见他们之间只是一种互不干涉的默契。^②另一方面，陆军直率地指出海军对九一八事变很不关心，海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设立了驻满洲海军部，设置海军独自的情报收集站。但是，是和陆军的情报收集机关无法相提并论的小规模的情报站。所以，并不一定是海军对满洲地区的关心程度低，只不过是整个海军最关心的对象是上海方面罢了。

但是，一旦陆军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海军预期以外的成功的话，海军就不可能再和陆军保持沉默了。出于海军面子问题，也有为获得预算的借口以及顾及海军评价上的问题，从泽本的“陆军以可观的战果，使周围反对的空气渐渐消失了”的证言里，可以看出海军对这些问题产生了焦虑感。

就这样，海军方面不仅在九一八事变上和陆军对抗，也深切地感触到对政局的积极关心的必要性。九一八事变对于海军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为了获取在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到日美开战为止的日本海军对政局的态度，以不仅在政界，而且在财界、学术界各方

① 新名丈夫編《海軍戦争検討会議記録——太平洋戦争開戦の経緯》，第119页。

② 池田清：《海軍と日本》，第91页。

面持有广范围人脉、情报来源的海军军人高木惣吉执笔的通称《高木惣吉史料》为线索，在适当介绍海军政局观的同时，以海军的动向为重点对政军关系的改观作出分析。

已经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了，高木在1940年（昭和15年）7月25日写的《帝国的近情和海军的立场》第一章“至到‘二二六事件’”^①中，关于满洲的定位，将“为了粉碎俄国的南下政策，日本牺牲了十万生灵，花费了二十多亿的日币，赌上国联而战”的这种日本军部和右翼团体，及至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满洲观，在内容上予以了连缀整理。也就是说，日本所谓的生命线满洲，在中国的对日本态度强化当中出现了危险，为了保卫满洲要采取军事行动，积极地认可了九一八事变的正当性。在这里高木也写道，当时的日本国内大多数人是完全肯定这种满洲观的。事实上，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原因，高木提出以下的见解：

大战后因世界经济不景气且日渐严重，使得浜口内阁、若槻内阁时期我国国内发展停滞不前，民间陷入不景气，失业者不断出现，官员的俸禄减少，军队紧缩大量整理整顿。于是不但英美国家，就连支那也蔑视我国，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民愤。^②

这个见解可以归纳为，事变的原因是由于对经济不景气无法做出对策的民政党内阁的失态，以及官吏、军人、国民各层对生

①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みすず書房，2000，第425页。使用了《高木惣吉史料》的研究还有：森元治郎：《ある終戦工作》（中央公論新社，1980）；伊藤隆：《昭和十年代史断章》（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野村実：《海軍の太平洋戦争開戦決意》（《史学》第56卷第4号，1987年4月）；工藤美知尋：《高木惣吉資料にみる日本海軍の終戦工作》（《日大法学》第48卷第2号，1982）等。《高木惣吉史料》现藏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图书馆。

②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425～426页。

活日益困窘化的不满，加上遭遇各国的蔑视等。高木除了闭口不提作为事变主谋陆军的责任之外，而且还从基本的政党政治以及中国的对日政策当中去寻求原因。高木就此事还做了以下更具体的记载：

然而民政党内阁的外交是所谓的英美协调、对支妥协。悬案已累积了数百件未解决的问题，因小幡公使“征求同意书”遭到蒋政权拒绝之后只能忍气吞声。由此不难推测对大陆问题极为关心之陆军暗中跃跃欲试，作出一些行动。^①

高木以陆军的擅自行动为前提，认为陆军的行动是其从国内政局的观点出发做出的合理判断，对军部的行动给予全面肯定。可以说其中凝聚了高木以及其代表海军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

海军一直对上海作战扩大的问题表示担忧。理由是，因为有过田中隆吉等陆军军人策划挑起的第一次上海事变（1932年1月28日）。作为海军，为了证明自己对上海的军事影响力，将此视为一次海军对上海影响力赢得好评的机会。因此，海军发动上海事变，在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的指挥下，陆战队登陆上海市街，和中国第十九路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遭遇了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的海军陆战队，给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属下支援了约五十艘舰艇，但是也并未能挽回战争劣势，终于陷入了请求陆军支援的境地。对陆军产生对抗意识的这种鲁莽而颇具野心的军事行动，使海军的膨胀主义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显露无遗。

在上述1946年旧海军军人座谈会《海军战争研讨会议记录》

^①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巻，第425～426页。

中所看到的海军对上海事件的应对。出席者竹内元海军少将介绍了美国有影响力的报纸通讯员“只要有关上海问题，海军都是隐忍持重”的报道。泽本也以“的确如此。（关于上海事件）绝非海军策动的”说法，给出了同样的证言。另外，上海事件当时的军务局长丰田贞次郎在发言中说：“第一次上海事件（昭和七年一月～五月）的时候，我还是军务局长，战争准备还没有做好，在当地陆战队的厅舍也还没有建好。当时末次长官任命一舰队小林跻造大将、二舰队末次信正大将、二舰队参谋长中村龟三郎为增援军的派遣掩护，但当时还有末次将成为三舰队长官的传言。可是因为一旦末次大将成为三舰队长官的话，事变可能就会扩大，所以横须贺镇守府的野村吉三郎大将被任命为了三舰队长官。”^①他在证言中认为，海军并未以此事件作为与陆军对抗并扩大在上海影响的机会。

另外，高木在《帝国的近况和海军的立场》的“第五节 上海事变与海军的困境”中，认为此事件与随处可见的那种对日美开战的警戒感值得注意：

当时日美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在上海的中日冲突必然会发展成为日美战争已经是常识。面对挤满海军省的报社记者的追问，当时面不改色的只有军令部第一部长及川少将（现任大臣）。丰田军务局长也长叹道：“马上就是日美战争了”。^②

认为上海事件招致了日美开战危机的不仅是日本方面，根据高木的记载：“陆军派遣增援一事是在正式发表之前，特地向美国做

① 新名丈夫編《海軍戦争検討会議記録——太平洋戦争開戦の経緯》，第122页。

②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427页。

了秘密通报，当时的美国大使馆武官艾萨克大佐听到我国陆军要进入上海时，敲着桌子对高桥伊望大佐叹息道：‘日美冲突再难避免了’”。^① 向英美利权集中的上海扩大战火，无疑将招致与英美之间的严重紧张状态。

但是，在同一史料中，高木表达了出于向陆军的对抗，海军也是积极充实备战，确保海军活跃的领域，通过军事成功而提高海军地位的强烈意识：

根据大陆政策的发展，英美，特别是美日之间的关系难测，海军的水上舰艇姑且不论，实际上在出师准备、航空军备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如果陆军在大陆有幸成功的话，所有的功绩将归陆军所有。如果英美进行强大的干涉，大日本帝国将必然经历三国干涉的痛苦打击，国防上的责任海军是不得不承担的。^②

在这里可以看出既有与英国、美国开战的决心，也有借此作为体现海军意义绝好机会而积极促成上海事变的姿态。陆军为主导的九一八事变的一时成功，使海军产生了在与陆军对抗上的深刻危机感和焦躁感，这些都在《高木惣吉史料》中有着明确的表示。后来，贯穿海军军事、政治行动的与陆军的抗争意识，促使海军毫不犹豫地采用战争政策的态度便植根于海军内部了。

这种意义上显示出的高木的上海事变观，可以说基本代表了海军全体的意志吧。下面再来看看高木对于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期所持的时局观。在《帝国的近情和海军的立场》的第四章《支那事变及其之后的重要事项》中“第一节 支那事变的开端”中，高木对上海事变做出了如下的表述：

①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428頁。

②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428頁。

今日的日本帝国在经济上处于依存英美势力的状态，如果没有希望调整国交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日本在大陆或者海洋开始发展建设世界新秩序，大概和英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和支那的关系也在冲突的时间和方法等方面引起了争议，当时的实际情势可以说是带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①

高木这种就当时政治状况的分析、判断，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使应该极力地回避和英美的冲突，但由于要确立世界的新秩序，也就是说在所谓称霸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日本国家目标下，与英美的军事冲突是必然的。高木至少在中日全面战争经历了三年的当时（1940年7月），就日本和英美的冲突是一场不可避免性战争，断定日本与中国及英美的军事冲突是“历史的必然”，准确地预测出了一年后开始的日美战争。

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展示了高木的分析能力，不如说是他以海军、陆军以及日本政治指导层，基本上是在亚洲断然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为前提，认识到中日战争和日英美的战争并不是两场毫无关系而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战争，即从日本在亚洲争夺霸权机会的观点出发把握了这一系列的战争。

于是，1937年8月爆发了第二次上海事变。当时海军省的干部是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海军次官左近司政、军务局长丰田贞次郎，军令部的干部是军令部总长谷口尚真、军令部次长百武源吾、第一班长及川古志郎。特别是海军省的构成，可以说都是些被称做良知派的军事官僚。因此，这年7月在卢沟桥挑起中日两军冲突时，当初海军内部对不扩大方针意见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到8月9日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在上海被中国保安队杀害，事件发生后，海军就放弃了不扩大方针。加之有尚未放弃对增兵持慎重姿态之陆军中

^①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432頁。

央的支持，结果就造成了上海出兵。^①

进而，8月15日海军航空队断然实行从长崎的大村机场对上海和南京的越洋轰炸，海军拿出比陆军更盛的气势以中国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为中心，为扩大战线而奔走。同年末发生了海军战机“误爆”并击沉美国战舰的事件。^②结果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致歉并处分了海军责任人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三井贞三少将。从美国驻日大使格尔“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话，恐怕要发生极度严重的事情了”^③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此事招致了非常严重的结果。

2. 九一八事变至中日全面战争期间的政军关系

在上一节中，从高木惣吉的见解中，概观了作为主要政治势力而保持独自姿态之海军的政治、外交认识的一部分。本节将简要归纳九一八事变后至中日全面战争期间，包括海军在内的多样的政治势力是怎样在相互复杂纠缠中，最终构筑成陆海军占优势的政军关系的。

正如前一章所分析的那样，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军部内明显出现了中间层亦即总体战派对外交、军事的领导，军中央事后追认派兵的行动，通过反复发生的既成事实逼迫政府、内阁让步的构造变得正常化了。由于五一五事件（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政友内阁的倒台，政党内阁走向了终结，前朝鲜总督海军大将齐藤实以

① 关于大山勇夫事件对海军的影响，参见影山好一郎《大山事变の一考察——第二次上海事变の導火線の真相と軍令部に与えた影響》。

② 关于帕奈号事件的研究，参见笠原十九司《日中全面戦争と海軍——パナイ号事件の真相》青木書店，1997；笠原十九司：《揚子江の危機——再考パナイ号事件》（《軍事史学》第25卷第3、4号，1990年2月）。笠原十九司在《揚子江の危機——再考パナイ号事件》中通过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的分析，指出当时日已经强烈意识到进入了日美战争的准备阶段。而且笠原十九司引用了《参謀本部第一部長 田中新一中将業務日誌》（防衛省戦史資料），指出：“1940年秋日本海军在军令部的对美战争作战的讨论时，就已经决定了将对美战争的据点放在太平洋上，而且当时日本海军就已经开始使用‘太平洋战争’的称呼了”。

③ Joseph Clark Grew, *Ten Years in Japan*, 石川欣一译《滯日十年——日記・公文書・私文書に基く記録》上卷，毎日新聞社，1948，第316頁。

“举国一致”口号继承了内阁。在标榜“举国一致”的背景，以九一八事变转为转机，日本国内出现了应该称为“权力的多重化、重层化”的状况。

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九一八事变后政党势力、军部，以及以官僚势力、西园寺公望为首的元老重臣势力，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集团，有了登上政治前台的机会，激情一下子高涨起来。^①但是权力的多重化、重层化状况，反而削弱了对在九一八事变中得势之陆军的行动抑制力。

也就是说，1933年（昭和8年）1月1日，关东军再次开始侵占满洲、热河的时候，恰好也是国际联盟讨论满洲问题的时候，在齐藤内阁周围因出于对国际舆论的顾虑，爆发了对陆军侵占计划的批判，以致昭和天皇也命令牧野伸显内大臣召开御前会议。

但是，西园寺公望、木户幸一（当时内大臣秘书官长）等宫中派，担心即使再召开御前会议也不可能抑制军部强硬姿态的情况下，可能会使天皇的权威受损，因此，反对召开御前会议。天皇自身也担心军部的强硬姿态会引起国际舆论的批判，也不再言及召开御前会议，宫中派开始表现出了接受军部实质性的主导外交的态度。^②这件事与退出国际联盟的问题说到底是相同的。

对于国际联盟传达给日本政府的否认“满洲国”的劝告文，最初最激烈反对的就是陆军。退出国际联盟对日本政府来说意味着真正意义上从华盛顿体制中退出，虽说这当然是应该回避的课题，但同时又不得不对“满洲国”的既得权益保持强烈的关注，所以

① 当时宫中派打算遵守以美英为中心建立起的华盛顿体制，主张对英美协调论；而九一八事变之后，亚洲门罗派则从“帝国自立论”的角度出发，主张打破既有的国际秩序。两派的对立日益尖锐。相关研究参见：堀田慎一郎：《岡田内閣期の陸軍と政治》（《日本史研究》第425号，1998年1月）；堀田慎一郎：《1930年初期における輔弼体制再編の動向》（《年報 日本現代史》第5号，1999）。

② 关于牧野伸显的研究，参见伊藤隆、广濑顺皓编《牧野伸显日記》（中央公論社，1990）。

如何对应军部的强硬姿态也成为很伤脑筋的问题。^①在此期间，英国曾就满洲问题推动过中日之间的协商，同时提出了与国际联盟继续共同交涉得出的以延期解决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妥协案。齐藤内阁一直到最后都坚持反对退出国际联盟的做法，通过召开枢密院院长、往届首相、民政党及政友会两党总裁等组成的重臣会议来试图统制军部。

在牧野内大臣的支持下，齐藤大臣之所以在乎重臣会议，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内阁主导型的政府的局限性，在与军部的对抗上期待通过借助重臣组成的强大政府，能够扭转军部占优势的政军关系。但是，西园寺公望、木户幸一依然对齐藤首相召开的重臣会议持消极态度。在此期间作为统制军部的手段，主张重臣会议召开必要论的吉田茂（前驻意大利大使），与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已代治、海军实力者山本权兵卫等接触，说服他们召开重臣会议。但是，由于这一说服工作中交错着各势力、各派阀间的期待，而未能够形成意见统一的状况。^②

对于齐藤首相、吉田等人的说服工作，虽然也有海军的山本、民政党等势力的积极回应，但是对已经承认了“满洲国”的事实已无济于事。对事实上否认“满洲国”的国际联盟的劝告表示不服从的枢密院院长仓富勇三郎等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齐藤首相

① 关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研究参见：茶谷誠一：《國際連盟脱退の政治過程——輔弼体制再編の視角から》（《日本史研究》第457号，2000年9月）；臼井勝美：《満洲国と國際連盟》（吉川弘文館，1995）；井上寿一：《危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日中戦争に至る對外政策の形成と展開》（山川出版社，1994）；内山正熊：《満洲事変と國際連盟脱退》（三宅正樹編《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第一法規出版，1983）等。

② 茶谷誠一：《國際連盟脱退の政治過程——輔弼体制再編の視角から》，第13页。茶谷誠一指出：“民政党和萨摩派要求召开的重臣会议主要还是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恢复他们的权威。”关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是枢密院的决定，可参见：佐々木隆：《举国一致内閣期の枢密院》（《日本歴史》第352号，1977年9月）；堀田慎一郎：《平沼内閣連動と齊藤内閣期の政治》（《史記》第77卷第3号，1994年5月）。

最终也放弃了召开重臣会议的打算。这期间，政府周围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对政策决定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西园寺对天皇制支配国家体制的坚持，天皇的权威才始终回避了实行由军部统制造成之为政治所利用的政策。

就这样，在1933年（昭和8年）2月20日政府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在同年3月27日的枢密院本会议上正式决定）。即使是退出了国联，齐藤首相等也未立即放弃外交交涉，也就是说并没有考虑退出华盛顿体制。这是因为至少在政府内部，外交协调派还依然占有优势。问题是即使是那些外交协调派（亦即日后的对英美协调派）在政府内部有优势，决定放弃伪“满洲国”在根本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实。很快单凭内阁、政府的判断已经不再可能运转整个政局了，而且政府渐渐失去了统制军部的手段。

从以上的政治过程看，作为抑制从国际联盟退出行动的手段重臣会议召开的失败——即使在决定外交的过程中军部也在发挥着主导作用——意味着在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周围错综复杂的期望中，统制军部的对策最终都归于失败。其结果，日本被迫与华盛顿体制的国际协调体制疏远开来，这使得日本以后在内政、外交上的选择面变得更加狭窄。这种所谓的外交孤立化的形式，不久在对华政策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强行分离华北的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那么，从退出国际联盟到华北分离工作，再到中日全面战争期间对华政策的实施，这段时期给予了政军关系怎样的影响呢？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以与中国南京政府缔结《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为契机，中国驻日本公使升级为大使（1935年5月17日）等，中日关系中还有中国国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问题，中国方面对日姑息政策也变得明显起来。但是，陆军利用这种状况开始乘机进行华北分离工作，谋划将华北地方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刚一显露出来，就引发了中国国民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姑息政策的批判，在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开始探索与共产党和解的途径。

就这一意义而言，可以预测日本对中国政策的选择被逼到了更加严峻的地步，就如我们以上所看到的那样，对于抑制陆军的退出国际联盟论和华北分离工作的进展，政府方面的力量已经变得极为薄弱了。那么，能够抑制陆军气势的力量，就只有海军这一支武装组织了。但是，就海军来说，在前一节介绍高木惣吉的资料时已经总结过，他们确实也和陆军有着相同性质的对中国强硬论，所以说很难期待其对陆军起到“制动器”^①的作用。在海军内部，亦如前章归纳的那样，围绕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不仅与政府形成对立，即使是在海军内部推进缔结条约派（条约派）和反对缔结条约派（舰队派）之间的派阀斗争也更加激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上海事件，舰队派断然从海军中枢中彻底把条约派的人排除出去。^② 已有许多研究明确地表明，舰队派势力中在对中国政策方面也是强硬论者占压倒性的多数，在认为和陆军采用共同步调上，海军中持对中国问题采取积极态度意见者也占多数。^③

恰好在当时，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成为海军的最大课题，即对支撑华盛顿体系的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这两个海军裁军条约的废除问题。对此，政府和其周边的政治势力主张，即使退出国际联盟后，也要基本上避免从华盛顿体系框架中退出，要坚持对英美协调路线的方针。因为政府判断废除裁军条约一事会使日本更进一步孤立。

但是，海军内部的判断，认为围绕满洲问题与美国及英国的冲突必定加剧。即认为对英美协调路线本身在不久的将来，将不

① 高木惣吉：《太平洋戦争と陸海軍の抗争》，経済往来社，1967，第234页。

② 关于海军内部派系对立的研究，参见秦郁彦《艦隊派と条約派——海軍の派閥系譜》（三宅正树编《昭和史の军部与政治》第1卷）。

③ 关于当时海军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参见：增田知子：《海軍拡張問題の政治過程》（《年報近代日本研究4 太平洋戦争》山川出版社，1982）；樋口秀実：《日中関係と日本海軍——1933～1937年》（《史学雑誌》第108卷第4号，1999年4月）。

再能够维持其有效性的看法，越来越占支配地位了。同时，海军内部一边协调所面临的与英美关系，一边推行对中国政策，并且为了日本能在中国占据优势而对推进华北分离工作的方针向军中央作了报告。

例如，当时被派遣到上海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旗舰出云坐乘）1936年（昭和11年）3月27日给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寄出了《关于以支那为中心国策的意见（第三舰队机密第八十五号）》，^① 在信中被认为集中了海军内部大体一致的意见。即及川论及了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的行动，认为那次事件虽然并非抱有要把全中国置于日本国的支配下“夸大的意图”的行动，“但是可能的话，希望使北支五省从南京政府政权中脱离，作为满支间的缓冲地带，以排除与苏战争时的周边的威胁”。^② 因此，他分析认为，陆军以1940年（昭和15年）为目标实现对“北支五省”的实质性占领，以及实行压制中国全境的计划，陆军的满洲地区对苏战争准备完成之际，正是对苏开战之时。对于这种危机感他还表示：

若果如此，对海军、对国家都是重大事件，关东军等的独断决定断然是不能允许的。就此事海陆军中央当局需要互相充分地对话，应慎重地考虑。以上述所示状况，鉴于陆军一直以来的独断越权行为，若关东军实力充足，或将不顾帝国国内的情况，制造借口企图对苏军开战，也未可知。因此，不论对关东军的强化是否愿意，都必然招致对苏战争，对此要做好精神准备，予以深刻地留意。^③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1963，第216~222页，第218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218页。

③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218页。

在这里，他强调了陆军的军事行动在导致日苏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指出有必要牵制关东军的行动，要提防陆军主导的大陆政策的升级。而且，他还主张陆军计划的“北支工作”，作为对中国政策的推进，应该在日本政府的统制下进行。总之，为了牵制、阻止陆军推进独自的中国政策，在这里他认为对中国政策应在日本政府统制下以合理的手段进行。就这样，他以代表海军整体的对陆军意见的形式总括了陆军的行动，而作为海军对中国政策的本意也在下面明显地表示出来：

不应将北支工作仅视为帝国的利己膨胀欲的结果，一方面如果不将其指导精神置于真正国际爱之理想的出发点，而是以帝国与北支政权的经济为目标，依靠相当浓厚的政治工作予以推行的话，则不仅要花费若干年方可完成，而且如果那样急功近利的话，不但不能使当初的理想实现，反而会招致各方面的误解。^①

海军虽然并不满意陆军的单独行动，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却主张把对中国政策予以一体化，实现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同时在国内特别是陆海军的相互之间应该促成相互协调的状况。而且，及川还言及今后日本应该采取的国家政策中，应将已经渐渐成为焦点的打入南方和打入北方问题进行调整：

帝国在应该采取的国策中，进入南方和进入北方二策无论哪一方面都应该视为和平进入。像今天一样各国关税壁垒很高，且人为地阻碍了别国的和平进入。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实力，且必须持具备排除这种障碍的准备和认识。^②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資料編），第220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資料編），第220页。

言及“进入南方”问题，反映了海军部内部对陆军在中国行使武力、搞军事行动的对抗意识，并明确了希望通过“进入南方”行动发挥海军作用的立场，而且着眼于该地区的石油资源。不过，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个时期海军提倡“进入南方”时期尚属早论，这种观点认为应该待伪“满洲国”成熟稳定，而且国防国家日本的体裁完备之后，再转向南进不迟。对于海军应该采取的姿态，也有观点认为：“即使把对苏战作为最近目标实行备战乃至执行国策的话，作为岛帝国也必须具备足以排除美国或英国其中的一国的海军装备。这是很多人所首肯的，没有理由不进行海军备战整备。”^①

对这个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及川的意见书，同年4月16日海军次官长谷川清、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联名在致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的《有关对外国策事件的建议（官房机密第一零三五号）》^②中作了回答。其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加进了按照广田弘毅内阁的“国策的基准”方针正式决定下来的国策内容。在信函的开头部分，他们表示海军的正式态度，作为今后的日本政府应采取的最妥当的方案，希望新内阁能够实现“国策要纲”，那样海军会按照此案保持部内的团结一致，力求在理解此主旨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所谓“国策要纲”，首先可概述为：“帝国国策的要纲，对内重振庶政；对外在大陆确保帝国的地位的同时，把发展南方作为基本方针，以充实国力、伸张国权的目的确立东洋的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创造东亚的安定势力。”^③随后，他们指出，作为对外政策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222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222~231页。

③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资料编），第222页。

的根基，“实行时，应当使国策政出一孔、一以贯之，同样重要的是严戒无谓地刺激列国，以致被迫过早地行使实力，或招致列国一致对抗我国之形势”。^①

综上所述，在调整与各国列强之间关系的同时，逐渐实现向中国满洲、中国南方地区的“进入”，明确地设定了这一以实现日本的权益和支配的目标。那时最大的问题是，陆军所采取的行动，招致列强警惕之行动的不利性。国家目标即便与陆军一致，其“进入”的方法却明显不同。这就暗中批判了陆军一连串的行动，显示出海军内部反对陆军的情绪依然很强烈。

直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一年为止，海军至少还抱有合理的判断，正如第一节中所看《高木惣吉史料》中所展现的那样，海军中好战的观点毕竟很少。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期，海军在对中国政策上与陆军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确保了合理的视点。因此，海军与主张对英美协调路线的外务官僚还是可以沟通的。在陆军方面，则可以说，在对中国政策的手段方面，对国际舆论的顾虑虽相对薄弱，但对于退出国际联盟后，由于其主导外交政策的突出引发的更尖锐批判，却颇为警戒。

因此，对中国政策手法的不同，并未立即成为妨碍陆海军沟通的主要原因。在此前的1934年（昭和7年）12月7日，陆海军加上外务省，三省关系课长制定了《有关对支政策案》^②，在其中就南京政府有责任停止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以及该政府放弃对华北地方政权的干涉等方面，三省间达成了一致意见。该时期的海军，就包括牵制南京政府的目的等目标，以华南的广东省为中心，讨论了海军兵力的进展。这里，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海军的进入华南，以及外务省对南京政府的怀柔政策等，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一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别卷（資料編），第222页。

② 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第8権（日中戦争），みすず書房，1964，第22～24页。

起构筑起对中国政策的互补关系。^①

当然，在围绕如何确定南京政府地位的问题上，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三省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但是这说到底不过是最终确保在中国支配权的方法论的不同而已。因为，就对华政策外交、军事领导而言，三方大体上说成功地保持了一定的统一性。在此意义上，以对华政策为媒介的该时期的政军关系，最终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安定感。客观地说，可视为进入相互补充、协力的状况。从此创出了比较均衡的政军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却未必能持久，南京政府接受了英美两国的支援，断然实行币制改革，并且在中国国内加强了反对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由此海军方面对陆军的强硬路线的警戒心也日益加剧。与此同时，从抑制陆军的对中国政策意义上而言，海军进行的南进政策，也难以期待陆军能予以积极的协助。^②就陆军而言，与海军的期待不同，他们希望加快对华北侵略的速度，那时他们正处于渐渐获得国内支持的状况之中。因此，就对华政策的问题，陆海军的行动依然非常不稳定，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政府方面也因缺乏明确统一的方针，而缺乏实行对中国政策的断然凝聚力。

三 中日全面战争前后期政军关系的改观

1. 二二六事件后以陆军为中心的政军关系

本节视点集中在二二六事件以后的内政方面，统制派反武装政

① 关于陆海两军就对华政策的对立的研究参见：樋口秀实：《日中関係と日本海軍——1933～1937年》（《史学雑誌》第108卷第4号，1999年4月）；赤木完爾：《日本海軍と北海事件》（《法学研究科論文集》，1997）。

② 该时期，海军以华南地区为中心采取了南进政策，相关研究参见：波多野澄雄：《日本海軍と「南進」——その政策と理論の史的展開》（清水元編《兩大戰間期日本 東南アジア關係の諸相》，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86）；相沢淳：《海軍良識派と南進》（軍事史学会編《第二次世界大戰》，錦正社，1990）；森茂樹：《枢軸外交および南進政策と海軍》（《歴史学研究》第727号，1999）。

变的成功，从军中央把皇道派清除出去，在这样的事态下成立了事实上属于军部的广田弘毅内阁，这里就以该内阁为媒介，考察决定其政治发言权的过程。

如同前一节所触及到的那样，1930年代的政治体系，或者说从政军关系的观点来看，从1932年（昭和5年）爆发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政友会内阁倒台，最终直到政党政治垮台，作为“选出势力”代表的政党职能相对强大，因此军部的反政党势力虽很强硬，但基本上说由于政党、政府对军部统制的常态化，政治优先的政军关系被固定了下来。政党政治崩溃之后，虽然政党的的确确从政治的前台上退出，而军部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但那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军部占主导地位的政军关系。

此后，一直至二二六事件期间，齐藤实和冈田启介两名海军大将政权虽相继组阁，但这些政权是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元老重臣派（即宫中派）促成的。齐藤、冈田两个政权都被认为是“举国一致内阁”，被视为对“非选出势力”政权基盘脆弱的辅助手段。另一方面，以陆军为中心的军部，因其陷入对中国政策纠葛的最大悬案中，也暂时不可能放弃对英美协调的基本路线，因此甘愿接受提倡对英美协调论的宫中派的主张。从此时至二二六事件，宫中派能在政军关系中实际上占据主导地位是一个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课题。^①

问题在于，为什么二二六事件以后，陆军能够接受宫中派对军部统制？为什么不立即努力树立军部政权呢？具体地说，二二六事

① 关于对1930年代日本权力构造的分析及宫中派所发挥的作用，参见堀田慎一郎《二二六事件——広田・森内閣期の政治》，《日本史研究》第413号，1997年1月，第25页。堀田慎一郎指出：“研究1930年代的中央政治史时，应以陆军为中心，同时将代表天皇意向的元老、重臣的动向放在视角之内进行分析。”相关研究，参见茶谷誠一《国際連盟脱退の政治過程——輔弼体制再編の視角から》（《日本史研究》第457号，2000年9月）。茶谷誠一在该论文中强调了分析宫内势力的重要性。額瀨厚在《日本海軍の終戦工作——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再検証》中指出日本的停战工作是以保全保守势力为目的的，所以停战工作也是在战争中掌握政治、战争主导权的主战派以从宫中势力手中再次夺回主导权为目的的高度政治策略。

件以后，军部已经获得了压倒性的政治地位，却为何支持外交官出身的广田弘毅呢？而且，包括陆军出身的短命的林銑十郎内阁在内，又为什么推举在国民中很有人气的近卫文麿呢？反过来说，政党内阁垮台后，虽然宫中派以取代政党的政治势力登上了政治舞台，扮演了代替政党而统制军部的角色，而且二二六事件后，尽管对军部的统制逐渐弱化，而且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期，可以说已经是军部为主导了，但为什么成立的却是非军部政权呢？

这里其实并不是要统制军部，而是意欲实行怀柔政策的宫中派，使用了独特的政治手法。就历史事实而言，是宫中派的态度最终加速了军部主导的政军关系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研讨的重要课题。

二二六事件以后的军部，特别是在陆军内部掌握主导权的是统制派，其中包括主张严惩事件“半反军”的石原莞尔（1936年的6月起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等陆军中坚层对广田内阁有着强大的影响。^① 石原代表的陆军中坚层所掌握的主导权，虽然在林銑十郎内阁期间转至同属统制派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1936年3月23日就任）手中，但无论如何都在实行以陆军为主导的内政、外交，而且领导了战争进程。

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掌握主导权的梅津陆军次官等统制派，通过坚决实行一系列的“肃军”行动，取替了参谋本部在陆军的优势地位，并通过构建陆军省占有优势的体制，企图使权力集中于陆军省的中央幕僚进而实现一元化领导，并且将缺乏紧密团结力的陆军予以再编。^② 根据1936年5月18日陆军省官制的改正，提出复

① 参见五百旗头真《陸軍による政治支配——二・二六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第2卷）。

② 堀田慎一郎：《二二六事件——広田・森内閣期の政治》，第29页。堀田慎一郎分析了以陆军省为主体的统制派介入政治的过程，指出：二二六事件之后，随着陆军对政治介入的加强，建立起“以陆军大臣为唯一窗口，合法、有效、在陆军大臣的支持下提交立案政策的体制，换言之陆军打开了单一的一条介入政治的通道”。

活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的现役武官制的理由是，与其实施仅仅停留于消极地阻止从军中央被排除出去的皇道派系将军再回到军中央，不如通过陆军省确保对内阁的牵制权来削弱政治对军部统制的可能性，或相反地说要抓住军部对政治统制的机会。^①

在实施这个措施的同时，梅津次官又在同年8月1日实施了陆军省官制的全面改革，在军务局里设置了执掌政治、政策的军务课（首届军务课长为石本寅三），显示了其干预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政治的具体实行。陆军省优势的构造渐渐形成，当然也导致了作为陆军的最大课题对中国政策的极大变化。

由参谋本部与关东军紧密合作强制实行的以往对中国的政策，在以陆军省占优势的构造中有了变化。华北分离工作也后退至了直接诉诸武力的强硬方针，而且在以经济提携为条件，通过与南京政府的交涉获得了让步，渐进地实现着华北分离工作的目标。对于陆军省的华北分离工作，石原等参谋本部虽说并非与其步调一致，而且有过批判，但是最终还是被迫表示沉默，结果形成了陆军省主导的对中国政策。

以梅津次官为中心的统制派，开始急切地落实后来成为内政悬案的总体战体制构筑。其代表事例是，同年8月2日经寺内寿一大臣提出的《行政机构改革案》。这是以行政长官和国务大臣的分离、禁止议员就任行政官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案。概括地说，即把帝国议会议员从政府要职中排除出去，旨在削弱议会的势力，试图强化从陆海军至既存官僚制的权限。广田内阁8月25日发表了

① 上法快男编：《陸軍省軍務局》，芙蓉書房，1979，第384页。关于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问题，陆军省军事课起草了《陆军大臣及次官的现役将官制的阁议请议案》，其中就绝对有必要推行现役制做了如下说明：“陆军大臣的职责是统领军人、严肃军纪、维持全军的团结。既然是统领属于统帅系统、受统帅权管辖的军人，那么陆军大臣也有必要是属于统帅系统、拥有统帅系统的命令权的现役军人。近来受时弊之影响，军人对军事的思想也不像过去那样单纯坚定了，这使得统领军人的工作日益困难，所以我相信正因为是现在才绝对有必要实行陆军大臣现役制。”

《国策七项》，其中加进了接受陆军的要求、实行行政机构改革等内容。

该内阁已在8月7日经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上制定了“国策的基准”，就国防军备的充实、南北并进方针等全部接受了陆军的要求。同日的四相会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上制订了以日、“满”、支共同防苏防赤为目的日德联合作为目标的“帝国外交方针”，进而在同月11日制订了旨在使华北五省成为防共亲日“满”地带的《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纲》等接二连三的措施，基本上作为陆军的代言人，原样不动贯彻了他们所主张的内政、外交政策。^①

正在那时，宣传苏联远东军增强、积极推进对苏战备的陆军，同样也急于实现军备扩充计划。9月15日向大藏省提出了《军备扩充五年计划案》。整備战时四十一师团和一百四十二支航空中队的大扩军计划是陆军统制派的夙愿，结果同年12月提出了初年度的总额达七亿两千万日元的预算。广田内阁之后，陆军一系列的内政、外交以及国家机构的再编的计划大体上都实现了。其结果是，随着陆军渐渐成为核心，海军也给予呼应，从而出现了军部对政治的统制，即出现了政军关系的逆转现象。

针对陆军对政治的统制事态，政党进行了反击。成为契机的是1936年10月30日的围绕议会制度改革中的“军部案”。政党认为“军部案”是一份旨在缩小帝国议会的权限，进而否定经明治宪法保证的帝国议会的正当性的案文，并且他们还依靠舆论的反军感情摆开批判阵势。军部虽然并没有打算直接理会政党的反击，但是还是表示，就从来主张天皇制为中心的国体的根本意义上讲，现有的

① 关于广田内阁时期制定“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等政策的经过，参见五明祐贵《広田内閣と「国策の基準」——策定経過をめぐって》（《日本历史》第624号，2000年5月）。此外，关于陆军提出的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国家机构再编问题的研究，参见池田順《ファシズム期の国家機構再編——広田内閣期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第288号，1986年8月）。

议会制是不适合的。这事实上是强调军部否定政党政治的态度。进而，在第二年，即1937年（昭和12年）1月21日的众议院会议上，发生了政友会的兵田国松代议士和寺内寿一陆相之间所谓“切腹问答”事件。寺内陆相要求解散议会，政局由此混乱。广田内阁由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而最终发展成为内阁总辞职。

同年1月25日，与民政党关系密切的陆军大将宇垣一成继广田内阁之后组织内阁，可是由于陆军的阻止，宇垣最终放弃了组阁（1月29日“宇垣流产”）。当时梅津陆军次官和石原等军部首脑和中坚军事官僚，与政党关系密切，他们因宇垣以往通过实行断然裁军尽力使国家财政的健全化而反对他组阁。于是，大命将归于忠实于陆军统制派意向而能干的人物、原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陆军大将的身上。他成立了林内阁（2月2日）。对这期间的事情原委，《军务课政变日志（昭和12年1月23日）》^①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认为陆军统制派彻底的反政党主义是“宇垣流产事件”最大的要因。

问题是，对于《军务课政变日志》所载那种军部的反政党主义，不论民政党还是政友会，根本就没有打算以支持宇垣的形式，构筑反军部、反陆军的阵营。两政党都由于在政党政治垮台以后，围绕内部潜在的主导权、方针的党内斗争，而无心举党支持宇垣。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局展开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陆军统制派的军事官僚手中。

另外，本来应该对欧美派的政党政治持理解态度的宫中派，在政权交替期间没有丝毫像样的行动，他们对宇垣见死不救的态度乍看似乎很令人费解。但是，事实是宫中派在此时，已经转变为对陆军统制派为中心的军部独断专行持置之不问的态度。实际上，作为宫中派的新领导而显露头角的近卫文麿等，在试图寻找与军界沟通

① 该资料收录于秦郁彦《軍ファシズム運動史——三月事件から二・二六後まで》，河出書房新社，1962，第369～380页。

的途径。陆军统制派，就此也将林内阁作为军部内阁，使其向着构筑成悬案的与总体战阶段相符的国防国家政策迈进。

林銑十郎内阁基本上是以梅津陆军次官为代表的陆军统制派的傀儡政权。陆军省在内阁开始成立后的第七十次帝国会议上，要求早期实现“军备充实六年计划”，不断地强迫军备扩充政策的断然施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梅津陆军次官意识到了对军备扩充计划持批判态度的议会势力，他发表言论说，报端所谓有关军装备编制宪法第十二条的编制大权，本在帝国议会的审议权限之外。^①而且，梅津还对统帅权独立制给予了扩大的解释，不仅是军令权，就连本应归入军政事项范畴的编制大权也解释为统帅权的范围，以此排除政府、议会的统制，迫使其承认军备扩张政策。

陆军在所作出的如此强硬的姿态中，反复强调“高度国防国家”的建设是目前陆军的目标。所谓的“高度国防国家”，就是把国防设定为国家政策的最大基本目标，同时要求国家机构按此字面意思，进行高度的军事再编。在此，如何应付将来发生的真正总体战成为了最大的课题，因此军事机构自动地被置于了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更具体地说，是要排除由政党、议会等按民意动向来规定政策选择的那种体制，企图以国防为幌子，光明正大地彻底集中权限。

这种陆军主导路线即使在继承林内阁的第一次近卫文麿组阁（1937年6月4日成立）期间也基本没有变化。在内阁建立一个月之后的7月7日开始的中日全面战争的战争指导上，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等主张压制中国论的对中国强硬派，开始在陆军内部掌握实权，军部首脑也是原则上认可这些佐官集团的作用。因此，近卫内阁的不扩大方针，也只是说说而已，完全未被实行，正如历史事实所展示的那样，实际事态

^① 《衆議院予算第四分科会における梅津陸軍次官答弁要旨》，《東京朝日新聞》1937年3月4日。

在日趋扩大。

在陆军内部，形成内政、外交两方面掌握领导权的态势，露骨地呈现出只有以军部主导的政军关系，才能成功建设包括对中国战争的高度国防国家的姿态。这样的陆军的姿态，虽然曾经引起财界、官界的畏惧和批判，但是在陆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13日），并通过的终止与中国和平交涉的通告（1938年1月16日）等压制中国论，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批判反应也就被迫沉默了。

2.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开战前以海军为中心的政军关系

在分析陆军行动时，就中日全面战争以后海军的动向再做些许详细的探讨。如上所述，军部占优势的政军关系构造固定了下来后，海军在中日全面战争中的行动是怎样的呢？这也是有必要加以明确分析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从整体上看，一直对陆军强硬姿态持批判态度的海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对中国的政策，也明显与国内政局拉开了距离。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至海军陆战队和中国军队的军事冲突（第二次上海事变，1937年8月13日）为止，此前海军因一直与陆军划清界限而持有的比较冷静合理的判断态度出现了后退，《高木惣吉史料》中暴露的强行路线逐渐地凸现了出来。

但是，也依然存在着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情势判断》（《高木惣吉史料·诸意见具申并战争指导》）^①那样对形势作出合理而且客观的见解。亦即海军省调查课1939年（昭和14年）4月11日制订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情势判断》，其中有米内光政海军大臣与井上成美军务局长对该文书的眉批，由此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海军省首脑部对情势的判断。

首先，在对德国的情势进行分析时，他们一面认为“德国先

^①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巻，第257～260頁。

于英国充实庞大军备已强制实行了膨胀政策，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不辞一击”；一面又认为由于其国力依然不够充分，所以“战争不可强行实行”。对于这样的情势判断，米内海相和井上军务局长都在眉批中表示同意。这对当时陆军省方面认为德军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首开战端，然后德军在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展开战局的预测给予了正面的否定。

在备考栏中，井上一方面预测，围绕强占波兰的英、德对立，将成为欧洲战争爆发的原因，所以德国对波兰的统治“能否成功还是个疑问”；另一方面，他还预测英国的对德政策情势，认为目前德国和意大利的膨胀政策很快必将形成对英国、法国的威胁，两国以武力对抗德国的话，扩充军备暂时还需要时间。他的结论就是，就英国来说，也存在着固守安全第一主义而不参战，屈服于德国的可能；但在能够确保美国、苏联对立进行援助，成功地离间德国和意大利，以及如果日本能够保持中立的等等条件下，美国“也不能说没有希望决心参战”。井上认为在这些条件中以“日本的态度最为重要”，日本对德政策是左右欧洲形势的关键。

井上对情势的判断是：“英国不仅担心如果过于接近苏联的话，会引起波兰的反感；而且也担心日本日益接近德、意，而导致欧洲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他写道，“日本的立场对于欧洲战争很重要”，而且说“就苏联的立场而言，也不愿意由于站在英国一边而受到日本的攻击”。他认为对于欧洲战争，日本不必有固定的立场，应该采取自由随意的姿态。井上认为，日本的对德态度是左右欧洲战争是否爆发的关键，所以日本应采取灵活的政策。

在他对形势判断的文字中，还应注意有以下的内容：“作为英国包围德国的一个对策，在处理支那事变中应该对我国出示诱饵，努力离间日、德、意的关系。作为我帝国虽说当然要利用这一立场，但若是被眼前的利害所惑，以致游离于防共枢轴的话，则会深深陷入在世界大战中为英国效犬马之劳，战后又因英国态度骤变而受到意外的压迫，这种错误的重犯是应该防止的。”

总之，从日本的立场来说，应强调一边坚持防共枢轴关系，一边警戒英国的离间工作，牵制英国；强调保持独自の发言权为上策的姿势。井上支持这种见解，认为：“日本应该利用这个立场自由地操纵德国、英国，如果英国不守信誉，那我们有实力准备。”他认为开展与两国的等距离外交，欧洲战争不论向何处发展日本都能确保有利的条件，才是合理的应对方略。

接着，海军省调查课还于1939年（昭和14年）4月11日制订了对策，即“第二，对欧洲战帝国应持的态度”。^①在开头的“要旨”中说：“对欧洲战争应保持与德、意友好的中立态度，通过积极活跃的外交以及军事行动迅速解决支那事变，以对英、美、法关系再进行调整为要务才是适当的。”“要旨”还历数了对欧洲战争采取“严正中立政策”的利弊得失。作为利点举出的有：可以促进当前事变的处理，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日本在亚洲地位的向上和有望增强国力，能够调整和英、美、法、苏的关系，利用英、法（美）的经济力量进行东亚建设等五点。

相反作为弊端举出的有：战后亚洲将成为各列强国角逐的场所；美国对日本立场没有好转的希望、英法势力的失落使日本无法强化在亚洲的地位；德意垮台之后英美对日本的压迫加强；由于国内对英国、对苏联舆论恶化的现状，对德意不表示好意的暧昧态度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有可能发展为国内问题等四点。井上在此批注道：“事关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拘于被舆论左右的浅见、面子而拖拖拉拉是最危险的，政治家应豁出自己的身家性命坚持正确的言论。”其结果，是得出了“第四，应持的态度”的项目中写道的那样，“并不一举明示态度，保持事实上对德、意方面好意的中立，在此之间应通过活跃的外交以及军事行动迅速促进事变的解决”，显示出灵活的姿势，充分确保选择的余地，根据形势的展开采取适当外交政策的结论。由此，应该试图解决作为悬案的中日战争。关

①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巻，第260～261頁。

于这一点井上在眉批中写道：“应该最大限度地保留选择的余地，不可仅限于德意，也应把英法美自由地摆布于掌中。”^①

可以说，井上的无限定等距离以及全方位外交的姿态，即使与苏联的关系也是可以贯彻到底的。总之，从他对调查课的“若获悉苏联参战的话，作为帝国不介入战争从国内来看（根据陆军的统制及其对苏的企图等所作综合判断）基本是不可能的”分析所作的“不同意”批语，也能领会到他那明确的意志。井上至少在这时就陆军对苏战争准备的目标、对中国的完全压制、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企划等都是完全反对的。他在摸索与陆军战略相反的海军战略。他排除简单的德意提携论、主张避免与英美开战，看来都是有意要确立海军独自の军事政治的作用。

进而，在“第三，以帝国应持态度为基调的当前的处理方针”^②的第二项“（防共协定）附属军事协定的利点”中的“1. 在处理（收拾）支那问题上预防英法苏的积极干涉；2. 与欧洲的德意发展策略相呼应，在远东使英法的援蒋态度发生缓和，争取迅速收拾时局”的内容作了如下批语：“将日本的行动与德意的行动同样看待的话，在政策上会使援蒋方针得以强化，实质上应该将援蒋力量看做是对欧洲的牵制，同时要考虑到会造成美苏进一步反日的结果。”他认为对德意的进一步接近将造成英美援蒋方针的强化，仅此将大大推迟中日战争的解决，并预测陆军的缔结三国军事同盟的行动亦将成为推延中日战争解决的原因。井上的这一判断是非常合理的判断，其预测的正确性也经受了历史的验证。

井上对陆军的姿态，已经从对立感情发展为几近于憎恶的程度了。他对于形势报告中一旦苏联参加欧洲战争的话，陆军必然对苏作战而海军无法予以抑制的分析，以强烈口吻作了批语“予以抑

① 参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図書館蔵《高木惣吉關係史料》。額瀨厚《日本海軍の終戦工作——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再検証》也以该史料为中心史料进行了引用和介绍。

②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261~263页。

制，要按照海军的决心去做”，由此也能看出井上有着相当的决心。

就全体而言，井上明确地坚持《（防共协定）附属军事协定》中“据条约日本应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保持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态度”，在此也是试图与陆军划清界限。不用说，所谓的米内—山本（海军次官）—井上这些代表海军省首脑的反陆军姿态，在这个时期就是在包括军令部在内的海军中取得全体一致也未必能形成，这是已为大量资料、证言所证实的事实。毋宁说，这一资料所显示的只是井上等海军内部被称为“左派三人组合”的特异幕僚一段时间内的态度，即使一时间内，他们在海军省内部掌握了实权，但从很快就出现的海军与陆军联合一致对中国强硬姿态来看，也只能说是一个特别时期内的海军反陆军的态度。

1939年（昭和14年）1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围绕日德军事同盟、克服经济危机等问题，因为阁内意见不统一而总辞职。经过平沼骐一郎内阁的过渡，到阿部信行内阁的成立（同年8月30日）前后，海军对政治的关心一举增大，对陆军主导的政治及战争指导的展开抱有相当的不满和对抗心理，在摸索独自角色的过程中，在以对华政策为代表的外交及内政上的强硬姿态，逐渐表面化了。

关于这一点，海军省调查课于同年8月21日，在题为《关于海军应采取的最高政策的考察》中留下了记录：

一、海军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其传统的清高主义而回避介入政治问题。

二、如果海军根据国家的重大时局确定国策的话，对于国内政治的大是大非不得已而采取暧昧对策的话应该如何对待？扶植海军政治势力方法如何？保持部内统制所运用实施的策略如何？

三、是否应该和陆军协调？如果应该协调的话这个策略该

怎么样？

四、是否应该打倒陆军？如果应该打倒的话这个策略该怎么样？

五、是否应该静观事态的发展？如果应该静观事态发展的话，应该在怎样的时机采取怎样的策略？

六、对明治维新宏伟大业的客观的坚韧性应该如何看待？如果顺应时势承认变迁之不可避免的话，应该沿着怎样的方向引导大势？

七、政治的中心与实力的中心的调节。再度讨论统帅权独立的问题。对陆军统制的确立应该促进还是应该阻止？^①

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海军对陆军主导的政治指导、战争指导继续以往的旁观者立场的话，那将使海军处于更加不利的政治地位。在陆军的主导性将越来越强化的情况下，必然招致海军的地位严重低下的危机意识。这个调查资料中，还存在着同样主题，即是与陆军对抗方案。其中方案之一就是《海军对新内阁的迫切希望事项（研究案）》（1939年8月24日）。

反映阿部信行内阁前后，海军对国内政治态度的《海军对新内阁的迫切希望事项（研究案）十四、八、二十四》中，收录了《帝国国策运用大纲》。这个资料虽然不能作为海军全体的统一意志来考虑，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海军到底对什么抱有特别的关心：

第一，目标 强化东亚新秩序的建设

第二，方策

一、日支事变之速战速决

二、事变后日满支三国互连环体制的整備

① 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328页。

三、远东外交的处置

四、对欧美外交的处置

五、强化国内诸情势的整備

第三，要领

一、日支事变之速战速决

1. 强化作战（兵力增加）
2. 促进政权工作
3. 强化金融工作

二、远东外交处置

1. 九国条约的废除（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主义的停止）
2. 支那对各国间的旧条约的改定修正
3. 对支日美的经济协作
4. 对支日法经济协作
5. 对支日德意经济协作

三、对欧美外交的处置

1. 日苏不侵犯协定 在支那边疆地域日苏势力圈的设定 通商协定（利权条约的改订、包含长期化）
2. 日德意军事同盟 对英包围阵营的结成
3. 日意法友好关系促进 法印的安定 海南岛的日本化 对法印经济协作（日本开发援助 法国市场的合作）
4. 通过日美通商关系的改善，以菲律宾岛为中心的西太平洋的势力圈的设定（以下略）^①

这里的重点是，作为中日全面战争的早期解决手段，海军一方面与陆军同样是通过军事力更加强化的完全制压论，实现打破

^① 伊藤隆编《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332~335页。

以华盛顿条约缔结为契机，扼制日本独占中国支配意图的华盛顿体制为目标；另一方面，不用说与德意，即便与美苏法合作关系也在强化之列，彻底贯彻了排英主义。客观地说，在这里海军虽希望设立独自的政策方案，但实质上已经无限制地接近了陆军的政策了。

因此，在探讨海军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时，有必要再稍微具体地查阅一番档案文献。例如，1939年（昭和14年）8月25日的《应处理新形势下海军的态度》，内容虽有些冗长，但还引用如下：

一、目前我国政治势力的中心圈集中于陆军和海军，就客观现实而言，面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实质上诱导了帝国国政的陆军领导以及领导理念，逐渐发生极大动摇，今日局面的危机，我海军为了国家的百年大计，有必要暂时放弃以往的超然态度，调整国政，指出国策运用的趋向，根据形势，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稍稍站在外交第一线，采取引导大势的积极态度。

二、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陆军在保持其帝国政治中枢势力地位的同时，打出的“防共即击苏”国策在本质理念上是错误的。而且，以强制力对此进行表面的掩饰，现出于一心对国家自存的要求，加上又被德国赤裸裸的态度不断刺激，在此本帝国也必须为了自存而探讨研究自己的前进方向。（在今日）这种情况下，我海军应该提高对帝国之海洋国家本质的自觉认识，东亚和平的确立不在于打击苏联，也不在于讨伐英国，实际上所需要的是，阐述以适当的军备实力为背景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理由，即全力专注于建设新秩序的国论。

三、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处在新世界形势下，帝国为了自存应持有的绝对要求，亦即帝国国策的根本原则应以东洋和平的确立为要点，本着这个要点，日、满、支应相互唱和才是内

外普遍的大方向目标。这次事变在这里显示了圣战的意义，在此存在着日、满、支的协作基础。那种口口声声说防共，并以此强制满、支，打击苏联的道路反而迫使支那彻底抗日的结果，对此错误的清算是我海军应予救助的当前课题。

四、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帝国在自存上的（必死的）要求，它的实现是实际上的大事业，为此帝国必须以国家的总体力量进行积极的国家活动。而且国家活动的两轮，即保持正当正确的军备扩充，和多边外交两者必须一齐行动。所有国家的行动，应该总是出于自身存立的绝对要求，何况即便诉诸武力的时候，也不应该伴随有丝毫的野心。我海军在今日危险的时刻，有必要积极努力致力于这一主张。（以下略）^①

在这里，海军所反复主张的是：代替陷于日中战争僵局的陆军，在战局、政局展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认为战局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打着“防共即击苏”之陆军的大陆政策；日本国家在本质上是“海洋国家”，在大陆寻求霸权，把目标定为对苏战、对英战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国家目标是“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虽然“日满支”一体论才正是日本“自存上的必死要求”，但是在这一点上有唤起国家意志统一的必要。总之，这里显示出他们所最为关心的是，构筑政战两略都不可缺少的政军关系。

的确，上述高木所记录的文书材料只不过是讨论材料的原案，但重要的是，当时在海军内部批判陆军的主导性，主张夺回海军的独立性和主导性的势力的确存在。这不单纯是后来海军与陆军合流的问题，而要看到海军有独自的政治目标，即使是在确认以“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名义强行侵略中国的海军政策本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忽视问题。因此，他们所说的政军关系，说到底是以海军的作用为基础的。在此，他们做好了海军将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

^① 伊藤隆编《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卷，第348～349页。

准备。

这样在中日全面战争以后，海军内部在华盛顿体制的框架中，出自坚持对英美协调路线的考虑，脱离陆军的影响力、强化海军独立的立场，实现海军自身目标的机会已经到来的意识越发强烈。以后，在《高木惣吉史料》中，这种色彩更是得以全面地展开。

此后海军的态度在原则上没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海军内部虽存在对立、抗争的情况，但在对于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的问题上海军内部最终能够达成统一意见的背景。^① 虽说正是这个同盟的缔结，事实上从这一时点起，日本已经大步迈向了与英美开战的道路；但是对于海军来说，即使对其危险性有所觉悟，为了确保自己在政军关系中的位置，还是从此贯彻了一条不亚于陆军的强硬路线。

四 结束语：“合法的间接统治”的归结

通过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五一五事件，把政党从政治的主体拉下来的军部，从内部操纵了广田、林内阁，成功地加强了对政治的统制。在此之前的齐藤、冈田内阁也是如此，他们作为“举国一致”内阁，事实上是削弱政党势力。取代政党势力的是被称为革新官僚（新官僚）的对总体战对应型的国家机构改革抱有极大兴趣和热情集团的崛起。他们与陆军的统制派系军事官僚串联，相互

① 关于日德意缔结三国同盟的研究参见：三宅正樹：《世界史におけるドイツと日本》（南窓社，1967）；三宅正樹：《日独伊三国同盟の研究》（南窓社，1975）；野村实：《太平洋戦争と日本軍部》“第二部日独伊同盟”（山川出版社，1983）；義井博：《日独伊三国同盟と日米関係 増補版——太平洋戦争前国際関係の研究》（南窓社，1987）；田嶋信雄：《ナチズム極東戦略——日独防共協定を巡る諜報戦》（講談社，1997）；額瀨厚：《日本海軍の中に形成された“親ドイツ派”とナチス・ドイツの外交戦略》（《連合艦隊 日米開戦編——連合艦隊の戦略と戦術を解き明かす》，世界文化社，1998）；額瀨厚：《籠絡された太陽の帝国——ナチス第三帝国と大日本帝国》（《ヒトラーの野望》，世界文化社，1999）。

提高政治发言的权力。

这种倾向在二二六事件后陆军统制派完全掌握军中央实权期间变得更加明显了。二二六事件后的广田内阁，进而林内阁，都根据序章提到的芬诺政军关系论，虽说军事对政治“有限的间接统治”是错误的，但那只不过是满足避开从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明治国家体制）的框架中脱离的条件，反映了陆军统制派露骨的反政党、反议会的态度，实际上，这时的政策关系确实已经实现了军部政治的统治。

但是，对于广田内阁的后继内阁问题，即宇垣一成一旦接受继承任命，陆军就会强行阻止宇垣组阁，即便是陆军依据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而且其行使权限范围是“合法的”，但对所谓大命降下这种明治国家成立以后惯例化的天皇及元老的权限也是明显地侵犯。宇垣中断组阁的事态，具体证明了政权形成是由军部所左右的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而，就如李炯喆氏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件事的结局是军部没有脱离“合法的间接统治”框架。^① 虽然对于这一事实尚需多方面的讨论，但是如果说句大胆的话，军部虽然具备了脱离“合法的间接统治”，而进入“非合法的直接统治”的实力和机会，却没有下定决心那么做的理由虽说确实可能有李氏所说的避免破坏作为“多元的联合体制”国家的明治国家的危险性的一面，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反复提到的，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要构筑总体战体制，就必须建立起能够确保包括政党势力在内的官界、学术界，以及最重要的广泛国民层的支持和赞同的政治体系。这才是最大的目标。

陆军把精力集中于为构筑总体战体制的新体系而排除阻害要因

①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卷，第116页。李炯喆指出：“军部的合法性、间接统治的确立，是与军部自身相对应的结果。这意味着，军人坚决地认同天皇制下多元联合体制的明治体制。国民也广泛地认同该体制的正统性，但是在军部的实力面前，多元联合体制中的各方深感无力，抱有强烈的旁观事态发展的倾向。”

的旧势力、旧思想。可是对陆军过激行动予以阻止的宫中派，陆军却不惜与之建立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陆军强烈希望近卫文麿内阁作为林内阁的后继内阁就是证明。

日本的政治体系是以权力分立制为最大特征的，所以不允许权力施行机关的一元化支配。陆军在与海军实行一体化的同时，即便促成军部政权建立，其政权也不可能代表日本的政治权力的全部。就此意义而言，在明治宪法体制下，陆海军不论哪一方确保拥有大多数的特权，也不就是“直接统治”的构造。

另外，在本章中利用《高木惣吉史料》，部分地论述了自认为落后于陆军政治行动的海军的政治思想、政治行动。其实，海军也好，陆军也罢，都同样强烈地持有反政党、反议会的态度，最终以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为后盾，将自立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形成与在备战将来作为总体战的对英美战争定为了最大的目标。这就必然要使国家机构的总体战化，换言之，为了实现与陆军统制派主张性质的国家再编构想，逐渐走向政治化。海军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记录下来的国家构想，由于确实与既存的国家机构无法充分对应，所以他们反复倡导海军本身的革新和国家全体革新的紧迫性。

这意味着海军也和陆军一样，超越了作为军事组织的权限，有必要把自己作为另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予以把握。海军的这种愿望和陆军相关联，旨在构筑具备有效机能的，进而是军部主导的政军关系。就这样，囿于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为了构筑自身构想的政军关系，陆海军共同的判断是，对于政治来说实现“合法的间接统治”形式才是最恰当而合理的。这也正是促成日本型政军关系建立的主要原因。

终 章

日本型政军关系的构造与特征

——走“军民融合型统治”的道路

一 前言

明治国家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至少到西南战争时期为止，还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到西南战争时期为止，政治和军事是由单一的政治机构或单一的政治领导一手掌握的。但随着参谋本部的设置而制定的统帅权独立制，在日本军队创设 10 年后早早地就给明治国家的政军关系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总之，在此之前从属于政治机构内的军事机构，以与政治机构并列、对等的方式分离了出来，政治与军事形成了各自完全不同的机构。从而排除了政治对军事的干涉，旨在保证军事独自的行动。

话虽如此，但这种机构的分化，在军政两机构由同一势力掌控政治实体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在政治领袖本身就是军事领袖的情况下，并未产生任何弊害。也就是，这一时期统帅权独立制的组织、权限、机构等并不是被作为工具，政治领袖可以以自己的权威和职能主动地行使政军两项权力。但是在出兵台湾（1874 年）及其战后处理过程的最后时期，这种政军关系开始崩溃。

在近代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随着政治机构高度化、复杂化的进程，军政两种机构分化应该是正常状态，仅在非常事态时政

军两种机构才会作为一体化的机构发挥机能，但那也是以军事从属于政治为前提的。尽管如此，日本的统帅权独立制是被置于与政治、军事相并列的对等关系上的。仅此决定了他们各自掌管事项的范围、权限，以及互相干涉问题方面必然出现军政两个机构间的对立、抗争。

这种事态的发生，带来了政略和战略在战争指导运用方面上的不一致。^① 在一系列的战争指导过程中，以统帅权独立制为根本原因的政治与战争两策略的不一致状态，在政治与战争两策略被认为比较一致的日清战争准备过程以及战争指导过程中，早就开始显露出来。但是，政战两策略的不一致，实际上仅仅在明治国家的战争领导与运行能力明显削弱时，政军两方的领袖虽然抱有各自的想法，但已经开始摸索政战两略一致的方向了。具体表现为对战时大本营、防务会议、临时外交调查会、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联络恳谈会等的设置。

这些虽然都是以调整统合政治和战争两策略为目的的措施，但除了政军两机构由于统帅权独立制而被置于了并列、对等位置之外，最终并未能收到所期待的成果。与此相对，统帅权独立制在议

① 山县有朋：《政戦両略論》，大山梓編《山县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第273～277页。这里所说的“政略”和“战略”，出自日俄战争前山县有朋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政战两略论》。所谓“政略”，是指通过给予作战目的、指示出其范围和限度、活用作战的成果等手段达到国家目标的国家政策；“战略”则是指按照“政略”给出的目的和限度，实施作战计划及实际的作战过程。依照这种解释，从前提条件上来讲，“战略”是从属于“政略”的，两者不可能出现平等、对立的关系。但是，由于对国际形势的不同判断，以及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等因素产生的对立和抗争，“政战两略”陷入了不一致的状态，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反复进行调整和妥协的工作。如果把这个问题和统帅权独立制联系起来说，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特征就是为了确保“战略”处于和“政略”对等的位置，军队方面频繁地活用统帅权独立制。换言之，军事指导者不仅仅在战争指导方面使用统帅权独立制，而且为了打破平时军事对政治的从属关系也使用了统帅权独立制。从这种意思上说，统帅权独立制在日本政军关系史上持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仅凭这一点就指出军事占有优势是不对的。

会、政党势力的抬头所造成的军部地位的相对下滑的局面中，被进一步强化，而军部对此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反而使自身政治地位得到加强。

基于以上问题，在结束本书的这一章中，第一是关于日俄战争后政军关系的构造及特征，首先以统帅权独立制与战争领导问题为焦点加以整理。因为如果在考察日本政军关系时，对这些必不可缺的制度和机构不加以论述的话，就不可能理解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基本构造。其中，对中日战争前后的战争领导的运用究竟给予了怎样的政治及军事的影响，由此进而还要探讨为什么军部能在明治国家里获得绝对政治地位的背景。

在此，不仅限于统帅权独立制的制度方面，同时也将留意政治机能的方面。因为所谓统帅权独立制，不仅是单一有军事制度性质，还是在极高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制度。所以，由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性所经常规定的、一定作用的持续发挥，也是本章所强调的一个方面。^①

第二，关于绪论和序章里所提出的日本型政军关系的特质，立足于本书各章所得出的结论，而在考察有关日本型政军关系特征先行研究的同时，导出笔者到目前为止的结论和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① 关于统帅权的研究，参见中野登美雄《统帅権の独立》（原書房，1973）。中野登美雄通过与德国军制比较，尝试从法律角度来分析日本的统帅权独立制。中野是以介绍和分析德国军制为研究中心，同时指出西南战争后设立参谋本部以及陆军军制转换为德国军制是形成日本统帅权独立制的重要原因。在此虽然中野详细论证了制度层面上的变化过程，但在其历史背景和统帅权独立制的政治目的这方面尚有欠缺。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上、下）（有斐閣，1956）；梅溪昇：《わが国における兵・政分離（統帥権の独立）の特殊性》（《日本歴史》）。梅溪的研究过于侧重从制度机构上的分析，对统帅权独立制的动态层面及政治机能方面的把握不够。从政治机能的视角对动态的统帅权独立制展开令人信服的分析的是雨宫昭一的《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雨宫认为在统帅权独立制的定位上，近代日本政治和军事的课题就是克服封建社会，因此形成的专业的理论 = 分业的理论，也就是统帅权独立制。

第三，对本书在理论及实证方面所探讨的政军关系史以及政军关系论，尤其是对探讨如今我国文官统制（civilian control）的方面，究竟能够得到怎样的启示方面，也试图进行若干考察。

二 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与统帅权独立制

1. 政战两策略不一致的表面化

1900年（明治33年）9月15日，伊藤博文创立了政友会，随着帝国议会中政党势力的扩大，那些由于唯恐政党势力扩张会侵害自身既得利益的势力，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极力主张必须为与俄国再战而扩充军备的军事领袖，更是利用各种机会对政党势力进行反抗。于是，产生了前所未有政治和军事间的紧张感，围绕设定日俄战争后的国家目标产生的矛盾、冲突明显地暴露出来。^①

本书的第一章曾探讨过，在围绕日俄战争后经营方向性的决定过程中，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的增设两个师团的问题，就是政战两策略不一致的典型事例。如同两个师团增设问题所暴露的那样，政军关系的不安定状态，更加促进了对围绕未来国家总体战这一新的战争形态所对应的战争指导、战争进行方式方面在政治与军事两者间的矛盾、冲突。由此发生的政军关系的变化结果将极大地削弱未来的战争领导能力。所以，政府、军事两当局者都抱着各种想法逐渐意识到，纠正政战两策略的不一致是亟待解决的课题。^②

日俄战争以后，作为纠正政战两略不一致的尝试方式之一，就

① 关于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东亚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战争政策的实施过程及战争指导体制内存在的诸问题，参见額瀨厚《統帥權獨立制の形成と戦争指導》（富田信男編《明治国家の苦悩と変容——日本政治史の一断面》，北樹出版，1979）。

② 关于有必要使政战两略保持一致和战争指导体制的一元化的背景，参见額瀨厚《総力戦体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国家総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

是1913年（大正2年）12月，国民党向第31届议会提出了《关于开设临时国防会议的建议案》。^①提案的内容是：“为了确立帝国国防方针，承认国务大臣、军务当局者以及特别任命者作为议员，组织临时国防会议成为必要，并希望政府迅速计划开设临时国防会议”。国民党总裁犬养毅，于翌年1月31日，在议会上说明了此提案的宗旨，并特别强调了要促进内阁与统帅部的紧密关系。犬养认为国防问题“不是区区党派之争”，^②应该从国家整体的观点来应对。

与此相对，军部以统帅独立制为由，认为国防应由国家事务以外的军令机构长官总参谋长和军令部长来辅弼，这表明了与犬养对立的见解。犬养提出本提案的真正意图，在于防止军部企图通过彻底贯彻统帅权独立制将国防问题从国务中分离，“临时国防会议作为天皇直属的咨询机关，在保持经济军备立场的同时，要将军备扩充的领导权从军部收回到政党一侧，沿着使统帅从属于国务的方向来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③由于在西门子公司案件中，山本权兵卫内阁被迫解散，大隈重信继任组阁并接纳犬养的提案。致力于设置国防会议的不仅有犬养，还有西园寺内阁、桂太郎内阁，尽管其主旨并非相同。特别是桂内阁，他基于日俄战争的领导体验，为解决国务和统帅之间的矛盾曾强烈地要求设置国防会议。^④

犬养的提案，在第二次大隈内阁时期以开设防务会议的形式得以具体实施。大隈内阁的有力支持者元老井上馨，根据欧美各列强侵入中国后利权的扩大，以及俄国通过西伯利亚复线铁路开设而侵入远东地区等状况，在日本的大陆权益和势力范围受到威胁的危机感中，提出了通过外交、财政、军事的统一予以对抗的方针，并向

① 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論覚書》（1），《法学》第12卷第3、4合并号，第45页。

② 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論覚書》（1），第45页。

③ 木坂順一郎：《軍部とデモクラシー——日本における国家総力戦準備と軍部批判をめぐって》，《季刊国際政治》第38号，第617页。

④ 徳富蘇峰編《公爵桂太郎伝》坤卷，原書房，1967，第625页。

大隈内阁说明建议设置国防会议的必要性。大隈接受该建议，在1914年（大正3年）6月3日召开的第33议会中，以“第125号勒令”的方式确定了设置防务会议。防务会议是以“在内阁大臣的监督下，审议有关陆海军军备设施的重要事项”^①为目的，由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七人组成。

大隈首相在防务会议设置之际，承继了犬养提案的主旨，认为就国防事宜而言，防务会议是阻止军队独断专行的机关。但是，当同为内阁的若槻礼次郎大藏大臣在防务会议上对国防经费进行调查时，冈市之助陆军大臣就以国防属于统帅权的范围为由，主张不能由文官参加或进行调查。即使在防务会议设置之后，政府把它作为国防基本方针的讨论审议机关，但陆军还是把防务会议的审议事项仅限于设施方面。由此，防务会议只是被作为军备和财政的协调机关，当初所期待的外交、财政、军事的统一和调整全都形同空文。

冈陆军大臣就防务会议的内容，在同年8月22日给前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的信里写道：“防务会议对于决定国防的根本方针，只是以一种设施，亦即付诸实施为目而成立的。陆军考虑到日后对此成立目的可能会引起争议，才在上奏中特别明记说：为了审议国防实施的缓急才是设立此会议的宗旨”。^②由冈陆军大臣的报告可知，防务会议是当初基于国民党和政府的构想而设立的。为了阻挠此构想，并达到使其成为有名无实的目的，实际上，军部采取的措施是限制防务会议的作用，使之成为自己回避舆论对悬而不决的军备扩张计划的批判的幌子。事实是军部随即在防务会议上提出了增设两个师团和实现建造“八·四舰队”建制的要求。

防务会议于1922年（大正11年）9月被废止，它的职能实质

① 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論覚書》（1），第56页。

② 藤原彰：《第一次世界大戦直前の日本軍部2》，《歴史学研究》第395号，1973年4月，第22页。

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已经停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新的国际形势的转变，在日本国内围绕外交政策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立和矛盾。为解除外交上的对立和矛盾，同时为对应国际形势，于1917年（大正6年）6月5日在宫中设置了临时外交调查会。^①它是“考察审议有关时局的重要条件”的会议，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委员有外务大臣、内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两名枢密院顾问官、政友会总裁、国民党总裁，其他干事有陆军次官、海军次官、外务次官、内阁书记长官。就构成人员和原先的防务会议比较来看，防务会议的成员中军人占半数以上，而临时外交调查会里13名委员中非军人占8名。从构成人员和设置过程看，它和防务会议不同，至少在人事方面政党政治的色彩较强，即使这是一时政策也好，政党获得了把握国防政策发言权的契机。

2. 政战两略调整统合机关的设置

随着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为对应时局着手对政治机构集权化和统一化为中心的制度改革。近卫内阁把卢沟桥事件称之为“日华事变”，并就该事件创设了临时内阁参议官一职，这是一个就日华事变答复政府咨询而设置的职务。同年10月15日，颁布了临时内阁参议官制，选取了各方面的代表出任内阁参议。这一举措使得各种势力，期待近卫内阁能够发挥所谓提高“举国一致性”的作用。所以，内阁参议官制被认为是“成立一种以各方面不同政治势力为基础的 Union Sacré”。^②但是，由于此制度实际上只起到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效果，到底还是没

① 关于临时外交调查会的研究参见：雨宫昭一：《近代における戦争指導の構造と展開——政略と戦略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下）》；雨宫昭一：《戦争の指導と政党——外交調査会の機能と役割》（《思想》第622号，1976年）；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等。

② 宫沢俊義：《大本营設置と内閣制度の改革》，《中央公論》1937年12月号，第36页。

能发挥当初预想的作用。

对近卫首相来说，该制度把军部内具有实力的宇垣一成、末次信正、荒木贞夫等提拔为内阁参议，这只不过是作为实施怀柔政策的一种“所谓的作姿态”。^① 迫使政府对军部有必要实施怀柔的背景是，政府急于打开围绕处理日华事变的主导权完全由军部把握，对作战进行方面“得不到任何报告”^② 的异常局面。

近卫首相为确保把处理日华事变主导权从军部转移到政府的策略，为使政战两略一致，设想设置以首相为成员的大本营。对此内大臣汤浅仓平表示赞同，同年11月1日、2日，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以及陆军大臣杉山元之间开始进行交涉。但是，在交涉过程中，虽然代表陆军的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对设置大本营持赞同意见，但对于首相作为构成人员的议案表示难以接受。而在海军方面，代表海军的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对设置大本营表示反对。

为此在11月2日，陆军省军务局在作为次善之策提出的“大本营会报”中建议首相不作为构成人员，但可以“努力实现有关政战策略的重要政务事项的意见交换和各行其责”；^③ 并提出了“大本营会报”的参加者，在原则上政府方面可以派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内务大臣四大臣参加的议案。

11月18日，政府公布了以此案为基础的“大本营条令”。^④ 其中第一条就写道：“在天皇权威之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之为大本营。”第三条“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长各自作为幕僚首长担负帷幄职能而参与作战计划，制订最终目标，协调陆海军的策略”。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大本营是天皇大权之下的最高且是唯一的统帅部，其中设置了幕僚以及各机构的最高部门进行统帅事务，专门

①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第6卷，岩波書店，1951，第83页。

② 近衛文麿：《平和への努力——近衛文麿手記》，日本電報通信社，1946，第7页。

③ 《大本营設置に関する意見》，《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营），第343页。

④ 《官報》第326号，1937年11月17日。

负责战时战争，将“制定最终目标、协调陆海军的策略”作为其任务。因此，一般行政事务不属于其权限范围。大本营被理解为军队的“最高统帅部”而不是政治机关。也可以说，根据条文“代替内阁行使一般行政，本来不是条例的精神”。^① 所以，这个机构与当初近卫首相政府方面构想的作为国务和统帅的统一机构的大本营相比，职能相去甚远。

由此，近卫等人设想的实现政战两策一致的构想，以称为“大本营”的这种军部势力对抗政府之机构的诞生而告终。不过，为了协调战争的领导，有必要在政府和军部间设置经常性的联络机构，根据军部方面的提案，于同年11月19日举行了“关于设置大本营之政战联系的内阁协议”。^② 结果，设置了随时会谈的协议体组织作为大本营与政府间的联络机构。这组织就是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是由总参谋长、军令部总长（实际上是副参谋长、军令部次长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及所需要的官僚组成。其运营则由政府方面的内阁书记长官、大本营方面的陆海军部的军务局长负责。特别是讨论重要问题时由内阁总理大臣、总参谋长、军令部总长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届时总参谋长、军令部总长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将列席参加。从以上的组织形态以及人员构成来看，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依靠当初的亲裁而具有重要国事会议的性质。

无论如何，日本大体上设置了由国务和统帅协议的战争领导机关。但是，这是由政府 and 统帅部的“协商”而设置的机构，不是依据官制设置的，也不是像内阁会议一样有法律依据。^③ 实际上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所决定的事项，正如文字表面的意思一样，只

① 《大本营は純然たる軍事機関》，《東洋經濟新聞》第1787号，1937年11月13日。

② 《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营），第1页。

③ 塩原時三郎：《東條メモ——かくて天皇は救われた》，ハンドブック社，1952，第52～59页。

不过是“协议”层面上的事。即便如此，重要的问题进一层由内阁会议决定如何处置，该会议在当时实质上是领导战争的机构。

于是，军部在大本营及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设置过程中，以统帅权独立制为盾牌，为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战争领导体制而奔忙。战时体制里国务和统帅事务结合极其紧密，无论哪方面问题实际上都有必要通过政府和军部的协议来处理。尽管如此，大本营的设置结果使国务和统帅事务的调整比以前更困难了。正如杂志上所报道的一样，“统帅方面的首脑部特别是海军方面，行政机构和统帅事项的混淆，荒谬的意见就非常强烈地提了出来……”^① 军部势力对政府介入统帅事务抱有何等的警惕，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关于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也是如此，大本营海军部“不能频繁地举行会议”，“统帅和政府担心，政务不久就会把统帅吃掉”。^② 由此可见，这些担心表露出了军部势力和政府之间尽可能保持距离的真实想法。

这样一来，该时期大本营的设置，明显已经超出了仅仅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一时合并的、纯粹的统帅问题。也就是说，军部面对以日华事变为理由设置大本营而阻碍战争进程的政府，是希望增强军部的政治发言权。军部不懈地对此状况进行了说明，认为大本营的设置是以强化作战机构与战争指导为目的的；其机构内部是不允许军人以外的人参与，是不可能产生军政府的机构的。另外，陆军部在大本营设置时，认为“要明确统帅与国务在职责、责任上的分工，不能有任何变化”，并说“臆测大本营就是战时内阁的前身，或妄断其将作为统帅国务统合的机构等是无稽之谈”，^③ 予以了强烈的否定。^④ 从军

① 《内閣参議から大本营論まで》，《エコノミスト》第15卷，第33号，1937年11月21日。

② 《陸海軍首脳部会議ノ際ニ於ケル（時局処理要綱）ニ関スル質疑応答資料》，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营・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上卷，原書房，1967，第21页。

③ 《東京朝日新聞》，1937年11月2日。

④ 《大本营に関する新聞説明案》，《現代史資料》第37卷（大本营），第351页。

部方面来看，大本营设置只不过是“战时体制编成期的里程碑”^①而已。

在设想战时体制会相当长期化的情况下，政治体制不可能总是维持平时的政治形态，必然会不得已地采用与军事统合的形态。由此，军部在此时期对赞成设置大本营的真正意图是，通过一连串的内阁强化策略提高其行政能力；对于力图主导对日华事变进行处理的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为必将到来的政治形态的军事化作准备。对有基于这种想法所设置的大本营，试图纠正政战两略不一致的尝试被搁置起来，实质上政战两略已经呈现出了二元化倾向。在政战两略二元化状态下，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设置，最终从近卫政府方面来看，只不过是政府企图操纵统帅权失败的一块“遮羞布”^②而已。

3. 军部掌握领导战争主导权的过程

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政治发言权得以强化的军部，到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时，已以各种具体的手段渐渐地掌握了领导战争的主导权。其中的手段之一就是在企划厅中扩大军部的影响力。

1937年（昭和12年）5月14日，由林銑十郎内阁设置的企划厅，自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以来，随着政府倾心于进行战争的政策，它不再具有当初所期待的充分发挥作为政府国策立案审议机构的机能了。与此相应，作为国家总动员计划的推动机关的内阁资源局，却迫于形势渐渐需要进行机构扩充了。在此状况下，政府在同年9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对企划厅与内阁资源局进行了合并，强化了技能，并决定由它担负国家总动员计划、扩充和运用综合国力等的战时统治以及审查重要国策、统管预算等任务。由此，国家总动员机关和综合国策企划厅两种机能并存的强大组织诞生了。这就是

① 《大本营設置は必然》，《エコノミスト》第15卷第32号，1937年11月11日，第7页。

② 矢部貞治編《近衛文麿》下卷，弘文堂，1952，第102页。

企划院。企划院是根据时局需要和经常性措施而不断修正官制、事务职责的，在此过程中军部不断提出军事要求，以此为做法提高军部在企划院的发言权。

面对一连串对军部干预政治的批评，军部在企划院最大的工作国家总动员法制定之际，陆军部报道组以“关于国家总动员法的制定和国家总动员”^①为题发表文章作出回应。其中，提及关于国家总动员法的运用，认为国家总动员应属于政务，所以其主管机关应为行政机关（即政府）。因此，不用说平时，即使在战时大本营的设置，与军部也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决非将之设置于军部的领导之下，因此认为军部干预了政治的批评是不恰当的。

进一步说，国家总动员不仅具有保证充足军需为中心的职责，还要负责贯彻国务与统帅间的紧密联系。为此，实际上在企划院的调查官的任命上，有着让陆海军武官参与的意向。军部认为，就广义的统帅事项而言，与政府间的协作是不可缺少的；反过来就狭义统帅事项，即纯粹地作战的领域，政府绝对是一步也不能介入的。实际上，由于广义统帅与狭义统帅的使用不同，所产生的军部闭锁主义，是形成统帅权独立制的战前军部一贯的行动原理。

近卫为阻止陆军日益明显地对政治进行干预，从组建第二次内阁之前就开始设想以“政治思想坚强的一元化”^②集结压倒陆军的政治力量。于是有了结成新党等为具体方案的新体制运动的展开。军部最先对近卫的构想表示了支持，他们是打算使近卫“成为军部所想要的傀儡”。^③所以，陆军对近卫的再出马甚至“寄予执著地期待”。^④畑俊六陆军大臣认为，为了对应当今世界形势而

① 石川準吉編《国家總動員史・資料編》（3），国家總動員刊行会，1975，第440页。

② 矢部貞治編《近衛文麿》下卷，第102页。

③ 岡義武：《近衛文麿——「運命」の政治家》，岩波書店，1972，第28页。

④ 《東京朝日新聞》，1940年7月17日

解决事变，强化国内体制与实现新的外交是当务之急，为此，新的体制和新的势力是绝对必要的。由此畑俊六向米内光政首相进言请求其总辞职。米内内阁因此而瓦解。

其结果，新成立的第二次近卫内阁已经到了无法忽视陆军意见的状态。同年7月17日近卫与领导组阁的畑陆军大臣举行会谈。会谈中陆军大臣就对陆军内部基于对政治体制强化的要求而提出辞呈的具体原委进行了说明。接着就有关必须对应国际形势紧迫化进行外交转换和更新，转达了陆军方面的意见。^①另外，近卫为了对应陆军的攻势提出了新的组阁方案，组阁过程中达成了关于国防方针的基本姿态应由陆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者协商决定的协议。^②

对近卫来说，确立完善的军备、强化日德意的枢纽、对南方政策的积极推行等为中心的策略，旨在确保内阁在成立之后能够全面掌握政治的主导权。而且，作为坚决实现国防和外交方针转换的条件，有必要通过某种制度改革来实现国务与统帅的统合调整。总之，以协调国务与统帅的一元化以及政战两略一致，力图通过政略主导的方式来解决事变。这对近卫来说，也是从第一次内阁时代以来所抱有的愿望。

对此，陆军虽然认同近卫构想的政战两略一致的必要性，但坚持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统帅，即狭义统帅应当属于国务以外范畴的立场。不过，在陆军内部，广义统帅只有在与国务之间圆满一致、协调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实现，这一见解还是占主导地位。因此陆军方面认为，关于国务和统帅的调整以及政府和军部的一元化调和，可以趁此机会复活并强化第一次近卫内阁以来所中断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举行频繁的联络协议，是进而强化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最好方式。

① 《東京朝日新聞》1940年7月18日。

② 《東京朝日新聞》1940年7月19日。

1940年（昭和15年）7月22日，大本营陆海军部提出《伴随世界形势的推移及对时局处理纲要》^①（以下简称《纲要》），大本营联络会议采纳了该提案。《纲要》特别对政战两略的关系提出“关于支那事变的处理应集中政战两略的综合力量”，并强调政战两略一致的必要性。根据此《纲要》，大本营联络会议同年9月23日断然实行了对北部法属印度的进兵，开始了武力南进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在海军方面，对美国比例以75%为目标正式进行作战准备，陆军也开始着手对南方的军事要地的地理调查、研究和制订作战计划，以及为应对热带作战对装备编成进行改善等。通过以上措施，在近卫内阁成立后，内阁中的军部势力实际上已经掌握了领导战争的主导权。比如说陆、海军大臣于同年12月29日的例行会议上，共同提出了有关对时局的处理、大正翼赞会的健全发展、强化战时经济能力、扫除不纯的政治策动和流言蜚语等建议。

在提出这一系列具体要求的同时，军部还就国务与统帅的调整、政府与统帅部的完全一致，以及军部自己对陆海军部时局处理的紧密协作的一体化的要求等，提出了议案。在国防国家体制的完善过程中，这种来自陆海军部方面的对最高政治运营的影响是值得注目的。^②这一时期针对国内外的状况，军部的基本方针在于发动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和集结全国力量以应付时局，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就是军部基本方针扩展的具体体现。并且，军部在此之后也在努力地进一步强化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其结果是设置了联络恳谈会。联络恳谈会被认为是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中政府和军部间妥协的产物，很显然它是在军部的主导下而设置的。

1940年（昭和15年）11月26日，为达到“不可轻易举行政府和统帅部的联络恳谈会”的目的，军政双方在首相官邸设置的

①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营・政府連絡會議等筆記》下卷，第11页。

② 《大阪朝日新聞》1940年11月30日。

联络恳谈会上达成共识，认为“于本会议决定的事项比内阁会议决定更具有效力，应作为领导战争之帝国国策予以坚决实行的措施”。^①而且，制订了政府和军部之间协议决定的重要国策，最终由御前会议和联络恳谈会做出的决定的程序。

第一次联络恳谈会以“承认国民政府事项”为议题，于同年11月28日召开。出席的有近卫首相、东条英机陆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松冈洋右外务大臣、塚田攻参谋次长、近藤信竹军令部次长，以及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共七名。从设置意图以及人员构成来看，虽然采取是以“政府与统帅”的双方代表组成联络协议机构的这一方式，但有关重要国策还要向御前会议征询意见，这意味着联络恳谈会最终还得将二者的调整统一委托于天皇权威这一绝对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容方面能帮助军部通过绝对主义形式提高政治发言权。

就联络恳谈会的运转而言，它最大任务仍是协调政战两略的关系。反映这一情况的资料，我们可以举以下1941年（昭和16年）6月26日第三次联络恳谈会上松冈外务大臣和塚田参谋次长之间的问答来说明。

这次联络恳谈会是以“随着形势的推移帝国国策要纲之事项”为讨论课题而举行的，会上松冈外务大臣提问道，作为南方对策是否可以采用武力进入方式。塚田副参谋长回答道：“暂不论此事的政略，对纯统帅的事项没有商谈的必要。况且这种情况尚未发生。如果进行商谈的话就会被撤销，为了不被撤销就得自主决定。”^②塚田副参谋长以统帅权独立制的绝对性为依据，反复强调了狭义统帅论，意在回避松冈外务大臣对参战（外交问题）和行使武力（统帅问题）不可分离的一再追问。塚田副参谋长以“没有商谈的

①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营・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下卷，第155页。

②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营・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下卷，第241~242页。

必要”和“统帅机密”为理由予以拒绝回答，甚至另外还列举了德国统帅权独立于政府的事例加以说明。这次问答的结果以“政治策略上可以商谈，武力则由于是关系胜败的问题，所以高等政策虽可以商谈，统帅则不可”^①来强调政略和战略之间的差异，表明政战两略之间达成一致是极其困难的。

联络恳谈会从其组织形态和人员构成来看，是政府和军部站在平等立场进行协议的机关。但是，在对卢沟桥事件的处理、南方政策、缔结日苏中立条约，以及对美邦交调整等问题上，军部方面认为均属于统帅的事项。也就是说，这样一些问题都仅仅是与军事问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将此提交给联络恳谈会与统帅权独立制是多有抵触的。既然是与统帅事项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问题，就致使联络恳谈会的运营必然置于军部的领导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一定要亲自主导运营联络恳谈会的话，军部当然会提出他们依据的统帅权独立制进行制约，或是对政府提交的议案进行否定。从政府方面来看，如果不突破统帅权独立制这一军部的特权制度，就不能掌握联络恳谈会的主导权。

如上所述，为了“不可轻易举行政府和统帅部的联络恳谈会”，才把联络恳谈会设置在首相官邸，在那里决定的事项是“应作为领导战争之帝国国策予以坚决实行的措施”。而且，对重要国策的决定都有必要召开御前会议。对于重要国策的决定，日本凭借对天皇权威的灵活利用，试图实现政战两略的一致。由于联络恳谈会只采用了绝对主义的形态，而没能达到促使政战两略的一致目的。

在此重要的是，政府被纳入了军部主导下的联络恳谈会，成为了战争领导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政府在战争领导的运营上丧失了相对的自立性。这是从日清战争直至亚洲太平洋战争整个时期的战争指导的共同现象。实际上，在战时大本营、防务会议、临

^① 参謀本部編《杉山メモ——大本營・政府連絡會議等筆記》下卷，第241～242页。

时外交调查会、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联络恳谈会等战争领导机关或者政战两略的统一协调机构中，政府相对自立性的丧失过程，也是在这些机构内军部获得政治发言权力的过程。

由这些战争指导机关以政战两略一致这一形式运营战争指导，因统帅权独立制的制约，以失败而告终。与中日战争同样，以太平洋战争的战局恶化为理由，东条英机内阁断然决定由东条首相兼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两职，嶋田繁太郎海军大臣兼任军令部总长，这种试图以人事关系为媒介进行政战两略一致的尝试，也由于没有在兼任的同时，完全下放具体权限而以失败而告终。靠人事改革没能从根本上解除统帅权独立制制度上的桎梏。

进而，1944年（昭和19年）8月5日，小矶国昭内阁负责召开“领导战争根本方针的制订及政战两略吻合的调整”^① 职责的最高战争领导会议，在得到敕裁后被设置为正式的符合法制的机关。虽然它成为了明治国家最后的战争领导机关，但是与至此为止的战争领导机关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情况在战前期最后的内阁铃木贯太郎内阁中也同样存在。的确，铃木内阁是以强化内阁职能为目的，让从首相到国务大臣列席大本营，计划实行“把大本营作为国务统帅统合的府”，即实现所谓的“大本营内阁构想”。^② 但是这也由于陆军的强烈抵抗而没能实现。^③

① 《大本营政府間會議沿革一覽表》，《現代史資料》第37卷，第492页。

② 森松俊夫：《大本营》，教育社，1980，第241页。

③ 铃木内阁时期，随着战局的恶化，军部的地位也大大降低，因此军政双方都提出了各种构想。为了对抗铃木内阁提出的“大本营内阁构想”，陆军则希望通过“陆海军一体化构想”、“最高战争指导府构想”来改变政军关系。对此，迄今为止并没有充足的先行研究，但以下研究可做参考。加藤陽子：《昭和11年における政治力統合強化構想の展開——大本营設置と内閣制度改革》（《史学雑誌》第96编第8号，1987）；加藤陽子：《模索する1930年代——日米關係と陸軍中堅層》（山川出版社，1993）；池田順：《15年戦争期の国家意思決定構造》（《歴史評論》第474号，1989年10月）；池田順：《日本ファシズム体制史論》（校倉書房，1997）；矢野信幸：《太平洋戦争末期における内閣機能強化構想の展開》（《史学雑誌》第107编第4号，1998）。

结果，在明治国家的政军关系中，政略一致来领导战争的设想，总是成为各届内阁所面临的课题，但最终都没能成功。这意味着正是统帅权独立制在作为决定明治国家政军关系制度的同时，也在必然地强化军部的政治地位。明治国家之所以表现出军事国家的一面，其根据就包含在这种特异制度的逻辑中。

三 二战之前日本政军关系的构造特征

1. 日本型政军关系论的定型是否存在可能

日本型政军关系的定式是否存在？作为进入此问题的前提，是如何认识二战开始之前日本政军关系这一课题。在序章中曾概括整理了亨廷顿等的政军关系论在对日本的政军关系分析上是否适用有效的问题，最后还想进一步予以探讨。^①

本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战前期日本，或说是明治国家的政军关系史，主要以从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妥协的政治过程为分析视点进行了探讨。根据对这一政治过程的分析，从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构造、制度几个侧面概括来看，可以按以下五个时期对其内容进行区分。

也就是，第一个时期为1877年（明治10年）1月发生西南战争之前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为以西南战争为转机至翌年参谋本部独立，军事机构分立的方向得以明确的时期。第三个时期为因明治宪法（1889年2月）的制定，对政治与军事分离给予明确解释的时期。第四个时期为由于修正陆海军省官制，废止军部大臣现役武官

① 三宅正树：《政軍關係研究》，芦書房，2001，第55～56页。三宅正树指出：“从政军关系的视角审视昭和史，能充分认识我国历史的个性，又能避免忽略别国历史中的类似性和共通性，是通向日本历史中正确位置的一条道路。”三宅在这里强调了有必要深入认识一国历史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军关系史可以作为比较史研究的一环，站在世界史的视野，开拓出把握该时代日本政治过程新路的可能性。

制（1931年6月），大臣和次官的任用资格扩大到后备役，是对军事的政治统治格外强化的时期。第五个时期是从1930年（昭和5年）4月的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中统帅权的侵犯问题以及翌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为契机的军部独断专行开始，至1936年（昭和11年）2月的二二六事件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的复活，到军部的政治势力化和军部政权的成立为止这一时期。就此，本书是以其中第四期和第五期政军关系史为对象的研究。

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政治和军事是由单一的政治机构掌控，或是掌握于单个的政治领导者的手里，看不到政治机构和军事机构的分立，两者作为密不可分的形式而存在。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所谓的政军关系这一形式的实际状态并不存在的时期。但是，第二个时期参谋本部以独立的形式设立，使得军政与军令从机构上、职能上分离开来，军事开始了向军事机构分立的方向发展。由此开始，特别是由于1885年（明治18年）12月内阁制度的确立，日本迎来了真正的从实际状态上的政军关系确立的时代。

进而，第三个时期中1907年（明治40年）9月制定了《军令第一号关于军令事宜》，这是对确立统帅权独立制度起到关键作用的重大措施。这个措施规定统帅可以经过敕定的规程下达军令，即使这仅限于作战指挥、作战计划的立案部门，其分立也意味着原本从属于政治机构之内的军事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与政治机构相并列对等形式存在了，在这一点上，这个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总之，军部通过制定《军令第一号关于军令事宜》获得了敕令制定权，由此，陆海军以“军令”为盾牌阻止政治对军事的介入，并且反过来将敕令以“军令”的形式予以滥用。^①

如此，陆海军虽然不断地推出坚持自身统帅权的措施，但这并未立即发展成为政治机构与军事机构的对立和抗争，倒是可以说，这之后的军事机构的权限被限制在了最小限度之内。以大正民主主

① 参见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第87~98页。

义状况为背景的政党内阁时代相当于第四个时期，由于当时有国际军缩和要求削减军备的国内舆论的原因，日本废止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不管是从制度和还是从国内舆论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军事受制于政治，军队威信明显下降的时期。

第五个时期是政军关系最为激烈对立的抗争时期。在该时期的初期，政党内阁由于1932年（昭和7年）5月的五一五事件恐怖活动而终结，军部为了彻底实行统帅权独立制和复活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而逐渐成为政治势力，这是一个在法西斯运动中“合法地”实现军部政权的时代。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后，为了坚决推进战争指导，政军关系也被迫进行了关系上的调整。进而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在总体战体制的构筑成为紧急课题的情况下，这种要求虽然更加强烈，但由于大本营政府联络恳谈会、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等只组建了极其有限且简易的组织，政军关系的调整最终也没有完全的实现。^①

从日本政军关系史的内容区分上来看，亨廷顿的“二重政府论”首先在理论实际范围上，因仅指这第五个时期的政军关系的对立和抗争，或是指军事的介入政治极为显著，所以有必要在明确时间限定的基础上进行讨论。除此之外的问题是，“二重政府论”用语的定义。从文字表面来理解的话，两个“政府组织”并存，各自参与对政治、战争的领导以及对国家政策的决定，指的是国家在这两个组织处于非调整状态下的运营。但是，“二重政府论”所说的究竟是否是第五个时期的实际情况，还是个疑问。

的确，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等军事组织中供职的骨干军事官僚，掌握着领导战争的主导权，进而由于政治的介入而施加了相当于政治指导的影响力和压力的事例不在少数，但就此认为日本立即

① 关于明治时期的政军关系史，参见伊藤皓文《明治国家における政軍關係——軍隊と国家の關係の一事例研究》（1、2），防衛庁防衛研究所《防衛論集》第7卷第2号，1986年9月；第7卷第3号，1986年10月。

分立为了两个“政府组织”，即便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认识的话，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1936年（昭和11年）2月二二六事件之后的广田内阁在组阁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由于军部露骨地压制自由主义人物入阁的情况，但是最终由外务官僚出身的广田弘毅组阁成功，这也可理解为当时军部还不能站在政治舞台前面。日美开战时的东条英机“军部”内阁也一样，推荐他的是以木户幸一为中心的重臣和宫中集团，后来打倒东条的工作在底下开始时，木户也是一面遵照天皇的意向，一面保持东条的支持态度，即维持着与军部内阁之间的协调关系。^① 总之，两者可以说是在一个“政府组织”内部重复进行着对立和妥协。

而且，由于失去天皇和木户的支持，东条内阁被迫总辞职，也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二重政府”，支持天皇的木户重臣和宫中集团掌握着政局的领导权，同时也明确表明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在天皇统治之下一元化体制。因此，所谓“东条独裁”的认识，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就这一意义而言，从军部的“合法的、间接统治”的角度，将更能正确地把握日本军部介入政治的实际情况。^②

进一步说，在重臣和宫中集团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即对英美协调派与军部、革新官僚为代表的“革新派”即“亚洲·门罗主义”（不干涉主义）派之间的对立和抗争以及妥协与协调的反复之中，特别是在中日全面战争以后，以前者对后者的妥协为背景，后者在掌握主导权的情形下，得以计划并推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应该理解为，在前者的认同下所推行的妥协

① 参见額瀨厚《東条英機——独裁者になれなかった“天皇の幕僚長”》，前田哲男、額瀨厚编《東郷元帥は何をしたか——昭和の戦争を演出した将軍たち》，高文研，1989。

② 李炯詰：《軍部の昭和史》（《军部昭和史》）上卷，“合法的、間接支配への道”，第15页。

性产物。而且，打倒东条内阁的工作，则是伴随战局的恶化而追究战败的责任，以及在天皇及天皇制度存续危机下的政治化表现，这意味着两者的协调关系已经崩溃。

从这样的观点来分析的话，亨廷顿提出的“二重政府论”这一对日本政军关系的认识，反而有对实际状况错误把握的危险。这样的把握，在作为坚决推进战争政策的角色上，过高地估计了军部、革新官僚等作用 and 地位，这样很可能会轻视或是无视重臣、宫中集团们的政治活动。虽然不能低估军部和革新官僚的地位，但是如果要对政军关系的实态作出概括的话，二者间绝不是平行和对等的关系，而是重叠且互补的关系。^①

2. 关于政军关系论的运用

以上，根据政军关系论的先驱研究和外国研究者对日本政军关系史进行的分析，第一章到第六章对1910年代到1940年代大约30年间的军政之间所展开的对立、妥协、协调的相互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为事例进行了探讨。虽然多少有些重复，但以下就分析近代日本政军关系史时应该如何运用政军关系论的问题，还是应该谈几点应该注意的事项。

在众多批判的对象之中，毕竟最值得探讨的是亨廷顿对日本政军关系史研究所提出的“二重政府”，而且对其按照历史事实进行反证又是第一位的。正如在各章所探讨的那样，对政军对立关系结构的分析实际上与亨廷顿所指出的那种以“二重政府”为框架的理解相比，如果稍用比喻意表达的话，即在“一个政府”内部存在着围绕政治选择的主导权而产生的对立，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反而是不允许“二重政府”化政治体系的原则在发挥作用，这一点是应该加以注意。

另外，关于珀尔马特的“禁卫军主义”论，也再次使人深感

^① 参见藤原厚《日本海軍の終戦工作——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再検証》，中央公論新社，1996。

在将日本军部的政治化或是把政治介入的原因与各国作比较时，有必要创造出能够从共性和特性两方面予以把握的理论。不单从制度论的观点，还要从历史的政治的视点来继续探索政治化的原因，也是今日历史学和政治学或者社会学领域的全体任务。在历史学领域里，尝试探讨战后军部政治化的原因，例如加深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情况，已经有着庞大的先行研究积累。但更为重要的是，那些研究积累与政军关系研究有着怎样的联系，有多大程度的借鉴价值。同时，在探索军部的成立和军部队政治介入的构造要因中，不停留于既存的法西斯主义研究和军国主义研究，在实证研究中也应看到运用政军关系论是不可或缺的。

而就芬诺的“政治文化比较”论来说，第一是有必要将军部介入的内容及其介入的程度与各国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第二是探讨如何理解“有限制的间接统治”的所谓日本军部对介入政治的课题。笔者对此认识虽说大体是可以理解的，但除了已经提到的疑点之外，还认为对于日本军部政治地位的认识定位于“有限制的间接统治”，应关注到对天皇以及天皇制度的分析，而且这点不可缺少。

之所以定位于“有限制的间接统治”认识的最大理由，亦如打倒东条内阁、东条内阁总辞职的过程所显示的那样，如果对行使强大政治和战争领导的天皇以及作为政军关系基础的天皇制度不进行分析的话，就不可能理解日本军部介入政治的实际情况。^①这就意味着今后在政军关系分析和理论构筑上，对作为明治国家体制核心的天皇制度如何评价是不得不纳入研究视野的问题。无论从结果或者还是从制度上来说，将军部的政治介入程度定位于“有限制的间接统治”的最大原因，正是天皇以及天皇制度这种统治体系的存在。

① 参见頼頼厚《天皇制国家の軍事機構》（菅孝行编《叢論日本天皇制Ⅱ 天皇制の理論と歴史》，拓殖書房，1987）。相关研究还有：加藤陽子：《摸索する1930年代——日米關係と陸軍中堅層》；増田知子：《天皇制と国家——近代日本の立憲君主制》；安田浩：《天皇の政治史——陸仁、嘉仁、裕仁の時代》。

最后，对于马科松提到的关键词“下克上”，笔者还深感有必要对有关日本军队骨干层的作用进行分析。关于日本军队的特征这方面虽然已经有些先行研究，^①而且有此研究已经证明，在军队中，对幕僚赋予绝大权限，其责任反而由上级承担；在战争领导体制里作战部门具有优越性等。的确，作为“下克上”典型事例还可以列举的有诺门罕战役（又称哈拉哈河战役）（1939年5月）、瓜达尔卡纳尔作战（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中辻政信参谋的独断专行，以及1931年3月、10月事件中长勇参与的实例。^②

这些都是日本军队的特征，另外考虑到军部骨干层是九一八事变和日英美开战的主要推进者，可以说“下克上”的问题也是阐述实际政军关系和日本军队特征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如前所述，作为日本军部对政治介入的基本要因，还不能不重视制度上以及机构的背景。不用说，探讨政治介入和非介入的动机，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将这一层次作为历史学的考察对象时，另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研究又是所必需的。

3. 是“非文民型统治”还是“军民融合型统治”

在此再次对李炯喆在《军部的昭和史》（上、下）中对日本政军关系特征进行分析时所提出的“非文民型统治”以及“合法的间接统治”的概念进行论述的同时，也谈谈笔者个人的见解。

首先，李氏把日本政军关系的基本特征，理解为从“融合的统一期（明治初期—日俄战争期）”到“较量期（日俄战争期—浜口内阁期）”，再到“军部优势期（九一八事变期—战败）”的转变，像这样的“政军关系的变化是在明治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情

① 参见藤原彰《天皇制と軍隊》；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下卷，日本評論社，1978。

② 参见額瀨厚《辻政信》、《長勇》，前田哲男、額瀨厚編《東郷元帥は何をしたか——昭和の戦争を演出した将軍たち》，高文研，1989；吉田裕、額瀨厚：《日本軍の作戦・戦闘・補給》，藤原彰、今井清一編《十五年戦争史》，青木書店，1989。

况下进行的。因此对明治体制的‘运营方式’是怎样的，不管是文官优势还是军部优势，其变化的‘幅度’可以说都是在体制范围内的”。^①他注意到了尽管明治国家统治体系始终保持不变，但是政军关系却有着生动的变化这一点。就是说，他在指出了明治国家统治制度的一贯性和统治机能的非一贯性这种对称性的同时，认为其中他所说的“军部优势期”的政军关系，作为其表面形态的政党所象征的文官统治是不必全盘否定的，因而他主张应该把可以称为“非文民型统治”（the type of non-civilian control）的统治形态作为实际状态来加以理解。^②

虽说这是颇有意思的主张，但是明治宪法体制本来是以权力分立制为基本原理的统治体系为其特征的，在此限度下的政军关系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能回避的要素。在历史过程或政治过程中这难道不是从最初开始就被固定下来了吗？若基于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李氏的主张就未必是正确的了。所以说，与其“根据‘运营方式’的改变”理解是文官优势还是军部优势变化，不如说那种由明治国家统治构造本身所孕育的政军关系的暧昧性、民主制度的未成熟性所造成的文官统治论的不存在是更应该加以瞩目的。关于这一点，李氏以别的表达方式阐述了一定的认识，因此不能就此认为他一定就与笔者的观点有所差异。

明治国家的统治系统准备了多样的统治组织，各自按照其所赋予的一定权限，尽力设法做到不使特定的组织确保绝对的权力，正所谓是“多元的政治联合体”。在此之中，就本书探讨的政军关系的框架来说，对于军部最终跨越与政党势力对抗的“较量期”的理由，归结于“军部优势”政军关系。若要对之给予更具说服力解释的话，则应该加上明治国家构造的特征和民主主义的未成熟

①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巻，“合法的、間接支配への道”，第6页。

②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巻，“合法的、間接支配への道”，第6页。李炯喆认为所谓“非文民型统制”这个概念并非全面否定文民统制，而是指由于文民统制的原则没有制度化，导致在没有明确原则的状态中展开的政军关系。

性。而且明治国家在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以怎样的国家目标和国家战略为基础而开展政策运营的等，这类问题的分析视点也就变得重要起来。

与此同时，即使清楚政军关系的应有模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民主主义已经成熟的话，也不能否定因其目标和战略左右实际政军关系的这一面。实际上，基于这一考虑，在各章通过军政的对立和抗争的诸事例，探讨了政军相互关系。所以，由于包含了不正面否定文官统治原则的含义，所以“非文官型统治”用语的提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非文官”最终客观地表示了“军人”，那么笔者认为即使称之为“军人统治型”的话也没有多大差别。因此，按照李氏的观点，由于文官和军人最终实现了相互协调的体制，从而构筑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争领导体系以及国家总动员体制，所以称之为“军民融合性统治”或是“军民混合型统治”，都是合理并具说服力的。本书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展开各章论述的。

也就是说，通过两个师团增设问题促使了政军关系矛盾的表面化（第一章）；在总体战体制的构筑这一政军共通的政治课题面前，出现了向军政协调的变化（第二章）；西伯利亚干涉战争时，政军之间暴露出深刻的对立，正如政党（原敬）与军部（田中义一）的妥协而创出战争领导体制所明确揭示的那样，政军之间形成了协调关系（第三章）。之后，正如从大正时期由宇恒一成陆军大臣断然实行军缩时所见到的那样，军部在大正民主主义高涨和处于国际和平形势时，必须与政党联手推进自身的构造改革和意识改革（第四章）。

这种情况甚至在李氏所指出的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军部优势期”，基本上也是如此（第五、六章）。另外，如果考虑到“军部优势期”的典型事例，东条英机内阁中事实上负责政治、战争领导的岸信介和星野直树为代表的官僚们（文官）的话，军部、政党、官僚，还有宫中、重臣集团等复合的诸权力集团形成的多元联

合体决定了政军关系构造的大框架，这一点就毋庸置疑了。^①

其次，李氏提出了“合法的间接统治”这一日本政军关系的特征。下面就此观点谈点意见。李氏把从九一八事变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军部统治”的实态，看做是“军部破坏了既存的政治体制，却没有树立独裁的权力，而是不得不停留于通过既存政治体制实施间接的统治”。^②以此为条件“军部统治”伴随着“合法的间接统治”得到了强行实施。而这种“合法性”的根据又在于“明治体制这一以天皇制为最高的国家权力构造”。^③

关于这一观点，虽然笔者大致上能够赞同，^④但问题是对这里所说的“合法的间接统治”为特征的战前日本政军关系的评价，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作为芬诺所谓的“发达的政治文化”国家日本，其军部从靠“敲诈”牵制内阁，最终转向“限制性的统治”，在其标准上还留有若干的疑问。的确，芬诺所论述的“军部统治阶段”论，在以一贯的分析视点来把握政军关系的时机及其变化过程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它又是在找出怎样把握日本政军关系方式的一个法则性方面提示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对这种芬诺理论，仅仅加上一些限制，尤其是仅仅以政治文化的成熟度水准作为一个指标，并相应地推展引来进行军政关系说明的话是不充分的。

① 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政军关系，参见纘纘厚《昭和期海軍と政局》（一）、（二），《政治経済史学》第344号，1995年2月；第345号，1995年3月。此外，参见纘纘厚《日本海軍の終戦工作——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再検証》“第四章 打到东条内阁的工作”，第93~145页。纘纘厚在书中指出“终战工作”是诸权力体共同实施的战败处理，也是企图继续保存其权力的政治工作。

②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卷，“合法的、間接支配への道”，第7页。

③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卷，“合法的、間接支配への道”，第7页。

④ 参见纘纘厚《東條英機——独裁者になれなかった“天皇の幕僚長”》，前田哲男、纘纘厚編《東郷元帥は何をしたか——昭和の戦争を演出した将軍たち》，高文研，1989。纘纘厚在该书中从天皇制政治构造的角度批判了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东条独裁论”。

这并不是对其本身加以否定，关于为何不得不采用“合法的间接统治”的问题，应该以明治国家体制的构造和机能为第一理由；而且，政军两者所处的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对一系列的政治过程究竟起了怎样的决定作用，对此进行详细的探讨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这一意义而言，在李氏考察军部政治化原因的基础上，在区分“构造的要因”和“状况的要因”，并说明其必要性的“第一章，军部的政治地位”，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分析方法。其中，作为“构造的原因”的有：（1）明治体制的权力构造，（2）明治体制的二元制，（3）近代化与军部的关系；作为“状况的原因”的有：（1）大陆政策与总动员体制，（2）对1920年代对文官优势的反抗，（3）1930年代的危机意识的多重化等。^①

对这一点来说，笔者在本章的第二节和本书的第五章里，就军部政治化的要因对“构造的要因”进行了论述。但是，就军部政治化乃至军部对政治介入的原因所作分析的方法，笔者所选择的是根据“状况的原因”进行的分析。李氏认为，“明治体制是最高统治层力量薄弱的分立的多元的联合体制，其结果是残留了一个具有强烈意志的机关，它超越应有权限向其他领域的机关扩大影响力，成为可能”。^② 这虽说基本就是以上所列举的“构造的原因”，但是由于将其归结于军部政治化的“状况的原因”的背景之下，因此笔者指出“状况的原因”中位居第一的是，战争爆发之前作为日本国家目标而出现的大陆政策的展开与总动员体制的构筑这两点，这与贯穿本书首尾的分析视角大体是一致的。

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军部政治化的两大要因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如何从总体上进行把握。笔者认为把两个原因论按照上部和下部作为复层关系来把握比较合理。总之，将“构造的原因”

①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巻，“合法的、間接支配への道”，第22页。

②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巻，“合法的、間接支配への道”，第35页。

作为下部构造，“状况的原因”作为上部构造的时候，可以认为“状况的原因”经常是由“构造的原因”来决定的，所以军部政治化在原理上是由明治国家的构造所决定的。但是，政治化原因即使在于明治国家的构造之中，由于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采取的是政治化的形态，当然作为上部构造也就必然按照广义的政治状况来发展。所以，正是由于对这两个原因采取了同时分析的方法，军部政治化的原因才显得更加清晰。

笔者从本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以各种政治事件为媒介对政军两者的对立和妥协的过程所作的尽可能详细的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一作为上部构造的“状况的要因”的实际状态。换言之，就是试图同时对制度与机能进行把握。

4. 社会统合过程中政军关系的位置

在本书作为研究目标的近代日本政军关系领域中，发表了极具实证性理论成果的雨宫昭一，提出：统帅权独立制（军事）和政党政治（政治）本来是一对不可能共存的对抗关系，从意欲强迫二者成为并存关系的田中义一思想和行动中，可以找到理解日本政军关系实态的钥匙。即“所谓继续维持统帅权独立制度的政党政治如果遇到了挫折，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从社会利益方面来说，政党对社会的统合遭到挫折；另一方面是从日本的政军关系来说，由于近代的行业分工扩大对政治的无法制约，导致统帅部的独断专行和自我膨胀，即出现政治与军事无限分裂，出现了政军关系分裂的可能”。^①这样，雨宫提出了值得注目的观点。

总之，按照雨宫的观点，以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大正民主主义发展为背景，在人们期待政党对社会进行统合的时候，以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为争论焦点，以统帅权独立制度为依据的军部卷土重来，实现统帅权独立制度旨在剥夺政党统合社会的地位，浜口、若槻两个民政党内阁都遭到了穷追猛打。而且，经九一八事变，军部

^① 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第6页。

于翌年以恐怖事件葬送了犬养毅政友会内阁，即使这类事件军部不都是根据其内部统一意见和计划而操作的。这些政党和军部的角逐事件不仅是争夺社会统合主导权的问题，而且也是掌握政军关系主导权的问题。

但是，如同本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结局“不一定要归结于军部的一元支配”，^①但政党与军部对社会统合主导权的争夺，最终的确是出现了所谓“军部优势”政治体制的特征。不过，正如已经叙述过的那样，由于明治国家统治构造的限定，以及所谓构筑国家总体战的国家战略目标被迫订立的1930年代以后的政治状况，就像依据民意不允许政党单独地统合社会过程一样，依据统帅权独立制的军部单独地统合社会的过程也不被允许，这也是当时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在以政、军、官位为主轴的国家总体战体制下，不得已而启动了多元的社会统合系统。可以说在这样大框架的把握下，近代日本的政军关系只能选择相互依存、协调的必然方式。而这也正是近代日本政军关系中军部的政治支配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不得不仅限于“合法的间接统治”的理由。

今后笔者将继续进行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理论性考察，围绕社会统合主体究竟适合于怎样的组织和权力体，探讨政军关系的内涵是否存在着决定结局要素的问题，利用先行研究和本书的事例研究，以本书中尚未充分探讨从九一八事变至二二六事件，再至日美英开战的1930年代为焦点，进一步进行细致地论证，并力图使之理论化。

在此以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想为基础，将社会统合的主体是如何把自身权力扩大变为志向作为研究对象，描述出政治和军事在对立、妥协、协调的政治过程中的各类形态。通过对这样政治过程的研究，阐明政治与军事本来所应有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作为今后的政军关系史研究所应该承担的职责。

① 雨宫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第6页。

四 结束语：政军关系论的当前课题

本书已经研究阐明的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后的日本政军关系的实际状态，那么如何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呢？下面结合当前的课题就此作些许探讨。

毋庸置疑，战后制定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不存在任何有关军事的条款。从最初就没有设想要创设以军队为主的军事组织及其机构。所以，从宪法上来看，也应该不存在“政军关系”。但是，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开始了再军备，从创设警察预备队到保安队，进而设立自卫队（1954年），在制定自卫队法以及自卫队设置法的过程中，事实上军事组织和机构、自卫官（军人）以及军事官僚（防卫官僚）已经出现。而且，在不断推进防卫整备的実施中，毫无疑问自卫队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军队，军事组织也强大起来。

如果根据日本国宪法上的解释，则日本是不应该保有军队的。但是，现在的日本拥有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的三种自卫队，是合计约24万余人的实力部队，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军队保有国之一。并设有作为统制、管理、运营该实力部队的防卫官僚机构，即防卫厅。为了统制自卫队，现在日本政府设置有称为参事官制度，这是旨在由参事官辅佐机构对防卫厅长官的制服组进行全面统管，该机构由官房长和防卫局长共10名防卫参事官组成。由于10名参事官全部是文官，故有时此制度也称之为“文官统制”。这是依据防卫厅设置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独特的实行文官统制的制度。

可是，近来自卫队方面，要求改编或者废止参事官制度的呼声高涨起来。自卫队方面的意见是，从现行的文官优势的防卫厅长官辅佐制度，发展到将文官（西服组）和武官（制服组）置于对等地位，再发展到将文官的任务限定为防卫政策的立案、施行的领

域，由武官掌管自卫队组织以及约 24 万人员。^① 如果严格地来说，这是因制服组从来就对“文官统制”持有强烈的不满而引发的问题，虽然不能即刻由此断言这就是对广义的文民统制的拒绝，但在逻辑上隐含的这种倾向极为浓烈。

总之，概观自卫队方面的观点，仅防卫事务次官和防卫参事官就对以文官直接辅佐防卫厅长官这种以文官统制为目的的制度抱有不满意。为此制服组提案了新的辅助制度，即文官和武官以同等并列的方式辅佐防卫厅长官，试图将其代替为本来意义上的文官统制。其中的意图在于将作为防卫问题的专门职能集团核心的统幕组织以及统幕长与文官置于同等地位，以便确保独立的发言权。采取这样的体制对于制服组来讲也许是文官统制，但是至少将文官与武官置于并列地位是违反文官统制原则的，因为这将直接导致架空文官统制。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本书所探讨之政军关系基本认识和政军关系的理想模式，即便从现实的要求来说也越来越应该尽早地得出结论。^② 若果将如此紧迫的状况也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在对当前我国的政军关系进行展望的基础上，本书所论述的政军关系论究竟应如何发挥作用呢？

随着自卫队与具有高度军队组织和军事机构的美军之间关系的不断加深，在自卫队自身也发展成为具有高度技术的专门集团的过程中，军队作为极其严格纪律下强固的组织集团，其内部的同心力

① 参见 纈纈厚《文民統制突き崩す制服組の暴走——加速する自衛隊“国軍”化への動き》，《週刊金曜日》第 519 号，2004 年 8 月 6 日；《文民統制の今日の問題》，《世界》，第 734 号，2004 年 12 月。

② 参见 西岡朗《現代の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知識社，1988，第 27~28 页。西岡朗指出：“文民统治的本质就是明确区分政治上的责任和军事上的责任，并且后者在制度上是从属于前者的。……‘政治统制’和‘民主统制’是军事统制原理中必不可少的两个要素”。纈纈厚也在《政軍關係において・軍事統制の主体を文民に置くとする原則》（前田哲男編《現代の戦争》，岩波書店，2002，第 70 页）中将“文民统制”定义为“在政军关系中，原则上文民为军事统制的主体”。

愈加强化，就愈加显露与一般社会的背离现象，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与自卫队制服组相对的文官统制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但是，自卫队作为坚如磐石的组织愈经锤炼，就愈加反感于那种意味着对政治的从属关系的文官统制制度，而且这一倾向愈加明显化的危险性又是无法抹去的。

所以，即使存在各种各样的评价，自卫队为了与民主主义社会共存，为了让市民社会容忍其存在，也必须遵从民主主义的规则，对合理的根据必须给予充分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对自卫队的限定，而且是因为在当今无论具有怎样高度的组织和人才的专门职能集团，如果抵触民主主义社会的原理和规范的行为，都将是不能容许的。

从这一点来看，如今也需要从以往的文官统制论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自从战后再军备开始以后，从文官统制对日本的再军备和自卫队的强化持反对立场这一面来看的话，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没能坚持反对的立场才促成自卫队危险性的理由；而另一方面，从赞成自卫队存在的阵营来看，只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才能消除国民对保有军队所抱有的不安。^① 如果这样讲的话，围绕文官统制的解释持赞成和反对的两种论点就是没有创见的同义反复，作为讨论是不会有其深化方向的。与其相比，更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去构筑市民社会和个人的安全保障，应该在这种综合安全保障论中加深对文官统制论的讨论。

在这样的讨论中，似乎战争爆发前的政军关系研究为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本书序章（第二节）已经提到，亨廷顿所说的文官统制，分为作为专门的职能集团的军队及其容忍作为其成员的军人自律性的所谓“客观的文官统制”，和与此相反的军队以及军人无条件地遵从文官统制的所谓的“主体的文官统制”两种。若对此再作整理的话，就应使军事与政治主体完全一体化。政治和军事的

^① 参见広瀬克哉《官僚と軍人——文民統制の限界》，岩波書店，1989，第4页。

一体化，即所谓的作为政治统治确立的文官统制位置，或是不使军队以及军人成为从事任何政治行动的专门职能集团，使军队或军人彻底成为非政治性存在。

尤其在美国，对政军关系论的讨论很热烈，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最大理由是，作为武力集团的军队和军事组织，在其行动原理和组织理念中，是否有可能和与之完全相反的民主主义社会共存。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进一步来看看世界的状况，现代史中军队对政治的介入频繁发生，军队自身的组织扩大和为获得政治资源为目的而介入政治的可能是无法排除的。

政军关系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杜绝军队对政治介入的可能，即使存在对军队各种各样的评价，也是要找出军队和民主主义通向共存途径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曾经以文官统治论著称一时的亨廷顿就主张确立“客观的文官统治”，即赋予军队自律性，使其作为专门职能集团能够彻底地打消介入政治的志向。该主张的问题是，正如芬诺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仅限于军队单纯地接受政治的统制。

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军队发挥着专门职能集团的作用，但因拥有统帅权独立制度等各种各样的特权，因此总是试图从政治统制中摆脱出来。由于有作为专门职能集团的意识，所以军队才出现了以对原敬内阁为象征的政治统制军事（政治统制）的极力抵抗的历史事实。军队作为专门职能集团的意识越是强烈，就越会加深其对时常因政治动向引起不安定政治状态的不信任；同时，关于国家的安全保障（国防）问题，包括政治判断在内的主体行动优先的倾向也就日益强化起来。

因此，亨廷顿和芬诺在围绕文官统制合理形态上的主张，从根本上是相互对立的。在考虑到两者的视点以及所持观点的差异和共同性目的，将两人的主张进行统合或者折中就变得不可缺少了。对此，西冈朗认为，在民主主义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中，为获得市民承认其存在，军队应始终是专门的职能集团。同时，军队自身应把

文官统制原则作为保证其自身存在的条件而予以接受，市民也应对军队所起安全保障作用保持期待感。^①

现今，在军事和政治的界限变得暧昧的情况下，尤其像美国社会所表现出的，即在所谓的“反恐怖战争”中对军队的作用抱有极大期待，在这种情况下，西冈的主张虽说相对比较易于接受，但是在日本，“二战”之前的军队最终并未归顺于政治统制，如本书第一章所探讨的那样，军部以增设两个师团问题为主，利用各种政治局面反复地介入政治的历史事实，以及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所显现的海外膨胀主义实践者存在的历史事实，都使人无法消除对军队所具有的不信任感和警戒感。因为有像战前日本军队所作所为的历史事实，与倡导不保持战斗力的和平宪法的存在，对原本作为民主主义社会和军队的共存前提的文民统制的实质关注，至少在一般市民社会中事实上是几乎不存在的。

但是，只要自卫队这种军队存在，即使不论其是非之争，而仅仅关注文民统制的应有的理想模式的话，例如像西冈所指出的那种折中的文官统制论不得实现时，无论是整个市民社会，还是对于约24万人强大的军事组织的自卫队来说，其结果也只能是两者的矛盾激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在分析亨廷顿和芬诺所提出的政军关系论的同时，更深刻地感到有必要尽早地找出日本型的文民统制论。这也是市民普遍的课题，是政治的重大责任问题。为此，对“二战”前日本政军关系史的研究，今后将显出更加重要的意义。

① 参见西冈朗《現代のシビ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第56～58页。

参考文献

一 资料

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刊行会編《大日本帝国議会誌》全18卷，1926～1930。

防衛教育研究会編《統帥綱領・統帥参考》，田中書店，1982。

《現代史資料》，みすず書房，1964～1974。

《明治百年史叢書》，原書房，1965～1983。

陸軍省編《陸軍省沿革史——自明治37年至大正15年》全3卷，叢南堂書店，1969。

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 国防論策編》，原書房，1971。

参謀本部：《昭和3年支那事變出兵史》，叢南堂書店，1971。

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編《日本陸海軍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

参謀本部編《西伯利出兵史——大正7年至11年》，新時代社，1972。

参謀本部編《滿州事變作戰經過ノ概要——滿州事變史》，叢南堂書店，1972。

家永三郎監修《日本史資料》上、下卷，東京法令出版，1973。

石川準吉編《國家總動員史》本編2卷、資料編10卷、補卷1，國家總動員史刊行會，1975～1987。

安部博純等編《史料構成 近代日本政治史》，南窓社，1976。

上原勇作關係文書研究会編《上原勇作關係文書》，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

憲兵司令部編《西伯利出兵憲兵史》全2卷，國書刊行會，1976。

新名丈夫編《海軍戰爭檢討會議錄——太平洋戰爭開戦の経緯》，毎日新聞社，1976。

外務省編（江藤淳解説）《終戦史録》全6卷，北洋社，1977～1978。

外務省編刊《日本外交文書 満州事変》全7卷，1977～1981。

桜井忠温編《国防大事典》，國書刊行會，1978。

《帝國議會議事速記録》全160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1985。

《帝國議會衆議院委員會議録》明治篇全72卷、昭和篇全172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2000。

栗屋憲太郎編《資料日本現代史2 敗戦直後の政治と社会1》，大月書店，1980。

神田文人編《資料日本現代史7 産業報国運動》，大月書店，1981。

外山操編《陸海軍将官人事総覧》全2卷，芙蓉書房，1981。

伊藤隆等編《近代日本史料選書1 真崎甚三郎日記》全6冊，山川出版社，1981～1987。

戦前期官僚制研究会編、秦郁彦監修《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伊藤隆等編《近代日本史料選書 2 大正初期山県有朋談話筆記・政変思起草》，山川出版社，1981。

伊藤隆等編《近代日本史料選書 6 本庄繁日記》全 2 冊，山川出版社，1982～1983。

坂野潤治等編《近代日本史料選書 12 財部彪日記》全 2 冊，山川出版社，1983。

山本四郎編《寺内正毅関係文書——首相以前》，京都女子大学，1984。

《枢密院会議議事録》明治編全 15 卷、大正編全 27 卷、昭和編全 54 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1996。

山本四郎編《寺内正毅内閣関係史料》全 2 冊，京都女子大学，1985。

《帝国議会貴族院委員会速記録》明治篇全 28 卷、昭和篇全 127 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2000。

栗屋憲太郎等編《東京裁判資料 木戸幸一尋問調書》，大月書店，1987。

政党政治研究会編《議会政治 100 年——生命をかけた政治家達》，徳間書店事業室，1988。

芝原拓自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2 对外観》，岩波書店，1988。

藤原彰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4 軍隊・兵士》，岩波書店，1989。

由井正臣等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3 官僚制・警察》，岩波書店，1990。

百瀬孝：《事典 昭和戦前期の日本——制度と実態》，吉川弘文館，1990。

前田英昭編《帝国議会報告書集成》全 8 卷，柏書房，1991。

栗屋憲太郎、吉田裕編《国際検察局（IPS）尋問調書》，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3。

外山操、森松俊夫編《帝国陸軍編成総覧》全3巻，芙蓉書房，1993。

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史料》，岩波書店，1997。

山田朗編《外交資料 近代日本膨張と侵略》，新日本出版社，1997。

軍事史学会編《大本营陸軍部戦争指導班 機密戦争日誌》上、下巻，錦正社，1998。

第二復員局残務処理部編、田中宏巳監修《太平洋戦争開戦前史——開戦迄の政略戦略》，緑蔭書房，2001。

二 日記・評伝・评论等

田中義一：《社会的国民教育——一名青年義勇団》，博文館，1919。

田中義一：《壮丁読本》，丁未出版社，1916。

綾部致軒編《田中中将講演集》，不二書院，1916。

黒田甲子郎編《元帥寺内伯爵伝》，元帥寺内伯爵伝記編纂所，1920。

中尾龍夫：《軍備制限と陸軍の改造》，文正堂書店，1921。

橋本勝太郎：《経済的軍備の改造》，隆文館，1921。

小林順一郎：《陸軍の根本改造》，時友社，1924。

石藤市勝：《どうして陸軍を改革すべきか》，大阪毎日新聞社，1924。

田中義一：《大処高处より》，兵書出版社，1925。

尼子止：《平民宰相若槻礼次郎》，モナス，1926。

相馬由也：《俎上の田中大将と其一味》，教化的国家社，1926。

吉田豊彦：《軍需工業動員ニ関スル常識的説明》，偕行社，1927。

松下芳男：《軍政改革論》，青雲閣書房，1928。

保利史華：《田中義一——宰相となるまで》，第一出版社，1928。

三井邦太郎編《我等の知る後藤新平伯》，東洋協会，1929。

伊藤正徳：《軍縮？》，春陽堂，1929。

尼子止：《平民宰相浜口雄幸》，宝文館，1930。

野崎政助：《若槻大内閣》，八郡俱樂部，1931。

《浜口雄幸遺稿 随感録》，三省堂，1931。

伊藤慶治郎：《陸軍軍縮と米露の東亜経綸》，日本書院出版部，1931。

田中貢太郎：《西園寺公望伝》，改造社，1932。

野依秀市：《軍部を衝く》，秀文閣書房，1933。

原田為五郎：《軍縮会議と軍備平等権の強調》，稲光堂書店，1934。

柳沼七郎：《軍人と政治》，紀元書房，1935。

松下芳男：《軍部を裏から覗く——華かな軍部の裏面観》，今日の問題社，1935。

鎌田澤一郎：《宇垣一成》，中央公論社，1937。

黒板勝美：《福田大将伝》，福田大将伝刊行会，1937。

渡辺幾治郎：《人物近代日本軍事史》，千倉書房，1937。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後藤新平伯伝記編纂会，1937。

安藤徳器：《西園寺公望》，白揚社，1938。

小泉策太郎：《随筆 西園寺公》，岩波書店，1939。

山崎一芳：《久原房之助》，東海出版社，1939。

京口元吉：《大正政変前後》，白揚社，1940。

下園佐吉：《牧野伸顕伯》，人文閣，1940。

企画院研究会編《国防国家の綱領》，新紀元社，1941。

酒井鎬次：《戦争指導の実際》，改造社，1941。

八重樫運吉：《国防国家の理論と政策》，日本評論社，1941。

- 中村嘉寿：《海軍の父山本権兵衛》，水産社，1942。
- 吉田秀夫：《国防国土学——東亜共栄圏の国土計画》，ダイヤモンド社，1942。
- 沢田謙：《後藤新平伝》，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43。
- 前田蓮山：《原敬伝》上、下巻，高山書院，1943。
- 山浦貫一：《森恪》，高山書院，1943。
- 桑木崇明：《陸軍五十年史》，鱒書房，1943。
- マリー・デブネ（岡野馨译）：《戦争と人——世界大戦後の省察》，岩波書店，1944。
- 五十嵐豊作：《国防政治の研究》，日本評論社，1945。
- 馬島健：《軍閥暗闘秘史——陸軍崩壊の一断面》，協同出版社，1946。
- 馬場恒吾：《近衛内閣史論——戦争開始の真相》，高山書院，1946。
- 鈴木貫太郎：《終戦の表情》，労働文化社，1946。
- 近衛文麿：《最後の御前会議》，時局月報社，1946。
- 近衛文麿：《平和への努力——近衛文麿手記》，日本電報通信社，1946。
-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研究会編《木戸日記——木戸被告人宣誓供述書全文》，平和書房，1947。
- 《東京裁判における木戸証言——軍政最後の権謀をあばく旋風時代の宮廷秘史》，キング出版社，1947。
- 竹越與三郎：《西園寺公》，鳳文書林，1947。
- 木村毅：《西園寺公望》，沙羅書房，1948。
- 高木惣吉：《終戦覚書》，弘文堂書店，1948。
- 牧野伸顕：《回顧録》全3巻，文藝春秋社，1948。
- 渡辺茂雄：《宇垣一成の歩んだ道》，新太陽社，1948。
- 作田高太郎：《天皇と木戸》，平凡社，1948。
- ジョセフ・グルー（石川欣一译）：《滞日十年——日記・公

文書・私文書に基く記録》上、下巻，毎日新聞社，1948。

鈴木一編《鈴木貫太郎自伝》，桜菊会出版部，1949。

鷲尾義直：《古島一雄》，日本経済研究会，1949。

小泉策太郎记录、木村毅編《西園寺公望自伝》，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49。

豊田副武述、柳沢健編《最後の帝国海軍》，世界の日本社，1950。

下村海南：《終戦秘史》，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50。

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一外交官の回想》，岩波書店，1950。

木舎幾三郎：《近衛公秘聞》，高野山出版社，1950。

岡田啓介述：《岡田啓介回顧録》，毎日新聞社，1950。

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読売新聞社，1950。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全8巻，岩波書店，1950～1952。

若槻礼次郎：《古風庵回顧録——若槻礼次郎自伝・明治大正昭和政界秘史》，読売新聞社，1950。

古島一雄述：《古島一雄清談》，毎日新聞社，1951。

加瀬俊一：《ミズリー号への道程》，文藝春秋新社，1951。

宇垣一成述、鎌田澤一郎：《松籟清談》，文藝春秋新社，1951。

風見章：《近衛内閣》，日本出版協同，1951。

福留繁：《海軍の反省》，日本出版協同，1951。

内田信也：《風雪五十年》，実業之日本社，1951。

中嶋久万吉：《政界財界五十年》，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51。

矢部貞治編《近衛文麿》上、下巻，弘文堂，1952。

塩原時三郎：《東条メモ——かくて天皇は救われた》，ハンドブック社，1952。

武藤章：《比島から巢鴨へ——日本軍部の歩んだ道と一軍人の運命》，実業之日本社，1952。

伊東忠治編《戦争史大観の説明》，協和実業社，1953。

細川護貞：《情報天皇に達せず——細川日記》上、下巻，同光社磯部書房，1953。

字垣一成：《字垣日記》，朝日新聞社，1954。

《小山完吾日記——五一五事件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慶応通信，1955。

緒方竹虎：《一軍人の生涯——回想の米内光政》，文藝春秋新社，1955。

福留繁：《史観 真珠湾攻撃》，自由アジア社，1955。

田中新一：《大戦突入の真相》，元々社，1955。

岡田大将記録編纂会編刊《岡田啓介》，1956。

御手洗辰雄編《南次郎》，南次郎伝記刊行会，1957。

伊藤正徳：《軍閥興亡史》全3巻，文藝春秋新社，1957～1958。

高宮太平：《米内光政》，時事通信社，1958。

細川隆元：《田中義一》，時事通信社，1958。

山本英輔：《山本権兵衛》，時事通信社，1958。

木村毅：《西園寺公望》，時事通信社，1958。

前田蓮山：《原敬》，時事通信社，1958。

御手洗辰雄：《山縣有朋》，時事通信社，1958。

青木徳三：《若槻礼次郎・浜口雄幸》，時事通信社，1958。

矢部貞治：《近衛文麿》，時事通信社，1958。

有竹修二：《齐藤実》，時事通信社，1958。

大谷敬二郎：《落日の序章——昭和陸軍史 第一部》，八雲書店，1959。

岡田丈夫：《近衛文麿——天皇と軍部と国民》，春秋社，1959。

岡義武等校訂《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政治——松本剛吉政治日誌》，岩波書店，1959。

石川信吾：《真珠湾までの経緯——開戦の真相》，時事通信社，1960。

石上良平：《政党史論原敬没後》，中央公論社，1960。

鈴木貫太郎伝記編纂委員会編刊《鈴木貫太郎伝》，1960。

佐藤賢了：《東条英機と太平洋戦争》，文藝春秋新社，1960。

前田蓮山：《歴代内閣物語》，時事通信社，1961。

河辺虎四郎：《市ヶ谷台から市ヶ谷台へ——最後の参謀次長の回想録》，時事通信社，1962。

富田健治：《敗戦日本の内側——近衛公の思い出》，古今書院，1962。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時事通信社，1962。

小磯国昭自叙伝刊行会編刊《葛山鴻爪》，1963。

田々宮英太郎：《昭和の政治家達——日本支配層の内幕》，弘文堂，1963。

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みすず書房，1964。

四王天延孝：《四王天延孝回顧録》，みすず書房，1964。

佐藤賢了：《大東亜戦争回顧録》，徳間書店，1966。

木戸日記研究会編《木戸幸一関係文書》，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

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上、下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

井上幾太郎伝刊行会編刊《井上幾太郎伝》，1966。

秋定鶴造：《東條英機——その生涯と日本陸軍興亡秘史》，経済往来社，1967。

高木惣吉：《太平洋戦争と陸海軍の抗争》，経済往来社，1967。

角田順：《宇垣一成日記》全3巻，みすず書房，1968～1971。

- 榎本捨三：《東條英機とその時代》，宮川書房，1968。
- 共同通信社、近衛日記編集委員会編《近衛日記》，共同通信社開発局，1968。
- 富岡定俊：《開戦と終戦——人と機構と計画》，毎日新聞社，1968。
- 東久邇稔彦：《東久邇日記——日本激動の秘録》，徳間書店，1968。
- 池田純久：《日本の曲り角——軍閥の悲劇と最後の御前会議》，千城出版，1968。
- 中村菊男：《昭和陸軍秘史》，番町書房，1968。
- 高田一夫：《政治家の決断》，青友社，1969。
- 山本義正：《父・山本五十六——その愛と死の記録》，光文社，1969。
- 有馬頼義：《宰相近衛文麿の生涯》，講談社，1970。
- 大谷敬二郎：《軍閥》，図書出版社，1971。
- 横山臣平：《秘録石原莞爾》，芙蓉書房，1971。
- 原奎一郎：《ふだん着の原敬》，毎日新聞社，1971。
- 実松讓：《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が最も尊敬した軍人の生涯》，光人社，1971。
- 《昭和史の天皇》（16），読売新聞社，1971。
- 高宮太平：《順逆の昭和史——二二六事件までの陸軍》，原書房，1971。
- 岡義武：《近衛文麿——“運命”の政治家》，岩波書店，1972。
- 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編《秘録板垣征四郎》，芙蓉書房，1972。
- 永田鉄山刊行会編《秘録永田鉄山》，芙蓉書房，1972。
- 額田担：《秘録宇垣一成》，芙蓉書房，1973。
- 東條英機刊行会、上法快男編《東條英機》，芙蓉書房，1974。
- 矢部貞治：《矢部貞治日記》全4巻，読売新聞社，1974～

1975。

井上清：《字垣一成》，朝日新聞社，1975。

有末精三：《有末機関長の手記——終戦秘史》，芙蓉書房，1976。

梅津美治郎刊行会、上法快男編《最後の参謀長——梅津美治郎》，芙蓉書房，1976。

新名丈夫：《海軍戦争検討会議記録——太平洋戦争開戦の経緯》，毎日新聞社，1976。

松下芳男：《近代日本軍人伝——人物でつづる日本軍事史》，柏書房，1976。

森克己：《満州事変の裏面史》，国書刊行会，1976。

高橋是清著、上塚司編《高橋是清自伝》，中央公論新社，1976。

佐藤賢了：《佐藤賢了の証言——対米戦争の原点》，芙蓉書房，1976。

林政春：《満州事変の関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大湊書房，1977。

細川護貞：《細川日記》，中央公論社，1978。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

実松讓：《海軍大将米内光政覚書》，光人社，1978。

豊田穰：《激流の孤舟——提督・米内光政の生涯》，講談社，1978。

阿川弘之：《米内光政》上、下巻，新潮社，1978。

林久治郎：《満州事変と奉天総領事——林久治郎遺稿》，原書房，1978。

田中新一著、松下芳男編《田中作戦部長の証言——大戦突入の真相》，芙蓉書房，1978。

松尾勝造：《シベリア出征日記》，風媒社，1978。

熊野英坤編《田中義一追悼集——没後五十年 目で見るお

ちが大将》，元総理大臣田中義一顕彰会，1978。

高山信武：《参謀本部作戦課——作戦論争の実相と反省》，芙蓉書房，1978。

黒田秀俊：《昭和軍閥——軍部独裁の20年》，図書出版社，1979。

上法快男編《陸軍省軍務局》，芙蓉書房，1979。

高木惣吉：《高木海軍少将覚え書》，毎日新聞社，1979。

矢次一夫：《政変昭和秘史——戦時下の総理大臣たち》，サンケイ出版，1979。

田中稔：《田中隆吉著作集》，1979。

棟田博：《宇垣一成——悲運の将軍》，光人社，1979。

榎本捨三：《東條英機 その昭和史》，秀英書房，1979。

野村実：《歴史のなかの日本海軍》，原書房，1980。

森元治郎：《ある終戦工作》，中央公論新社，1980。

山本四郎編《寺内正毅日記——1900～1918》，京都女子大学，1980。

矢次一夫：《東條英機とその時代》，三天書房，1980。

松谷誠：《大東亜戦争収拾の真相》，芙蓉書房，1980。

西浦進：《昭和戦争史の証言》，原書房，1980。

原奎一郎等編《原敬をめぐる人びと》，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1～1982。

田崎末松：《評伝田中義一——十五年戦争の原点》上、下巻，平和戦略総合研究所，1981。

武藤章著，上法快男編《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録》，芙蓉書房，1981。

勝田龍夫：《重臣たちの昭和史》上、下巻，文藝春秋，1981。

伊藤隆、野村実編《海軍大将小林躋造覚え書》，山川出版社，1981。

入江貫一著、伊藤隆編《大正初期山県有朋談話筆記 政変

想出草》，山川出版社，1981。

小堀桂一郎：《宰相鈴木貫太郎》，文藝春秋，1982。

秦郁彦：《昭和史の軍人たち》，文藝春秋，1982。

沢田茂著、森松俊夫編《参謀次長沢田茂回想録》，芙蓉書房，1982。

宮野澄：《最後の海軍大将 井上成美》，文藝春秋，1982。

戸川猪佐武：《犬養毅と青年将校》，講談社，1982。

岸田英夫：《侍従長の昭和史》，朝日新聞社，1982。

野村実編《侍従武官城英一郎日記》，山川出版社，1982。

山本親雄：《大本营海軍部》，朝日ソノラマ，1982。

森川哲郎：《東条英機暗殺計画》，現代史出版会，1982。

山本四郎編《西原亀三日記》，京都女子大学，1983。

河原敏明：《天皇裕仁の昭和史》，文藝春秋，1983。

千田夏光：《天皇と勅語と昭和史》，汐文社，1983。

高田万亀子：《日本の曲り角——三国同盟問題と米内光政》，勁草出版サービスセンター，1984。

吉松安弘：《東条英機 暗殺の夏》上、下巻，新潮社，1984。

田中隆吉：《太平洋戦争の敗因を衝く——軍閥専横の実相》，長崎出版，1984。

大平進一：《最後の内大臣木戸幸一》，恒文社，1984。

海軍省海軍軍事普及部編《支那事変に於ける帝国海軍の行動》，鵬和出版，1985。

高木惣吉：《高木惣吉日記——日独伊三国同盟と東条内閣打倒》，毎日新聞社，1985。

芦沢紀之：《謀略——吉田茂逮捕》，芙蓉書房，1985。

種村佐孝等編《大本营機密日誌》，芙蓉書房，1985。

半藤一利：《聖断——天皇と鈴木貫太郎》，文藝春秋，1985。

赤松貞雄：《東條秘書官機密日誌》，文藝春秋，1985。

杉森久英：《近衛文麿》，河出書房新社，1986。

保科善四郎等：《太平洋戦争秘史——海軍は何故開戦に同意したか》，日本国防協会，1987。

生出寿：《“帝国海軍”軍令部総長の失敗——天皇に背いた伏見官元帥》，徳間書店，1987。

読売新聞社編《天皇の終戦——激動の227日》，読売新聞社，1988。

亀井宏：《昭和の天皇と東條英機》，光人社，1988。

野村実：《天皇・伏見宮と日本海軍》，文藝春秋，1988。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ィジョン》，中央公論新社，1988。

実松讓：《米内光政秘書官の回想》，光人社，1989。

伊藤隆：《東條内閣総理大臣機密記録——東條英機大臣言行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勝野駿：《昭和天皇の戦争》，図書出版社，1989。

伊藤隆編《牧野伸顕日記》，中央公論社，1990。

木下道雄：《側近日誌》，文藝春秋，1990。

立命館大学編《西園寺公望伝》全4巻、別巻2，岩波書店，1990～1997。

寺崎英成、マリコ・テラサキ・ミラー編《昭和天皇独白録——寺崎英成・御用掛日記》，文藝春秋，1991。

池井優等編《浜口雄幸日記・随感録》，みすず書房，1991。

河合弥八著、高橋紘編《昭和初期の天皇と宮中——侍従次長河井弥八日記》全6巻，岩波書店，1993～1994。

豊田穂：《最後の重臣岡田啓介——終戦平和に尽瘁した影の仕掛人の生涯》，光人社，1994。

林銃十郎：《満州事件日誌》，みすず書房，1996。

大内信也：《帝国主義日本にNoと言った日本人水野広徳》，雄山閣出版，1997。

東野真：《昭和天皇二つの“独白録”》，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98。

竹下勇著、波多野勝編《海軍の外交官竹下勇日記》，芙蓉書房出版，1998。

奈良武次著、波多野澄雄編《侍従武官長奈良武次日記・回顧録》全4巻，柏書房，2000。

高木惣吉著、伊藤隆編《高木惣吉 日記と情報》上、下巻，みすず書房，2000。

三 研究書等

村上啓作編《戦争要論》，陸軍大学将校集会所，1925。

コルマン・フォン・デル・ゴルツ（日本陸軍大学校译）：
《国民皆兵論——現代の軍制と統帥》，偕行社，1926。

信夫淳平：《近代外交史論》，日本評論社，1927。

篠崎嘉郎：《満洲金融及財界の現状》上、下巻，大阪屋号書店，1927～1928。

矢内原忠雄：《満洲問題》，岩波書店，1934。

今中次麿：《日本政治史大綱》，南郊社，1936。

戦争経済研究会編《工業動員論》，大同出版，1937。

ルーデンドルフ（間野俊夫译）：《国家総力戦》，三笠書房，1938。

葛生能久著、黒龍会編《日支交渉外史》，黒龍会出版部，1938～1939。

愛野時一郎：《戦略体勢と新戦争——世界変局と日本の決意》，日満支婦人大同会事業部，1939。

黒田覚：《国防国家の理論》，弘文堂，1941。

松下芳男：《近代日本軍事史》，紀元社，1941。

信夫清三郎：《近代日本外交史》，中央公論社，1942。

木下半治：《戦争と政治》，昭和書房，1942。

寺内弥吉：《日本総力戦の研究》，日本電報通信出版部，1942。

土屋喬雄：《国家総力戦論》，ダイヤモンド社，1943。

大久保純一郎：《文化統制の研究》，東洋書館，1943。

渡辺幾治郎：《太平洋戦争の歴史的考察》，東洋経済新報社，1947。

E. H. ノーマン（大窪愿二译）：《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家の成立》，時事通信社，1947。

田中惣五郎：《日本官僚政治史》，世界書院，1947。

飯塚浩：《日本の軍隊》，東大共同組合出版部，1950。

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全4巻，河出書房，1951～1952。

藤田嗣雄：《軍隊と自由》，河出書房，1953。

高橋甫：《百万人の戦争科学——戦力の構造と運動の理論》，建民社，1953。

歴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全5巻，東洋経済新報社，1953～1954。

ルイス・スミス（佐上武弘译）：《軍事力と民主主義》，法政大学出版社，1954。

田中惣五郎：《日本軍隊史》，理論社，1954。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昭和史》，岩波書店，1955。

細谷千博：《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有斐閣，1955。

ハーバート・フェイス（大窪愿二译）：《真珠湾への道》，みすず書房，1956。

植田捷男等編《近代日本外交史の研究——神川先生還暦記念》，有斐閣，1956。

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構造の研究》，未来社，1956。

松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上、下巻，有斐閣，1956。

中山治一：《日露戦争以後——東アジアをめぐる帝国主義の国際関係》，創元社，1957。

E・H・ノーマン（大窪愿二译）：《日本の兵士と農民》，岩波書店，1958。

岡義武：《山県有朋——明治日本の象徴》，岩波書店，1958。

日本外交学会編《太平洋戦争終結論》，東京大学出版会，1958。

ロバート・ビューター（大井篤译）：《終戦外史——無条件降伏までの経緯》，時事通信社，1958。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編《日露戦争史の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59。

信夫清三郎：《真説日本歴史Ⅱ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雄山閣，1959。

松下芳男：《日本軍制と政治》，くろしお出版，1960。

横越英一：《近代政党史研究》，勁草書房，1960。

黒羽茂：《世界史上より見たる日露戦争》，至文堂，1960。

鶴原和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における政治と民衆——鶴原和吉遺稿》，中央公論事業出版，1961。

藤村道生：《山県有朋》，吉川弘文館，1961。

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河出書房新社，1961。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の外交》，毎日新聞社，1961。

キャサリン・コーリー（神川信彦、池田清译）：《軍隊と革命の技術》，岩波書店，1961。

秦郁彦：《軍ファシズム運動史——三月事件から二・二六後まで》，河出書房新社，1962。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全7巻、別巻1，朝日新聞，1962～1963。

松下芳男：《明治の軍隊》，至文堂，1963。

梅溪昇：《明治前期政治史の研究——明治軍隊の成立と明治国家の完成》，未来社，1963。

安藤彦太郎編《満鉄——日本帝国主義と中国》，御茶の水書

房，1965。

篠原一、三谷太一郎編《近代日本の政治指導》，東京大学出版会，1965。

島田俊彦：《関東軍——在満陸軍の独走》，中央公論新社，1965。

中村菊男：《満州事変》，日本教文社，1965。

古屋哲夫：《日露戦争》，中央公論新社，1966。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青木書店，1966。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新社，1966。

金原左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社会的形成》，青木書店，1967。

三宅正樹：《世界史におけるドイツと日本》，南窓社，1967。

臼井勝美：《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中央公論新社，1967。

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の形成——原敬の政治指導の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7。

住谷悦治等編《講座日本社会思想史2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思想》，芳賀書店，1967。

吉村道男：《日本とロシア——日露戦後からロシア革命まで》，原書房，1968。

石田雄：《破局と平和——1941～1952》，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義の形成》，岩波書店，1968。

原口清：《日本近代国家の形成》，岩波書店，1968。

信夫清三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史》，日本評論社，1968。

慶応義塾大学地域研究グループ編《変動期における軍部と軍隊》，慶応通信，1968。

レスター・ブルークス（井上勇译）：《終戦秘話——一つの

◆ 帝国を終わらせた秘密闘争》，時事通信社，1968。

トリストラム・コフィン（遠藤正武、飼牛康彦译）：《武装社会——アメリカ軍国主義の告発》，サイマル出版会，1969。

伊藤隆：《昭和期政治史研究——ロンドン海軍軍縮問題をめぐる諸政治集団の対抗と提携》，東京大学出版会，1969。

井上清編《大正期の政治と社会》，岩波書店，1969。

前島省三：《昭和軍閥の時代》，ミネルヴァ書房，1969。

岡義武：《転換期の大正——1914～1924》，東京大学出版会，1969。

高橋正衛：《昭和の軍閥》，中央公論新社，1969。

中村菊男：《近代日本政治史》，慶応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1970。

松尾尊允：《民本主義の潮流》，文英堂，1970。

山本四郎：《大正政変の基礎的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70。

アービン・クックス（加藤俊平译）：《天皇の決断——昭和20年8月15日》，サンケイ新聞社出版局，1971。

白土みどり：《最終戦争時代論——石原莞爾の思想》，邦文社，1971。

義井博：《昭和外交史》，南窓社，1971。

三輪公忠：《松岡洋右——その人間と外交》，中央公論新社，1971。

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史7 日本帝国主義の崩壊》，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

歴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全6巻，青木書店，1971～1973。

満洲史研究会編《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満洲——“満州国”成立前後の経済研究》，御茶の水書房，1971。

竹村民郎：《独占と兵器生産——リベラリズムの経済構造》，勁草書房，1971。

細谷千博編《日米関係史——開戦に至る10年（1931～1941）》全4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1972。

堀内謙介監修、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本外交史21 日独伊同盟・日ソ中立条約》，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会，1971。

臼井勝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時代》，原書房，1972。

小山弘健：《日本軍事工業の史的分析——日本資本主義の発展構造との関係において》，御茶の水書房，1972。

鈴木武雄監修《西原借款資料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

高橋幸八郎編《日本近代化の研究》上、下巻，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

馬場伸也：《満州事変への道——幣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論新社，1972。

金原左門：《大正期の政党と国民——原敬内閣下の政治過程》，塙書房，1973。

宮地正人：《日露戦後政治史の研究——帝国主義形成期の都市と農民》，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大山梓：《日露戦争の軍政史録》，芙蓉書房，1973。

菊地昌典：《ロシア革命と日本人》，筑摩書房，1973。

村上一郎：《日本軍隊論序説》，新人物往来社，1973。

高橋治：《派兵》全4巻，朝日新聞社，1973～1977。

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岩波書店，1974。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とその後》，中央公論社，1974。

アルフレート・ファークツ（天野真宏译）：《軍国主義の歴史——軍部と政治》，福村出版社，1974。

テッオ・ナジタ（安田志郎译）：《原敬——政治技術の巨匠》，読売新聞社，1974。

臼井勝美：《満州事変——戦争と外交と》，中央公論新社，1974。

大江志乃夫：《国民教育と軍隊——日本軍国教育政策の成立と展開》，新日本出版社，1974。

J. W. モーリ（小平修、岡本幸治译）：《日本近代化のジレンマ——両大戦間の暗い谷間》，ミネルヴァ書房，1974。

佐藤誠三郎等編《近代日本の対外態度》，東京大学出版社，1974。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義史論——満州事変前後》，青木書店，1975。

太田雅夫：《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新泉社，1975。

今西英造：《昭和陸軍軍閥抗争史——101人の政治的軍人》，伝統と現代社，1975。

松下芳男：《日本軍閥の興亡》，芙蓉書房，1975。

佐藤徳太郎：《軍隊・兵役制度》，原書房，1975。

安部博純：《日本ファシズム研究序説》，未来社，1975。

三宅正樹：《日独伊三国同盟の研究》，南窓社，1975。

井上清：《日本の軍国主義》全4巻，現代評論社，1975～1977。

大江志乃夫：《日露戦争の軍事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76。

鹿野政直：《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小学館，1976。

由井正臣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有精堂，1977。

義井博：《日独伊三国同盟と日米関係——太平洋戦争前国際関係の研究》，南窓社，1977。

藤原彰：《天皇制と軍隊》，青木書店，1978。

五味川純平：《御前会議》，文藝春秋，1978。

大浜徹也：《天皇の軍隊》，教育社，1978。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 1906～1918》，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

細谷千博等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大学出版

会，1978。

江口圭一編《日本ファシズムの形成》，日本評論社，1978。

刘田徹：《昭和初期政治・外交史研究——十月事件と政局》，人間の科学社，1978。

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1 昭和期の軍部》，山川出版社，1979。

細谷千博：《日本外交の座標》，中央公論社，1979。

河原宏等：《日本のファシズム》，有斐閣，1979。

升味準之介：《日本政党史論》第5、6、7巻，東京大学出版社，1979～1980。

富田信男編《明治国家の苦悩と変容——日本政治史の一断面》，北樹出版，1979。

黒羽清隆：《十五年戦争史序説》，三省堂，1979。

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2 近代日本と東アジア》，山川出版社，1980。

藤井徳行：《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北樹出版，1980。

森松俊夫：《大本營》，教育社，1980。

生田惇：《日本陸軍史》，教育社，1980。

森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第一法規出版，1981。

池田清：《海軍と日本》，中央公論新社，1981。

伊藤隆：《昭和十年代史断章》，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

藤村道生：《日本現代史》，山川出版社，1981。

白鳥令編《日本の内閣》全3巻，新評社，1981。

三輪公忠編《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日本1930年代論として》，創世記，1981。

栄沢幸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政治思想》，研文出版，1981。

額瀨厚：《総力戦体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国家総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

野村乙二郎：《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の研究——日露戦後から第一次東方会議まで》，刀水書房，1982。

藤原彰：《太平洋戦争史論》，青木書店，1982。

藤原彰：《戦後史と日本軍国主義》，新日本出版社，1982。

大原康男：《帝国陸海軍の光と影——一つの日本文化論として》，日本教文社，1982。

富田信男、瀨瀬厚等：《政治に干与した軍人たち》，有斐閣，1982。

坂野潤治：《大正政変——1900年体制の崩壊》，ムネルヴァ書房，1982。

大江志乃夫：《天皇の軍隊》，小学館，1982。

信夫清三郎：《大東亜戦争への道》，南窓社，1982。

藤原彰：《日中全面戦争》，小学館，1982。

木坂順一郎：《太平洋戦争》，小学館，1982。

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 4 太平洋戦争》，山川出版社，1982。

工藤美知尋：《日本海軍と太平洋戦争》上、下巻，南窓社，1982。

野村実：《太平洋戦争と日本軍部》，山川出版社，1983。

三宅正樹編《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全5巻，第一法規出版，1983。

伊藤隆：《近衛新体制——大政翼賛会への道》，中央公論新社，1983。

赤木須留喜：《近衛新体制と大政翼賛会》，岩波書店，1983。

大江志乃夫：《統帥権》，日本評論社，1983。

伊藤隆：《昭和史をさぐる》，光村図書出版，1984。

筒井清忠：《昭和期日本の構造——その歴史社会的考察》，有斐閣，1984。

入江昭、有賀貞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4。

五百旗頭真：《日本政治外交史》，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4。

近代日本研究会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6 政党内閣の成立と崩壊》，山川出版社，1984。

塩崎弘明：《日英米戦争の岐路——太平洋の宥和をめぐる政戦略》，山川出版社，1984。

古屋哲夫編《日中戦争史研究》，吉川弘文社，1984。

日本現代史研究会編《1920年代の日本の政治》，大月書店，1984。

天野卓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民衆運動——広島県域を中心として》，雄山閣出版，1984。

古屋哲夫：《日中戦争》，岩波書店，1985。

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中央公論新社，1985。

坂野淳治：《近代日本の外交と政治》，研文出版，1985。

吉田裕：《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もうひとつの日中戦争史》，青木書店，1986。

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岩波書店，1986。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86。

栗原健、波多野澄雄編《終戦工作の記録》上、下巻，講談社文庫，1986。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下巻，日本評論社，1987。

李炯喆：《軍部の昭和史》上、下巻，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7。

遠山茂樹編《近代天皇制の研究Ⅱ 近代天皇制の展開》，岩波書店，1987。

大江志乃夫：《日露戦争と日本軍隊》，立風書房，1987。

瀨瀨厚：《近代日本の政軍関係——軍人政治家田中義一の軌跡》，大学教育社，1987。

近代外交史研究会編《変動期の日本外交と軍事——史料と

検討》，原書房，1987。

波多野澄雄：《“大東亜戦争”の時代——日中戦争から日英米戦争へ》，朝日出版社，1988。

西岡朗：《現代のシベリアン・コントロール》，知識社，1988。

鈴木総兵衛：《聞書・海上自衛隊史話——海軍の解体から海上自衛隊草創期まで》，水交会，1988。

藤原彰、今井清一編《十五年戦争史》全4巻，青木書店，1988～1989。

五百旗頭真：《日米戦争と戦後日本》，大阪書籍，1989。

クリストファー・ソーン（市川洋一译）：《太平洋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1941～1945年の国家、社会、そして極東戦争》，草思社，1989。

茶園義男：《密室の終戦詔勅》，雄松堂出版，1989。

前田哲男、額額厚：《東郷元帥は何をしたか——昭和の戦争を演出した将軍たち》，高文研，1989。

栗屋憲太郎：《東京裁判論》，大月書店，1989。

渡辺行男：《軍縮——ロンドン条約と日本海軍》，ペップ出版，1989。

山田朗：《昭和天皇の戦争指導》，昭和出版，1990。

山田朗、額額厚：《遅すぎた聖断——昭和天皇の戦争指導と戦争責任》，昭和出版，1991。

大江志乃夫：《御前会議——昭和天皇十五回の聖断》，中央公論新社，1991。

藤原彰等：《徹底検証・昭和天皇“独白録”》，大月書店，1991。

藤原彰：《昭和天皇の十五年戦争》，青木書店，1991。

山本四郎編《近代日本の政党と官僚》，東京創元社，1991。

佐藤元英：《昭和初期対中国政策の研究——田中内閣の対満

蒙政策》，原書房，1992。

福島新吾：《日本の政治指導と課題》，未来社，1992。

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1992。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内政と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

吉田裕：《昭和天皇の終戦史》，岩波書店，1992。

柴沢幸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の権力の思想》，研文出版，1992。

古川隆久：《昭和戦中期の総合国策機関》，吉川弘文館，1992。

加藤陽子：《模索する1930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中堅層》，山川出版社，1993。

渡辺文也：《“シベリア出兵”史論修正序説》，日本図書刊行会，1993。

細谷千博等編《太平洋戦争》，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伊藤隆：《昭和期の政治》（续），山川出版社，1993。

坂野潤治：《日本政治史——明治・大正・戦前昭和》，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3。

麻田貞雄：《両大戦間の日米関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長井和：《近代日本の軍部と政治》，思文閣出版，1993。

尾崎秀実著、今井清一編《開戦前夜の近衛内閣——満鉄〈東京時事資料月報〉の尾崎秀実政治情勢報告》，青木書店，1994。

栗屋憲太郎、NHK取材班：《東京裁判への道》，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4。

山田朗：《大元帥 昭和天皇》，新日本出版社，1994。

アルフレート・ファークツ（望田幸男译）：《ミリタリズムの歴史——文民と軍人》，福村出版社，1994。

前原透：《日本陸軍用兵思想史——日本陸軍における攻防の理論と教義》，天狼書店，1994。

井上寿一：《危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日中戦争に至る対外政策の形成と展開》，山川出版社，1994。

臼井勝美：《満洲国と国際連盟》，吉川弘文館，1995。

新人物往来社戦史室編《日本軍敗北の本質》，新人物往来社，1995。

栗屋憲太郎：《十五年戦争期の政治と社会》，大月書店，1995。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

藤原彰等編《昭和二十年/1945年——最新資料をもとに徹底検証する》，小学館，1995。

吉田裕等：《敗戦前後——昭和天皇と五人の指導者》，青木書店，1995。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戦後史のなかの変容》，岩波書店，1995。

三宅正樹：《日独政治外交史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96。

山本四郎編《日本近代国家の形成と展開》，吉川弘文館，1996。

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の国家抗争——1871～1936》，岩波書店，1996。

額綱厚：《日本海軍の終戦工作——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再検証》，中央公論新社，1996。

池田順：《日本ファシズム体制史論》，校倉書房，1996。

笠原十九司：《日中全面戦争と海軍——パナイ号事件の真相》，青木書店，1997。

三谷太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岩波書店，1997。

山田朗：《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張と崩壊》，吉川弘文館，1997。

雨宮昭一：《近代日本の戦争指導》，吉川弘文館，1997。

細谷千博等編《太平洋戦争の終結——アジア・太平洋の戦後形成》，柏書房，1997。

須崎慎一：《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その時代——天皇制・軍部・戦争・民衆》，大月書店，1998。

松尾尊兌：《民本主義と帝国主義》，みすず書房，1998。

安田浩：《天皇の政治史——睦仁・嘉仁・裕仁の時代》，青木書店，1998。

西田毅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ナカニシヤ出版，1998。

森山優：《日米開戦の政治過程》，吉川弘文館，1998。

季武嘉也：《大正期の政治構造》，吉川弘文館，1998。

白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吉川弘文館，1998。

平間洋一：《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日本海軍——外交と軍事との接続》，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1998。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義史研究》，青木書店，1998。

額額厚：《日本陸軍の総力戦政策》，大学教育出版，1999。

額額厚：《侵略戦争——歴史事実と歴史認識》，ちくま新書，1999。

増田知子：《天皇制と国家——近代日本の立憲君主制》，青木書店，1999。

岡部牧夫：《十五年戦争史論——原因と結果と責任と》，青木書店，1999。

佐藤元英：《近代日本の外交と軍事——権益擁護と侵略の構造》，吉川弘文館，2000。

山口宗之：《陸軍と海軍——陸海軍将校史の研究》，清文堂出版，2000。

黒沢文貴：《大戦間期の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

古川隆久：《戦時議会》，吉川弘文館，2001。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研究史論》，校倉書房，2001。

三宅正樹：《政軍関係研究》，芦書房，2001。

山田朗：《昭和天皇の軍事思想と戦略》，校倉書房，2002。

前田哲男編《現代の戦争》，岩波書店，2002。

吉田裕：《日本の軍隊——兵士たちの近代史》，岩波書店，2002。

ハーバート・ビックス（吉田裕監修、岡部牧夫译）：《昭和天皇》上、下巻，講談社，2002。

樋口秀実：《日本海軍から見た日中関係史研究》，芙蓉書房，2002。

井竿富雄：《初期シベリア出兵の研究——“新しき救世軍”構想の登場と展開》，九州大学出版会，2003。

四 欧文文献

Robert J. C. Butow,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First Published by Mall Press 1962, Revised and Published in Peregrine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9).

Morris Janowitz,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Nobutaka Ike (e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Records of the 1941 Policy Confer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James B. Crowley, *Janpan's Quest for Automony: Nation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 - 1938*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Roger F. Hackett, *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1838 - 192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James W. Morley, *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 191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Yale C.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military Rivalry 1930 - 1945*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73).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Richard J. Smethurst,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Harold H. Sunoo, *Japanese Militarism: Past and Present* (Chicago: Nelson-Hall, 1975)

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On Professionals, Praetorians, and Revolutionary Soldiers*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1977).

William F. Morton, *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

(Folkestone: Dawson, 1980).

Volker R. Berghahn, *Militarism: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 1861 - 1979*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Volker R. Berghahn, *Militarismus: Die Geschichte einer internationalen Debatte* (Hamburg: Berg, 1986).

Eliot A. Cohen, *Supreme Command: Soldiers, Statesman, 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译 后 记

此次承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厚爱，《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的中文译本得以出版，作为译者我们非常高兴，也感到十分荣幸。

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老师纘纘厚先生，纘纘厚老师师承井上清、藤原彰，长年致力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被称作近代日本军政关系研究最高权威，也是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者之一。《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原书出版于日本岩波书店，是一本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的必读书籍。

我们翻译这本书，最初主要是出于学习的目的。本书通过大量史料，描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昭和初期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既有互相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妥协的一面。书中具体分析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道路的背景、原因，也论述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道路的整个过程。身为学习日本近代史的我们，为了准确地掌握有关知识、锻炼自己阅读日文史料的能力，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翻译的方法来精读此书。通过翻译，我们对纘纘厚老师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纘纘厚老师的分析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我们也觉得如果能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国读者，不仅能帮助广大读者深刻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还将对

我国近代史研究者、中日关系研究者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由纛纛厚老师的部分研究助手和几届研究生共同完成的。纛纛厚老师的助手是雷秀雅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承担第一章）和申荷丽博士（日本国立山口大学，承担序章及统稿工作）。参加本书翻译的纛纛厚老师的研究生有顾令仪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承担第三章、第五章及终章）、毕克寒博士（中国东北大学，承担第六章）、毛莉女士（北方民族大学，承担第四章）和郭鑫（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在读博士生，承担第二章）。

由于是几个人同时翻译，无论是遣词造句方面，还是陈述表述方面，都难免不够统一，甚至出现问题。多亏担任监译者的马彪老师大力斧正、认真审校，这些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

借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向多年来辛勤培养、谆谆教导我们的纛纛厚老师表示感谢，没有纛纛厚老师的教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向担任本书监译者的马彪老师表示感谢，没有马彪老师的辛勤劳动，本书的译文质量就难有保证；我们还要向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编辑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本书的中文版就难以问世。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尽一份微薄之力。

书中难免还存在不足、失当，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代表 顾令仪

2010年9月29日于西安